

清朝

兴起史

清の興起史



清朝
興起史

周
远
廉
著

清 朝 興 起 史

● 吉
林
文
史
出
版
社

清朝兴起史

周远廉 著

*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张 6插页 337,000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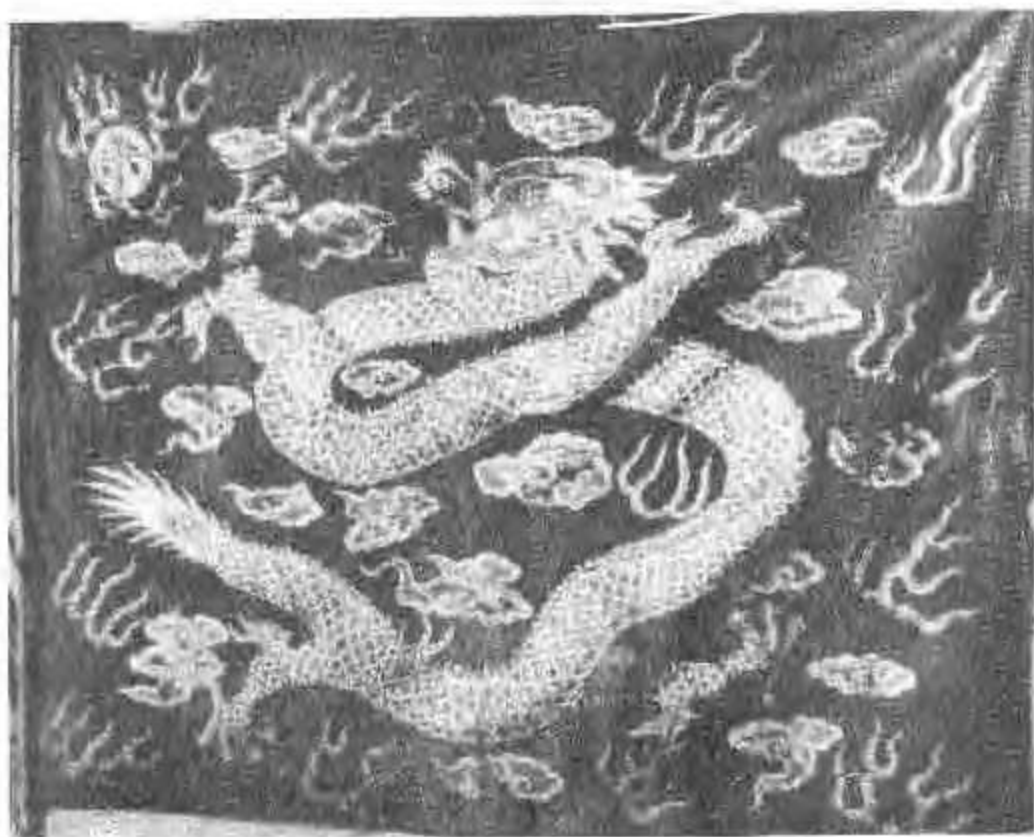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1437·42 定价：3.8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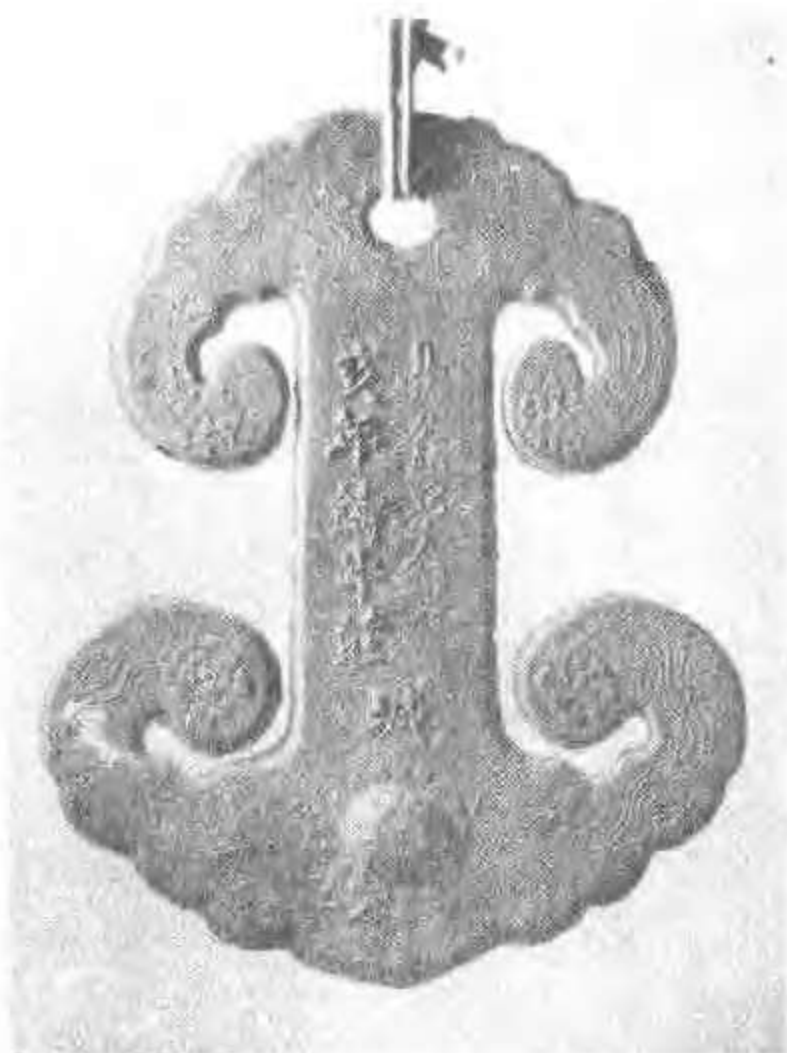
清太祖努尔哈赤画像



努尔哈赤的甲胄



八旗旗帜之一：正黄旗



云板（天命八年）



蒙古恩格德尔额驸之碑



福陵（努尔哈赤之陵）



永陵四碑亭

前 言

一五八三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四十年内，统一女真各部，屡败明军，进驻辽东，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后金国，为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统一全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清朝的兴起，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素为学术界关心和重视。在这个阶段，有许多引人深思而又很有意义的重要问题，比如，为什么清朝的兴起如此迅速，它有哪些特点？满族是怎样形成的，八旗贵族如何发展，八旗制度与八贝勒共治国政制产生的历史背景如何，为什么相继发生了诛杀皇长子、休离大福金等九大疑案，为什么后金对待汉官汉民的政策有了变化，如何评价明金之间的几次大战，满蒙联盟是怎样形成的，等等。本书拟对这些重要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周远廉

目 录

前言

第一编 (1583—1621)

第一章 女真各部的统一	(3)
第一节 建州、海西、“野人”女真	(3)
一、女真各卫	(3)
二、女真的生产水平和社会状况	(7)
第二节 “太祖”世系	(13)
一、“肇祖原皇帝”猛哥帖木尔	(13)
二、五世祖董山	(19)
第三节 癸未起兵	(26)
一、“景祖”、“显祖”之死	(26)
二、十三甲兴师	(36)
第四节 削平各部	(41)
一、群雄争长	(41)
二、统一各部	(45)
第二章 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奴隶制的扩大	(59)
第一节 经济的迅速发展	(59)
一、农业的进步	(59)
二、牧、采、猎的流行	(64)

三、工商业的发达	(68)
第二节 诸申处境的变化	(72)
第三节 奴隶制的急剧扩展	(78)
一、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 ——阿哈	(78)
二、奴隶制成为后金国的主要生产关系	(81)
第三章 满族贵族集团的形成	(87)
第一节 贝勒和台吉	(87)
一、六祖子孙	(87)
二、四大贝勒与和硕贝勒	(91)
第二节 元勋与功臣	(98)
一、五大臣	(98)
二、八固山额真	(101)
三、抚顺额驸与石乌礼额驸	(104)
第四章 后金国的建立和发展	(107)
第一节 国号和汗称	(107)
第二节 八旗制度	(114)
一、八旗制度出现的历史条件	(114)
二、由牛录到八旗	(117)
三、八旗制度的内容、性质及其影响	(122)
第五章 国初四大疑案	(129)
第一节 三都督舒尔哈齐之死	(129)
第二节 皇长子褚英的执政及被诛	(135)
第三节 大福金富察氏的休离	(141)
第四节 “太子”之废	(146)
一、军功累累的大贝勒	(146)
二、太子之过及废黜	(151)
第六章 明满关系的变化	(160)
第一节 龙虎将军	(160)
一、建州左卫都督	(160)

二、龙虎将军的册封·····	(163)
第二节 争执频仍·····	(170)
一、致书明巡抚·····	(170)
二、伐木之争·····	(176)
第三节 “七大恨”·····	(179)
第四节 萨尔浒之战·····	(189)
一、腐朽明朝欲灭建州·····	(189)
二、新兴后金大败明军·····	(197)

第二编 (1621—1626)

第一章 进驻辽东·····	(207)
第一节 辽沈之战·····	(207)
一、坐失良机·····	(207)
二、挥军猛攻·····	(211)
第二节 西征广宁·····	(219)
一、按兵不动·····	(219)
二、“经抚不和”·····	(221)
三、轻取广宁·····	(236)
第三节 辽东军民的抗金斗争·····	(242)
一、抗金斗争的历史背景·····	(242)
二、反金斗争蓬勃开展·····	(246)
第二章 过渡性质的新政策·····	(251)
第一节 “各守旧业”·····	(251)
第二节 “计丁授田”·····	(257)
一、“计丁授田”的基本情况及其阶级实质·····	(257)
二、“计丁授田”之田的生产关系·····	(262)
第三节 按丁征赋命役·····	(265)
一、封建赋役制度·····	(265)
二、诸申下降为封建依附民·····	(271)

第四节	禁杀包衣和阿哈的“首主”	(273)
第五节	天命十年的编庄	(280)
第三章	八旗贵族的发展	(284)
第一节	汗、贝勒权势的膨胀	(284)
第二节	优待女真官将	(291)
第三节	厚遇蒙古贵族	(299)
一、	满蒙联盟的历史背景	(299)
二、	恩格德尔额驸	(303)
第四节	降金汉官的任用和疏远	(310)
一、	起用废官罪臣微员末将	(310)
二、	严责众汉官	(316)
三、	惩治刘兴祚	(319)
四、	痛斥李永芳	(327)
第四章	对待汉民政策的变化	(334)
第一节	“恩养”尼堪	(334)
第二节	迁丁隶民	(339)
第三节	合食同住	(343)
第四节	捕捉“无谷之人”	(346)
第五节	天命十年十月的大屠杀	(350)
第五章	入辽以后的五大案	(354)
第一节	“虾阿哥”的贬责	(354)
一、	威震辽东的达尔汉虾	(354)
二、	扈尔汉的革任降职	(359)
第二节	幽禁阿敦督堂	(366)
第三节	额尔德尼的冤死	(372)
一、	“一代杰出之人”	(372)
二、	大巴克什的惨死	(376)
第四节	审讯乌尔古岱额驸	(384)
一、	“哈达贝勒”	(384)

二、惩治王督堂	(388)
第五节 训斥四贝勒	(391)
第六章 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	(399)
第一节 “共治国政”制产生的历史条件	(399)
第二节 “共治国政”制的基本内容	(403)
第七章 宁远之战	(412)
第一节 城下之败	(412)
第二节 英明汗去世	(418)
附录 大事年表	(422)

第一编

(1583——1621)

第一章 女真各部的统一

第一节 建州、海西、“野人”女真

一、女真各卫

后金国是满族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以女真为主，吸收汉、蒙等族人员参加，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满族最早的先人，是夏、商、周时期的肃慎。肃慎的后裔，汉、唐的挹娄、勿吉、靺鞨，宋、辽、金、元、明的女真，为开发东北、华北广大地区，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丰富祖国文化宝藏，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的女真，分为建州、海西和“野人”女真三大系统，其下各有若干大小不等的部落。建州、海西女真，原先以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为中心，散布于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东至海岸，入明以后，逐渐南徙。建州女真的一支建州卫，明宣德八年(1433)移居婆猪江支流富尔江上游的吾弥府(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不久，在酋长李满住带领下，迁往灶突山(今辽宁新宾县境内)浑

河上流苏子河畔，并于正统三年(1437)六月向明帝奏报，表示要“仍旧与朝廷效力”。^①建州女真的另一大支，建州左卫，几经迁徙，最后于正统五年也来与建州卫同住，定居在苏子河。到了明末，建州女真，人丁滋生，部落日繁，分布在抚顺以东的浑河流域，东至长白山，南达鸭绿江。海西女真，陆续迁至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到松花江中游。“野人”女真，部落众多，相继迁居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阔地区，从松花江下游，到黑龙江流域，东至海岸。

明朝政府对女真诸部十分重视，大力招抚，设置卫所，进行管辖。永乐元年(1403)，始置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女真头人阿哈出为指挥使，赐诰、印、冠带裘衣及钞币。^②永乐二年设奴儿干卫，三年置毛怜卫，到七年，在斡难河、黑龙江、嫩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亨滚河等流域，共设一百三十个卫所，任命了大批女真头人为指挥使、千户和镇抚，并专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③正统十二年(1447)，共有女真卫所二百零四及五十八个地面(城、站)，万历时，增至三百八十一卫及三十九个千户所地面(站、寨)，分设在西起鄂嫩河，东辖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包括整个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

女真卫所与明朝政府之间，是中央与边疆地方的上下隶属关系，这从明帝赐给各卫的敕书，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满文老档》载录了明成祖朱棣颁给建州女真毛怜卫指挥使司指挥僉事宁布尔罕的敕书，译录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朕思，帝者治国，为使天下一家，整治大军，使民安康，远近无别，皆委诸臣管辖。尔宁布尔罕，虽

① 《明英宗实录》卷43。

② 《明太宗实录》卷24。

③ 《明太宗实录》卷62。

居于边境之地，犹思天遣而来归者也。知天时，明事务，尔心深远，故自众擢出。朕嘉尔识忠义，何故嘉而不赏？先曾赐尔毛怜卫指挥使司之指挥僉事之职，今特晋尔为同卫怀远将军，世袭指挥同知。尔若愈加坚信天道，善贤恭勤，禁约管辖尔之属下兵民，看守边境地方，使之平安，狩猎，育养牲畜，任意繁殖万物，始终无恶，天必慈鉴，赐福及尔之子子孙孙，进而贵也。其勿轻违此义，切切。”^①

根据这道敕书，结合《明实录》等文献，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嘉奖归明忠臣，擢任明朝政府地方军政机构官员。明帝敕称，因宁古尔罕“知天时，明事务”，归顺朝廷，服从中央政权，故予嘉奖，前曾授为明毛怜卫指挥使司的官员指挥僉事，现又加官晋级，升为本卫怀远将军，世袭指挥同知。按明制，女真各卫的官员，皆由明帝封授。明政府对女真各部头人，分别封为某卫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僉事、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僉事、千户等职。后来，有的还因立功或人多势强，被封为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个别的首长还特别封授龙虎将军的崇高职衔。一般是世代延续，父死子继，无子绝嗣则由亲族承袭，但皆须报明帝批准。

封授女真卫所官员时，明帝都要赐给“诰、印、冠带袭衣”。“冠带袭衣”是明朝的官服，明朝官员各按品级职衔穿戴不同的冠、带、朝服和常服。诰是诰敕。印是官印，由礼部铸给。女真卫所官将接受“诰、印、冠带袭衣”，既表明今后他们都是明帝的臣仆，应对皇帝效忠，服从调遣，恪遵国法；又意味着他们得到了明帝授与的权力和特权，可以凭藉明朝官员的资格，行使明朝政府给与的权力，管治属下军民。因此，明代文献中常有女真官员奏讨诰敕、印信、冠服以便治辖部众的记载。明帝也曾将这

^① 《满文老档·太祖》，158。

个意思，多次谕示女真各部首领。例如， 正统九年(1444)， “敕谕兀者卫都督刺塔、亦里察河卫指挥哈刺、纳木河卫指挥沙笼及大小头目人等曰：昔我祖宗临御之时，尔等父祖遵事朝廷，特设卫授官，给与印信，管束人民，保障边境。”^①

第二，责令各部酋长为帝尽忠效劳，不许谋反叛逆。明帝敕称，宁布尔罕既然担任明朝官员，就要“坚信天道，善贤恭勤”。所谓“坚信天道”，就是谕令宁布尔罕坚决忠于明帝，因明帝是“奉天承运皇帝”，所行之事，皆系奉天之命，宁布尔罕当然要遵依帝旨，当然应该为君效劳，也就是要“善贤恭勤”。尽忠效劳的具体内容很多，如引导属人耕田种地，猎捕禽兽，依时朝贡，遵守国法，服从调遣，等等，而最主要的是“始终无恶”，即不得叛逆，要严格“禁约管辖”部众，不许他们为非作歹、抢掠盗窃，不许危害地方安宁。^②明朝政府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多次降敕训诫。成化三年(1467)四月，以建州、海西女真各卫经常劫掠人口和牲畜，明帝特遣中军署都督金事武宗，敕谕考郎兀等四十四卫首领，晓谕朝廷厚恩，强调女真卫所是“朝廷属卫”，人丁是“朝廷赤子”，命令各部头人“全臣节”，“守国法”，停止行劫，否则将发大军征剿。其敕如下：

“敕谕考郎兀等四十四卫都督撒哈良等曰：尔女直卫分，乃我祖宗所设，世授尔以官职，积年朝贡，所得赏赐，亦已

① 《明英宗实录》卷112。

② 女真卫所官员必须遵命从征，捕盗平叛，为帝效劳。明帝多次调令各卫官兵率部随军厮杀，永乐十九年(1421)，敕辽东总兵官都督朱荣于所属卫分“并鞬鞞、女直、高丽寄往安乐、自在州官军内，选精锐五千，以七月率至北京”，毛怜卫指挥使猛哥不花便“率子弟、部属从征者”，奉命至京(《明太宗实录》卷120、122)。正统九年(1444)，敕谕亦里察河卫、纳木河卫都督刺塔等人说：近闻有人来蛊惑为非，“尔等自宜坚秉忠诚，互相戒飭，严禁部属，遇有境外蛊惑为非之人，少则即便擒拿至京，多则会合军马擒杀，具奏来闻，重加升赏”(《明英宗实录》卷112)。

厚矣，正当感恩图报，以全臣节。今乃背义忘恩，纵其部下，犯我边境，边将屡请起调大军，直捣尔境征剿。朕念尔处人民，俱是朝廷赤子，中间有善有恶，不可一概诛戮，特广天地之量，姑置不究。仍降敕示尔，尔宜敬顺天道，深体朝廷好生之德，戒谕部属，令其革心向化，改过自新，即将原掠人畜一一送还，以赎前罪，自今各安生理，依时朝贡，永享太平之福。若仍长恶不悛，大军一出，追悔无及矣。尔其钦承朕命，毋怠毋忽。”^①

从上所述，散处东北广大地区的各部女真，被明朝设立卫所后，封授官职，赐敕颁印，穿戴明朝官服，隶属“朝廷统治”，谨守“朝廷法度”，按时朝贡，为帝效劳，听从差遣，服从裁处，立功受奖，违法被惩。这些事实表明，女真卫所是纳入明朝政府版图的“朝廷属卫”，是受到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军政机构，所有女真“俱是朝廷赤子”，都是隶属明帝的庶民。

二、女真的生产水平和社会状况

建州、海西、“野人”女真，居住分散，人丁悬殊，生产水平有高有低，社会发展阶段不尽相同。总的来看，建州、海西女真比较“野人”女真进步一些。

十五世纪三十年代到十六世纪初，牛耕和铁制农具的使用，在建州、海西女真中已比较普遍，农业已成为“资生”的很重要的部门。正统二年(1437)，朝鲜人潜入建州卫指挥使李满住部侦察，在兀喇山北隅吾弥府，“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满野”。朝鲜人说，李满住部，“虽好山猎，率皆鲜食，且有

^① 《明宪宗实录》卷41。

田业，以资其生”。^①弘治四年(1491)，海西女真尼麻车部，住茅房，“室大洁净，又作大柜盛米，家家有双砧，田地沃饶，犬、豕、鸡、鸭，亦多畜矣”。^②嘉靖六年(1527)谪戍三万卫的监察御史卢琼，在其所著《东戍见闻》中总结性地指出：建州女真“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海西女真，“俗尚耕稼”。从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明代辽东档案看，在女真与汉人的大规模交易中(详后)，未见有女真人购买粮食的记载，相反，米粮却是建州女真在抚顺马市上出售的重要货物，明人多次以猪牛等物和建州女真交换粮食。可见，女真的农业生产已有相当水平。

畜牧业仍占比较重要的地位，马匹一直是女真与汉族交易的货物，^③牲畜甚至还起着一定的货币作用。成化五年(1469)三月，建州女真柳尚冬哈向朝鲜索要逃奴三之莫之说：“我以牛马购奴婢。”^④建州女真沈吴应只，以马一匹，从毛怜卫女真买得汉人幼童刘时。^⑤

女真人喜爱狩猎，采集也很流行。女真地区盛产人参、珍珠和各种皮毛，是卖与汉族的主要货物。海西女真都骨屯部，有的女真人，一家就有貂鼠皮三百余张。^⑥

女真人的手工业很不发达，很多部落不会开采矿山冶炼钢铁，没有种植棉花，只能织麻布(建州)，不知道养育蚕子缫丝织帛，也不会煎煮食盐。虽有很少的匠人，也主要是打造与兵猎有关的器械，如从明和朝鲜买铁及铁制农具，制作弓箭。

女真与明人的贸易相当频繁，主要是以打猎、采集所得人

① 《朝鲜世宗实录》卷77。

② 《朝鲜成宗实录》卷259。

③ 明政府发给女真各卫敕书一千五百道，每年每道敕书许一人入京朝贡，带马一匹。马市上，每年女真都要卖出很多马。

④ 《朝鲜世祖实录》卷45。

⑤ 《朝鲜成宗实录》卷152。

⑥ 《朝鲜成宗实录》卷255。

参、貂皮，以及马匹等，易换耕牛、农具、食盐、布帛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大多是通过入京朝贡及在开原、抚顺等处马市进行的。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明代辽东档案，详细记录了当时女真与汉族频繁往来、贸易兴旺的情形，现引录两段材料如下。

建州女真在抚顺马市的交易：

“（万历六年五月）初六日，夷人曹乃奇等七十八名到市，与买卖人化朝羊等交易，行使猪牛等物，换过麻布、粮食等货，一号起三十一号止，共抽税银八两二钱一分五厘。”“（万历六年七月）十二日，落雨。夷人宁弓提等五十名到市，与买卖人王世爵等交易，行使猪牛等物，换过木耳、麻布等货，一号起三十号止，共抽税银七两四钱四分四厘。”^①

海西女真叶赫部进入开原镇北关马市的交易：

“（万历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一起。镇北关进入夷人卜寨、那林孛罗差易失八里、兀太等七百九十名到市，与买〔卖人〕李九羔等易换貂皮等物，共抽银三十六两一〔钱〕……。

一，入市货物抽银九两六钱四分五厘：缎八匹半，抽银八钱五分。袄子十九件，抽银二两八钱五分。铤子三百五十三件，抽银一两七钱六分五厘。水靴十四双，抽银二〔钱八分〕……牛七只，抽银一两七钱五分。羊四只，抽银八分。

一，易换货物抽银二十六两五钱三分二厘。貂皮六百三十九张，抽银一十五两九钱七分五厘。马十一匹，抽银七两七钱。珠子三颗，抽银四钱。参九十九斤半，抽银九钱九分五厘。鹿皮二张，抽银四分。羊皮一百六十张，抽银二钱一分四厘。狗皮二十一张，抽银一钱五厘。羊皮袄一件，抽……狐皮八十四〔张，抽银八钱四分〕……蘑菇一百一十二斤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105号，《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各项清册》，万历六年八月。

半，抽银七分五厘。狼皮一张，抽银二分。睡皮十张，抽银一钱。水獭皮三张，抽银六分。”^①

根据万历六年(1578)八月、十一年九月、十二年三月记载抚顺、开原马市交易的三份明档，我们可以看出女真与汉民的交易相当频繁，基本上是三日一市，有时间日一市。双方的人数很多，海西女真一批动辄数百人，叶赫部都督逞加奴、仰家奴，哈达部都督猛骨孛罗、歹商，经常率领部属八百名、九百名入市交易，最多的一次达一千一百八十名。仅在万历十一年七至九月和十二年一至三月的半年内，海西女真进入开原镇北关、广顺关马市买卖货物的人员，有一万一千八百七十四名，这还不包括档案残缺无法统计的人数。进行交易的货物，品种很多，数量很大。上列半年内，开原“买卖人”买进貂皮四千七百二十四张、狐皮五百七十七张、狗皮七百六十一张、羊皮一千七百四十三张、人参三千六百一十九斤、蜜一千四百六十斤(皆未包括残缺未计的数量)，还有鹿皮、牛皮、水獭皮、狼皮、睡皮、豹皮、马、蘑菇、松子、木耳、木楸、马尾、珠子、榛子、蜡、毡等物。女真人则买回了大批耕牛、农具等必需品。叶赫部都督仰加奴等，一次就买进铍子三百三十五件、牛九十五头、锅二十口。其侄卜寨有一次派遣亦失八里等进入镇北关，买了袄子一百零三件、铍子一千一百三十四件、锅九十五口、牛十五头。半年内海西女真叶赫、哈达等部共买进铁铍四千八百四十八件、牛四百九十七头、锅三百四十五口、袄子六百三十一件。^②

女真还通过“抚赏”方式领取物品。明政府以种种名义对女真卫所官民实行“抚赏”，比如，进京朝贡有赏，入市买卖有赏，传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107号，《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清册》，万历十二年三月。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107号，《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清册》，万历十二年三月。

述事件有赏，入京回还告讨下程有赏，进送汉人有赏，报告消息有赏，“告讨”有赏，等等，除给以酒饭款待外，还发给大批铁锅、食盐、布帛纸张等物。有一次“抚赏”海西女真哈达部“买卖夷人都督”猛骨孛罗，用了以下物品：

“棹面七张，折猪肉二十五斤六两，连酒用银四钱四厘八毫。牛二只〔残缺〕。下程猪肉一百斤，用银一两四钱三分。酒一百壶，用银六钱六分六厘六毫。酒二海，用银〔残缺〕。羊二只，用银八钱。炭二十包，用银二钱。好酒二壶，用银四分。许纸一百〔残缺〕。铎子八件，用银三钱二分。青布一匹，用银一钱。平花缎十八匹，用银一十〔两零八钱〕。官白中布三匹，官锅四十四口，官盐八百四十斤。”^①

据不完全统计，从万历十一年七至九月和十二年一至三月的半年内，海西女真在开原镇北关、广顺关，通过“抚赏”，领得布一千零五十五匹、锅一千六百六十九口、盐三千二百三十斤及其他物品。^②建州女真于万历六年七月初一至八月二十二日的五十二天里，得到“抚赏”的布一千零一十匹、锅一千一百八十九口、盐四千五百九十二斤。^③

在抚顺、开原马市上，女真人卖出了大量人参、珍珠、皮毛，到得很多银两。万历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海西女真哈达部都督猛骨孛罗、歹商率众一千一百名，进入开原广顺关马市，卖与汉族“买卖人”貂皮一千八百零三张、羊皮一百五十三张、狍皮一百六十八张、狐皮一百八十六张、马八匹、珠子一颗、蜜六十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107号，《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清册》，万历十二年三月。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107号，《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清册》，万历十二年三月；乙108号，《马市抽分银四柱清册》，万历十一年九月。

③ 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106号，《都指挥金事戴良栋呈报互市抽银清册》，万历六年十二月。

斤、人参一百六十九斤，以及其他物品。^①人参照低价一斤卖银九两计算，一百六十九斤参当售银一千五百二十一两，貂皮、狐皮、狍皮二千余张，又可卖银上千两。仅万历十一年七至九月和十二年一至三月的半年内，除去残缺不计外，海西女真在开原马市卖出的人参三千六百一十九斤，当售银三万二千五百多两，至于貂皮四千七百二十四张、狐皮五百七十七张、狍皮七百六十一张，以及其他珠子等物，又可售银上万两。

铁制农具和耕牛的大量输入，对促进女真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提高生产率，增加粮食产量，起了很大的作用。交易的频繁，人参、蘑菇、貂皮、狐皮等大量出售，银两的增多，使采集和狩猎远远超越了自己消费的范围，增加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因素，促进了私有制的发展。这一切，为建州、海西女真向更高社会阶段的过渡，提供了物质条件。

明朝末年，建州、海西女真各部，基本上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土地公有，部落成员可以自由耕耘、渔猎和采集，没有赋税，没有监狱和法庭，没有专职官僚，没有军队，遇逢征战，部众自由组合共同厮杀。诸申是女真的主要成员，人数最多，影响很大，分化已经比较明显。他们与部长、寨主(亦称为“贝勒”、“台吉”)之间基本上还是平等的关系，可以“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部长、寨主等酋长，一般都有一些阿哈(奴隶)和少量“古楚”(gucy，意为朋友、同伴，后来转化为近臣、僚臣)，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正力图向真正的贝勒——统治者转化。阿哈是奴隶，为主耕田种地，牧放牲畜，猎捕兽禽，从事家务劳动，人数较少，一般都是被掠的明人和朝鲜人，当时还没有发生迫使本族人为奴隶的情况。随着生产的提高和私有制的发展，建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107号。

州、海西女真正在开始逐步进入奴隶社会。^①

第二节 “太祖”世系

一、“肇祖原皇帝”猛哥帖木尔

关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先，《武皇帝实录》等文献，有一段十分生动的记述。该书载称，在长白山东北布库里山下，有一个湖泊，叫布儿湖里，恩古伦、正古伦、佛古伦三位仙女来浴于泊，浴后，佛古伦吞食神鹊衔来的仙果，感而怀孕，生下一子，“生而能言，倏尔长大”，姓爱新觉罗，名布库里雍顺，相貌非凡，举止奇异。佛古伦给他一条船，叫他顺流而下，将来当为国主。布库里雍顺乘船到了鳌朵里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南），平息了当地的纷争，被推为城主。这就是满洲的始祖，也是努尔哈赤最早的先祖。

这种说法固然并不准确，但是，这个美妙动听的传说，也不是全无根据的，它曲折地反映了努尔哈赤的祖先，曾经是女真某个部落的首长。就此而论，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据可靠的文献记载，努尔哈赤的先祖，有籍可查的，当上溯到元末明初的建州女真一个部落的头人猛哥帖木尔，这就是《武皇帝实录》载述的努尔哈赤的六世祖都督孟特木，后来追尊为“肇祖原皇帝”。早先，猛哥帖木尔驻牧斡朵里（即上所说鳌朵里），是元朝封为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

明洪武元年（1368），大将军徐达率兵取大都（北平），元亡，

^① 关于建州、海西女真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问题，详见拙著《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本书就不一一论证了。

顺帝北遁，东北地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洪武初，故元遗将各据一方，丞相也速据大宁，丞相也先不花屯开原，平章洪保保驻辽阳，平章哈剌不花占复州，平章高家奴聚平顶山，平章刘益屯得利羸城，左丞相纳哈出据金山，互相争战，掳掠人畜，“野人”女真也频繁劫掠，东北大乱。猛哥帖木尔感到难以应付，遂率众南迁，移居图们江下游训春江(珲春江)流域，依附于高丽国东北面朔方江陵道都统使李成桂。此即朝鲜《龙飞御天歌》所谓“入侍潜邸”。洪武二十五年(1392)，李成桂取代高丽恭让王，自立为君，改国号为朝鲜，猛哥帖木尔数至其都城“献方物”，成为朝鲜的吾都里万户。^①

永乐元年(1403)六月，明成祖欲招抚女真，设立卫所，遣使朝鲜，宣告“皇帝敕谕”说：“女真吾都里、兀良哈、兀狄哈等招抚之，使献贡。”^②十月，设建州卫，以阿哈出为指挥使。^③二年四月又遣使臣王可仁赉敕，前往女真地区，宣布“朕即大位，天下太平，四海内外，皆同一家”，谕劝女真各部归顺，如果听从“朕言”，则“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牧放，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共享太平之福”。^④明成祖朱棣从建州卫指挥使阿哈出那里了解到猛哥帖木尔聪睿练达，有归明之心，于永乐三年三月特遣使臣王教化的专往招抚，并谕告朝鲜国王，令其协办此事说：“皇帝敕谕朝鲜国王：东开原毛怜等处地面万户猛哥帖木尔能敬恭朕命，归心朝廷，今遣千户王教化的等赉敕劳之。道经王之國中，可遣一使与之同行。故敕。”^⑤

① 《朝鲜太祖实录》卷12；《朝鲜太宗实录》卷1。

② 《朝鲜太宗实录》卷1。

③ 《明太宗实录》卷24。

④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8页。以下此书简写为《李朝实录史料》。

⑤ 《朝鲜太宗实录》卷9。

朝鲜国王李芳远(李成桂第五子)，以猛哥帖木尔是“东面之藩篱”，不愿让他及其他流寓境内的建州女真受明封职，或返回明国，设法阻挠，特赐猛哥帖木尔“庆源等处管军万户印信一顆”、清心丸十丸、苏合元三十丸及其管下八十二人木绵布、白苧布若干匹，并数遣官将前往，诱劝猛哥帖木尔“勿从朝廷使臣之命”，力沮其归明之愿。^①

这对猛哥帖木尔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是受明封赐，他日率领部众返回故国，还是长期流居朝鲜，永为其臣？如以明帝为君，离开旧居二十余年，宫殿已换新主，明帝会怎样对待？朝鲜国王能否放行，是否将断绝粮盐布帛供应，多方威逼，甚至遣军剿杀，闹得家破人亡？设若拒明之命，永居朝境，既将遭受异邦压制，又失去了以后归返故国的大好机会。

正在这徬徨难定的时刻，王教化的到了猛哥帖木尔居住地方，多方劝抚，并宣读了永乐皇帝的敕谕。敕书说：

“前者阿哈出来朝，言尔聪明，识达天道，已遣使赉敕谕尔。使者回复，言尔能恭敬朕命，归心朝廷，朕甚嘉之。今再遣千户王教化的等，赐尔彩缎表里，尔可亲自来朝，与尔名分赏赐，令尔抚安军民，打围牧放，从便生理。其余头目人等，合与名分者，可与同来。若有合与名分，在彼管事不能来者，可明白开写来奏，一体给与名分赏赐。故敕。”^②这道敕书讲了六个问题：

第一，由于猛哥帖木尔“识达天道”，即能适应元亡明兴的局面，愿意放弃过去为元臣僚的“万户”职衔，敬遵中原新君的旨意，“归心朝廷”，因而得到了永乐皇帝的嘉奖，遣派使臣前往招谕。

第二，明帝谕劝猛哥帖木尔“亲自来朝”，以便给与“名分赏

^{①②} 《朝鲜太宗实录》卷9。

赐”。“名分”，就是官职。明帝依据设立女真卫所封授头人职衔的先例，要猛哥帖木尔亲自入京朝贡，从而封赐官职。猛哥帖木尔接受了这个职衔，就成为明帝的臣仆，当上了明朝政府的地方官员，就要“抚安军民”。这个“抚安军民”，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方面，猛哥帖木尔既然蒙受君恩，荣任要职，就得到了明帝授与的“抚安军民”之权，即得到了统治属下人员之权，可以凭藉这个权力加强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猛哥帖木尔身为明臣，有义务为朝廷效劳，要忠于皇上，不能为非作歹，叛逆不法，也就是说要管辖部属，安分守法，禁止他们扰乱边境，劫掠人畜。这是一切女真卫所官员必尽的义务。因为这次是谕劝来朝，重点在招抚，故这层意思没有详述。

第三，帝谕给与猛哥帖木尔“赏赐”。“赏赐”虽只二字，却包含了重要的具体内容，有相当多的物质利益，即可以通过入京朝贡领取银帛衣帽等优厚赐物，出售土特产品，买回(或领赏)耕牛、农具、食盐等等生产、生活必需用品，若遇特大天灾人祸，还可奏讨赐物(米、盐、牛等)，度过难关。

第四，明帝并不强迫女真卫所人员放弃旧俗，改从汉制，女真可以照样“打围牧放”，以农为主的可以照旧耕田种地，打牲的继续进山猎捕兽禽，采挖人参，捞拾珠子，“从便生理”，一切都可依照多年传统继续进行。

第五，明帝不干预猛哥帖木尔属卫内部人员升降事务，给与保举官员的权力，哪些头目当封，应授何职，皆由猛哥帖木尔“开写来奏”，依奏批准，授与“名分”(官职)。这样一来，不仅维护了猛哥帖木尔在部落中原有的影响，而且有利于扩大他的势力，提高他的威望，巩固他的地位。

第六，有了这道敕书，成为明朝官员，猛哥帖木尔就找到了一个强大的后盾。过去，他只能以一个部落的女真头人的资格，

与朝鲜往来，不得不称臣纳贡。如果朝鲜国王施加压力，甚至发兵征剿，只有孤军奋战，以少敌众，以弱对强。现在不一样了，受封之后，就是明朝地方军政机构官员，就是大明天朝的臣属，就可寻求明帝的支持，对付朝鲜的压制。

根据敕谕及王教化的劝说，猛哥帖木尔决定率领部众，归顺明帝，但又怕朝鲜国王阻拦和侵袭，因此一面收拾行装，准备亲赴明都受封，一面又设计敷衍，对朝鲜官将东北面都巡问使吕称佯说，如若进京，虑被其他女真及倭寇掳掠，“以是忧疑未决”，对大护军李愉，则伪告“我等不从朝廷招安”。朝鲜国王信以为真，放松了警戒，并于五月派专使人明，告称猛哥帖木尔因避其他女真袭扰，来到本国东北居住，授与“镜城等处万户职”，不愿返明，奏请将他及其管下百余户留下，继续在朝鲜附藉当差。^①明帝甚怒，于七月初五训诫来使，不仅不允其请，而且严厉责备国王不放猛哥帖木尔是对君不敬，宣称：“猛哥帖木尔，皇后之亲也。遣人招来者，皇后之愿也”。^②使臣急忙返朝，朝鲜国王立即上奏认过，表示迅即督送。但就在使臣回朝之前的十几天，猛哥帖木尔已于九月初三日同王教化离家出发，前往北京朝拜皇帝去了。^③

猛哥帖木尔进京叩拜后，永乐皇帝授以建州卫指挥使之职，“赐印信、钹花金带”，赐其妻幃卓“衣服、金银、绮帛”。猛哥帖木尔害怕受到朝鲜兵马袭击，于永乐九年迁往建州卫释家奴居住的奉州，在今吉林市南辉发河流域一起耕牧。永乐十一年至十四年间，明廷另设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尔掌卫事。

猛哥帖木尔对明朝中央政府十分忠顺，除遣部众进呈礼品外，还多次赴京朝拜，贡献马匹方物，仅据《明实录》的记载，从

^{①②③} 《朝鲜太宗实录》卷9。

永乐十一年至宣德八年(1413—1433)的二十一年里，他就亲自入京朝贡七次，明廷依例宴待，赐给彩币、表里等物。^①

猛哥帖木尔经常为明帝效劳。永乐二十年三月，明成祖朱棣率领大军亲征鞑靼和宁王阿鲁台，猛哥帖木尔随军征战。事后，为防鞑靼报复，猛哥帖木尔上疏说：“达达(鞑靼)常川往来搅扰，边境去处，住坐不得”，奏准迁往朝鲜会宁居住。^②

明帝以猛哥帖木尔忠顺尽力，一再嘉奖，宣德元年(1426)正月晋为都督佥事，赐冠带，八年二月再进右都督。^③其弟指挥佥事凡察奉兄之命，于宣德七年二月入京贡献马匹方物，领受钦赐钞币、绢、布，三月又因“招谕远夷归附”之功，升为都指挥佥事。^④

明廷以原三万卫千户鞑靼杨木答兀掳掠军民牲畜，逃往斡木河流域，令猛哥帖木尔和凡察将其裹胁的辽东兵民送还京师，并派辽东都指挥佥事裴俊带领官兵一百六十名，前往“招取杨木答兀下漫散人口”。宣德八年闰八月十五日，杨木答兀勾引阿速江等卫“野人”阿答兀、弗答哈等三百余人“前来抢杀”，众寡不敌，十分危急。这时，凡察及猛哥帖木尔之子阿谷等，人人奋勇抵挡，负伤力战，猛哥帖木尔带领部众前来救援，杀退敌兵，迎接裴俊到斡木河本部住地。十月十九日，杨木答兀又“纠合各处野人”八百余名，围住猛哥帖木尔、凡察、阿古歹等家及裴俊营寨，烧毁阿谷大门。身为大明都督，聪睿机智、英勇顽强、威震各部的女真人猛哥帖木尔，为效忠明帝而奋勇战死，阿谷及其他在家男子亦皆死难，妇女牲畜被掠，努尔哈赤的先祖遭到了巨大灾难。^⑤

① 《明太宗实录》卷90、100、124；《明仁宗实录》卷5；《明宣宗实录》卷12、13、99。

②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303——306页。

③ 《明宣宗实录》卷13、99。

④ 《明宣宗实录》卷87、88。

⑤ 《明宣宗实录》卷99、108；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373、374页。

二、五世祖董山

明宣德八年(1433)十月十九日猛哥帖木尔战死以后，其子董山(亦名董仓、充善)与阿古之妻，被“七姓野人”掳去，家财尽失，部众死亡亦多，余者“流离四散”，“存者无几”，唯凡察逃脱。凡察竭力收集余部，并上奏明帝，请求发兵征剿阿速江等卫“野人”头目弗答哈等。明帝两次遣使赉敕，谕令弗答哈归还所掠人马资财，又以凡察救援都指挥僉事裴俊有功，升为都督僉事，掌建州左卫事。^①不久，董山及阿古之妻为毛怜卫指挥哈儿秃等赎回。年轻的董山返回阿木河后，外有仇敌“野人”迫胁，朝鲜兵马亦“往来搅扰，不得安稳”，内有叔叔独掌卫事，亡父多年辛苦创建之业，毁于一旦，部众零落稀少，屈服于叔，处境十分困难。要摆脱这个危局，最迫切的是必须尽速离开朝鲜，返回明国，先解决外忧，以后再与凡察叔叔商议卫事。因此，凡察与董山一再上奏，请求迁往灶突山苏子河畔，与建州卫李满住部合住。几经周折，长达三年之久，正统五年(1440)，凡察、董山终于率领部分属民，逃出朝鲜，来到苏子河口，人疲马乏，衣食艰难。明帝闻悉，敕谕凡察说：“今已敕辽东总兵官曹义等，安插尔等于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处。尔等若果粮食艰难，即将带回男妇口数，从实报与总兵镇守官，给粮接济，听尔自来关给。……尔等既改过复归，须要始终一心，敬顺天道，不许复怀二三之意。尤宜约束所部人员，谨守朝廷法度，自在耕牧，安分生理，永享太平之福，毋仍侵犯邻境，以取罪愆。”^②

董山虽然年轻资浅，势力单薄，但骁勇善战，锐意进取，竭

^① 《明宣宗实录》卷108、110。

^② 《明英宗实录》卷71。

力招集旧部，重振家业。他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从叔叔凡察手中夺回建州左卫的大权，以便重振父威，并进一步更好地进行称霸女真的事业。首先是印信之争。明帝因猛哥帖木尔被杀，建州左卫之印被“七姓野人”抢去，乃颁新印，令凡察掌管。正统二年十一月，董山袭封建州左卫指挥使后，上奏明帝说“旧印已获”，其意显然是要继承父业，独握印信，掌管建州左卫。凡察知悉，立即上奏，求留新印，含意也是对左卫权力的争夺。正统三年正月，英宗敕谕凡察、董山，宣告：“一卫二印，于法非宜。敕至，尔等即协同署事，仍将旧印遣人送缴。”^①董山的要求，虽未完全批准，但至少已取得了“协同署事”的成果，可以分享一部分权力。开始打破了凡察独掌印信、独主卫事的局面。此时，他们正忙于筹备迁徙，故这一争端暂告中止。

正统五年迁住苏子河以后，董山与凡察的矛盾，又重新尖锐化了。六年正月，以董山部属指挥使塔察儿等来朝，“为董山乞恩”，明廷遂升董山为都督佥事。^②这样一来，在官阶职衔上，董山便与凡察一样，可以平起平坐互不相下。

凡察感到形势逐渐不利，遂想取消董山协同署事之权，欲图独掌，但遭到了明帝的拒绝。正统六年六月，明帝降敕，谕告凡察、董山说：“往岁冬，因尔一卫存留二印，已尝遣敕，谕尔凡察、董山协同署事，将新印进缴。今尔凡察乃奏董山不应署事，都指挥李章加等又奏保凡察独掌卫事，此事朕处置已定，岂容故违。敕至，尔等即遵依前敕，存留旧印，随将新印缴来。”^③随即又令辽东总兵官曹义遣人往察二人不和之故及部众意愿，上报处理办法。

曹义召见凡察、董山，询问部众意见后，于正统六年八月上

① 《明英宗实录》卷38。

② 《明英宗实录》卷75。

③ 《明英宗实录》卷80。

报朝廷说，“部落意向，颇在董山，而凡察快快，终难安靖”，建议增设建州右卫，“以处凡察”。^①明帝同意，于七年二月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升都督佥事董山为都督同知，掌左卫事，都督佥事凡察为都督同知，掌右卫事，董山收掌旧印，凡察给与新印收掌，从二人奏保，擢升塔察儿等人官职，并敕谕董山说：“尔奏保都指挥佥事塔察儿等十人，皆尝效劳于边，悉升官职，听尔部分。……尔与凡察，旧本一家，今既分设两卫，特遣敕谕尔处大小头目人民，听从所愿分属。自今宜严飭下人，毋相侵害，以保尔禄位，延及子孙。”谕凡察之敕，亦与此同。^②

据辽东总兵官曹义的察询及朝鲜边将了解的下情，建州左卫的女真人，大多倾向于猛哥帖木尔之子董山，若按敕谕所说，“听从所愿分属”。那么，董山的建州左卫，人员理应比右卫多得多。不管怎样，董山总是基本上取胜了，成为建州左卫的“掌卫事”都督同知。

分卫之初，三卫之中，建州卫最强，右卫次之，左卫最弱。建州卫第一任掌卫之人，是有名的酋长阿哈出，其女于洪武年间嫁与燕王朱棣。从阿哈出到其孙都督佥事李满住，祖孙三代，没有遭到重大打击，四十余年的经营，兵强马壮，人丁众多，家贤富豪，是当时女真各部实力最强的大酋长。右卫的凡察，虽经变乱，但毕竟年富力强，又独掌了一段卫事，也聚集了相当多的人员。左卫董山，处境最差，父兄惨死，祖产尽失，年轻望浅，人丁不多。但是，形势是不断变化的，由于董山的艰苦奋斗，尽量利用明帝的厚待，招兵买马，势力迅速膨胀，兼之李满住、凡察相继老病，不到二十年，董山便一跃而为威震各部的女真名酋了。

① 《明英宗实录》卷82。

② 《明英宗实录》卷89。

董山掌卫初期，对明朝中央政府十分恭顺，多次入京朝贡，一再遣派属下头目奏报消息，引导部众效劳边疆，得到明廷好评。兼念其父死于国事，从优礼遇，厚赐布帛，允其购买耕牛农具，又从其所请，由都督同知晋为右都督，袭其父故职。可是，明朝官将，常欺女真，勒索银财，招致女真严重不满。董山又看到蒙古也先势大，屡攻明国，并曾掳获正统皇帝，因而更改初衷，乘机作乱，伙同李满住、凡察，多次入境劫掠人畜，杀害官民，“一岁间入寇者九十七，杀掳人口十余万”，“自开原以及辽阳六百余里，数万余家，率被残破”，“辽东为之困敝”。^①

明廷初因忙于应付蒙古，抽不出军队，又恐三卫进一步和“北虏”联合，只好对董山等人采取招抚、劝诱和训诫的方式，但内心十分恼怒，一待边警稍弛，立即决定发兵征剿，并派使往谕女真各卫，分化瓦解，诱令入贡。一向机警多智的董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明廷会宽恕其过，便带领家属十余人及左、右卫大小头人，于成化三年四月，“以听抚来朝，贡马及貂皮”。明廷先以“山等常纵部落犯边”为由，集女真头人于阙下，降敕训诫说：

“尔等俱系朝廷属卫，世受爵赏，容尔在边住牧，朝廷何负于尔。今却纵容下人，纠合毛怜等处夷人，侵犯边境，虏掠人畜，忘恩背义。论祖宗之法，本难容恕，但尔等既服罪而来，朕体天地好生之德，姑从宽宥。今尔回还，务各改过自新，戒饬部落，敬顺天道，尊事朝廷，不许仍前为非，所掠人口，搜访送还，不许藏匿。若再不悛，必动调大军问罪，悔将何及，其省之戒之。”^②

宫殿周围，武士环列，重兵把守，四面被围的区区数百女

^① 任洛：《辽东志》卷7，《艺文志》。

^② 《明宪宗实录》卷41。

真，怎敢反抗，只有忍气吞声，听其斥骂，还要“顿首输服”。^①出阙之后，董山等人气愤不平，部下指挥，有的“出漫骂语”，“褫厨役铜牌”，明帝又降诏痛责。董山等人更为愤怒，“扬言此还，即纠合海西野人抢掠边境”。宪宗令礼部遣行人护送（实即押送），并赐敕严厉训斥说：

“尔之先世，僻居荒落，后为部落所逼，远来投顺，我祖宗怜尔失所，赐与近边地方，使尔住牧，设立卫所，除授官职，父死子代，世世不绝。自尔祖尔父以来，或边方效劳，或岁时进贡，朝廷升赏宴劳，俱有定例。我之所以加恩于尔者不为不厚，而尔之所以享有室家之乐，官爵之荣，数十年间部落莫不听尔约束，邻封不敢辄加以兵，是谁之赐欤？尔等正宜尽心竭力，为我藩屏，以报大恩，乃敢悖逆天道，纠率外夷，寇我边境，掠我人畜……如或执迷不悛，以前寇扰边方，朝廷必调大军征剿，悔无及矣。尔等其省之戒之。”^②

一而再、再而三的指责训诫和威胁，本已使得一贯骄纵的董山等酋长脸上无光，威风扫地，但问题还没有完，明廷并不就此罢手，一俟行人“护”送董山等到达辽东广宁，即命靖虏将军总兵官武靖伯赵辅等宣读敕旨，将董山拘留，遣其家属数人还告部落，责令归还所掠人口，不许再犯边境。七月二十七日，董山等一百一十五人被带到帅府，听旨之后，愤恨不服，“逞凶肆詈，袖出小刀，刺杀通事”，在驿“夷人”哈啞哈等一百零一人，亦各持刀，乱刺馆伴兵卒，但人少势孤，被赵辅捕捉，杀死董山等二十六人，其余押于狱中。^③

① 《明宪宗实录》卷41。

② 《明宪宗实录》卷42。

③ 《明宪宗实录》卷45。

九月二十四日，明令赵辅等率兵五万（朝鲜记载为七万八千），征剿建州左卫、右卫，生擒九十七人，斩杀六百三十八人，俘获男妇一百五十一人，“获其马牛器仗无算，焚其巢寨，房屋一空”。^①朝鲜国王亦奉明帝诏旨，遣中樞府知事康纯率兵一万余，进攻建州卫李满住部，斩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等三百八十六人，生擒李满住之妻等男妇二十三人，获牛马二百二十九匹，焚烧庐舍一百九十五座及其积聚二百一十七所”。^②

骁勇善战的女真名酋董山，中了明廷之计，就这样杀身问斩，家破人亡，努尔哈赤的祖先遭到了第二次大的灾难。

董山有三个儿子，长名拖落（又写为脱罗、妥罗），次名脱一莫（妥义谟），三名石报奇（锡宝齐篇古）。石报奇就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其子福满，追尊为“兴祖直皇帝”。成化五年七月，脱罗“悔过来朝”，建州左卫都指挥佟那和劄等奏保脱罗袭父职，帝命降袭都指挥同知，“令统率本卫人民，依前朝贡，再犯不贷。”^③脱罗对明朝中央政府十分忠顺，亲自进京朝贡十二次，并以“在边有传报擒送之功”，升为都督僉事。弘治十八年（1505）脱罗病故，其子脱原保袭职后，亦朝贡不绝。

由于记述脱罗父子材料太少，现将《明实录》中有关记载引录列表如下：

脱罗、脱原保进京朝贡简表		
时 间	简 况	出 处
成化五年七月乙丑	脱罗来朝，降袭，授都指挥同知。	《明宪宗实录》卷六十九

① 《明宪宗实录》卷47。

② 《明宪宗实录》卷50；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586页。

③ 《明宪宗实录》卷69。

成化九年正月乙巳	女直都指挥脱罗来朝，贡马及貂皮，赐宴及衣服彩缎。	同上卷一百一十二
成化十二年正月癸丑	都指挥脱罗来朝，贡马及貂皮，赐宴及衣服彩缎。	同上卷一百四十九
成化十四年八月戊午	都指挥脱罗来朝，贡马及貂皮，赐宴及衣服。	同上卷一百八十一
成化十四年九月壬寅	脱罗以“在边有传报擒送之功”，升二级（晋都督）。	同上卷一百八十二
成化十九年二月戊寅	女直都督脱罗来朝，贡马及貂皮，赐宴并金织衣、彩缎。	同上卷二百三十七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丁亥	女直都督脱罗来朝，赐宴并衣服、彩缎。	同上卷二百六十
成化二十二年二月乙酉	女直都督脱罗来朝，贡马，赐宴并衣服、彩缎。	同上卷二百七十五
弘治二年二月壬寅	建州左等五卫都督脱罗等二百五十九人奏乞袭升，不允。	《明孝宗实录》卷二十三
弘治六年二月丙午	女直都督脱罗等来朝，贡马，赐宴并衣服、彩缎。	同上卷七十二
弘治七年正月戊午	女直都督脱罗等来朝，贡方物，赐宴并衣服、彩缎。	《明孝宗实录》卷八十四
弘治十三年十一月甲戌	女直都督脱罗等来朝，贡马，赐宴并彩缎、衣服。	同上卷一百六十八
弘治十五年三月丁丑	女直都督脱罗等来朝，贡马，赐宴并彩缎、衣服。	同上卷一百八十五
正德元年正月癸亥	令故都督金事脱罗之子脱原保袭父原职。	《明武宗实录》卷十二
正德二年二月戊寅	女直都督脱原保等贡马，赐宴，赏金织衣、彩缎等物。	同上卷二十三
正德三年二月己丑	女直都督脱原保来朝，贡马，赐宴及金织衣、彩缎。	同上卷三十五
正德四年三月丁酉	女直都督脱原保等来朝，贡马匹方物，赐钞锭、织金、文绮等物。	同上卷四十八
正德五年四月甲寅	女直都督脱原保等来朝，贡马，赐钞锭、彩缎等物。	同上卷六十二
正德十年三月己未	女直都督脱原保等来朝，贡马及貂皮，赐宴，给裘衣、彩缎、绢纱。	同上卷一百二十二
正德十六年三月甲子	女直都督脱原保等以马匹、	同上卷一百九十七

	貂皮来贡，赐彩缎、纱绢及金织衣。	
嘉靖元年三月辛未	赐建州左卫都督脱原保纁丝蟒衣，从其请也。	《明世宗实录》卷十二
嘉靖元年四月癸未	建州左等卫女直都督僉事脱原保等来朝贡马，赐缎、绢、纱、锭。	同上卷十三
嘉靖二年六月戊申	建州左卫女直都督脱原保等来朝，贡马，赐彩缎、纱绢、衣服、靴袜。	同上卷二十八

嘉靖二年(1523)七月以后，《明实录》便无叙述脱原保的记载，相反，提到建州左卫首领入贡时，领头的却是章成等人。例如，“嘉靖三年六月甲辰，建州左卫女直都督章成等四十七人，入朝贡马，赐缎绢、衣、纱、靴鞋有差”。^①嘉靖七年正月(壬午)，“建州左等卫、海西亦里察河、斡难河等卫女直都督章成等一百八十人，来朝贡马，宴赉如例。”^②这表明，脱原保的子孙已经没落，不再掌管建州左卫了。

第三节 癸未起兵

一、“景祖”、“显祖”之死

景祖，名觉昌安，亦写作觉常刚，明人称为叫场或教场，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顺治五年(1648)追上谥号为景祖翼皇帝。显祖名塔克世，亦写为塔石，明人称为他失、塔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顺治五年追尊为显祖宣皇帝。觉昌安之父名福满，

^① 《明世宗实录》卷40。

^② 《明神宗实录》卷84。

追谥为兴祖直皇帝。福满之父石报奇，是董山第三子，长兄为脱罗，脱原保是其侄子。

关于觉昌安、塔克世的身份、势力及其行动，明朝官将及士大夫有些评述，但其说不一。有的说，觉昌安是建州卫左都督。万历末年曾到辽东查看边情的司业张鼐，在其所著《辽夷略》中指出：“佟教场，建州卫左都督金事也。”

有的认为，塔克世当响导有功，被明宁远伯李成梁封为指挥使。马晋允著的《明通纪辑要》说：王杲不道，歼我疆吏，成梁因他失为响导，遂梟王杲于藁街。他失者，叫场之子，杲之孙婿也。因以杲之余地与他失，使为建州左卫指挥。”

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陈继儒的《建州考》，黄道周的《博物典汇·建夷考》，程开祜所辑《筹辽硕画·建夷考》，皆未载明觉昌安父子的官衔和身份。

清廷修的《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高皇帝实录》、《满洲源流考》等书，也未提到景、显二祖的头衔。这样一来，明清文献，或含混其词，不予说明，或人言各殊，莫衷一是。究竟觉昌安、塔克世有无职衔，系何身份，势力强弱，就成了一个需要查明的问題。

明人的记载，都是努尔哈赤兴起以后的追述，难免不夹有偏见，或系道听途说。清朝的官书，又有为亲者讳的缺点，皆难完全依以为据，不如明辽东官员的报告更为可靠。

抚顺马市，是建州女真与汉民交易货物的地方。万历六年（1578）四月初七日，任大顺被委任为定辽后卫经历，前往抚顺城更替副断事罗厚，负责“抽收夷税银两，抚赏夷人”，七月初八日离职。任大顺于八月开具了在任期间“抽收夷税”、“抚赏夷人”清册，上报巡抚。这份清册虽有残缺，但直接讲到觉昌安的有三次：

“（五月）初三日，落雨。夷人叫场等四十五名到市，与

买〔卖人等交易，行使〕猪牛等物，换过麻布粮食等货，一号起三……抽税银八两二钱一分五厘。”

“(五月)初三日，抚赏买卖夷人叫场等二十三名，牛二只价〔银七钱五分，猪一〕只价银一钱，盐一百五十五斤价银六钱二分，共用银一两四钱七分。”

“(六月)十二日，抚赏买卖夷人叫场等二十一名，牛一只〔价银……〕〔猪〕三只价银三钱七分，兀刺一双价银七分，红布四匹价银四钱八分，盐二百七十斤价银一两八分，共用银二两二钱八分。”^①

这是当时万历六年的档案，经历任大顺经办抽税抚赏，亲眼看到叫场入市卖出麻布粮食，买进猪牛，收取税银，亲自办理“抚赏”叫场的物品，随即汇总登记成册，上报巡抚。这样形成的文件，当然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而且这时的努尔哈赤仅是一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夷人”，谁也不能预见这个二十岁的女真青年，四十年以后，会反叛朝廷，会攻占辽沈，会打败天朝大军，会逼死经略、巡抚大人。对这个当时与明无仇无冤的普通“夷人”的祖父，任大顺自然不会怀有偏见，存心歪曲事实，任意贬斥，而是客观地如实地反映交易、抚赏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这份档案十分真实，是了解叫场身份、经历、行动的最可靠的原始资料。

根据任大顺撰写的《清册》，结合其他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觉昌安的身份、地位及其行动的情况。《清册》载录建州女真分批入市的领头之人，有忙子、朱长革、张海、张乃奇、宁弓提、叫场、曹乃奇、失刺八、付羊公、来留住、扎力砍、龙豆、松塔、色失、哈屠合、忽失八、绰乞、小四、虎刺海、摆洪、勒克得、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105，万历六年八月《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清册》。

大有、艾马茶、咬郎、三章等二十五人，还有进京朝贡回还的把当哈。这二十六人中，从《明实录》记述建州女真人贡的都督、都指挥名单中，可以找到九人，他们是毛怜卫都指挥戮乞纳（即《清册》所列绰乞），建州左卫都督来留住（另一处写为右卫都督），建州右卫都督八当哈，毛怜卫都督付羊公，建州左卫都督松塔（另一处写为建州卫都督），毛怜卫都督失刺卜（即《清册》所列失刺八），左卫都督蟒子（《清册》的忙子），建州卫指挥使咬郎，建州左卫都督八汗（《清册》记为摆洪）。从葛上愚公的《东夷考略》等明人著作中，还可以找到张海、色失二位酋长的名字。可见，《清册》所记女真人市的领头人，是建州各部的酋长。照此看来，叫场（觉昌安）既然是率众入市的领头人之一，这就表明他也是建州女真的一部之长。

在这些女真酋长中，觉昌安的身份不算显贵，势力不大，地位不高。这从两个方面反映得十分清楚，首先是他的部众并不多。普通女真进入马市交易，一般是跟随本部酋长前往，入市人数的多少，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这个部落的大小和酋长势力的强弱。从万历六年四月十六到七月初六的八十天里，《清册》开具的建州女真人市酋长有十七人，（不包括残缺未记及抚赏的人数），共二十四人次，按随行人数多少排列，其顺序是：朱长革，三次，四百三十人；张海，二次，一百九十人；张乃奇，三次，一百九十人；色失，四次，一百七十人；忙子，五次，一百六十五人；失刺八，一次，一百三十人；曹乃奇，两次，一百一十三人；宁弓提，两次，一百二十人；绰奇，一次，九十人；扎力砍，一次，八十人；龙豆，一次，七十二人；来留住，一次，五十余人；付羊公一次，五十人；松塔，一次，五十人；叫场，一次，四十五人；忽失八，一次，四十人；哈屠合，一次，二十

人。^①在这十七个酋长中，叫场带领部众入市的人数才四十五名，倒列第三，仅为朱长革、张海、张乃奇、色失、忙子等酋长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其势力的大小，部众的多少，是显而易见的，他不过是建州女真几十个部落中一个小部落的酋长而已。

另一方面，《明实录》对进京朝贡的女真首领，一般都要写明领众之人。从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出生这一年开始(这一年，觉昌安约四十来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到万历九年(1581)，这二十三年里，《明实录》载明朝贡的建州女真首领，按时间排列，有都督木力哈、都指挥忙恰答牙、都指挥戮乞纳，都督柳尚、胜革力、王忽、纳木章、安台失、来留住、八当哈、失利卜、大疼克、纳答哈、台恭、忙子、付羊公、章成、牙令哈、阿古、松塔、八汗，都指挥额苦、土满，指挥咬郎。^②觉昌安(叫场)虽然常到抚顺马市做买卖，可是在《明实录》中却找不到他的名字，可见他或者仅是作为一个小部头人附属于大部酋长之下跟随入京，或者是根本没有到过北京，未能荣睹龙颜，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明人记载皆未提及叫场入贡)。这正说明此时的觉昌安还只是一个僻处山区、默默无闻、不见经传的小部头人，诸申不多，地位不高，势力不大。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伯祖脱罗，大难之后，幸能获免，降袭父职，自然心有余悸，谨小慎微，事迹不显，他的堂叔脱原保也无赫赫战功，而且从嘉靖二年(1523)以后，就再未进京朝贡，不再统辖建州左卫，整个家族衰落了，觉昌安自然也难以承荫祖先遗泽，荣袭都督要职。但是，从《清册》及其他史料看，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105号，万历六年八月《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清册》。

② 《明世宗实录》卷522、523、535、538；《明穆宗实录》卷10、11、46、47、50、60、62、66；《明神宗实录》卷15、35、36、39、50、52、53、68、70、91、113、114、116、118。

尽管出身不显，先天不足，觉昌安却不是一个听天由命才具平凡的庸碌之辈，而是很有艰苦奋斗精神，力图重振祖业的有为之士。

《清册》载述，万历六年四月十六至七月十六的八十多天里，叫场至少三次带领部众，进入抚顺马市，买卖货物。其中的一次，以“麻布粮食等货”，换过“猪牛等物”，计三十多号，抽税银五两二分四厘。此项记载虽然过分简略，五两多税银，似乎也只是区区小数，但问题并不简单，交易的商品也不算少。按照女真与汉民买卖的通例，基本上是女真以人参、皮张等土特产和马匹，买进耕牛、铁制农具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这在前述《清册》所载海西女真与汉民的贸易，已经反映得十分清楚。《武皇帝实录》也载称，建州女真地区，“有明珠、人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猁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等皮，以备国用”，与明“互市交易”。^①人参更是重要商品，大量向明售卖。^②这种马市，基本上女真是卖多买少，明则处于贸易逆差。明档所记万历十一年七至九月和十二年一至三月，海西女真在开原镇北关、广顺关的马市，买进铧子、耕牛、衣服、缎绢等物，按时价计，约折银八百五十两。而卖出的商品，仅人参一项，照时价每斤九两银计算，三千六百一十九斤参当值银三万二千五百多两。至于貂皮四千七百余张，狐皮、狍皮、羊皮、豹皮三千余张，又可售银上万两。这样大量的货物买卖，才抽税银六百一十二两，由此推知，叫场入市抽的税银五两多，大致是价格五百两左右的营业额，表明其交易的商品数额是不小的。由此而获取的银两，也是不会少的。他还通过“抚赏”领取了很多物品，仅初三、十二日两次，就得到明臣给与的三头牛、四头猪、盐四百二十五斤，以及兀刺、红布

① 《武皇帝实录》卷1。

② 《武皇帝实录》卷2。

等物。

觉昌安不仅在经济上勤理财务，多次进入抚顺马市，卖出土特产，买进牛、铎、盐、布等物，扩大生产，提高产量，牟取利银，发财致富，而且在政治上也善能观望风色，临机应变，眼明手快，战阵厮杀，发奋图强。他与嘉靖末隆庆年间称雄建州的著名酋长王杲，结为姻亲，以长子礼敦之女嫁与王杲之子阿台，又娶阿台之女为四子塔克世之妻，藉以为靠。^①他还很可能参加了王杲袭掠辽东人丁牲畜财帛的活动。可是，一旦看到明廷发兵追剿王杲时，叫场就迅速转变了。王杲是建州右卫都指挥，剽悍好乱，嘉靖三十六年掠抚顺境，杀备御彭文洙，屡掠东州、惠安，一堵墙诸堡。四十一年设伏，生擒副总兵黑春“磔之”，深入辽阳，掠孤山，戮指挥王国柱等。万历二年七月，又执抚顺游击裴承祖，剖腹惨杀。明廷大怒，十月发兵征剿，破杲寨，斩一千余级，三年八月，磔杲于京。^②觉昌安与王杲是双重联姻，亲上加亲，照说应站在亲家的立场，跟从王杲，抗敌明兵。可是，明帝震怒，大兵追剿，重兵压境，如若孤注一掷，与明对抗，无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是笃念至戚之谊，共抗明军，同归于尽，还是以本身安危为重，置亲不顾，临阵反戈，投奔敌营，立功补过，免于灭顶之灾，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两个利害悬殊的结局。在这决定整个家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觉昌安和塔克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一条通路，与王杲决裂，投到明宁远伯李成梁总兵官麾下，报告边情，指引道路，从征厮杀，为消灭王杲而竭尽全身之力。

王杲之所以能横行二十年，屡败明兵，主要是靠联合诸部和

① 《武皇帝实录》卷1；陈继儒《建州考》。

② 若上恩公：《东夷考略》；《明世宗实录》卷509；《明穆宗实录》卷3；《明神宗实录》卷31、40、41。

坚守险寨，这也是历代女真名酋称强的基本条件。女真居住偏僻地区，高山密林，行走不便。五岭、喜昌、石门诸隘，“人骑不能成列”。王杲所住之寨，依山阻险，城坚堑深。阿台的古勒寨，异常陡峻，“三面壁立，壕寨甚设”，明军人地生疏，不知路径，枪炮沉重，难以运行。因此，王杲可以进退自如，得势，则深入明地，掳掠人畜，袭杀官兵；失利，则逃匿故地，倚险固守，休养生息，串联他部，一有机会，东山再起，明将对此很难应付。可是，觉昌安父子的投明，就使战守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觉昌安是一部之长，他们六弟兄强盛之时，“自五岭迤东，苏苏河迤西，二百里内诸部，尽皆宾服”。他的归顺明朝，必然影响其他建州女真部落与王杲的关系，削弱了王杲势力。而且，觉昌安父子久居祖地，深知“夷”情，熟谙路途，又是王杲亲家，知悉姻亲底细，一旦充当明军响导，就使王杲失去了“地利”的有利条件，陷于被动局面。

明万历二年(1574)十月，李成梁率军数万，攻取王杲之寨，纵火焚烧，杀掠人畜殆尽。王杲突围出走，三年二月复纠众人掠，又为明兵击败，逃匿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王台处，七月被王台执送北京，磔于市。王杲之子阿台图报父仇，屡次纠众掠边。十一年李成梁再领大军出击，取阿台的古勒寨及其同党阿海的莽子寨，杀阿台，“杲自是子孙靡孑遗”。

王杲、阿台之死及其家族的衰落，与觉昌安、塔克世为明兵响导，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文献认为是塔克世引导明军攻王杲。如马晋允的《明通纪辑要》载称：“王杲不道，歼我疆吏，李成梁因他失为响导，遂梟王杲于藁街。他失者，叫场之子，杲之孙婿也。”黄道周也写道：“先是奴酋父他失有胆略，为建州督王杲部将。杲屡为边患，是时李宁远为总镇，诱降酋父，为宁远响

导讨杲，出奇兵，往返八日而擒杲。”^①

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则载称叫场与塔失父子皆为响导，从征王杲。该书于万历二十三年晋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时，追叙说：

“其祖叫场，父塔失，并及于阿台之难。至是，新克五十以献，乞升赏。又因贡夷马三非，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今复身率三十二酋保寨，且钐束建州、毛怜等卫，验马起贡，请得升职长东夷。时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在庭，会查本夷原领敕三十道，系都指挥，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后并死兵火，良然。”

两说有所差异，联系历史形势来看，《皇明从信录》的记载，更为准确。其一，万历二年，塔克世约三十余岁，虽值壮年，能征善战，可是其名不扬，凡事皆父觉昌安出面办理，前引明代辽东档案，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只写了叫场，未写塔克世，即系明证。《清实录》亦仅述觉昌安之有为，降服附近各部，未言塔克世有何功勋。从亲家变仇敌，为明响导，这样大的事，叫场不点头，不出面，塔失怎敢自由行动。其二，《皇明从信录》是引的努尔哈赤自己的话，他遣“贡夷”马三非，呈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如无其事，怎敢胡说，怎能冒功？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右庭，复查之后，亦得出相同的结论，肯定“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这样的材料，比《明通纪辑要》，当然更有说服力，就史料价值而论，《皇明从信录》的记载，显然更为可靠。由此可见，觉昌安、塔克世父子都为明军引路，参加了消灭王杲的战争。

觉昌安父子还为李成梁作响导，攻打阿台，并因此而死于战乱

^① 黄道周：《博物典汇·建夷考》，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卷1，《建州之始》，载述与此类似。

之中，这就是清人所谓的景、显二祖之死。在这个问题上，《清实录》等官书的记述，颇有失真之处。例如，《武皇帝实录》卷一载：

“秃隆城有尼康外郎者，于癸未岁万历十一年唆构宁远伯李成梁，攻古勒城主阿太，……成梁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阿太妻系太祖大父李敦之女，祖觉常闻古勒被围，恐孙女被陷，同子塔石往救之。既至，见大兵攻城甚急，遂令塔石候于城外，独身进城，欲携孙女以归，阿太不从。塔石候良久，亦进城探视，及城陷，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并杀觉常刚父子。后太祖奏大明曰，祖父无罪，何故杀之。诏下，言汝祖、父，实是误杀。”

《武皇帝实录》此叙，破绽不少。既然是明朝大帅宁远伯李成梁亲统大军出征，重兵包围城寨，而且“攻城甚急”，身为阿台的外祖父，觉昌安怎能独身进城，怎能携女突围？塔克世又怎能进入城中？如此自由出入，与炮火纷飞弹矢如雨的鏖战气氛，怎能协调？实录撰修者这样编写，用心良苦，其目的不过是，欲图掩盖觉昌安父子背亲弃友投靠明军的不光彩行为。明人记载却一致认为，叫场、塔失是为明军引路进攻阿台，而死于兵火。例如：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载：“先是李宁远捣阿台，奴儿哈赤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为响导，……因兵火死于阿台城下。”

若上愚公《东夷考略》载：“初奴儿哈赤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阿台，为响导，死兵火。”

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其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阿台为响导，死兵火。”

努尔哈赤自己也曾经承认这一事实。万历十七年，他还仅仅是一个小部寡民之长，急需倚赖明帝讨要职衔以“夸耀东夷”时，

特遣“贡夷”马三非，奏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请得升职长东夷”。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在庭会查属实，“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后并死兵火，良然”，议准升为都督僉事。^①

这些史料表明，觉昌安、塔克世确是竭尽全力，为明宁远伯总兵官李成梁效劳，在促成姻家阿台惨死的事件中，起了不应该起的可耻的恶劣作用。他俩本来想通过这一活动讨好明国，邀功请赏，扩大自己的势力，不料，事与愿违，阿台固然被斩，自己却也“并死兵火”，重振祖业的幻想毁于一旦，努尔哈赤家族遭到了巨大的灾难。

二、十三甲兴师

明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觉昌安、塔克世死于古勒寨，这对努尔哈赤一家来说，固然是一大不幸，然而，如无其他变故，照说还是可以过得下去的。觉昌安父子之死，是为明响导，攻打王杲、阿台而死于战乱之中。王杲、阿台先后为乱三十余年，掳掠人畜，击杀军民，戕官毙吏，为明大患。万历三年王杲就擒，明廷大喜，幼君御殿宣捷，祭告太庙，并行献俘大典，百官称贺，有功诸臣皆获厚赏，李成梁由署都督同知，世荫千户，晋左都督，世荫都指挥同知。海西塔山前卫都督王台加授勋衔，特封龙虎将军，二子并进都督僉事。^②阿台之灭，明帝御皇极门宣辽东大捷，祭告太庙，群臣欢庆。宁远伯李成梁岁加禄米一百石，荫一子为本卫指挥僉事世袭，巡抚兼右僉都御史周詠升总督兼右

^① 若上愚公：《东夷考略》；沈国元：《皇明从信录》；《明神宗实录》卷215。

^② 《明神宗实录》卷31、40、41；若上愚公：《东夷考略》；《明史》卷238《李成梁传》。

都御史，总督吴兑升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周詠、吴兑还各荫一子锦衣卫千户，巡抚李松升右副都御史，荫一子入监，辽海东宁参政张崇功升按察使，开元兵备金事靖四方进右参议。大学士亦缘功奖赏，元辅张居正荫一子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次辅张四维荫一子锦衣卫世袭百户。从征官兵，亦各赏银币。觉昌安、塔克世既响导有功，而且“有殉国忠”，理应得获重奖，海西酋长王台可封龙虎将军，二子荣授都督金事，觉昌安的子孙自然也可援例封授官职，领取奖银，至少也可当个都指挥乃至都督金事。如果这样办理，努尔哈赤家便可逢凶化吉，因祸得福，有了明帝的厚赏擢升和支持，他们几个二十多岁的有为青年，便可乘机招兵买马，扩大势力，称雄建州女真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种可喜图景并未出现，相反，努尔哈赤弟兄陷入了逆境，险遭灭门之祸。

《武皇帝实录》卷一，对努尔哈赤家的处境，作了如下的叙述：

“（万历十一年二月）…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并杀觉常刚父子。后太祖奏大明曰，祖父无罪，何故杀之。诏下，言汝祖父，实是误杀。遂还其尸，仍与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太祖曰：杀我祖父者，实尼康外郎唆使之也，但执此人与我，即甘心焉。边臣曰：尔祖父之死，因我兵误杀，故以敕书马匹与汝，又赐以都督敕书，事已完矣。今复如是，吾即助尼康外郎，筑城于甲板，令为尔满洲国主。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康外郎。其五祖子孙，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之。尼康外郎又迫太祖往附，太祖曰：尔乃吾父部下之人，反令我顺尔，世岂有百岁不死之人。终怀恨不服。”

《武皇帝实录》的这段叙述，有些地方不够准确，如所谓“诏下”，“给都督敕书”，等等，并无其事，叫场、塔失当时还是人

微资浅，其名未能载于奏疏上达帝君，亦无授与都督的特旨，直到六年半以后努尔哈赤才因功、因势、因祖和父“殉国忠”而由都指挥进封都督佥事。但是，总的来看，它对努尔哈赤一家处境的表述，还是大体符合实际的。

第一，它载明努尔哈赤得罪了明朝边臣，栽下了祸根。当时，辽东大捷，强“酋”就擒，明朝君臣踌躇满志，趾高气扬，蔑视“东夷”。在这样的气氛下，明边臣承认是“误杀”，送回叫场、塔失之尸，给与敕书、马匹，允许努尔哈赤袭封都指挥，这对天朝大帅来说，算是念其响导之功，从优奖赏，恩赐够为隆重了。可是，他们没有料到，一个二十五岁的小小女真努尔哈赤，竟然要求执送尼康外郎（又写为尼堪外兰），以报杀害父、祖之仇。

这个要求，本来是合理的。努尔哈赤很清楚，父、祖之死，不管是误会，还是尼康外郎的挑唆，或者是蓄意所为，^①总是死于明兵之手，明朝君臣就是他的仇人，此仇不报，有何颜面生于世间。但是天朝“圣皇帝”威严无比，辽东守臣，“自视其身，如在霄汉”，^②直到三十一年以后，努尔哈赤已经成为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女真国聪睿恭敬汗时，致书辽东巡抚郭光复，仍尊郭为“地方之主”，比为“太阳”，自居阿哈。^③这样贵贱悬殊强弱显异的局面，微弱小部酋长努尔哈赤，他敢向明帝索报父仇吗？那无异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怎么办？是忍气吞息，

① 一些文献载称，李成梁为了消除隐患，特意杀死塔失。黄道周：《博物典汇·建夷考》载：“先是奴酋父他失有胆略，为建州督王杲部将。杲屡为边患，是时李宁远为总镇，诱降酋父，为宁远响导讨杲，出奇兵，往返八日而擒杲。酋父既负不赏之功，宁远相其为人有反状，慕之，以火攻，阴设反机以焚之死。”马晋允：《明通纪辑要》：李成梁用他失为响导，杀杲。后他失“时阑入塞，辄有寇掠，成梁乘其醉而歼之。”

② 天聪四年木刻揭榜七大恨原文，引自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女真上奏，尊明君为“圣皇帝”，这在《女真译语》二编《女直馆来文》中，记述得十分清楚。

③ 《清文老档·太祖》卷74。

屈于威势，置父仇不顾，而谄事明帝，图求个人安乐，升官晋爵，当一个不孝之子无耻之男？还是不畏强暴，挺身而出，直斥明朝君臣，披甲上阵，浴血奋战，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作一个有血性、有骨气、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笃孝的义子？或者是既要牢记大恨，誓死报仇，又要讲究策略，在力不能及之时，暂时克制，不把矛头指向明国，而将怒火引及次要之敌，一则略释心头之恨，二则尽可能地避免明廷的敌视，从而蓄积力量，待机而动。刚毅聪睿的努尔哈赤采取了第三种方针，向明国讨索仇人尼康外郎。不料，这一正当的要求，竟惹恼了骄横跋扈的明朝边将，被他们视为无理取闹，严辞训斥，一口拒绝了。真是，祸不单行，父、祖既死，又开罪于明帅，不仅得不到天朝的恩赐和支持，反将受其打击迫害，努尔哈赤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第二，敌人引明为助，乘机威逼归服。尼康外郎之名，明朝文献未载，难知其详，据《武皇帝实录》等书，他乃苏苏河部内的秃隆城主（《满州实录》记为图伦城主），即建州左卫一个候袭官职的头人。尼康与明将关系密切，为李成梁引路，击灭阿台有功。他又曾向抚顺游击献谗，责治苏苏河部撒儿湖城酋长瓜喇，尼康原来的势力并不大，部众不多，观其后来屡逃，不敢与努尔哈赤交锋，即系明证。但是尼康响导有功，努尔哈赤又为明臣所厌，因此明将气势汹汹地对努尔哈赤宣称：“事已完矣，今复如是，吾即助尼康外郎，筑城于甲板，令为尔满洲国主。”^①寥寥数言，震动极大。当时，王杲父子齐遭斩杀，同死者三四千人，建州各部酋长伤亡不少，叫场、塔失双双丧命，另一强“酋”王兀堂亦惨败遁逃，“建州部益弱”，明威大振，“东夷震慑”。^②在这样形势下，明臣的讲话，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他说要为尼康筑城，

① 《武皇帝实录》卷1。

② 若上愚公：《东夷考略》。

要让尼康主管建州女真，谁能怀疑，谁敢抗命，一下子就使尼康威望剧升，势力激增，“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康外郎，其五祖子孙，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之”。^①尼康乘机“又迫太祖往附”，俨然以建州国君自居，这对努尔哈赤一家来说，又是一大威胁。

从永乐三年(1405)猛哥帖木尔第一次入京朝贡受封指挥使，到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觉昌安父子去世，在这一百七十九年里，努尔哈赤家族历经盛衰，三起三落，遭受了三次大灾难，而尤以最近父、祖冤死，祸害更为严重。宣德八年(1433)，虽然猛哥帖木尔及长子阿谷死于“七姓野人”之手，董山与母被掳，家财尽丧，损失不为不大，但毕竟是因忠于明国而遭难，明帝特予优待，立即敕令“野人女真”归还人畜财帛，升凡察为都督佥事，不久又授董山为指挥使，连续晋升至右都督，袭父故职，掌建州左卫，凡察掌建州右卫。正是由于明帝的擢用和支持，董山才能由一个孤苦幼童一跃而为“雄长诸夷”的强酋，重振父业，名扬各部。成化三年(1467)，董山因乱被斩，明军攻剿三卫，杀掠人畜，为害甚烈，但董山业已称雄多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余势犹盛，故不到两年，其子脱罗“悔过来朝”，明帝即令袭封都指挥同知，掌左卫，随即晋为都督，家道又复中兴。这次觉昌安之死，却形势迥异了。觉昌安、塔克世仅系普通酋长，官衔不尊，业绩不显，部众不多，牲畜不旺，器仗较少，努尔哈赤弟兄得到的遗产寥寥无几，史载只有遗甲十三副。兼之，明国边臣恼怒，支持仇人尼康，部众叛离，族人心变，局面的险恶，灾难的深重，远逾昔日。

尽管身陷绝境，年方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却没有被敌人吓倒，坚决不向尼康屈服。他不顾寡不敌众、强弱悬殊的恶劣形势，毅然高举义旗，于万历十一年五月，率领少数人马，猛攻秃隆

^① 《武皇帝实录》卷1。

城，打响了建立后金国的第一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十三甲起兵”。

第四节 削平各部

一、群雄争长

明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当时的女真各部是什么样的局面？这是关系到努尔哈赤盛衰兴亡的重要问题，不能正确观察、掌握形势，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便难以战胜敌人，由弱变强，由小变大。在这一点上，努尔哈赤非常聪明，十分重视，判断异常准确，收效也特别显著。

《满洲实录》满文体，对此情景，有一段总结性的叙述，译为汉文如下：

“时各地之国为乱。满洲国之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纳殷部、鸭绿江部，东海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呼伦国之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各地盗贼蜂起，各自僭称汗、贝勒、大人，每村每寨为主，各族为长，互相征伐，兄弟相杀，族众力强之人，欺凌、抢掠懦弱，甚乱。”^①

① 《满洲实录》卷1，满文体。《满洲实录》，是记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实录，成书于后金天聪九年(1635)，以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有图，乾隆年间重绘三部。《满洲实录》依据《满文老档》删写而成，虽然编写时已作了一些更动，乾隆重绘时可能又有所修改，但它毕竟是满族自己编写的载述早期历史的文献。而且《满文老档》残缺不全，目前所见最早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才开始载录，在此之前的事情，只有依靠《满洲实录》和《武皇帝实录》的记载，这两部书基本相同。经过查阅，发现《满洲实录》的满文体比汉文体更准确，改得少一些，尤其是此处所引的总结性叙述，比《武皇帝实录》的记载更为清楚、更为可靠。

《满洲实录》将万历年间的女真分为“满洲国”、“东海”、“呼伦国”三大系统，“满洲国”就是建州女真，“呼伦国”是海西女真，“东海”女真是“野人女真”的一支（另一支为“黑龙江女真”，以住居黑龙江流域而得名）。

建州女真内部，陆续演变为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鸭绿江部、纳殷部、朱舍里部，等等。各部又分为若干小部，如苏克素护河部，有图伦、萨尔浒、嘉木湖、沾河、安图瓜尔佳等等城寨，浑河部包括杭嘉、栋嘉、扎库穆、兆嘉、巴尔达、贝欢等寨。由于王杲、阿台、阿海大败被杀，王兀堂重创溃逃消声匿迹，建州女真各部实力大损，一般都是人丁稀少，甲杖不全、尚未出现一个智勇双全、兵强马壮威震各部的新首领。才虽平庸，势虽不盛，可各部之长却互不相下，称王争雄，甚至骨肉相残，干戈时起。栋鄂部诸酋长曾经集会商议，决定共同出兵，攻打努尔哈赤家族，以报过去掠寨之仇，“遂以鳞血淬箭，以备用”，谁料，师尚未出，内争突起，“部中自相扰乱”。①努尔哈赤的堂叔康嘉，与人合谋，请哈达国兵，令族人兆嘉城主理岱导引，劫掠努尔哈赤的胡吉寨。朱舍里、纳殷二部，共引叶赫兵，抢掠努尔哈赤的洞寨。②

海西女真已由明初近百卫演变成“呼伦国”的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四大部。哈达部，以居哈达河（今清河）流域而得名，也有一部分人住柴河流域。万历初年的哈达酋长，姓纳喇氏，名万，尊称万汗。《明实录》记为王台，居哈达河北岸的哈达城，贡市在开原的广顺关，地近南，一般称为南关。王台对明十分忠顺，袭祖速黑忒塔山前卫左都督职，经常进京朝贡，入市马市，送还其他部落掠取的人口，万历三年以缚送王杲，加龙虎将军勋

① 《满洲实录》卷1。

② 《武皇帝实录》卷1。

銜。王台机智善战，得众心，势日强。他“远者招徕，近者攻取，其势愈盛”，拥有敕书七百道。^①明人称其“所辖东尽灰扒（辉发），兀刺（乌拉）等江夷，南尽清河、建州，北尽二奴（叶赫），延袤几千里，内属保寨，甚盛”，“耕牧三十年，东陲晏然”。^②《清实录》亦言“彼时叶赫、乌拉、辉发及满洲所属浑河部，尽皆服之”。^③然而，盛极转衰，王台年老，长子虎儿罕“好残杀”，部众离心，剽悍头目虎儿干、白虎赤先后叛投叶赫。叶赫酋长清佳努、杨吉努为明塔鲁木卫都督僉事，因其祖父都督祝孔革为王台之叔王忠斩杀，贡敕及季勒诸寨被占，蓄意报仇，乘机用兵，尽夺季勒诸寨，联合其他部落频行入掠，虎儿罕不能敌，辉发、乌拉、建州各部亦脱离王台铃束，哈达势蹙，万历十年王台忧愤而死，虎儿罕寻即去世。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王台第三子康古陆、四子孟格布禄，与虎儿罕之子歹商，不齐心协力，共御外患，反而争分父业，械斗不休。康古陆还叛投叶赫，娶清佳努之女，纠合叶赫攻歹商，并强占继母温姐为妻（温姐是清佳努之妹，是康古陆正妻的姑姑），歹商势危。明以王台忠顺，出兵保其遗孤，万历十五年十月攻孟格布禄，收其部众八百余，革其所袭龙虎将军职。十六年，擒康古陆，责其与侄歹商和好而释，不久病死。有明相助，本可稳定局势，逐渐积蓄力量，再度强大。可是，歹商却“酗酒好杀”，部众怨恨解体，形势更加恶化，十九年往叶赫完亲，归途中，被岳父布斋（清佳努的长子）遣人刺杀，孟格布禄执掌部政，势益孤弱。^④

叶赫部，以居住叶赫河（今通河）流域而得名，在开原北，贡

① 《武皇帝实录》卷1；苕上愚公：《东夷考略》。

② 苕上愚公：《东夷考略》；《明神宗实录》卷190、203。

③ 《满洲实录》卷1；《武皇帝实录》卷1。

④ 张鼐：《辽夷略》；苕上愚公：《东夷考略》；海滨野史：《建州私志》；《明神宗实录》卷140、190、192、194、197、203、366。

市在开原镇北关，一般简称为北关。万历初年，叶赫酋长为清佳努、杨吉努弟兄，明人称为逞加奴、仰加奴，姓纳喇氏，英勇善战，征服诸部，各居一城。他俩为报祖仇，统一海西，称雄女真，屡攻哈达，一再掠明。明为保哈达，固藩篱，分而治之，不让出现辖治群寨、威胁辽东的强大酋长，在万历前期采取了抑制叶赫的政策。十一年十二月，清佳努、杨吉努进攻哈达，大掠把吉诸寨，并拥精骑三千余，驻镇北关前“请赏”。辽东巡抚李松，宁远伯总兵官李成梁，设下“市圈计”，“令三军皆解甲易服”，诱清佳努入圈听抚赏赉。清佳努骄妄失检，仅率三百骑，进入开原关王庙，明伏兵四起，斩清佳努及其子兀孙李罗，杨吉努及其子哈儿哈麻与从者尽死，外面的女真亦死千余人。叶赫虽遭暗算，损失惨重，但清佳努之子布斋、杨吉努之子纳林布禄，誓报父仇，东山再起，数次掠边。十六年李成梁率军围攻叶赫城，斩级五百余，“城中老少皆号泣”，布斋、纳林布禄乞和，师还。^①叶赫连遭明军进剿，元气大伤。

乌喇部，因居乌拉河（今松花江上游）流域而得名。万历初年，酋长名满泰，姓纳喇氏，与哈达万汗同为纳奇卜禄之后，所住乌拉城，在乌拉河东岸。万历二十四年（1596），满泰父子往所属苏瓦烟席栏地，修筑边壕，淫村中二妇，其夫夜入，杀满泰父子。

辉发部，酋长王机努，姓纳喇氏，隆庆、万历时，征服附近部落，在松花江支流辉发河畔扈尔奇山上筑城，故名辉发部。王机努卒，孙拜音达里杀其叔七人，自为贝勒，其堂兄弟族人多投叶赫，部众也有“叛谋”，局面很不稳定。^②

①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1《卜寨、那林李罗传》；荏上愚公：《东夷考略》；海滨野史：《建州私志》卷上；《明神宗实录》卷190、197。

② 《满洲实录》卷3；《武皇帝实录》卷1、2。

东海女真，是“野人女真”的一支，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及乌苏里江以东至沿海岛屿。据《武皇帝实录》卷一载，东海女真分为窝集、瓦尔喀、库尔喀三部，其下又分为安楚拉库、内河、斐优、赫席赫、鄂谟和苏噜、佛纳赫、扎库塔、瑚叶、那木都噜、绥芬、宁古塔、尼马察等村屯寨路。“野人女真”的另一支，是黑龙江女真，以居住黑龙江流域而得名，主要分为虎尔哈部、萨哈连部、使犬部、使鹿部、索伦部，其中又分为若干小部，如使犬部有奇雅喀喇部、赫哲喀喇部、额登喀喇部，即赫哲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等，使鹿部有费雅喀部、奇勒尔部、吉烈迷部等。“野人女真”部落居住零散、人丁稀少，生产相当落后，以渔猎采集为主要谋生方式，各部之间也常争吵攻伐。

总之，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及其往外扩展的一、二十年里，建州女真三遭明军重惩，强酋就擒或逃匿，元气大损，部落分散，争战不息；海西女真，哈达内忧外患交迫，国势剧衰；叶赫两受明军围剿，损兵折将，又与哈达多年构兵，实力消耗过大；乌拉、辉发也是内乱不止，干戈时起；“野人女真”分散零落，各寨势孤力弱。这一切，为努尔哈赤的兴起，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统一各部

明万历前期，女真各部，争吵不休，互相攻伐，固然为智勇双全的能人创造了各个击破扫平群雄的良好条件，但也使微弱小部陷入遭人欺凌被人蚕食的困难处境。万历十一年五月努尔哈赤起兵，攻打仇人尼康外郎的图伦城时，人马并不多。《武皇帝实录》卷一载称，此时“太祖兵不满百，甲仅三十副”。几十个人，三十副甲，这个数字本身就很少了，但这还不全是努尔哈赤的人

马。这次攻城，是努尔哈赤联合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及其弟扬书进行的，也就是说这个“兵不满百”是三部之众。细算起来，努尔哈赤以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二计算，也不过只有“兵”三、四十人，而所谓三十副甲，他只有“遗甲十三副”，其余十七副是噶哈善与扬书弟兄的。^①以这区区几十人，要想吞并数倍、一二十倍于己的其他建州部落（仅栋鄂部长阿海就有兵四百），打败百倍、一二百倍于己的海西叶赫、乌拉、哈达强部，降服建州、海西、“野人”数以万计的女真，成为女真之王，确是难而又难。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父与祖惨死、众叛亲离、强敌威逼、朝不保夕的女真青年——努尔哈赤，在三十来年的时间里，竟削平群雄，统一各部，成为占地数千里辖治所有女真的“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

这个奇迹之所以能出现，并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因素或所谓的“天命”，而是努尔哈赤顺应时代潮流，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艰苦奋斗几十年，而出现的符合规律的必然结果。从这三十多年的历史来看，虽然头绪纷繁，大事迭出，措施众多，但努尔哈赤的活动，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内政与外务两大方面。

所谓内政，归结到一点，就是壮大实力，即拥有一支强大的、精锐的军队，粮饷充足，吏治严明，令行禁止，兵民一心，这样就能攻无不克，军威无比。要想达到这一目的，除了必须制定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的方针路线以外，最关键的是能够网罗一大批能人，使得猛将如云，谋士似星，群集麾下，同心事主，共建大业。

在这关系到一部、一国盛衰兴亡的用人问题上，努尔哈赤强调了六项原则。一是必须任用贤人。他反复指出“贤者”的重要

^① 《武皇帝实录》卷1；《八旗通志初集》卷224，《常舒传》；《钦定八旗通志》卷217，《常舒传》。

性，要求群臣举荐能人。《满文老档》载：“每值会议，汗谓群臣曰：……汝等当念所任之重，有宜于治理汗之大政之贤者，则勿隐。诸事浩繁，汗一人焉能尽理。若贤人甚多，各任以事。倘治理国政管辖众兵之大臣甚少，济事几何！……凡为治政，得一材犹难，但系可以资政之人，即荐之可也。”①

二为不论亲疏门第，公正举人。汗谕：“诸大臣，汝等荐人，勿思何故举其他之人而逾尔之亲戚。勿论根基，见其心术正大者而荐之。且莫拘血缘，见有才者即举为大臣。”②

三系不拘一格，用其所长。他常谕示群臣说：“全才之人有几？若长于此，必拙于彼矣。……若有临阵英勇者，用以治军。有益于国政之忠良者，用以辅理国政。有知晓古今善规者，用以讲善规。有善办筵宴者，用以宴宾客。无才而能歌者，用以歌之。如是，人各效其所长矣。可于各处网罗有用之人。”③

四乃举贤贬奸。努尔哈赤一再列举女真各部及明朝贪官污吏祸国害民的事例，训谕诸贝勒要贬斥奸臣，擢用贤者。《满文老档》载：“聪睿恭敬汗教诸子曰：善良公正之人，不举不升，则贤者何由而进！不肖者不贬不杀，则不肖者何由而惩！切勿贪婪，宜秉忠直，勿好财帛，宜好才德。天下大道，莫过于忠直，吾素好忠直。……诸子，汝等当记之。”④

五是奖惩分明，功必赏，过必罚。《满文老档》编写者说：“聪睿恭敬汗，……其心公正。……有善行者，虽系仇敌，亦不计较，而以有功升之。有罪者，虽亲不贲，必杀之。”⑤万历十二年（1584），努尔哈赤攻打翁鄂洛城时，被敌方鄂尔果尼发箭射中头部，“透盔伤肉，深指许”。洛科又发一箭，射中其项，“鏃卷如钩，拔出，带肉两块”，“项血涌出”，“昏仆于地”，“昼夜血犹不

①②③④⑤ 《满文老档·太祖》卷4。

止”，几乎丧命。后攻下此城，诸将俱欲砍杀鄂尔果尼和洛科，以报前仇，努尔哈赤却念其忠勇，拒绝众议，反委授官职。^①以族弟多弼贝勒作战不力，革其固山额真，尽夺其按固山额真例赏给的俘获。^②因族弟旺善贝勒征战之时，“皆施狡诈”，尽取赐与旺善的阿哈、诸申，并多次举以为例，告诫群臣。^③

六为赏赐效劳官将。努尔哈赤十分注意臣将的财产和生活状况，不吝赏赐，尽量使其富裕而全力效忠于汗。《满文老档》编写者说：“聪睿恭敬汗每日睡卧二三次，不知者以其真眠，实乃非眠也。乃在思考，诸贤臣中，应使谁富？某一贤臣曾效力甚多而家贫困？谁难与所娶之妻同聚而又不能另娶因之忧苦？谁之妻死无力续娶而烦闷？役使阿哈、耕牛、乘马、衣服悉皆具备者有几，穷苦之人甚多也！寢后即起曰：赐某以妇，给某以阿哈，赏某以马，与某以衣，赐某以谷。”^④

努尔哈赤还制定了“厚待功臣”这一重要国策。对于早年来投、率军征战、尽忠效劳的“开国元勋”，努尔哈赤是特别优待和宠爱的，赐给他们大量人畜财帛，任以高官，封授世职，联姻婚娶，荣辱与共，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扈尔汉、安费扬古等“国初五大臣”的兴起及其子孙的世代显赫，就是这一国策的具体体现（详见第三章第二节）。

努尔哈赤对待功臣十分宽厚，当他们出了差错犯有过失时，常念其功而从轻处治。例如，后金天命四年（1619，明万历四十七年）七月，费英东奉命回都城报告夺取铁岭的消息时，于途中“将俘获、牛、骡私自分与同行兵士”。诸贝勒、大臣以其“居心骄傲，擅将众人之俘获财物另行分配”，拟定革其“大臣职，自

① 《武皇帝实录》卷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9。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9。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4。

取乌拉城以来，各战以大臣得赏之物，尽夺取之”。^①灭乌拉，是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中经掠叶赫，取抚顺、清河、范河，大败明军于萨尔浒等重大战争，每战均掠获巨量人畜财帛(仅抚顺之战，就获人畜三十万)，重赏官将。如果将自灭乌拉以后各次战争赏赐之物尽行籍没，又革其“大臣之职”，则费英东将从众额真、一等大臣、家资富豪的达官贵人，贬降为贫寒低贱的“闲散”。这是很重的处分，而且似乎已成定论，很难改变，因这是诸贝勒、大臣一致的意见，在通常的情况下，汗往往是依议而行的。可是，这次努尔哈赤却一反常例，拒绝诸贝勒、大臣之议，下谕说：“贫时得铁，犹胜于金。吾无部臣之时，得彼而以大臣用之，今何以退！”仅令取消此次铁岭之战所得的赐物。^②

“贫时得铁，犹胜于金”，这句话说得多么正确。这就是努尔哈赤对待开国功臣的基本态度。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合情合理的。对这些身任要职、负有盛望、军功卓著的“开国元勋”，如无篡位叛逆大罪，仅因些微过失，就不念前劳，忘掉旧情，大显国主威风，滥施君汗之权，将他们革职籍没，严酷惩治，必然要自伐栋梁，丧失臣心，引起军队混乱，削弱后金实力。努尔哈赤如此从宽处理，既申明了军纪国法，又照顾了功勋旧臣，妥善地解决了问题，安抚了群臣，于人、于己、于国都是很有益处的。

正是由于努尔哈赤重用贤者，厚待功臣，因此招来了许多机智忠贞武艺超群的有才之人，猛将谋士云集麾下，发奋图强，各尽其能，经济发展，“民殷国富”，国势日强，军威大振，所向无敌。这就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为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壮大后金国，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11。

在妥善处理内政、不断增强实力的同时，外务——统一各部建立后金国，也就进行得十分顺利，异常迅速。这与努尔哈赤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是分不开的。明人称：努尔哈赤通晓汉语，“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①他的所作所为，显示出他精通兵法，运用得相当巧妙。首先，他在开展统一女真各部的行动时，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以抚为主的方针。^②这与兵法中所云“攻心为上”，十分吻合。其具体内容有三，一为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对于持刀交锋拒不投降的部落，努尔哈赤遣军大肆屠杀，掠为俘获。因纳殷部七村诸申降后复叛，据城死守，“得后皆杀之”。^③额赫库伦部女真曾对周围部落吹嘘说：听说努尔哈赤的兵“勇敢善战”，如果真是那样勇敢，就来进攻罢，我们捎个信去。努尔哈赤派兵两千围攻，因守兵拒不降服，便冲入城内，砍杀城里的五百兵，又包围逃出城外的三百兵，全部斩杀，“获俘一万”，灭其国，“地成废墟”。^④这样，可以警告其他部落：战即败，抗即灭，拒则杀，威胁各部归顺。总的来看，这种残酷屠杀，还是不多的。

二为降者编户。努尔哈赤特别重视收编各部降顺的女真，不管是因为大军压境，兵临城下，无路可走，被迫归顺的人员，还是交战失败，城寨陷落，不得不降之人，他都实行“恩养”政策，一律将他们“编户”，分别编在各个牛录内，不贬为奴，不夺其财物，原系诸申，仍为诸申。原是部长、寨主、路长、贝勒、台吉，则大多授与官职，编其属人为牛录，归其辖领。比如，取哈达后，既将其“属下人分隶八旗”，又命酋长约兰之子懋巴里为甲

① 黄道周：《博物典汇·建夷考》。

② 《武皇帝实录》卷1。

③ 《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48。《清实录》删掉了“得后皆杀之”这一句话。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4。

喇章京，设立牛录，“使统之”。^①其族人夏瑚率十八户降，亦编牛录，“令其子雅琥统之。”^②诸申达雅里、哲尔德、喀尼、穆都珠瑚、赫书，等等，仍系诸申，后皆因功封授官职。^③

就是对长期与己为敌的女真部落，大多数也是“抚恤恩养”。虽然乌拉布占泰贝勒，多次惹事生非，开罪于努尔哈赤，但灭乌拉后，他仍将降顺的首长、官将、诸申“编万户率回”，不改变其原有身份。叶赫曾一再企图消灭努尔哈赤，后又悔婚，将许与努尔哈赤的美女嫁给蒙古，多次骚扰破坏。努尔哈赤灭叶赫后，除杀其主金台石、布扬古二贝勒外，对其他的贝勒、台吉、大臣“皆赦之”。“叶赫国中，无论善恶，皆全户不动，不使父子兄弟拆散，不使亲戚分离，俱尽数迁移而来。不淫妇女，不夺男子所执弓箭，各家财物皆由原主收取”。^④

三是来归者奖。对于主动归顺之人，努尔哈赤特别从厚奖赐。东海瑚尔哈部女真纳喀达部长率百户来投，努尔哈赤专遣二百人往迎，“设大宴”，厚赐财物。“为首之八大臣，每人各赐役使阿哈十对、乘马十四、耕牛十头、冬衣豹皮镶边蟒缎皮裘大褂、貂皮帽、皂靴、雕带、春秋衣蟒缎无披肩朝衣、蟒袍小褂、四季穿用衣服、布衫、裤、被褥，等等物品，皆厚与之。其次之人，各赐阿哈五对、马五匹、牛五头、衣服五套。再次者，各赐阿哈三对、马三匹、牛三头、衣服三套。末者，各赐阿哈一对、马一匹、牛一头、衣服一套。……其居住之宅，盛饭之釜，席子、缸、瓶、小磁瓶、碗、碟、匙、筷子、水桶、簸箕、槽盆，等等家具用品，俱齐备厚赐之。”^⑤

①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23。

②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23。

③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23。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13。

⑤ 《满文老档·太祖》卷7。

努尔哈赤的“恩威并行”、征抚齐用、以“恩”为主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努尔哈赤百战百胜的无敌军威影响下，在他大力招抚女真的政策推动下，许多部长带领属下人员前来“归顺”，很多诸申自动来投。上面曾经谈到瑚尔哈部的纳喀达部长受到厚待，一些陪同纳喀达来原本准备回去的女真，见到这样的厚待，便决定留下不走了，捎信回家说：“汗以抚聚部众为念，收为臣属，如此厚养，全未料及。”^①早在万历十六年(1588)努尔哈赤起兵初期，苏完部长索尔果便率所属诸申五百户来归，努尔哈赤编五牛录，令其子侄世代辖领。^②栋鄂部鲁可苏弟兄“带领四百人归来”，编二牛录，子孙世袭辖领。^③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各地女真部落酋长率众来归的，就有二、三百起，这就大大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过程，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

其次，努尔哈赤采取了正确的用兵策略，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积极争取蒙古，尽力避免过早地和明国发生正面冲突，直到万历四十六年以七大恨誓师伐明以前，没有受到明军的征剿，极大地便利了统一女真事业的进行(详见后述第六章)。

在用兵顺序上，建州女真各部分散零落，人丁稀少，势孤力薄，容易夺占，又与努尔哈赤同一族种，故首先攻打这些小部，既并而为一，又以此为据，作为核心，逐步扩大，从几十人的兵力发展到“骁骑数千”、“有兵二万”。在此基础上，随即向海西四部中内讧激烈、国势剧衰的哈达进军，并积极招抚、攻打东海女真，壮大实力，有兵数万，然后才灭乌拉，取辉发，将最强最敌

① 《清文老档·太祖》卷7。

② 《清洲实录》卷1；《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1、11；《清史列传》卷4，《费英东传》。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八旗都统衙门》档案《正白旗满洲查送佐领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8。

对的叶赫部放在最后。这种先易后难、蓄积力量、波浪式扩展的策略，是正确的，对统一女真各部，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再次，作战之时，努尔哈赤非常机智，运用兵法十分巧妙，指挥战争异常得当。他长于用间（尤其在对明的战争中），重视保密，多谋善断，议即定，定即行，出兵犹如暴风骤雨，迅不可挡。黄道周称其：“初酋一兄一弟，皆以骁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垄而议，继则建台，策定而下。”^①茗上愚公说：“奴酋八子，每登山密谋，兵至如风雨。”^②因此，他经常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古勒山之战，即系一例。

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九月，叶赫国主布斋贝勒、纳林布禄贝勒，因努尔哈赤拒绝割地降顺，纠合哈达国主孟格布禄、乌拉国主满泰贝勒之弟布占泰、辉发国主拜音达里、蒙古科尔沁部国主翁阿岱、莽古、明安、锡伯部、卦勒察部、长白山朱舍哩路主裕冷革、纳殷路主搜稳塞克什，“九国兵马，会聚一处”，合兵三万，进攻建州“国主”。武理堪奉努尔哈赤命哨探敌情，入夜，看到浑河北岸，“敌兵营火如星密，饭罢，即起行”，立即“飞报太祖，言敌国大兵将至”。努尔哈赤率兵迎击，加哈守将奈虎山坦报告，叶赫等部兵正攻黑机草城，“敌兵甚多”，“众皆失色”。当夜，叶赫营中一人逃来报告，叶赫兵一万，哈达、乌拉、辉发兵一万，蒙古科尔沁等部兵一万，“共兵三万”，努尔哈赤之兵“闻之，又皆失色”。^③在这大军压境，敌众我寡，军心动摇，兵民惊慌，面临覆国之灾的严重关头，努尔哈赤显示了非凡的才干，很快就击败敌军，转危为安。他在三个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其一，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两军交战勇者胜。勇，有其基

① 黄道周：《博物典汇·建夷考》。

② 茗上愚公：《东夷考略》。

③ 《武皇帝实录》卷1。

础，有决心，有信心，才能奋勇冲杀，如果未战先怯，相战必败。在众心畏敌惊慌不安之时，必须使兵将树立起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去掉怕字，首先要统帅以身作则，才能身教言教，换怯为勇。当武理堪驰报“敌国大兵将至”时，已近五更，努尔哈赤镇静自若，下令说：“我兵夜出，恐城中人惊，待天明出兵”，“言毕复寝”，而且睡“甚酣”。其妻袞代皇后推醒他说：“今九国兵马来攻，何故盹睡，是昏昧耶？抑畏惧耶？”努尔哈赤平静地说：“畏敌者，必不安枕，我不畏彼，故熟睡耳！……我承天命，各守国土，彼不乐我安分，反无故纠合九部之兵，欺害无辜之人，天岂祐之！言讫复睡，以息精神。”^①这种胸有成竹蔑视强敌的大无畏精神，对安定军兵之心，起了很大作用。

当然，敌兵来攻，声势浩大，首领的泰然自若，固能暂时宽解众心，但仅此亦难持久，还要进一步激励士卒誓死杀敌。天明，努尔哈赤率军出发，到了拖素寨，谕告全军说：“尔等可尽解臂手顿项，留于此，若伤肱伤颈，唯命是听，不然，身受拘束，难以胜敌，我兵轻便，必获全胜矣。”^②臂手，即“蔽手”，顿项系“护项”，乃保护项臂的穿戴。两军相战，刀矢交加，手臂受伤则难以续战，颈项被刺，容易丧生，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解脱蔽手护项的，但是，戴上它，又太重，行动不便。努尔哈赤之所以下达这样的命令，实际上意味着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从绝境找出路，于死地求生存，有此拼死厮杀的决心，就能击败“身受拘束”动作不灵的敌兵。这个命令，很有说服力，军心顿时安定，“众遵令，尽解之”。^③

但是，一旦听闻“敌兵甚多”、“共兵三万”，全军又大为惊

① 《武皇帝实录》卷1；《高皇帝实录》卷1。

② 《武皇帝实录》卷1。

③ 《武皇帝实录》卷1。

慌，“众皆失色”、“又皆失色”。这也难怪，此时的努尔哈赤还没有完全统一建州女真，朱舍哩、纳殷二部尚独立于外，能够调动的兵力，不过数千，努尔哈赤自己也承认“我兵虽少”。兵数悬殊，确难抵挡。在这关键时刻，努尔哈赤告诉士卒说：

“尔众无忧，我不使汝等至于苦战。吾立险要之处，诱彼来战，彼若来时，吾迎而敌之，诱而不来，吾等步行，四面分列，徐徐进攻。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谅此乌合之众，退缩不前，领兵前进者，必头目也，吾等即接战之，但伤其一二头目，彼兵自走，我兵虽少，并力一战，可必胜矣。”①

这段话讲得很好，精辟地分析了战守形势，指出了制敌之术。敌之长，在于兵多，己之长，在于地利人和，据险设伏，以逸待劳，出其不意，齐心进攻，定能击败人生路不熟的乌合之众。正是由于努尔哈赤能够根据不同情况，及时谕劝兵将，才能不断克服畏敌怯战情绪，树立必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从而为大败九部联军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二，发挥所长，克敌所短。建州处于守势，古勒山一带，地形复杂，崎岖陡峭，草木丛生，江路狭隘，易守难攻，兼之敌军深入异乡，道途不熟。因此，努尔哈赤充分利用了地利条件，“先使精兵埋伏道旁，又于岭崖多设机械以待”，“而沿江峡路阻隘，故敌兵不得成列，首尾如长蛇而至”，守兵“所在放石，兵马填江而死者不知其数，后军惊溃”。②努尔哈赤又令百战百胜的著名骁将额亦都巴图鲁领兵一百挑战，“敌悉众来犯”。以一百对数万，众寡太悬殊了，可是，额亦都毫无惧色，英勇“奋击，殪九人”，狠狠地煞了敌军威风，长了自己的志气。③

① 《武皇帝实录》卷1。

②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801页。

③ 《武皇帝实录》卷1；《清史列传》卷4，《额亦都传》。

其三，抓住战机，猛攻敌军。叶赫九部之兵，沿途被守军投石打死不少，“后军惊溃”，额亦都的“奋击”，又挫了联军士气。为振作军心，叶赫国主布斋、纳林布禄和蒙古科尔沁翁阿岱、莽古、明安贝勒，领兵冲上前来，“合攻一处”。布斋贝勒先入，不知是骑术生疏，还是心中惊慌，或者是过于匆忙，所骑之马，竟“被木撞倒”。此时，建州兵士武谈，立即“向前骑而杀之”，叶赫诸贝勒大惊，“皆痛哭”，同来贝勒“大惧”，“皆丧胆”，“各不顾其兵，四散而走”。努尔哈赤乘机挥军猛扑，纵兵掩杀，尸满沟渠，大败九部联军，斩四千，生擒布占泰，获马三千匹，盔甲千副。这就是以少胜多的古勒山之战，从此努尔哈赤“威名大震”。①

又次，努尔哈赤逢战当先勇猛冲杀的作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努尔哈赤自幼喜爱兵猎，勤学苦练，武艺超群，史称他刀法高强，箭术精湛，是射箭能手，能百步穿杨。万历十六年(1588)四月，栋鄂部人组翁金，素以善射著称，部中无人可及，努尔哈赤指定百步之外一柳树，令其发射。组翁金发五矢，仅中三矢，上下不一。努尔哈赤也射五箭，箭箭俱中，而且五箭集中于一处，相去不过五寸，众皆叹为神技。②他一贯强调，遇逢交战，贝勒、大将必须亲自冲杀在前。他曾明确地谕告诸子及官将说：“两支大军会战之时，让兵士在前进攻，是不行的。我本身，我生之诸子，任用之五大臣，我等要亲在前面冲杀。”③尤其是在起兵初期，兵少将寡，努尔哈赤更是每战必亲自出战，率先冲击，拼死厮杀，从而战必胜，攻必克，以少败多，所向无敌，浑河之战，即系明证。

万历十三年(1585)四月，努尔哈赤领兵八十，进掠哲陈部，

① 《武皇帝实录》卷1；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801页。

② 《武皇帝实录》卷1；《满文老档·太祖》卷4。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4。

托漠河、章甲、巴尔达、萨尔湖、界凡五城集兵相抗，八百余人，布列界凡浑河畔，严阵以待。因敌兵突至，众寡悬殊，士卒大恐。五祖宝朗阿之孙扎亲、桑古里，平日在乡邻族人中间，以英勇“称雄”，现在却“见敌众大惧”，解甲与人，欲图潜逃，努尔哈赤怒斥其怯，亲自执纛先进。首领既然斥责堂弟怯战，率先执旗，俗尚武勇的女真士兵，照说应该跟随酋长前冲了。可是，兵力相差太远，以八十，对八百，敌人十倍于己，交锋必将失败，无异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因而从行之人皆胆怯不动。在这军心动摇即将灭亡的紧急关头，努尔哈赤毫不害怕，下马步行，与弟穆尔哈齐率包衣颜布禄、兀凌噶“直入重围”，“直前冲击，奋勇射之”，连杀二十余人，敌兵八百不能抵挡。涉河而逃，努尔哈赤率兵追杀六十余人，全胜回师。^①后来努尔哈赤回顾数十年戎马生涯时总结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②正是这种英勇盖世的气概和拼死厮杀的作风，才赢得了兵将的拥戴，建立起崇高的威信，因而能够作到，令必行，引必从，全军上下，一往直前，同为统一女真事业南征北战，争建奇勋。

有了这些决定性的因素，努尔哈赤领导的统一女真各部的进军，十分顺利，非常迅速。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取图伦，下兆嘉，斩尼康，十年之内统一了建州女真部落，接着又灭哈达(1599)，并辉发(1607)，亡乌拉(1613)，取东海女真，到后金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灭叶赫，三十六年内，统一了建州、海西女真及大部分“野人女真”部落，努尔哈赤从一个小部酋长上升为强大的后金国“英明汗”。《武皇帝

① 《武皇帝实录》卷1；《高皇帝实录》卷1。

② 《武皇帝实录》卷1。

实录》描述此境说：“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①这对女真——满族的发展，对东北民族的发展，对明国的关系，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① 《武皇帝实录》卷3。

第二章 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奴隶制的扩大

第一节 经济的迅速发展

一、农业的进步

女真各部的统一，为农、工、商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武皇帝实录》卷一，对万历十六年（1588）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建州女真时的形势，作了如下的归纳：

“太祖遂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与大明通好，遣人朝贡，执五百道敕书，领年例赏物。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狍狸、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以备国用。抚顺、清河、宽奠、瑗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因此，满洲民殷国富。”

这里讲到了“民殷国富”，就文字本身而论，说的是建州比过去富裕了，诸申富了，国家富了。这样，以努尔哈赤为首的贝勒、台吉当然更富了。将这种局面和一二十年前相比，那时，努尔哈赤的堂叔阿哈纳，向沙革达部部长巴斯汉之妹求婚，巴斯

汉却拒绝说：“尔虽六王子孙，家贫，吾妹决不妻汝”，而许与“殷富”的栋鄂部长克轍之子。^①世道多变，彼时家贫而难以娶妻，今日“民殷国富”，家计充裕，就此而论，的确是一个大的变化、大的进步。

但是，此时所讲形成“民殷国富”的主要收入，只有两大项，一为朝拜明帝，领取“年例赏物”；二系以本地珠、参、毛皮土特产，进入抚顺四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这两项的收入，固然不少，对于一个人丁数千的中等部落，可以够用了，可以自夸为“民殷国富”，而对于一个辖地几千里、人丁数十万的大国而言，那就太少了，差得太多了。上百万的人口，一日三餐所需的几百万石粮食，马、牛、羊、猪数百万头所需的巨量饲料，从何而来？仅靠“年例”赏物和互易收入，是绝对解决不了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有农业发展，手工业、畜牧业、采集业、商业大发展，才能满足这个需要。《武皇帝实录》偏偏不讲农、工、畜牧，正表明此时还存在很大缺陷，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的情况还很糟糕，因此，它所谓的“民殷国富”，仅是对比昔日贫穷窘境而言，有了进步，但离真正的“民殷国富”，还有很长的路程，与下述三十年以后局面，差距还很大。

后金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在给蒙古扎噜特部钟嫩贝勒的信中，努尔哈赤比较满族与蒙族的区别时说：“尔蒙古国以饲养牲畜食肉着皮维生，我国乃耕田食谷而生也。”^②第二年四月十七日，努尔哈赤致书蒙古喀尔喀五部贝勒说：

“皇天赋与我地，盛产财物，有三种貂皮，黑、白、赤三种狐皮，貉、獾、狍皮、豹皮、海獭皮、虎皮、水獭皮、银鼠皮、黄鼠狼皮、貉皮、狍鹿皮、狍皮等等皮裘。又有棉、丝

^① 《武皇帝实录》卷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13。

棉、布、葛布、盐。复有金、银、铁，皆产于地。凡此皆有，衣食之资，皆可得之。”^①

这两段话，勾画了此时农、工、商、畜牧、采集、渔猎全面发展的基本轮廓，与前段时间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现以此为线索，看看各方面的具体情况。

在农业这个起决定性作用的部门，进展很快。努尔哈赤深知粮食的重要性，万历十二年(1584)五月的一个夜晚，他捉获了一个刺客，弟兄亲族俱欲斩杀，他却说：

“我若杀之，其主假杀人为名，必来加兵，掠我粮石，粮石被掠，部属缺食，必至叛散，部落散，则孤立矣，彼必乘虚来攻，我等弓箭器械不足，何以御敌。又恐别部，议我杀人启衅，不如释之为便。”^②

这里讲得十分清楚，粮食被掠，部属就要叛走离散，家族就被孤立而亡于敌手，粮食的有无，成为部属去留的关键因素，关系到努尔哈赤一家的盛衰兴亡，何等的重要！

这是努尔哈赤起兵初期的情况，当时他还只是一个人丁稀少势孤力弱的小部酋长。过了三十年，他已经成为占地数千里的大国君汗，对待粮食的问题，仍然十分重视，经常以此作为决定军政大事的一个主要因素。万历四十三年六月，诸贝勒大臣以叶赫布扬古贝勒悔婚，欲将已许努尔哈赤之妹，改嫁与蒙古喀尔喀部莽古尔太台吉，力主攻伐叶赫及支持叶赫的明国，努尔哈赤对布扬古此举虽然十分痛恨，但却坚决拒绝了群臣的建议。《武皇帝实录》对此载述说：

“太祖不允曰：……若侵大明，合乎天，天自祐之，天既祐之，则可得矣。但我国素无积储，虽得其人畜，何以为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5。

② 《武皇帝实录》卷1。

生，无论不足以养所得人畜，即本国之民，且待毙矣。及是时，先治其国，因疆圉，修边关，务农事，裕积贮。遂不动兵。”^①

《满文老档》载称：

“汗又拒曰：明兵出境助叶赫，为之防御，终究无必鉴之。……我等今若伐明，理直，天自祐之，天既祐，我等或能得矣。虽得之，所得人畜何以食之？吾国向无积储，虽战有所获，不但不足以养所获人畜，即我等之旧人尚且皆死矣。趁此暇时，先治吾国，固吾地，修边关，耕田收谷，以充粮库。是年遂未兴兵。”

没有粮食，粮食不多，就不能兴兵，不能灭敌平愤，不能占夺人畜扩大疆域，如果联系到第二年努尔哈赤不得不强忍怒火，低声下气地向明帝“悔罪认过”（详见第六章第二节），就可知道粮食的作用之大。“民以食为天”，努尔哈赤对此理解得很深刻，认识很正确，而且有实际的经验和教训。万历二十九年十月，他因辖区“失稔”，遣使于朝鲜满浦官员说：“我境年凶如此，明春难以生活，闻朝鲜多有蓄积云，幸相赈救。”^②这个面对强敌英勇不屈的“聪睿汗”，竟因歉收，部众难活，无法可想，而被迫乞粮于人，使他亲身体会到了粮食的重要性。

因此，努尔哈赤想方设法，极力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品种，提高产量。他很早就大力组织屯田，远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朝鲜使臣南部主簿申忠一便发现建州地区屯田遍及各部：“奴酋于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所经处，无墅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③由于建州土质不良，“其地颇硗

① 《武皇帝实录》卷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

③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683页。

④ 申忠一：《建州图录》。

瘠，粮料时苦不给”，食用缺乏，“欲为广垦储粮之计”，^①努尔哈赤一方面在攻占的海西哈达等部地区“群驱垦牧”，“罄垦猛酋旧地”（猛酋，即哈达孟格布禄贝勒），“益垦南关旷地”，^②同时又不断遣发兵卒，越边进入明境开垦。万历初，总兵官李成梁于宽奠、大奠、长奠、永奠、新奠等六城堡，“开拓新疆，围环者八百余里”，辽东军民“苦役”，“往往逃窜其中，积集六万余人，屯聚日久，生齿益繁”，“成家乐业，与内地无异”。努尔哈赤以地系祖业为词，一再“索地”，为明“患害”，三十四年李成梁、赵楫（巡抚）派兵数千，强迫居民迁回，这八百余里肥沃熟土遂“擲之建人”，成为建州田地，种植牧放。^③

女真继续越垦明地，明臣多次派军驱逐，遣人劝阻，移文诘责。努尔哈赤虽声称遵诏，呈文具结，但却照旧越边占耕田地。例如，万历四十二年，努尔哈赤命王台、二汉领五百余人，入明境“住种”，明备御董国贤等“驱之，不去”。辽东巡按翟凤翀为此上奏说：

“据开原道薛国用呈称：奴儿哈赤差部夷五百名，来本边汛河口刘家孤山地名住种。又地名仙人洞，有种田达子四十四名。去年宣谕数次，令彼撤回，三见题疏，两经部覆，奉有明旨，奴投有不牧种之甘结，詎意倏忽变幻时来。以善言谕之，不肯去。以逐杀畏之，各夷云：我只怕我都督，就死在这里，也不回去。”^④

不管明朝边将一再驱逐恫吓，努尔哈赤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继续开垦，“分遣人牛，临边住种”，耕地日广，人牛日多。^⑤

① 《明神宗实录》卷519。

② 《明神宗实录》卷507；《海滨野史》：《建州私志》。

③ 《明神宗实录》卷424、455；《海滨野史》：《建州私志》。

④ 《明神宗实录》卷519。

⑤ 《明神宗实录》卷519。

长期持续扩大耕地，农业生产进展很快，万历二十三年（1595），建州地区已是“无墾不耕”，粮食下种一斗，肥地可收八、九石，瘠地收一石。到了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包括建州、海西以及明国垦地在内的后金辖区，农业兴旺发达，“土地肥沃，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终于达到了努尔哈赤所说：“我国乃耕田食谷而生也”的水平。^①

二、牧、采、猎的流行

这个时期，畜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采集、渔猎也甚为发达。八旗劲旅长于骑射，交战之时，万马奔跃，风驰电掣，瞬息即至，弓矢齐发，敌兵还未清醒过来，已毙于箭下，这一特长，弥补了兵少的严重缺陷。马和牛一样，还可以耕地拉车。因此，为了满足征战和农耕的需要，后金国对增加牲畜十分重视，首先是通过战争大量掠取马、牛、羊、驴、骡。《满文老档》记述征战收获时，常用olji一词，如得一千、二千或一万olji，^②olji意为俘获，兼指人畜而言。从这种表述战果的方式——人畜并提，便可以想见，后金对掠取牲畜是何等的重视。万历二十一年（1593），败叶赫九部军，获马三千匹。二十六年，征安楚拉库，获人畜万余。三十八年，取雅兰路，获人畜一万余。四十三年，灭额赫库伦部，获人畜一万。天命三年（1618），取明抚顺等城堡，得人畜三十万。通计在统一女真各部及对明战争中，前后所掠牲畜，多达百万以上。这是后金牲畜增加的主要来源，加上八旗人丁的饲养放牧，后金的畜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汗、贝勒和八旗官将，拥有大批牲畜。早在兴起初期，努尔

^① 申忠一：《建州图录》；李民安：《建州闻见录》。

^② 本书所引满文，皆系用罗马字转写，因满文字母不便印刷。

哈赤即曾赐给长子阿尔哈图图门贝勒褚英、次子古英巴图鲁贝勒代善各八百adun。^①adun，意为马群、牛羊群、牧群。马群一，当有十匹以上马，牛羊群一，数量会更多一些。顺治元年(1644)入关以后，大凌河牝马三十六群，有大小马一万九千七百匹，平均每群有马五百四十七匹。商都达布逊诺尔马群，每群马自三百匹至五百匹。张家口外牧厂，牛以一百二十头为一牛群，羊四百只为一羊群。^②可见，褚英、代善二人，拥有的马、牛、羊，当有数万匹之多。

朝鲜人李民寅叙述天命四年(1619)后金畜牧业时，总结性指出：“六畜惟马最盛。……将胡之家，千百为群，卒胡也不下十数匹。”^③李民寅讲的“将胡”，指的是八旗贝勒和官将。此时的贝勒有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德格类、斋桑古、济尔哈朗、岳托、硕托、萨哈廉、杜度等十二人。八旗官将，有五大臣，十扎尔固齐，八固山额真，十六名梅勒额真，还有甲喇额真约五十名，牛录额真二百余名，合计约有三四百名“将胡”，以“千百为群”算，当有马三万至三十万。当然，李民寅所说“千百为群”是习惯用语，形容马数之多，不一定就是说每一“将胡”有马一千或一百，不能以此作为计算绝对数字的根据，但它毕竟也表明了后金贝勒、大臣确实拥有数以万计的马匹。

李民寅既说“卒胡也不下十数匹”，又说努尔哈赤统辖“长甲军十万余骑，短甲兵亦不下其数”。^④长甲军是骑兵，十万余名骑兵应有战马数十万匹，因为一名骑兵不止有一匹战马，而是二、三匹或四、五匹，这样看来，八旗骑兵的马就有五六十万匹了。此数有些夸大，因为，此时后金国总计才有二百三十多个牛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08、1209。

③ 李民寅：《建州闻见录》。

④ 李民寅：《建州闻见录》。

录，每牛录以额定三百丁计，有七八万丁，怎么也凑不够十几万或二十万兵的数字。如果说有四五万兵士参加萨尔浒之战及从事其他征伐，倒还符合历史实际一些。照几万名士兵计算，战马有十万匹左右。

后金之牛、羊、猪的数量也相当多。李民寅说：后金“家家皆用小车，驾之以牛”。^①每家都有用以驾车之牛，仅此一项，就有数万头牛。努尔哈赤还常常以马、牛、羊、猪赐给降民和八旗官兵。他对抚顺降民一千户，给与马、牛和谷物，还赐牛一千头令其宰杀，每户又给“大母猪二、犬四、鹅五、鸭五，以令饲养”。^②由此可见，后金确是六畜兴旺，马、牛、羊等牲畜，多达百万匹(头)以上。

女真性喜狩猎，采集亦甚流行，貂、狐、参、珠，为其特产，名扬天下。努尔哈赤经常率领群众，行围打猎，还专门制订了详细的围猎法例。他严禁行围时喧哗杂乱，因为“猎时喧哗，声响山谷，兽即遁走”。他对捕捉老虎，极感兴趣，想出了对付这个横行山谷威慑百兽的山中之王的办法。他规定：“若见虎卧，勿动，即告众。若于恰当之处遇见，则众人围而杀之。如地势恶劣，则弃之。若见虎奔，则勿停，追而射之。”^③这个办法很好。老虎凶猛异常，贪残好斗，稍不小心，猎人即会葬身虎口。虎卧之时，尚未发现有人跟踪，猎人返回求援，众人齐动，才有可能射杀此兽。虎若奔跑，显示出它畏惧猎人，胆怯逃窜，斗志锐减，这时猎人群起急追，便易于得手，捕杀逃虎。对于大熊、野猪这样力大无穷的猛兽，努尔哈赤也很有兴趣，特别作出了捕捉的规定，强调众人动手，要求首先发现熊猪之人，无力射杀

① 李民寅：《建州闻见录》。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6。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4。

时，“则呼‘共杀’，而求助于他人。共杀时，平分其肉”。①

努尔哈赤少年时期，曾上山采挖人参，摘拾松子，带到抚顺马市出售，深知采集之利。他为了对付明朝边将的压价收买，细心钻研保存、制造方法，终于力排众议，果断决定，废弃以水浸润人参的长期习俗，改为煮熟晒干，这样，可以慢慢出售，获利甚大。《武皇帝实录》卷二载称：“曩时卖参与大明国，以水浸润，大明人嫌湿推延，国人恐水参难以耐久，急售之，价又甚廉。太祖欲煮熟晒干，诸王臣不从。太祖不徇众言，遂煮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

努尔哈赤把采参狩猎之人，作为与耕田、筑城相提并列的三大类劳动力，宣布应当“善养”。②

努尔哈赤对狩猎、采集的重视、支持和组织，促进了猎、采、捕的大发展。仅只是万历三十五年明廷实行禁市政策以后的两年内，努尔哈赤准备向明出售的人参，就烂掉了十余万斤，可见人参产量之多。女真地区还有一种名贵特产——珍珠。珠有大有小，光泽不一，最佳者称为“东珠”，价值昂贵，是后金一重要财源。茅瑞征在其所著《东夷考略》，论及东珠与努尔哈赤富强的关系时说：“长白山在开原城东南四百里，其岭有潭流水，下成湖陂，湖中出东珠。今其地为建酋奴儿哈赤所有，故建酋日益富强。”

努尔哈赤拥有大量人参、珍珠、貂皮、狐皮，运往明国抚顺、清河、宽奠、绥阳等关出售，获得巨量银两，换回耕牛、铁铧、铁锅、食盐、衣布、纸张等生产、生活必需用品，促进了农工生产，扩大了财源，增强了国力。明辽东巡按翟凤翀对此评论说：“奴酋擅貂参海珠之利，蓄聚蕃富。”③ 这是比较符合历史实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

③ 《明神宗实录》卷519。

际的。

三、工商业的发达

以往女真部落分散零乱，互相残杀，严重地影响了工商业，手工业十分落后，商业极不发达。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消除了割据状况，密切了经济交流，他又实行优待工匠，大力促进手工业、商业的政策，迅速地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

努尔哈赤“宽待”掳来的各种工匠，对“善手铁匠……欣然接待，厚给杂物，牛马亦给”。^①他派遣本族人员，充当甲匠、箭匠、弓匠、冶匠，在汉族工匠、朝鲜工匠的指导下，从事弓、箭、甲仗的制作。万历二十七年(1599)，创办铁矿，冶炼铁器，又开金矿、银矿。^②

当时，征战频仍，兵器急需，大批匠人日夜赶制军械。在汗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老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铁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银匠、铁匠、革匠、木匠皆有，“而惟铁匠极巧”。铁匠又巧又多，仅北门外专造铠甲的铁工，其居住的房屋，就“延袤数里”。^③

铁匠技术高超，使用好铁，打造的甲仗十分结实。八旗军“所戴盔甲、面具、臂手，悉皆精铁”，“极是精坚。所有长枪、飞枪、透甲箭，极是锋利”。因此，天命四年(1619)萨尔浒大战时，后金步兵径直冲进朝鲜军营，朝兵虽连发铳箭，不能射人，“甲坚固也”。而明兵盔甲，“既皆荒铁，胸背之外，有同徒祖”，敌兵于“五步之内，专射面胁，每发必毙”，难以抵

① 《朝鲜宣祖实录》卷134。

② 《武皇帝实录》卷3。

③ 李民葵：《建州闻见录》；程令民：《筹辽硕画》卷首《东夷奴儿哈赤考》；徐光启：《辽左防危已甚疏》，《明经世文编》卷488。

挡。^①兵器甲仗的锋利坚固，表明了铁的开采、冶炼和制造的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手工业生产飞跃发展的一个标志。

过去，女直只能织麻布，努尔哈赤兴起以后，大力提倡种植棉花纺织布匹，饲养家蚕，缫丝织帛。《满文老档·太祖》卷五载，天命元年正月，谕告部众：“要开始种植棉花，专赖收获，才有衣穿”。“是年，始育蚕缫丝织缎，种棉织布，传布于全国”。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女真地区，素不产盐，全靠外地供应，主要是依赖“抚赏”，“告讨”，向明国边将领取，数量少，来源不稳定，经常闹盐荒。努尔哈赤决心改变这一恶劣局面，天命五年六月，“始遣人往东海煮盐”，收效很大。当年十月，就命参将阿尔巴尼率每牛录的四人，前往海滨，运取煎煮的食盐，“于国内按丁给与”。这一千余人运回的盐，数量相当多，当有数万斤或一二十万斤。^②

农业、畜牧、采集、渔猎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这个阶段，建州与蒙古各部，与朝鲜，与明国的贸易，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增长。建州地区，资源丰富，尤其是人参、貂皮、狐皮，以及珍珠等土特产品，产量多，价格高，更是对外出售获利的主要物品。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辽东巡按翟凤翀便指出：“奴酋擅貂参海珠之利，蓄聚蕃富”。^③

努尔哈赤的贸易方针，是以明为主要市场，出售人参、貂皮、狐皮、珍珠，换取布帛、农具、耕牛、食盐等生产、生活用品，再将一些帛缎布匹以及银两，向蒙古买马，以备军用和向明出售，同时，也以人参等物与朝鲜贸易。

后金与明的贸易，长期是以建州海西、女真名义进行的，主

① 李民寅：《建州闻见录》；徐光启：《辽左陆危已甚疏》、《恭承新命谨陈急切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488。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

③ 《明神宗实录》卷519。

要渠道有二。一是进京朝贡。明发给建州敕书五百道、海西女直一千道。天命三年攻明以前，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各部，并吞了乌拉、辉发、哈达，还掠取了叶赫一部分敕书，在进贡时，仍以原来的名义，如建州左、右卫，建州卫，海西哈达部等，虽然明朝政府知道此事，但无力干预，不能叫努尔哈赤将哈达、辉发、乌拉退出来，只有默认，让其进贡。

进贡的人数很多，在较长的时间里，努尔哈赤每年派一千五百人，进京朝贡。^①朝贡本身，就包含有贸易的因素。建州人贡马匹、人参、貂皮，明则赐以彩缎银钞，此时彩缎等物亦已折银发给，按每人一匹彩缎计算，一千五百人可领彩缎折的白银四千五百两，加上其他物品，数量相当不少了。按照规定，“贡夷”可以携带货物入京出售，买回物品。万历四十年，明因“贡夷”至京太多、欲图限制。礼部主事高继元于四十年五月上奏说：

“贡夷除琉球、暹罗、朝鲜冠带之国，并番僧番族外，三卫、海、建女直先后辐辏计九百人。三卫悍而纵肆无忌，女直诈而狡横，回夷行李多至千柜，少亦数百，恣买违禁货物，迁延岁月不回，宴赏程廩车马之类，费亦数万，此三夷者借贡兴贩，显以规利，且渐生心，不可不思患预防者也。臣请制其流者六，清其源者三。……一，核贸易。请敕边臣起送夷人之日，计其携带之物开单，送礼兵二部，遣会同馆官，与之发卖，如其高价莫售，仍以原物还之。自京而出，要买某货若干，召商卖与，其价两平，各从其愿，若有违禁之物，不许私卖。”^②

从高继元的奏疏，可以看到后金“借贡兴贩，显以规利”的真实情况，“贡夷”成百上千，卖出大批货物，买回许多商品，生意

^① 《明神宗实录》455、530。

^② 《明神宗实录》卷495。

兴隆，财源茂盛。

除了领取赐物和在京市易以外，后金还有“车价”等项收入。所谓车价，是建州八贡之人，须沿途州县备办车辆，运送贡品（包括交易的货物），因数量太多，难以办齐，折交银两。“车价”银相当多，每年竟多达数万两。^①

后金与明贸易的另一重要渠道，是在抚顺、开原、清河、宽奠、绥阳等处设立的马市。比起每年一次の入京贡市而言，抚顺等处的马市就更加频繁，基本上是三日一市，每次入市的人数都是成百上千，交易额极为庞大。

通过入京贡市和马市交易，后金与明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交流。仅是人参一项，每年就有数以万斤计的买卖。比如，前面曾经提到，由于明廷一度于万历三十五年实行禁市政策，两年之内，后金准备出售与明的人参，竟腐烂了十余万斤。

这样大量的物品交换，后金卖出了土特产品，买进了急需的衣、布、帛、缎、牛、盐、锅、铎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得到许多银两，还可打听明国情况，为用兵作准备，确实是获利极大。这一点，明臣也有所了解。万历三十七年四月，兵部尚书李化龙上奏，分析辽东军情说，此时建州努尔哈赤，不会“舍数万车价之利，而急言战也”。^②万历四十二年九月，辽东巡按翟凤翀更明确指出，“奴酋所最贪者，清、抚之市”。^③可见贡市、马市规模之大，利益之厚。

农业、手工业、商业、畜牧业和采集、狩猎业的迅速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为兵力的增强，为后金国的建立，为满族的形成及其由女真族的原始社会末期进入奴隶社会，

① 《明神宗实录》卷457。

② 《明神宗实录》卷457。

③ 《明神宗实录》卷524。

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二节 诸申处境的变化

涣散的女真部落，统一了，后金国建立了，并且进步很快，社会经济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原来女真中的主要成员——诸申，是什么样的处境，变好了，还是更坏？这是涉及满族、后金国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如果从物质生活来说，大多数诸申比过去是好了一些，至少可以吃到盐了，有布用，有衣服穿了，耕种农具多了一些。但是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诸申发生了两极分化，少数丁多马壮、出征立功、掠取人畜的诸申，发财了，当上了牛录额真、备御、千总等中下级官将，有的还进入了高级官将的行列，上升为役使阿哈、勒索属民的奴隶主，而大多数诸申，则失去了过去“任意行止”的自由，编入八旗，遭受汗、贝勒的压迫，处境显著恶化，我们这里讲的诸申，就是指这样的贫苦人丁。

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诸申必须编入八旗各个牛录，听从牛录额真等官将管辖，不得离开本牛录到外地居住。各个牛录的范围及耕种的田地，皆有规定，不许随便更换和迁移。诸申外出，须向牛录额真说明缘由，申请批准，才能行动，不得擅自私走。往日诸申任意行走、随便迁居的古老的自由传统，被统治者取消了。

以前，遇逢要事，诸申聚会，平等商议，共同决断。现在诸申只有服从命令听候驱使的义务，没有决定问题的权利，大小诸事，皆由牛录额真、甲喇额真、梅勒额真、固山额真，直至诸贝勒议处，报后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批准。

昔日诸申与“贝勒”之间平等相待，不受“贝勒”惩治，今日

汗、贝勒握有生杀予夺大权，颁布各种法令，施行严刑峻法，重惩“犯上”诸申。

天命四年(1619)七月初八日，英明汗努尔哈赤下谕，责令八旗官将严守法度，严束部下，忠心为国，叫群臣立誓。他说：

皇天祐我，授以基业。为国君者，唯恐有失天授之基业而兢兢业业固守之。汗委任之诸大臣，自众额真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尔等应勒敏恪慎，殚心厥职，严守法度，严束部下。……自众额真以下，村拔什库以上，各官所立誓言，自奏于汗，汗阅后书于档子。日后尔等若变心犯罪，即依誓言审断。”^①

八旗官将遵谕，书写誓言呈交于汗。总兵之一等大臣以下，五牛录额真以上各官誓书说：

“汗所降谕旨及各项法令，定牢记不忘，且勤加宣谕。若置诸贝勒、大臣之命令于脑后，玩忽职守，不辨良莠，为诸贝勒、大臣见责，我等甘受贬黜。”^②

众章京、各村拔什库立誓说：

“诸贝勒、大臣已将各项法令下达于牛录额真。我等定不忘牛录额真传谕之言，召之即至，不违其时，遇有差委工役之事，定不避亲族，身先承当。若谎称此言，并不兑现，为牛录额真见责，报诸贝勒、大臣，我等甘愿伏诛。上天嘉祐汗之忠直，我等皆愿效汗，奉公为生。战阵征伐，必矢忠效力。陈情述见，必尽忠言。阵有俘获，尽缴于众均分之，得与不得，均与众同。若违此言，私取或隐匿些须之物，甘受天责，殃及死罪。”^③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11。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11。

以汗、贝勒、八旗大臣为首的统治阶级，就是通过这样的严格控制 and 野蛮镇压，才剥夺了诸申往时享有的自由的民族成员权利，才将长期以来“任意行止”的诸申束缚在八旗制度之下，从而金派诸申屯垦田地，披甲从征，充任各役，进行沉重的剥削。

努尔哈赤起兵以后，曾实行了牛录屯田制。《满文老档·太祖》卷三载：“是年（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以取赋谷于部众，将苦累部众，始命一牛录出十丁四牛，于旷野外耕种，自此，不取赋谷于部众，部众亦无所苦。谷物丰足，粮库充裕，前此未有粮库矣。”

同书卷四在总结天命元年（1616）前夕国内情形时，又写道：“因取赋谷于部众，将苦累部众，乃令每牛录出十丁四牛于公，于闲地垦田，多获谷物，充实仓库。任十六大臣、八巴克什，掌管库谷之登记收支。”

从这两段记载，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这是关于努尔哈赤全部辖区的规定，涉及面广，地区辽阔，不是仅指个别牛录或村屯。这样大规模地屯垦田地，必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二，所谓每牛录出十丁之丁，就是部众，亦即人们常说的诸申。努尔哈赤命令每个牛录出十名诸申屯种田地，就是奴隶主专政的国家，向八旗全体诸申征收赋谷的特殊方式。过去，诸申自由耕牧行围，“不纳所猎”，不受任何形式的赋税剥削，现在，必须出人丁，自备耕牛，垦种田地，收获物被迫全部交纳国库。《满文老档》写得很清楚：向诸申收赋谷，将苦累诸申，故令诸申出丁牛屯田。可见，屯田即系代替赋谷的征收，即变相的赋谷，就是奴隶占有制国家征收诸申赋谷的特殊方式。

第三，屯田苦了诸申，富了汗、贝勒。按照努尔哈赤的规定，一牛录出十丁四牛屯垦闲地。一丁应垦多少地，汗谕虽未说

明，但可以拿以后“计丁授田”的标准，作一比较。天命六年七月颁行的“计丁授田”谕，规定每丁给田六日，一日为六亩（也有少数地区，一日为十亩），每丁共领地三十六亩。照此推算，一牛录十丁，可屯垦田地三百六十亩。进入辽沈前夕，八旗有二百三十多个牛录，当有二千三百多丁，可垦地八万余亩，以每亩收谷一石计，可收八万余石谷。因此，《满文老档》编写者说，实行牛录屯田制以后，“谷物丰足，粮库充裕，前此未有粮库矣。”这对女真国——后金国实力的加强、军粮的供应，对汗、贝勒财富的增多，都起了重要作用。

屯田以外，诸申还要缴纳各种临时金派的物品。李民寅叙述后金征赋金役的方式说：“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绝无呈诉辨理曲直之事云。”①

诸申被迫披甲当兵，从征厮杀。诸申年长成丁，必须在所属牛录披甲为卒。早期比例不大，名额不多，后来大体上是三丁抽一。战争频繁时，或进行大的战争，如天命四年与明军决战于萨尔浒，金丁当兵的比例就大一些。

披甲的诸申，还须买马备鞍，自置兵器。努尔哈赤责令各牛录额真督促兵丁办理军装，维修兵器，养好战马。“若兵丁甲、胄、弓、箭、刀、枪、鞍辔等物恶劣，则贬降牛录额真。若俱整修良好，军马肥壮，则擢升牛录额真。”②各牛录额真在努尔哈赤升官晋级的引诱和贬斥降职的警告下，当然要加紧鞭策兵丁喂好战马，备齐鞍辔，整修甲胄兵器。这需花费大量银米，对诸申来说，是很重的负担。

长期征战，许多诸申不死便伤。《清实录》等官书反复宣称，

① 李民寅：《建州闻见录》。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

蒙天保佑，八旗劲旅所向无敌，伤亡极少，这与历史事实出入很大。

《满文老档》在正式叙述天命三年四月攻打明抚顺城的战役时，大讲明兵惨败情形，对自己士卒的伤亡，却尽量掩饰，声称只死小卒二人，无受伤者。其实，真相并非如此，从它另外两处记载此役赏赐原则看，牺牲是不小的。四月二十一日后金国汗、贝勒规定：“有大功之人多赏，小功之人少赏。负伤者，视其伤之轻重，查看后赏之。甲兵死者，厚赏之。”第二日，“查询攻敌负伤者，各按伤之轻重，录功行赏”。^①这两次都明确讲到，兵士有受伤的，有死亡的，而且伤者死者还不少，否则，就不必两次记载按照伤的轻重来分别赏赐了，如果只死小兵二人，也就不必特别规定“甲兵死者，厚赏之”。

天命六年三月，后金军攻下沈阳、辽阳。《满洲实录》记述这次战役时，只说大败明兵，只字不提八旗兵丁有何伤亡，似乎无一死者。然而，《满文老档》载录的努尔哈赤劝诱海州民降顺的汗谕，却不得不承认：“攻取辽东城时，我之兵士，死者亦多。”^②“死者亦多”，虽只四字，却真实地反映了大量披甲的诸申血染战场、尸横遍野的悲惨情景。

诸申还须承担筑城、运粮等苦役。早在起兵之初，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就在苏子河畔修建费阿拉城，后陆续扩建加固。万历二十三年，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入使建州时，观察了该城的情况。他说，城分内城外城，“外城周仅十里，内城周二马场许”。内城外城皆“先以石筑，上数三尺许，次布椽木。又以石筑，上数三尺，又布椽木。如是而终，高可十余尺”。当时，正金派诸申缴纳木材，驾牛运送，于外城之外，修建木栅，“每一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户计其男丁之数，分番赴役，每名输十条”，每条长十余丈。^①

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迁都赫图阿拉，也筑内外城，“内城以木石杂筑，高可数丈”，很宽阔，“可容数三万众”。^②

天命三年八月，开始建界藩城，仅第二年二月十五日，一次就派遣一万五千人搬运筑城石块。^③天命五年，又从界藩迁往萨尔浒，金派诸申、阿哈，大修汗宫和诸贝勒、大臣府宅。仅大贝勒代善的新居，除令其本旗诸申服役兴建外，还发公中人丁一千名为彼修建。^④

诸申筑造城池，期限急迫，艰苦难堪。努尔哈赤也承认筑城是苦役，几次谕称，应当“善养”“修筑城池运送木石之穷苦之人”。^⑤

诸申还被金往造船运粮。天命元年，努尔哈赤下令，每牛录出三人，遣往兀尔简河上游森林处，造船二百，以备进攻东海萨哈连部女真之用。^⑥

不仅国家金派的官徭是差重役烦，而且诸申还遭受诸贝勒和八旗官将的奴役。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置牛录额真一，其上有甲喇额真、梅勒额有、固山额真，还有旗主贝勒。额真，乃满文 *ejen* 的音译，其意为“主”。照字直译，牛录额真是本牛录三百诸申之主。仅从这官衔本身，便可想见牛录额真对本牛录诸申统治权力之大。牛录额真打骂诸申、盘剥诸申的行为，相当普遍。比如，科坦凶横暴虐，任意鞭打本牛录诸申的妇女。^⑦

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使得许多诸申倾家荡产，穷苦不堪。就

① 申忠一：《建州图录》。

② 李民葵：《建州闻见录》。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8。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14。

⑤ 《满文老档·太祖》卷8。

⑥ 《满文老档·太祖》卷5。

⑦ 《满文老档·太祖》卷18。

在《满洲实录》编写者颂扬“满洲民殷国富”时，很多诸申穷得连妻子也娶不起。万历四十一年三月，努尔哈赤下令，清查本国各路各村没有妻子的诸申，“赐千余人以妻。女人不敷，发库财与之，令其买女为妇，每人给毛青布二十至三十匹。”^①

自带耕牛农具，屯垦田地；筑城造船，官役频繁；置办军装、兵器、战马，花费银米甚多；官将勒索，贝勒欺凌，严厉辖束，层层控制；长期征战，伤亡累累；法网森严，动辄得咎。这一切，使诸申的处境显著恶化，从原来自由的氏族成员，下降为奴隶占有制国家统治的贫苦平民。

第三节 奴隶制的急剧扩展

一、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阿哈

这段时间的阿哈，比过去增加了许多倍。在战争中掠夺的人口，是阿哈的主要来源。同时，诸申分化加剧，穷者沦落为奴，或因犯罪贬为阿哈，以及原有的阿哈生的子女，皆增加了阿哈的数量。比如，申忠一说：一些诸申私人朝鲜境内采挖人参，努尔哈赤“令各部刷出，每名或牛一只，或银十八两征收，以偿其私自越江之罪。其中，贫不能措价银与牛者，则并家口拿去使唤”。^②

阿哈数量之多，从下述一些事情可以看得很清楚。首先，努尔哈赤一贯执行“抗拒者杀，俘者为奴”的政策，把攻打女真各部和明朝城乡掠来的男女老少，强行勒令充当阿哈。这个数字非常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

^② 申忠一：《建州图录》。

大。比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征安楚拉库，获人畜万余。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取雅兰路，获人畜万余。万历四十三年十二月，灭额赫库伦，获俘一万。天命三年(1618)四月，取明抚顺等三城和台堡五百余，获人畜三十万。七月下清河，“杀鹵军丁男妇以万计”。天命五年七月，打下懿路、蒲河二城，“老百姓、马、牛，俘获甚多”。^①三十多年的征战，努尔哈赤率军掠取的人畜，为数可达数百万之多。

其次，《武皇帝实录》卷二载，天命三年八月，努尔哈赤令纳邻、因德二人，“率四百众”，往夹木和收获庄稼。这里所说的“四百众”，是什么意思？“众”又是什么身份，是诸申，还是阿哈，或是兵士？不清楚。查看《满文老档》，它记为，纳邻、因德二人“率诸贝勒之拖克索包衣八百人”打谷。^②由此可知，原来《武皇帝实录》讲的“四百众”，却是诸贝勒拖克索中的八百名阿哈。一次就能派遣八百阿哈打谷，可见诸贝勒必然拥有大量阿哈。

再次，万历四十年九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乌拉时，其子莽古尔泰、皇太极建议直取乌拉都城。努尔哈赤拒绝说：“相等之大国，欲一举尽灭之，岂能得乎！且尽取其外所属诸部，唯存其都。若无阿哈，主何能生！若无诸申，贝勒何能生！”^③这段话，非常重要，充分反映出此时阿哈的数量，是何等之多。我们可从三方面来分析。

第一，与前段时期相比较，查阅清朝早期的文献，找不出努尔哈赤有专门讲述阿哈的话，相反，他却常提到诸申，担心诸申因为缺粮而离开，这岂不是表明，诸申是当时女真部落中社会的主要成员，而阿哈却是人数很少不为人们所重视吗！现在，局面

① 《武皇帝实录》卷1、2；《满文老档·太祖》卷4、6、10、16；《明神宗实录》卷583、585。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7。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

不一样了，阿哈成为努尔哈赤经常谈论的话题，这就是说，阿哈的人数，已经很多，在社会上有着强烈的影响，统治者不能闭目不视了。

第二，本来是莽古尔泰、皇太极建议攻打乌拉都城，毫未涉及阿哈，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而努尔哈赤却偏偏援引阿哈与家主的关系，来反对其议，来为己先取外部孤立都城的主张作根据，如果阿哈的人数很少，不为众所熟悉，努尔哈赤怎么会这样讲，听的人怎能理解。正因为此时阿哈非常多，从事生产劳动，家主依赖阿哈为生的情形已经相当普遍，所以努尔哈赤才列举这种社会上公认的、常见的、习惯的事情，作为比喻。

第三，这段话把阿哈与诸申相提并论，无阿哈，则主不能生，无诸申，贝勒也不能生，改变了过去只说诸申不谈阿哈的古老习惯，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昔日以诸申为主体的局面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诸申与阿哈并重的社会阶段已经到来了，

这些事实表明，到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就任“英明汗”，正式建立后金国时，阿哈已经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劳动者阶级。

阿哈劳动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什么活都干，但最主要的活，还是在汗、贝勒、八旗官将的拖克索中，耕地种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现举两个重要例子为证。

例一，天命三年八月，纳邻、因德率诸贝勒拖克索的八百名阿哈去打谷时，遭明军偷袭，杀七十人。为了报复，九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遣兵掠明会安堡，获人一千，斩三百，并致书明臣说：“尔大国皇帝之兵，若窃杀我耕田阿哈一百，我将杀尔之耕田阿哈一千。”^①这段材料，既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八百阿哈是在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7。

诸贝勒的拖克索中耕田种地的阿哈，不是家内奴仆；同时，“耕田阿哈”四字，还说明阿哈主要从事于农业劳动，已是社会上非常普遍的行为。因此，对阿哈，不称为织布阿哈，不叫建房阿哈，不命名为煮饭阿哈或运粮阿哈，而称之为“耕田阿哈”。并且，努尔哈赤及八旗贝勒、大臣太习惯于这种现象了，好象不管是后金国，还是明国，种地植棉的人，都是“耕田阿哈”，所以他们既把诸贝勒拖克索中的阿哈叫做“耕田阿哈”，又称明国种地农夫为“耕田阿哈”。这样的书写方式和习惯称呼，有力地证明了，此时的阿哈，主要在拖克索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例二，天命六年闰二月，努尔哈赤下谕说：“阿哈应爱主，主宜怜阿哈。阿哈之耕田之谷，须与主共食。”^①关于家主怎样“爱”阿哈的真实情景，待后评述，这里只着重讲一个问题，即在汗谕中，不说阿哈服其他杂役，而是明确地、突出地讲阿哈耕田，可见阿哈是主要从事农业劳动。

当然，这并不是说阿哈不干其他活。他们必须为家主采挖人参，捕捉兽禽，捞取珍珠，还要随主从征，牧马备鞍，厮杀拚刺，还要伐木运水，洗菜做饭，侍奉家主，等等苦役，尽皆承担。但总的来说，广大阿哈主要是在拖克索中耕田种地，已经成为后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

二、奴隶制成为后金国的主要生产关系

随着后金国的建立和扩展，汗、贝勒和八旗官将，掠夺了大量人畜，编立大批拖克索（庄），役使阿哈耕田种地。天命四年（1619）因败被俘进入建州的朝鲜从事李民寅，叙述后金汗、贝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7。

勒、大臣庄田之多时，写道：“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互相买卖）、农庄（将胡则多至五十余所）。奴婢耕作，以输其主。”^①一人能有五十多个拖克索，可见八旗贝勒、官将占有庄园之多。

在这些拖克索中耕种田地的阿哈，仍然是奴隶，并没有转化为封建农奴，家主剥削阿哈的奴隶制，已经发展为后金国中的主要生产关系。

马克思指出：“这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所以昂贵的原因之一。按照古人的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声的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②

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这是对奴隶的身份和性质的科学概括。奴隶不能算作人，而是物品，和牲畜、工具一样，都是主人占有的物品，都是主人的工具。既是工具，主人就有权任意支配，可以买卖，可以赠赐亲友，可以分授子孙，也可以损坏，对奴隶来说，就是可以驱使、打骂，直到杀身害命。

从这个阶段阿哈、家主的情况来看，土地、耕畜、生产工具，皆归家主所有。这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了阿哈必然陷于惨遭家主蹂躏的困难处境。

家主完全占有阿哈人身，象对待牲畜一样，残酷压榨，野蛮虐待。阿哈的身份极端低贱，与牛马等同，经常是人畜并提。阿哈被家主任意买卖，或赠送与人，或分给子孙。^③家主虐待阿哈，百般辱骂，残酷鞭打，甚至灭绝人性地将阿哈折磨至死。^④阿哈不能离主外逃，直到天命五年，捕获逃亡的阿哈，还是一律

① 李民寰：《建州闻见录》。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222页注17。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4。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46。

新杀。①

关于劳动产品分配方式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满文老档·太祖》卷十七，载录了努尔哈赤的一道汗谕，非常有价值，现译录如下：

“(天命六年闰二月)十六日，汗谕下：天命之汗，慈养属下诸大臣，诸大臣亦应有尊敬汗而得生计之理矣。贝勒当爱诸申，诸申须爱贝勒。阿哈应爱主，主宜怜阿哈。阿哈之耕田之谷，须与主共食，主之征战得获之衣服，应与阿哈同着，打猎所获之肉，应与阿哈同食。申年(天命五年)曾下令曰：‘(家主须)勤种棉花织布，以衣包衣阿哈，见其着劣衣之时，则取之而给与善养之人。’兹已过矣。今兹酉年(天命六年)，播种棉谷收获之前，勿论，若收新棉新谷之后，(阿哈)复以(家主)给与衣食为劣而上诉，则从虐养之主取之，转而给与善养之主。贝勒与诸申，阿哈与主，若皆互相慈爱，则天嘉之，人皆喜好矣。汗之如斯互相爱恤度日之言，无论是谁，皆不得违！”

这是极为罕见的珍贵资料，是判断阿哈性质的关键性根据。这次“汗谕”，是努尔哈赤对后金全部辖区宣布的。它概括了整个后金国中阿哈与家主之间关系的基本情况，指出总的弊病，重申禁令，强调必须在全部辖区贯彻执行，不准任何人违背。

依据此谕，可以说明四个问题：

第一，阿哈是由家主供食。《满文老档》里的汗谕，有这样一句话，原文为：aha i weilehe usin i jeku be i emgi uhe jefu。这是命令式的句子，被命令的对象 aha (阿哈)，被省略了。aha i weilehe usin ijeku，意为“阿哈之耕田之谷”，在

① 李民安：《柵中日记》。

这句话里，是作为及物动词jefu(吃，食)的宾语。jefu，是动词jembi的命令式，意为叫人吃，使人食，令食。be，是表示及物动词和强制式动词的直接客体的附加成分。全句应译为“(阿哈)须与额真(主)同食阿哈之耕田之谷”。这句话说明了阿哈辛勤耕耘，所收粮食须与家主同吃。但怎样同食？是粮食由阿哈支配，邀请家主同食？还是谷归主人所有，仅给阿哈口粮？或者是阿哈交纳一部分产品，余谷自己食用？尚不清楚，还需看下一句。努尔哈赤说：“若收新棉新谷之后，(阿哈)复以(家主)给与衣食为劣，则从虐养之主取之，转而给与善养之主。”这清楚地表明，原来所谓阿哈与主“共食”，却是阿哈由家主供食，是家主使阿哈食之。

《满文老档》卷二十一记载了努尔哈赤的另一段话，也有助于说明阿哈是由家主供食。天命六年四月初五日，努尔哈赤力主自萨尔浒迁都辽阳，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可以获得食盐，能吃到足够的盐。他说：“昔我国之包衣阿哈逃亡者，皆因无盐得食耳！”把阿哈的逃亡，完全归诸于没有盐吃，固然是太简单了，但也不是毫无根据。据李民寅说，天命四年下半年至五年七月他在建州的时候，“盐酱极贵”，“将胡家尚有所储，而闾阎则绝乏已久云”。^①食盐这样稀少，一般诸申，甚至小奴隶主，都很难买到足够的盐，很难吃到适量的盐，家主当然不会给阿哈吃多少盐。因此，努尔哈赤的这一句话，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旁证，它说明，阿哈确系由家主供食，而且吃得很坏，往往连盐都吃不上。

第二，阿哈穿的衣服，是由家主供给。汗谕明确规定，“(家主须)勤种棉花织布，以衣包衣阿哈”，家主征战得获的衣服，

^① 李民寅：《建州闻见录》。

“应与阿哈同着”，可见，阿哈的衣服，确系由家主供给，但往往是给以粗衣劣服，使得阿哈不断因衣食为劣而上告。

第三，家主虐待阿哈的情况十分严重。长期以来，家主给阿哈吃得很坏，穿得很差，甚至不给盐吃。广大阿哈对这种缺衣少食的恶劣处境十分不满，不断逃亡、上告，矛盾非常尖锐，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采取对策。天命五年，努尔哈赤下谕，命令大小奴隶主，家中多织布，给阿哈穿，多给阿哈粮食吃，否则将从虐养的主人处取走，给与另外所谓的“善养之主”，以图缓和一下矛盾。但是，没有什么效果，以致第二年再下汗谕，重申前令，对家主们再三劝导和警告。这道汗谕本身，就足以说明，阿哈吃得坏、穿得差的悲惨处境，并没有任何改变。

第四，阿哈所获粮谷，全由家主霸占。前面已经说明，后金国英明汗下谕，命令阿哈须与家主同食“阿哈之耕田之谷”，既然阿哈本身都由家主供食，由家主供穿，那么，很明显，阿哈生产的粮食，是全部交与家主了，不然的话，不要说一切粮谷由阿哈支配，就是一半、一小半归阿哈所得，阿哈也不会衣食于主了。

由此可见，对努尔哈赤的这道汗谕，不能简单地按字面来解释，它的真正的含义是，广大阿哈披星戴月，辛勤耕耘，生产出来的宝贵粮食全被家主攫取。家主虐待阿哈，给与劣衣恶食，招致阿哈愤怒反抗，迫使统治者下令告诫家主，但丝毫无济于事，矛盾在继续激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阿哈的性质及奴隶制生产关系，作出结论了。在这个阶段，阿哈人数激增，主要在汗、贝勒、八旗官将的拖克索内耕田种地，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家主所有，家主完全占有阿哈人身，阿哈衣食于主，劳动成果尽被家主霸占。因此，

这时的阿哈，既未转化为不能打杀、缴纳地租、有个人私有经济的封建农奴，也不是经营地主使用的封建雇工，而仍然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这样的家主压榨阿哈的剥削方式，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而且已经发展成为当时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

第三章 满族贵族集团的形成

第一节 贝勒和台吉

一、六祖子孙

满族贵族，包括宗室贵族和异姓贵族两大类。宗室贵族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弟兄的后裔，异姓贵族则是八旗功臣和皇亲国戚，封授了公侯伯子男爵职。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景祖翼皇帝”觉昌安，一共六弟兄，通称为六祖或六贝勒、六王，亦称宁古塔贝勒。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尊称为“显祖宣皇帝”，排行第四，共弟兄五人。清兴之后定制，“显祖”本支为宗室，系金黄带，“兴祖直皇帝”福满（觉昌安之父）和景祖的子孙（亦总称六祖子孙，但此简义的六祖子孙，不包括显祖塔克世之子），为觉罗，系红带子。封爵定制以前，显祖子孙尊称为贝勒和台吉，崇德元年（1636）始定王公爵位十等，封授宗室。

宗室虽然都是显祖之后，同为一祖所生，但嫡庶有别，亲疏有分，功勋不一，忠奸相异，智愚难齐，因而封爵高低不等，贵

贱悬殊，待遇迥然不同。

显祖塔克世有五子，长子努尔哈赤，次子穆尔哈齐，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幼子巴雅喇。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四个弟弟都被尊称为贝勒，有人有财有权有势，可是，各人的地位、处境及其身后的待遇，却又极不相同。以穆尔哈齐来说，生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小长兄努尔哈赤两岁。当父、祖被杀，家境险恶的危难时刻，他支持大哥起兵报仇，重振祖业，《清史稿》赞其“骁勇善战，每先登陷阵”。^①尤须大书特书的是，穆尔哈齐在对抗五部联军中的英勇战功。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努尔哈赤率马步兵五百，往攻哲陈部，时遇大水，遣众兵返家，只带绵甲五十人铁甲三十人，继续进掠。这时，加哈酋长苏枯来虎，秘密遣人飞速奔跑，往告扎漠河、章佳、巴尔达、萨尔浒、界凡五城，五城即联合出兵追赶。努尔哈赤的后哨章京能古特，发现敌军，立即飞报，不料，找不到部队，未能告知。努尔哈赤仗恃有后哨侦探敌情，故未注意防备。突然，敌兵追来，阵于界凡浑河，直至南山，约八百余人，十倍于努尔哈赤之军。众寡悬殊，出人不意，从天而降，一下子就震动了军心。五祖宝郎哈之孙夹陈、桑古里二人，看见敌兵众多，“大恐”，“解其甲与人”，意欲逃窜。努尔哈赤十分生气，怒斥说：“汝等平素在家，每自称雄于族中，今见敌兵，何故心怯，解甲与人。”说完，亲自执旗先进。^②

努尔哈赤对堂兄弟的这样怒斥，既是真的动了大气，又包含了很深的用心。他气的是，这两个人，平日在族中，以勇自命，飞扬跋扈，跃武扬威，目中无人，不可一世。可是，一到两军对阵，敌众我寡，处于劣势，就变成另一种人，胆小如鼠，贪生怕

^① 《清史稿》卷215，《穆尔哈齐传》。

^② 《武皇帝实录》卷1。

死，解盔卸甲，竟想逃之夭夭。这样一来，军心更加不稳，士气更加低下，全军覆没，在所难免。他怒斥族弟的目的之一，就是惩一儆百，连亲为弟兄、贵为台吉的家族成员，都因畏敌而遭严斥，那么，其他怯战之人，也要受到惩罚了。用这样的方式，来稳定军心，克服畏敌情绪，阻止临阵逃遁行为的发生和扩展，也许是有用的。可是，努尔哈赤没有想到，不仅斥责族弟，未能起到作用，就是自己亲自执旗前进，也不能产生良好的影响，敌兵固然是岿然不动，己军也是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怎么办？这种局面稍微延续一下，就会大难临头。正是在这一发千钧的危急关头，穆尔哈齐挺身而出，随兄长并肩前进，二人携带两名包衣，“奋勇步射，直入重围，混杀敌兵二十七人，遂败其兵。八百人不能抵挡，皆涉浑河而走”。敌兵遁退，努尔哈赤的部下兵将才赶来，看见大局已定，便建议“乘此势，可追杀之”，真能见机行事，遇功不让。努尔哈赤对此非常生气，“怒而不应”，待敌渡过浑河，略为休息，便率兵追杀四十五人。他与穆尔哈齐追至界凡，见败兵十五人，便弯弓发箭，各射死一人，余十三人坠崖而死，大获全胜。努尔哈赤收兵时说：“今以四人败八百众，实天助也。”^①

如果此战失败，努尔哈赤不死便擒，整个家族就完了，那时历史进程怎样行驶，结局如何，实难预料。至少可以想像，爱新觉罗王朝恐怕很难建立起来了，努尔哈赤也难戴上“太祖武皇帝”的皇冠，皇太极的太宗、福临的世祖宝座也坐不成了，就此而论，穆尔哈齐是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应该算是清王朝的特大功臣。

可是，努尔哈赤及其子孙，对于曾经风雨同舟屡次从征立有

^① 《武皇帝实录》卷1。

殊勋的穆尔哈齐，在封赐爵位上，似乎过于吝嗇，在世时，仅赐号“青巴图鲁”，译称“诚毅”，为习惯尊称的普通贝勒，未能挤入“执政贝勒”行列，顺治十年才追封多罗贝勒。他的十一个儿子，只第四子务达海于崇德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屈居十等爵位中第九等，其他儿子在太宗朝均未授爵。而穆尔哈齐的三兄弟舒尔哈齐，却是权势赫赫的“三都督”，顺治十年追封和硕庄亲王。他的四兄弟雅尔哈齐，史称其“无嗣”，“卒年及事迹”皆不著，很可能是年幼早死，可是顺治十年却追封多罗郡王，谥“通达”，并配享太庙，入祀盛京贤王祠。三人待遇显然有异，为何差别如此显著，看看其亲生之母，便可明了，原来，舒尔哈齐、雅尔哈齐与努尔哈赤皆系一母所生，均为景祖塔克世嫡妃宣皇后之子，而穆尔哈齐之母，却系“庶妃”李佳氏，生母地位低下，又非太祖努尔哈赤一母之弟，嫡庶有别，亲疏有分，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不平等的结局。

与此相似，又另有差别的是巴雅喇的爵位。巴雅喇是塔克世最小的儿子，十七岁时(1588)，即偕侄褚英、大臣噶盖、费英东领兵一千，攻安楚拉库部，“星夜驰至”，夜取屯寨二十处，其余尽行招服，获人畜万余。二十六岁时，巴雅喇又与大臣额亦都、费英东率兵一千，攻东海窝集部，取赫席赫、鄂谟和苏鲁、佛纳赫拖克索三路，获人畜二千。^①这样一个年幼出征骁勇善战连立军功的台吉，生时亦仅赐号“卓礼克图”(译称“笃义”)，为普通贝勒，不是“执政贝勒”，顺治十年追封多罗贝勒，谥“刚果”，其子在“太宗”朝亦未封王公爵位。出现这种局面，并不是因其亲母贫寒低下。巴雅喇的生母纳喇氏，是塔克世的继妃，也是嫡妃，地位并不低，是真正的“大福金”。但是纳喇氏对前妃之子努尔哈

^① 《武皇帝实录》卷1、2。

赤，十分刻薄，常在丈夫面前进谗言，十九岁时即将子赶出，另行分居，“家私只给些须”。努尔哈赤十岁丧母，遭受继母虐待，处境艰难，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兴起以后，自然不会厚待巴雅喇，这个嫡妃的爱子，便只能与庶妃之子穆尔哈齐同为闲贝勒，死后才略予封赠。

不仅是努尔哈赤弟兄之间高下不一，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也是荣显相异，贵贱有别。努尔哈赤共有十六个儿子，属于先后三个大福金生的有褚英、代善、莽古尔泰、德格类、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七人，庶妃生的有阿拜、汤古岱、塔拜、巴布泰、巴布海、赖慕布、费扬果，另有侧福金之子阿巴泰，以及爱妃之子皇太极。努尔哈赤之子，年幼时俱称“台吉”，后定制皆称“阿哥”，都是后金国中有权有势的贵族。但是这些阿哥中，依其嫡庶亲疏，情况很不一样，褚英等七个大福金所生之子，及皇太极、阿巴泰，成年之后都尊称贝勒，而巴布泰、巴布海等七个庶妃之子，却始终为台吉，升不上贝勒。

努尔哈赤的兄弟舒尔哈齐等人的儿子，大多数是台吉，只有阿敏、济尔哈朗、斋桑古三人才进入贝勒的行列。

尽管宗室贵族之中，爵位权势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后金国汗努尔哈赤的亲族，是所谓的“天潢贵胄”，辖有牛录或固山，占有大批包衣和拖克索，统军治民，领兵出征，是执掌军政大权的最高统治集团成员，构成了满族贵族的主体。

二、四大贝勒与和硕贝勒

和硕贝勒，为清朝特有的专用名词。和硕贝勒，乃满文hošo i beile 的音译。hošo（和硕），意为“四方之方，东南、西南、

东北、固北四角之角”。①i 意为之。beile 音译为贝勒。hošo i beile 按字直译，应译为“一方之贝勒”，即一方之主。《满文老档》有时又将 hošo i beile（和硕贝勒）称为 gūsai beile 或 gūsai ejen beile，前者译为“固山贝勒”，后者为“旗主贝勒”。②和硕贝勒就是固山贝勒，就是旗主贝勒。

和硕贝勒、旗主贝勒的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旗主的年岁增长、死亡，以及功过升贬，而略有变化。天命四年（1619）萨尔浒之战被俘进入建州的朝鲜从事李民寅，对八旗作了如下的叙述：

“胡语呼八将为八高沙。奴酋领二高沙，阿斗、于斗总其兵，如中军之制。贵盈哥亦领二高沙，奢夫羊古总其兵。余四高沙，曰红歹是，曰亡古歹，曰豆斗罗古（红破都里之子也），曰阿未罗古（奴酋之弟小乙可赤之子也。小乙可赤有战功，得众心，五、六年前，为奴酋所杀）。一高沙所属柳累三十五，或云四十五，或云多寡不均。一柳累所属三百名，或云多寡不均，共通三百六十柳累云。……旗帜（有五色之大小不同者，奴酋黄旗，贵盈哥黑旗，红歹是白旗云。）”③

根据李民寅的记述，八旗（八高沙，即八固山）之中，努尔哈赤亲领二黄旗，代善（贵盈哥）也有二旗，阿敏（阿未罗古）、皂太极（红歹是）、莽古尔泰（亡古歹）、杜度（豆斗罗古）各有一旗。

稍晚一点，朝鲜满浦金使郑忠信，于天命六年八月入使后金，记述八旗人员兵数如下：

“一部兵凡一万二千人，八部大约九万六千骑也。老酋

① 《清文汇书》卷3。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17。

③ 李民寅：《建州闻见录》。

自领二部，一部阿斗尝将之，黄旗无画，一部大舍将之，黄旗画黄龙。贵盈哥领二部，一部甫乙之舍将之，赤旗无画，一部汤古台将之，赤旗画青龙。洪太主领一部，洞口渔夫将之，白旗无画。亡可退领一部，毛汉那里将之，青旗无画。酋侄阿民太主领一部，其弟者哈将之，青旗画黑龙。酋孙斗斗阿古领一部，羊古有将之，白旗画黄龙。”^①

将这两段材料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断定，进入辽沈前夕，后金国中八旗的旗主贝勒、和硕贝勒，有代善（两个红旗）、阿敏（镶蓝旗）、莽古尔泰（正兰旗）、皇太极（正白旗）、杜度（镶白旗），努尔哈赤既是八旗之“共主”，又亲领正黄、镶黄二旗。

和硕贝勒、旗主贝勒权力很大，是本旗之主，与旗下人员之间，是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满文老档》在记述和硕贝勒与旗下官兵的关系时，用了一个很特别、很有趣也很准确的词汇 salibumbi。salibumbi 是动词 salimbi 的强制态和被动态。salimbi 意为“承受家产之承受，擅，专”。salibumbi 意为“使承受，使专主”。这就是说，八旗人员包括各级官将，都是后金国汗“专主”之人，由努尔哈赤赐给各旗主贝勒，使旗主贝勒承受，使其专主。

《满文老档》有时也用 salibumbi 一词，来表述家主与阿哈的关系。比如，大贝勒代善怀疑次子硕托有叛逃之心，而向汗父妻请说：如我听信后妻谗言，“不将我之僚友、部众给与吾子（硕托），不将包衣阿哈、马牛牧群使其承受专主”，则杀后妻。^②可见，和硕贝勒有权将为其专主的旗下大臣、诸申，象阿哈、马牛一样，赐与子孙，连用的词汇都相同，都用 salibumbi 一词。

这种政治上和硕贝勒与旗下人员的君民隶属关系，在经济方面也有体现。努尔哈赤曾谕告众人说：若无阿哈，主何能生！若

^①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3146页。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16。

无诸申，贝勒何能生！”^①这在前面已经讲到，诸申必须自带耕牛农具，屯垦闲地，当兵服役，遭受贝勒欺凌盘剥。

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个具体事例，来看看和硕贝勒与旗下官将的君臣关系。八旗设有牛录额真、甲喇额真、梅勒额真、固山额真等官。额真乃满文 *ejen* 的音译，意为“主”。如照字直译，牛录额真(*niru i ejen*)应译为牛录之主，固山额真(*gūsai ejen*)应译为“固山之主”或“旗主”。牛录额真、固山额真等官街的出现，固然表明担任牛录额真、固山额真的官将，对本牛录、本旗的诸申，有权管辖，有权盘剥，但他们毕竟还不是本牛录、本旗的真正之主，他们和诸申一样，皆须尊奉本旗和硕贝勒为主，受其统辖，为其效劳，否则将被严惩。比如，天命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率兵攻明时，令“左翼之一固山之主莽古尔泰贝勒”，领精兵一百，追逐沈阳城外明兵。“以莽古尔泰贝勒亲身远逐，该固山大营之兵主总兵官额亦都率领众兵，不速追贝勒，由后缓缓而行”。回兵时，“莽古尔泰贝勒对彼之大兵之主额亦都曰：尔何故不从吾行？额亦都曰：怎知如此远逐，尔如此追杀，我等众兵焉能追及。”努尔哈赤因额亦都不护卫莽古尔泰而大发雷霆，下令尽捕其随从的十余大臣，额亦都也“自缚待审”。法司拟处额亦都死刑，努尔哈赤虽念其长期征战，军功卓著，又系妹夫，其子亦娶己女，宽免不杀，但仍严办，夺其诸申三百丁，革其功。^②这样一个开国元勋、皇亲国戚，因未紧密护卫和硕贝勒，险被斩首示众，可见和硕贝勒确是本旗之主，旗下人员皆系其臣仆，君臣之义甚严。

和硕贝勒还是本旗其他贝勒之主。当时的贝勒，都是努尔哈赤的子、侄、孙子，都是皇子皇孙，拥有汗父（汗伯父、汗祖父）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16。

给与的牛录诸申、阿哈，与议国政，带兵出征，有些还是“十部执政贝勒”，常以“执政贝勒”名义代表后金国，与蒙古各部贝勒盟誓议和，权势很大。但是，贝勒并不都是和硕贝勒，进入辽沈以前，八旗只有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杜度是和硕贝勒，其他如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第十子德格类，舒尔哈齐之子斋桑古、济尔哈朗，代善之子岳托、硕托，都已成年，都是有权有势的贝勒，但都不是旗主贝勒。他们不能独立成旗，必须附入父兄旗下，服从本旗和硕贝勒辖治，仰其供给，对旗主十分敬畏。阿敏及其弟斋桑古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镶蓝旗和硕贝勒阿敏，怀疑其弟斋桑古贝勒行为不轨，因而“对其诸弟之衣食生计，供给便不充裕，不公平。斋桑古向大贝勒、四贝勒再三陈诉，大贝勒、四贝勒以若将弟诉之言告于父汗，则似诬谤并肩而行之阿敏台吉，将招外入之言，因而不告。斋桑古欲将苦情告于汗伯父，则惧兄阿敏台吉，若不告，生计无着，困苦忧愁”。后斋桑古与硕托分别前往自己的拖克索和牧群地，诸贝勒、大臣听说后，疑其欲逃往明国，发兵堵截。阿敏奏告汗伯父，建议：“将吾等弟兄置于众人之前审之，若吾为非，则辱吾，若弟斋桑古为非，将弟付吾，吾将杀之。”努尔哈赤拒绝此议，决定从轻了结此事，下令说：“若斋桑古愿与其兄阿敏台吉合居，听之。若不愿与阿敏台吉合居，欲与他兄合居，则归入于他兄之固山下。”^①

这件事表明了五个问题。其一，斋桑古虽是拥有牧群、诸申、阿哈，领兵辖民有权有势的贝勒，但并不能独立为旗，而是依附于兄长阿敏，归属旗主贝勒阿敏的镶蓝旗下。后虽因弟兄之间关系恶化，难以合居，亦不能独立于八旗之外，必须“归入”另一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6。

和硕贝勒的固山之下。其二，斋桑古等贝勒，衣食方面，仰赖于兄长和硕贝勒阿敏供给，阿敏刻薄寡恩，则其弟便“生计无着，困苦忧愁”。其三，本旗的其他贝勒，对自己固山的和硕贝勒阿敏十分畏惧，虽受其虐待，亦不敢直接反抗，甚至还不肯越过阿敏向一国之汗努尔哈赤诉苦。其四，和硕贝勒对本旗人员有权支配，除汗父（汗伯父）可以干预外，其他旗的和硕贝勒无权过问该旗的内部事务。象上述辅父执政的大贝勒代善，为汗父宠爱的四贝勒皇太极，也不敢、不愿干涉与己“并肩同行”的固山贝勒阿敏旗内之事。其五，身为和硕贝勒的阿敏，竟要奏请斩杀本旗的弟贝勒斋桑古。这一切，充分表明了，和硕贝勒对本旗属下人员统治之严及其支配权力之大，二者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君臣、君民隶属关系。

和硕贝勒之外，还有“四大贝勒”。《清史列传》卷一《代善传》载称：

“丙辰（1616），太祖建元天命，封代善及舒尔哈齐长子阿敏、太祖第五子莽古尔泰与太宗文皇帝，并为和硕贝勒。国中称代善为大贝勒、阿敏为二贝勒，莽古尔泰为三贝勒，太宗文皇帝为四贝勒。”

《清史稿》卷二百一十五《阿敏传》载：“天命元年，与代善、莽古尔泰及太宗，并授和硕贝勒，号四大贝勒，执国政。阿敏以序称：贝勒。”

《清史列传》与《清史稿》，都把和硕贝勒与大贝勒等同起来，都断定是天命元年封授的。查看《满文老档》，并无这样的记载。老档中第一次出现“大贝勒”，是在天命三年三月。第二年三月萨尔浒会战时，老档多次叙述大贝勒（代善）率兵大败明兵的具体情况。五月初五，为庆贺胜利，设大宴。《满文老档》对此载述说：

“五月初五辰刻，汗出坐于衙门，衙门左右，设凉棚八座，八固山之诸贝勒、诸大臣坐于八处，大贝勒、阿敏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四贝勒、朝鲜二元帅等六人，皆赐矮几，设大宴。前此筵宴，诸贝勒皆不坐于棹，席地而坐。”^①

第二月，“和硕贝勒”一词，正式出现于《满文老档》之中。此后，大、二、三、四贝勒，便屡见不解了。

从这些情况来看，天命元年前夕八旗定制时，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已是各主一旗（或二旗）的旗主贝勒或和硕贝勒，按年岁为序，分别称为大、二、三、四贝勒。这时，除庶妃所生阿拜等人以外，爱妃乌拉纳喇氏之子阿济格才十岁，多尔袞、多铎仅是四岁、两岁的乳臭未干的幼童，没有其他旗主贝勒。到了天命四年，情况就有了变化，努尔哈赤之孙杜度也成了独主一旗的固山贝勒，岳托、硕托、济尔哈朗、斋桑古、德格类、阿济格等台吉，皆已年长，披甲上阵，领兵厮杀，成为有权有势的贝勒和台吉，因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四大贝勒，地位更为突出，高于其他贝勒之上，设宴之时，单独成列，其他贝勒则各归本旗之下就坐，四大贝勒成为高于普通贝勒、高于和硕贝勒的尊贵称呼了。天命六年二月，努尔哈赤又规定：“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②四大贝勒具体主管军国大政，成为英明汗一人之下的最高统治成员。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9。

② 《清太宗实录》卷5。

第二节 元勋与功臣

一、五大臣

五大臣是清初特有的专词。设立五大臣的时间，各书记载不一。《皇朝文献通考》载，万历四十二年（1614）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武皇帝实录》记为四十三年，《清史稿》则将它定在天命元年（1616）。《清史列传》比较含混，在四十一年正月以后，写道，“寻命”费英东等五人为五大臣，佐理国事。

根据《满文老档》等文献，看来五大臣设立的时间，比上述诸书的记述，还要早一些。五大臣是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和安费扬古。额亦都与安费扬古最早投于努尔哈赤麾下，参加了万历十一年（1611）的报仇起兵。费英东三人于十六年率众来投，被太祖“授以大臣之职”。直到天命四年败明军于萨尔浒时，这五人都是后金国中官阶最高军功最卓著的大将。《满文老档》载称，因为代父执政的褚英贝勒心胸狭窄，折磨“汗所任用同甘共苦的五大臣”，“使之困苦”，努尔哈赤十分生气，在万历四十年秋天出征乌拉时，将褚英留在国内。可见，五大臣设立的时间，至迟也不会晚于万历四十年秋。

额亦都等五大臣，是清朝的开国元勋。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攻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从征诸申才数十人，额亦都就在其中，而且奋勇冲杀，首先登城，立下了第一功。努尔哈赤起兵初期，六祖中的长祖德石库、二祖留阐、三祖索长阿、六祖宝实的子孙，“同誓于庙，欲谋杀太祖”。万历十一年六月、九月，十二年四月、五月，刺客四次夜至，额亦都皆护卫努

尔哈赤，拼死反击。《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五《额亦都传》载述此时情形说：“太祖为族人所惑，数见侵侮，矢及于户，额亦都护左右，卒弭其难。”额亦都骁勇善战，能挽强弓十石，以少败众，所向无敌。十五年秋，奉命取巴尔达城，至浑河，河水方涨难涉，他以绳索联系军士，强行渡河，夜薄其城，率骁卒先登，守兵力战，发箭射中额亦都股上，透股钉于城堞，欲下不能，额亦都挥刀砍断身上的箭，更加勇猛冲杀，夺取了城寨，受伤达五十余处，全身竟无一处完好。二十一年，叶赫等九部联军三万来攻，敌众我寡，军心动摇，在这紧急关头，额亦都奉命，以百骑挑战，“敌悉众来犯”，额亦都“奋击”，毙九人，“敌却”，乘机冲杀，大败九部兵，为努尔哈赤建树了又一特大功勋。此后征东海，灭辉发，取乌拉，并叶赫，下抚顺，败十万明军于萨尔浒。夺辽阳、沈阳，额亦都皆领军从征，史称其，“辄为军前锋，用兵垂四十年，未尝挫衄”。^①

安费扬古，姓觉尔察氏，很早就随侍努尔哈赤，参与了起兵初期一系列战斗，屡败敌兵，攻取城堡。万历十二年（1584）六月，努尔哈赤为报妹夫噶哈善被杀之仇，率兵四百，攻马尔墩城主纳木章、沙木章、内申，城寨倚山负险，守兵力拒，矢石杂下，连攻三日不克。第四日，安费扬古奉命，乘夜率兵，自间道，跣足攀崖而上，拔其寨，立下大功。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努尔哈赤带领少数士卒，往掠哈达富尔佳齐寨，师还，追兵赶来，努尔哈赤令兵前行，己身一人殿后，哈达贝勒孟格布禄率骑追来，一骑在前，三骑在努尔哈赤之后，前后夹攻，努尔哈赤坐骑受惊，几乎坠倒，势甚危急，安费扬古赶来救援，尽杀四人，努尔哈赤亦射中孟格布禄坐骑，敌众败走。努尔哈赤盛嘉安费扬古

^① 《清史列传》卷4，《额亦都传》。

勇敢善战，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以后征服女真各部，取抚顺、辽阳、沈阳，安费扬古皆立军功，《清史稿》赞称，“当时猛士如云，而二人（安费扬古、劳萨）尤杰出云”。

费英东，姓瓜尔佳氏，万历十六年（1585），随父苏完部长索尔果率所部五百户来投。栋鄂部长何和礼，兵马精壮，亦率部来投。努尔哈赤自万历十一年五月起兵，虽连续攻取兆嘉、图伦、萨尔浒、王甲、玛尔墩、翁鄂洛、安图瓜尔佳、贝欢、托漠河、鄂勒珲、巴尔达、嘉班、阿尔泰等城寨，但皆系小部，降服的诸申不多，人丁并未大增，一次出征，最多只有马步兵五百。费英东、何和礼的来归，顿使局面大变。费英东率来的五百户，按两户征三丁计，有七百五十丁，加上何和礼的人丁，就使努尔哈赤增加了两、三倍的兵丁，声势大振，为努尔哈赤大展鸿图，创业建国，立下了大功。费英东来投后，多次领兵出征，所向无敌，军功累累。天命三年四月，攻取抚顺后，明广宁总兵张承荫、辽阳副将颇廷相率兵一万来援，据险坚守，枪炮齐发，费英东坐骑震惊乱跑，“诸军为之却”。在这关键时刻，年过半百的老将费英东，策马大呼，挥令士兵冲击，遂反退为进，大败明兵，击杀张承荫、颇廷相，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努尔哈赤盛赞其忠直正义，誉为“万人敌”。《清史列传》称其自少从征，三十余年，“身先兵士，冲突坚阵，当其锋者，莫不被靡”。^①

正因为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安费扬古很早来投，奋勇冲杀，效忠于主、军功累累，成为清朝开国元勋，因此倍受英明汗努尔哈赤重用，初授为大臣，随晋一等大臣，再任为理政听讼五大臣，有的还任固山额真、众额真（额亦都、费英东），佐理国政，听断词讼，领军出征，辖治军民，成为后金国

^① 《清史列传》卷4，《费英东传》。

中的最高官将。

五大臣还与汗、贝勒联姻婚娶。额亦都初娶努尔哈赤族妹，后“尚和硕公主”，其次子达启、第八子图尔格皆娶太祖之女和硕公主，额亦都之女亦嫁皇太极为元妃。费英东娶褚英之女，是努尔哈赤的孙女婿。何和礼娶努尔哈赤第一个大福金佟佳氏之女固伦公主，其第四子又系大贝勒代善的女婿。

五大臣都因功封授爵职。额亦都封一等总兵官（后之一等子）世袭，死后追封“弘毅公”，其子图尔格封三等公，后进一等公世袭。费英东授三等总兵官，死后追封直义公，后晋为一等公世袭。何和礼授三等总兵官，死后晋三等公世爵。扈尔汉初授一等总兵官，其子准塔及弟阿拉密又因功封三等伯。五大臣成为后金国中身任要职、荣封世爵、尊为皇亲的显赫贵族。

二、八固山额真

固山额真，是满文 *gūsai ejen* 的音译，直译为固山之主即旗主，但固山额真仅只是管理本旗的最高官将，真正的一旗之主是旗主贝勒。固山额真总管本旗一切事务，出师行围，各带本旗兵行，审理旗内案件，参与会审大狱，辖治旗下人丁，与议后金军国大事，是旗主贝勒的得力助手，是后金国汗的亲信大臣，握有实权，职尊位显。

天命四年（1619），任固山额真的有阿敦、额亦都、虾费扬古和多弼。^①六年闰二月八旗的固山额真是扈尔汉、阿敦、穆哈连、济尔哈朗、汤古岱、博尔晋、何和礼、阿巴泰。^②《满文老档·太祖》卷七十八载称，扬古利向汗立誓，决心“以汗的法令公正

① 李民寰：《建州闻见录》；《满文老档·太祖》卷9。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18。

管辖吾管辖之一旗”，则扬古利亦是固山额真，但老档未记明扬古利何时担任此职。根据《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六的记载，天命六年三月攻沈阳时，壕深堑坚，兵将畏难，“扬古利拔刀挥本旗兵先登”，照此看来，扬古利至迟在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前，已是固山额真了。

从上面所述先后担任固山额真的十二人来看，额亦都、扈尔汉、“虾费扬古”（即安费扬古）与何和礼，皆系五大臣成员。多弼之父龙敦，是景祖觉昌安的三哥索长阿第四子，是努尔哈赤的从叔父。龙敦在努尔哈赤起兵初期，多次惹事生非，坑害侄子，几次泄漏师期，使敌人尼堪外兰、李岱预先防备，增加了攻城的困难。他还曾唆使努尔哈赤的继母之弟萨木占，拦路劫杀努尔哈赤的妹夫和得力助手噶哈善哈思虎。但是，努尔哈赤节节胜利，势力强大以后，龙敦之子多弼、托博辉、从子旺善，皆随从征伐，多弼还当上了固山额真，天命四年三月，以对明作战，未能率领本旗士卒及时赶到，严重失职，革去固山额真职务。^①

阿敦，是努尔哈赤的族人，甚为信任，权势很大（详见第二编第五章）。汤古岱是努尔哈赤第四子，母为太祖庶妃钮祜禄氏。阿巴泰是努尔哈赤第七子，母为太祖侧妃伊尔根觉罗氏。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同母弟舒尔哈齐贝勒第六子，从小为汗伯父抚养，封授贝勒。《武皇帝实录》卷三载：“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帝与带善、阿敏、莽古儿泰，皇太极、得格垒、迹儿哈朗、阿吉格、姚托诸王等，对天焚香祝曰：……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盟誓。济尔哈朗能名列其中，可见他已成为执掌后金军国大权的“执政贝勒”了。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9。

博尔普，姓完颜氏，很早就率人丁来归，置牛录，初授牛录额真，继授虾(侍卫)和扎尔固齐，骁勇善战，屡立军功，封副将世职(后之男爵)。穆哈连，是努尔哈赤的亲信近臣，多次领军出征。天命四年正月，穆哈连率兵一千，往收东海瑚尔哈部遗民，来去五月，带来一千户二千丁六千人，增加了八旗人丁，扩大了兵源，^①定世职时，授总兵官。

扬古利，姓舒穆禄氏，库尔喀部长朗柱之子，幼年来投，努尔哈赤十分喜爱，以女嫁与，尊称“额驸”。扬古利很早就披甲上阵，从征厮杀，二十一岁时，即往略朱舍里、纳殷，降服二路。二十三岁，从征辉发多壁城，遇水拦阻，不能前进，扬古利不顾危险，率先渡河，士卒跟随，遂攻取其城，俘获很多。二十七岁时，从征哈达，奋战先登，生擒孟格布禄贝勒，灭掉曾经称雄女真的哈达大部，为努尔哈赤扩大辖区，建立了殊勋。万历三十五年，扬古利随舒尔哈齐、褚英，往迎蜚优城主策穆德黑及其部众，编五百户。扬古利与扈尔汉率兵三百，护送先行，归途中，突遇乌拉布占泰贝勒领军一万，拦路劫杀。在这敌众我寡的危急关头，扬古利鼓励士卒说：“吾侪平居相谓，死于疾宁死于敌，此非临敌时乎？”持戈冲敌，奋勇拼搏，杀乌拉兵七人，“敌兵退回，渡河登山，畏惧，无敢复来”，夹河相持，争取了时间，军心稳定下来，为后军赶来全歼敌兵创造了有利条件。天命四年三月萨尔浒会战时，扬古利奋勇冲杀，击破明军主力杜松总兵部队，松等皆死。第二日又往击马林总兵，努尔哈赤命受伤之人停下，不参战，扬古利虽然负伤，却裹创系腕，率十牛录兵，凭高驰击，明兵大溃。随后下沈阳，取辽阳，皆树奇勋。努尔哈赤“嘉其战多屡受创”，命“位亚八贝勒，统左翼兵，授一等总兵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9。

官。”后来扬古利晋超品公，“仍带六章京职”，“位亚贝勒，帽顶嵌珠”，死后追封武勋王，为满洲异姓贵族中唯一追赠王爵之人，子孙世袭一等公爵。^①

扬古利等固山额真，除阿巴泰、汤古岱、济尔哈朗是宗室、多弼是觉罗以外，都是行武出身，久经战阵，南北转战，为女真国、后金国的建立和扩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封授爵职，成为异姓贵族的重要成员。

三、抚顺额附与石乌礼额附

抚顺额附是李永芳，石乌礼额附是佟养性，这两个额附是负责管理汉民事务的高级官将。

李永芳，辽东铁岭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任备御，守抚顺，十二月，收受努尔哈赤上呈明朝的“诉状”，转呈兵部，第二年，改为游击。^②后金天命三年四月十五日，努尔哈赤率领大军，以七大恨誓师伐明，围抚顺，招劝李永芳投降说：“汝若不战而降，则不扰汝所属之兵及所辖之地，仍以原礼养之。……吾岂有不超升汝职如吾之一等大臣相养之理乎！……城中大小官员军民，汝等若举城投降，父母妻子亲族俱不使离散。”^③李永芳一面声称愿降，一面又令军士备守具，八旗军进攻，瞬息破城，杀千总王命印，李永芳出城投降。努尔哈赤第一次和明朝正式交战，第一次得获明朝降官，为了便于今后对明用兵，了解明情，统辖汉民，争取更多的汉官归顺，决定厚待李永芳。为使“抚顺游击情愿归顺，特加优遇，使其乐居于此”，努尔哈赤与八旗大

① 《清太宗实录》卷18、39。

② 《明神宗实录》卷516、524，《清史列传》、《武皇帝实录》、《清史稿》皆说李永芳在万历四十一年已任游击，这是错误的，应以《明神宗实录》的记载为准。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6。

臣商议后，特设大宴，“以汗子阿巴泰之长女，妻与抚顺游击”，尊称“抚顺额驸”，升授三等副将。降民千户，仍依明制设大小官员，“令伊故主游击李永芳管辖”，并厚待降民，父子兄弟夫妻不使分离，因战失散的亲族眷属及包衣阿哈等，皆令返家后查明归还相聚。又赐与降民马、牛、阿哈、衣服、被褥及粮食，给牛一千头令杀而食用，又赐每户各大母猪二头、犬四条、鹅五只、鸭五只，令其饲养。^①

李永芳受宠若惊，尽忘旧君恩情，竭力效忠新主，通报军情，领兵从征，用计行间，煽诱明国兵民降顺，效尽了犬马之劳。天命四年七月，后金攻清河，参将邹储贤领兵死战，火器齐发，滚木矢石俱下，李永芳大声呐喊，招诱胁迫守兵弃城投降，遭邹痛斥，邹储贤等兵民万余皆死难。第二年攻铁岭，天命六年三月取沈阳，下辽阳，李永芳皆率汉兵，“从征有功”，升三等总兵官。

佟养性，辽东人，在抚顺经商，见建州势盛，暗与努尔哈赤联系，通报明情，守将发觉，捕押于狱。佟越狱潜逃，进入建州，努尔哈赤大喜，以亲族之女嫁与，尊称“石乌礼额驸”，授三等副将，从攻辽阳，晋二等总兵官。

努尔哈赤还以优遇李永芳、佟养性为例，多次劝诱明将投降，极力争取汉官归顺。天命四年六月取开原，明将守备阿布图，因妻子被掠，带二千总及兵二百余人前来投降。千总王一屏、金玉和、戴集宾、白奇策及守堡戴一位，亦因子女被俘，共带二十余人来降。另外一些守堡、把总亦降。努尔哈赤甚喜，以“明国向无叛逃他国之例”，他们的归顺，是因为“天意祐我”，“闻吾养人”而来，应予重奖，特赐阿布图人一百、牛马一百头、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

羊一百只、骆驼五头及大量布帛，并擢升副将。赐金玉和等六千总各人五十、牛马五十头、羊五十只、骆驼二头。赐戴一位等守堡、把总，各人四十、牛马四十头、羊四十只、骆驼一头。对这些官员的从人，亦照职位赐以妻、奴、牛、马、衣、谷等物。^①授金玉和甲喇额真，给与三等副将世职。

李永芳、佟养性等降金汉官，就这样以效忠新汗，奔走厮杀，立下功劳，封授爵职，进入了贵族行列，成为清朝异姓贵族的一个重要集团，后来演变发展成为汉军贵族。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1。

第四章 后金国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 国号和汗称

随着女真各部的逐渐统一，后金国也就应运而兴了。后金国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明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定国政”，是这个国家的萌芽形态。万历二十一年击败九部联军统一建州女真，萌芽的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被尊为“英明汗”，标志着一个新兴的、强大的奴隶占有制国家，正式屹立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随着这个国家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它的国号及其首领的尊称，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先后有着一些不同的称呼。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叫女直国、建州国、女真国、诸申国和满洲国，天命四年（1619）才开始叫“后金国”，不久改号为金。

万历十五年，附近的图伦、玛尔墩、界范、哲陈、萨尔浒、安图瓜尔佳、贝欢、瓮郭落、播一混、托漠河、鄂勒浑等屯寨部落，相继被努尔哈赤征服。努尔哈赤于虎拦哈达东南加哈河两界中的平岗，筑城三层，这就是有名的费阿拉城，是女真国——后金国

第一个“都城”。《满洲实录》卷二汉文体，对这时的状况，描述说：“筑城三层，启建楼台。六月二十四日，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同书满文体，记载得更准确一些：“筑三层城，建衙门楼台。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禁革作乱、窃盗、欺诈，立禁约法制。”

“定国政”，是建州女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空前的创举。尽管此时努尔哈赤只征服了十来个部，还未统一建州女真，领地狭窄，人丁不多，仅仅是辖众数千的一部之长，与臣民亿万疆域辽阔的明国相比，与兵强马壮人丁数万的哈达、叶赫、乌拉大部相比，十分弱小。但是，他却胸怀大略，高瞻远瞩，开始定辖区之政。这个“国政”，首先是禁止“作乱”，即禁止阿哈对家主作乱，不许诸申、阿哈对贝勒作乱，要他们安分守己，辛勤耕耘，不得滋生“杂念”，心怀不满。一句话，不许破坏现状，维持统治秩序。

“国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禁“欺诈”，即要求阿哈忠于家主，不得作伪撒谎，不能冒犯主子威严，不许诸申怠慢贝勒，责令他们听从驱使，遵守命令，不能借口对抗，拖延不行。

“国政”的第三个内容，是严禁“窃盗”，这是女真历史上第一次以法令的形式，来维护私有制，保护私有财产，使贝勒、大臣占有的阿哈、牲畜、财帛不被他人窃取，不准阿哈偷盗。努尔哈赤还制定了另外的法禁，兴建了“衙门”（*yamun*），作为贝勒发布命令、管辖兵民体现国家权力的公堂。这一切，和过去氏族制末期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这次的“定国政”，标志着满族国家的开始产生，是国家的萌芽形态。

这时，还没有“国号”，因为努尔哈赤辖区太小了，他既难于启齿给它命名为什么国家；同时，他恐怕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但个人的尊称却已经有了，即“僭称”“淑勒贝勒”。《满洲实录》满

文体，从努尔哈赤出生之日起，一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都称他为“淑勒贝勒”。淑勒，乃满文Sure的音译，意为“聪睿”，淑勒贝勒就是聪睿贝勒。

万历十六年，苏完、栋鄂、雅尔古何和礼等三部长来投，又相继兼并了王甲、兆嘉，人丁上万，辖区扩大，努尔哈赤就想当当“王子”了。万历十七年(1589)七月，朝鲜平安道兵马节度使援引归顺的建州女真童海考等四十八人的报告说：

“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胁制群胡，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①

过了几年，大败九部联军，征服朱舍哩、纳殷二路，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辖地西抵明朝抚顺，南至鸭绿江，东达长白山，相当广阔，人丁成倍增长。这时就出现了最早的国号。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努尔哈赤上书明朝游击胡大受说：

“游击宣谕莫与高丽为仇，我并无违法。……达担国、海西及建州，必直有奸人歹人……。”^②

这里，将建州与达担国、海西相提并列，显然意味着建州与海西一样，与达担国一样，也是一个国家。但建州左卫是明朝属卫，努尔哈赤是明帝封授的女直都督，他当然不敢对天朝明帝自称建州国，因而含糊其词，只有在另外场合，才敢抬出这个国号。就在上书之前，努尔哈赤已在朝鲜人面前，自称国家了。八月，朝鲜通事河世国随明朝差官，进入建州辖区，努尔哈赤对河世国说：“两国别无仇怨，……今后如前和好。”十一月初，其部将马臣等来到朝鲜，对满浦金使柳濂说：“我王子计虑长远”，归还朝鲜人口，而朝鲜无友好之意，斩杀进入渭原采参的女真，

①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1530页。

②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1530页。

“至今子丧其父，弟失其兄，妇哭其夫，号呼冤痛，惨不忍闻。我王子不堪目前悲苦之状，将起兵报仇。”^①

十二月底至第二年正月，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入使建州。努尔哈赤令马臣告诉申忠一说：“继自今两国如一国，两家如一家，永结欢好。”其族兄多之亦说：“我王子与你国将欲结为一家”，故归还人口。努尔哈赤还致书朝鲜说：

“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禀，为夷情事。蒙你朝鲜国我女直国二国往来行走学好，我们二国无有动兵之礼。”

申忠一观看书中印迹，“篆之以建州左卫之印”。^②

这些事实表明，此时努尔哈赤对朝鲜已自称“王子”，自称是女直国或“女直国建州卫”，即包含了建州国、建州国主的含义，但毕竟还不十分明确。他还只能自称“王子”，不敢称“汗”，只能沿用明朝政府对女真的称呼——“女直”，不敢恢复祖俗，引用“女真”本名。他既称女直国，又不得不加上建州卫，不敢彻底摆脱明朝政府在称呼上的规定束缚。他既僭称女直国之主、王子，又只能钐盖明朝政府颁发的“建州左卫之印”，没有另行铸造建州国主的印玺，不敢以建州国王、建州国汗名义与朝鲜交涉。这都说明，努尔哈赤既有雄心大志，要称孤道寡，又很明智，很有节制，在势力不够强大的时候，暂且委曲一下，使尊称和国号与实力相应，不要过分狂妄。几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万历二十九年，灭哈达，努尔哈赤自称“女真国龙虎将军。”^③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努尔哈赤致书朝鲜边将说：“建州等处地方国王佟，为我二国所同计议事，说与满浦官镇节

①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168页。

② 申忠一：《建州图录》。

③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684页。

制使知道，……”^①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建州国王”。王，即汗，朝鲜将努尔哈赤送来的“番书”、“胡书”，译成汉文时，对满文“汗”(han)，译为王、国王或皇帝。这个“建州国”、“建州国王”的称号，延续了十四年之久，直到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建州军攻下明抚顺时，还是用的这个名号。茅瑞征的《东夷考略》载称，努尔哈赤下抚顺，“赍番书请和，自称建州国汗”。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亦载，“赍夷文请和，自称建州国汗”。海滨野史的《建州私志》，也说努尔哈赤“自称建州可汗”、“建州国汗”。朝鲜亦说此时的努尔哈赤，自称“建州王”、“建州主”。^②

尽管努尔哈赤很早对朝鲜就自称建州国王，在国内又“僭称”聪睿汗、聪睿恭敬汗，但明朝中央政府全然不知。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则朝鲜是属国，建州是属卫，皆为天朝明国属下，“人臣无私交”，朝鲜是不能和建州遣使往来互通书信的，违者将按律重惩。因此，朝鲜国王在政治上极力避免与建州正式联系，有所往来，皆暗中进行，不让明知，所以，努尔哈赤书信中的“僭称”，朝鲜不敢奏告。直到抚顺失守，明金正式交战，朝鲜才敢将建州的王号上奏于明。再则，努尔哈赤与明联系时，一直以建州左卫都督身份进行，自居臣仆，尊明帝为天，从来没有使用过建州国、建州国汗等类称号。另外，明朝君昏臣暗，文官爱财，武将怕死，他们忙于交结权贵，盘剥兵民，哪肯花时间花精力去侦察建州内情，一向让努尔哈赤牵着鼻子走（详后）。朝鲜不敢讲，建州不能讲，明朝糊涂，因而，努尔哈赤足足当了二十多年的女直国汗、聪睿恭敬汗、建州国汗、英明汗，昏聩的明朝政府却一无知晓。

^① 朝鲜《东国史略事大文轨》卷46，页29，转引自香港文海出版社出版的《清史论丛》第1集第24页。

^②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961页。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已吞并了哈达、辉发和乌拉，重创叶赫，疆域扩展，延袤数千里，人丁众多，兵强马壮，便加上了新的尊号。《满文老档·太祖》卷五载述此情说：

“丙辰年，聪睿恭敬汗五十八岁，正月朔，甲申，国之诸贝勒、大臣、众人皆会曰：我等之国，无汗则忧苦甚多，皇天为使我等之国得享安康，眷爱穷苦部众，而降生贤能善养之汗，应奉上尊号。

众议之后，八固山诸贝勒、大臣率众列成四方四隅，立于八处。八固山八大臣奉书出班跪于前，八固山诸贝勒、大臣率众跪于后，阿敦虾立于汗之右边，额尔德尼巴克什立于汗之左则，各自前迎受八固山大臣跪奉之书，奉于汗前。置之褥上。额尔德尼巴克什立于汗之左前方曰：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呼此名后，下跪之诸贝勒、大臣、众人皆起。汗离座，出衙门，向天三叩首，叩毕，还座，八固山诸贝勒、大臣各依年岁向汗叩首。”

这次“大典”，定下了两个问题，一是汗称，努尔哈赤被尊为“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简称“大英明汗”或“英明汗”，二是年号，定为“天命”，明万历四十四年，就是努尔哈赤辖区的天命元年。但是，关于“国号”，此次却无记述，直到天命三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攻明抚顺时，仍自称为“诸申国英明汗”和“建州国汗”。老档记的“七大恨”，有两次提到“诸申”，第三恨为明人每年出边，“进入诸申之地侵夺”，第五恨为明不许居于柴河三路诸申收获庄稼。^①这两大恨，都只讲到“诸申之地”、“诸申”，没有提到后金二字。到了第二年三月萨尔浒之战以后，局面就变了。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

天命四年四月，努尔哈赤遣使人朝，致送“胡书”与朝鲜国王，其书“称以天命二(四)年后金国汗谕朝鲜国王，枚数七宗愤恨”。国王传示备边司说：“奏文中后金汗宝，以后金皇帝陈奏，未知如何？”备边司回奏说：“胡书中印迹，令解篆人申汝棹及蒙学通事翻解，则篆样番字，俱是后金天命皇帝七个字。”^①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后金国汗”、“后金天命皇帝”，而且既有书信，自称“后金国汗”，又有汗宝“后金天命皇帝”之印。由此可见，天命四年三月，努尔哈赤才开始在对朝交涉中，第一次抬出了“后金国”的国号。

朝鲜立即将建州僭称向明朝报告，明人甚惊，纷记其事。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中写道：

“朝鲜咨报，奴酋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指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词甚侮慢。”

茅瑞征的《东夷考略》载：

“奴儿哈赤……传檄朝鲜，僭号后金国汗，黄衣称朕。……朝鲜方咨报，奴酋移书声吓，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斥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意甚恣。”

海滨野史的《建州私志》亦载：

“建人建国号曰后金皇帝，建元天命，指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意甚恣。”

以上都是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明人根据朝鲜的报告，记下了努尔哈赤僭称后金国汗之事。稍晚一点，努尔哈赤攻下铁岭、开原，灭掉叶赫以后，遍发招降榜文，劝诱辽民归顺。明经略熊廷弼于万历四十八年六月(戊申)上奏说

“奴贼招降榜文一纸，内称后金国汗，自称曰朕，皆僭

^①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3038页。

号也。大略贼自言为天所祐，中国为天所怪，谕各将率屯堡归降。”^①

万历皇帝览奏，十分愤怒，“谕中外臣工曰：逆贼出榜招降、横肆诟侮，朕心深切愤恨。”^②

这是努尔哈赤的招降榜文，它第一次对辽东兵民使用了“后金国汗”的称号，抬出了“后金国”，而且明臣上报此事，皇帝批覆此事，可见这是千真万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后金国号的正式出现，是在天命四年，是努尔哈赤自己提出来的，是满族的自称，而不是人们所说为与宋辽金时的金相区别，故史称后金。天命六年三月进驻辽沈以后，又改称为金，一直延续到天聪十年(1636)四月。

第二节 八旗制度

一、八旗制度出现的历史条件

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到天命四年(1619)后金国号的正式出现，三十余年里，征伐频繁，烽烟不息，大小数百战，女真——后金国便在这样的条件下，由早期单纯的军事组织发展起来了。对外用兵，对内镇压阿哈等劳动者的反抗，是这个国家的根本任务，因此，它的政权组织形式采取了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的建立，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女真散处辽宁、吉林、黑龙江各地，习俗不一，制度相异。有的部落依山沿江居

^{①②} 《明神宗实录》卷595。

住，捕鱼捉貂，采参捞珠，渔猎为生，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有的女真人，室居耕田，“饮食服用，皆如华人”，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出现。如果没有统一的、正确的管理制度取代旧日分散的、各自为政的方式，就很难真正地统一起来。这个各有特色、复杂松散的混合体，便将是昙花一现，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哈达部名酋王台的失败，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证。

王台势力强大时，自称哈达汗，明封为龙虎将军，吞并了许多女真部落，辖区辽阔。明人说：王台“所辖东尽灰扒、兀喇等江夷，南尽清河、建州，北尽仰、逞二奴，几数千里”，拥有敕书七百道。^①《武皇帝实录》亦载：“叶赫、乌拉、辉发及满洲所属浑河部，尽皆服之，凡有词讼，悉听处分”。但是，由于王台没有建立起适当的管辖制度，兼之御下无方，“贿赂公行，是非颠倒，反曲为直。上既贪婪，下亦效尤，……民不堪命”，因此，“诸部尽叛，国势渐弱”。万历十年，王台“竟以忧愤死”。^②

王台之亡的前车之鉴，巩固女真各部统一的迫切要求，是努尔哈赤利用、改造牛录制创立八旗制度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对待女真的总政策，及其对努尔哈赤的态度，对促进八旗制的确立，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明政府对待女真，一向采取“分而治之”的方针，在努尔哈赤兴起以后，更想依靠这个办法，来削弱建州势力，恢复明政府对全部女真的统治。这在杨道宾的奏疏中，反映得十分清楚。

万历三十六年(1608)，努尔哈赤已经灭哈达，亡辉发，重创乌拉，军威大振。署礼部尚书杨道宾连上三道奏疏，详述明廷国策和努尔哈赤近况，提出对策。他说：

① 张鼎：《辽夷略》；《明经世文编》卷453，杨道宾：《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谨遵例奏请乞赐请问以折狂谋事》。

② 《武皇帝实录》卷1；茅瑞征：《东夷考略》。

“女直乃肃慎旧疆，亡金遗孽。自永乐初年野人女直来朝，其前海西、建州女直悉境归附，乃设奴儿干都司，统卫所二百有四，地面、城、站五十八，而官其酋长，自都督以至镇抚。许其贡市，自开元以达京师。……其海西、建州，岁一遣人入贡，海西一千，建州五百。……然必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有二，各自雄长，不使归一者，盖以犬羊异类，欲其犬牙相制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建州夷酋奴儿哈赤，既并毛怜等卫而取其印敕，又举海西南关一带卫所酋目，若布占吉，若猛骨孛罗等而有之，虽婚姻有所不恤。惟北关一带，若纳林孛罗与弟金台等，竭力死守，以苟延旦夕。又闻其饰名姝，捐重妆，以交欢北虏。夫国家本借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更闻奴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然详绎成祖文皇帝所以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二，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养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①

三道奏疏，主要讲了一个问题，即明对女真的基本政策是“分而治之”，一定要使女真四分五裂，各自为主，互不相下，不能让他们统一起来，“不使归一”，以便以夷治夷，“犬牙相制”。因为，女真一联合，“兵满万人，则不可敌”，将成大祸。分，则互相间易起争端，争必乱，乱必弱，既乱又弱，必竞相争求明

① 《明经世文编》卷453，杨道宾：《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辽酋兼并属夷凭陵属国罪状已著乞速颁文告严飭武备以遏乱萌事》、《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遣遵例奏请乞赐诰问以折狂谋事》；《明神宗实录》卷444。

援，那时就不得不卵翼于明，听明驱使，为明帝效劳了。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所以必须坚持祖宗立法，立即制止努尔哈赤对各部女真的兼并，“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这样，才能除去祸根，保证边境安全，保证明朝安全。

面对天朝明国议论发兵捣巢分裂女真的紧迫形势，努尔哈赤如果不制定正确政策，巩固女真的统一，则所辖各部又将涣散，实力大损，定将被明兵诛剿，家破人亡，重蹈远祖董山、外祖王杲覆辙。正是在这样条件下，努尔哈赤利用旧的牛录制，改进发展，创立了八旗制度。

二、由牛录到八旗

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牛录是满文 niru 的音译，意为射兽用的“大披箭”。很久以来，女真人“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面行。……（女真）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华言大箭）厄真（厄真华言主也）。"^①这是以族寨为基础凑编而成的临时性的武装组织，围猎用兵，则自由组合，兵猎完毕便解散。所谓的牛录额真，不是汗贝勒封授的统治士卒的专职官将，而是由参加兵猎的诸申推举的临时指挥者。这种各依族寨、自由凑编的临时性武装组织，既是当时女真部落分裂涣散条件下的产物，又反过来延续、助长了女真的分裂。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女真统一大业的进行，而且在客观上为明朝政府对待女真的根本政策——分而治之，提供了有利条件。

^① 《武皇帝实录》卷2。

因此，对于本族这种传统的组织形式，既要利用其为大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优点，不能一概否定；又不能不加改革地完全照搬，不然，即使暂时能施用武力强制将许多小部落混在一起，也很难稳定，很难长期统一，更不能使这些各有特色的部落融合成为一个牢固的共同体。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长期过程中，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对这一古老的传统形式，不断予以改组、发展和完善，最后建立了八旗制度。

现将万历四十三年(1615)以前努尔哈赤编立的部分牛录列表如下：

姓 名	旗别	地名	简 况	出 处
索尔果	镶黄	苏完	率五百户来归，编五牛录，使其子侄分统之。	《八旗通志》卷十一。
三潭	正白	苏完	领三百户来投，编牛录，令其子布赖统之。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以下简称《通谱》。
扎霸	正白	苏完	来归，设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一。
赫东额	正白	马佳	同弟尼玛禅率五十户来归，授尼玛禅为备御。	《通谱》卷七。
何和里	正红	栋鄂	“率部下来归”，编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八。
鲁可苏	正白	栋鄂	领四百人来归，编牛录，令其子石汉统之。	《八旗都统衙门档》。
兑齐巴颜	镶红	栋鄂	“率领部属来归”，编三牛录，令其子噶尔呼机、侄阿兰珠、郎格统之。	《通谱》卷八。
罗屯	正红	安褚拉库	“率八百户来归”，编二牛录，令其子艾唐阿、侄安充阿统之。	《通谱》卷十一。
乌尔古岱	镶黄	哈达	“率部属来归”，将其属下人分隶八旗，所余之人编牛录，令其孙克什纳统之。	《通谱》卷二十三。

苏巴海	镶白	哈达	率二百人来归，编牛录，令其子莽果统之。	《通谱》卷二十三。
约兰	正红	哈达	来归后，其子懋巴里授参将，设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二十三。
夏瑚	正黄	哈达	率十八户来归，编牛录，令其子雅琥统之。	《通谱》卷二十三。
常舒	镶白	沾河	来归后，编牛录，使统之。又编半个牛录，令其子布汉图统之。	《通谱》卷三十二。
阿球巴图鲁	正兰	沙晋穆尔吉	“率族众及八十人来归”，编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四。
明安图巴颜	镶红	绥芬	率亲族及女真“一千余众来归”，编二牛录，令其子哈哈纳、绰和诸统之。	《通谱》卷二十一。
阿尔都山	镶白	额宜湖	招抚萨齐库城女真三百余，编牛录，令其子哈宁阿统之。	《通谱》卷二十五。
乌珠阿穆巴	镶红	蜚优	来归后，编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二十五。
策穆特赫	正白	蜚优	率五百户来归，编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二十五。
孟古慎郭和	镶白	纳殷	率子弟及“同里壮丁”五百名来投，授以牛录额真。	《通谱》卷二十六。
康古里	正白	那木都鲁	与弟喀克笃里率壮丁二百名来投，编二牛录，令其弟兄二人分辖。	《八旗都统衙门档》。
叶克书	正红	长白山	率尼马察村三百余人来归，编牛录，使统之。	《八旗都统衙门档》。
琥球	镶红	尼马察	率三百户来投，编牛录，使统之。	《八旗都统衙门档》。
图尔坤黄占	镶白	费雅郎阿	率一百余户来投，设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四十。
僧额	镶黄	宁古塔	率兄弟及同村三百人来归，编二牛录，令僧额及其子塞纽克统之。	《通谱》卷四十一。
雅穆什达	正黄	绥芬	率一百五十人来，以其孙任牛录额真。	《通谱》卷四十一。
南济兰	镶黄	乌拉	率二十五人来，编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四十四。

根据简表和有关文献，我们可以看出五个问题：

第一，多数牛录系以某部、某地“来归”之人编立而成，即以率众来投的酋长或其子侄为牛录额真，“使统之”。这是因为，酋长带众来归，壮大了实力，为后金的建立立下了功劳，有功就应酬报，既可笼络其心，又能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的人归顺，故令为牛录额真，辖治旧有人员，不剥夺其昔时权利，不改变其与族属之间的原有关系。这样安排，有利于牢固地建立起对来归人员的统治。当时，女真人多系聚族而居，世守其地，血缘关系很深，亲族观念甚浓，酋长、族长威望很高，如果一下子换掉旧酋长，另委外族外寨之人为新官，原酋长固然不满，来归的女真亦必不服，很难顺从新主，易起叛逃之念。现以原主为长，继续辖束旧日族属和“同里之人”，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新汗努尔哈赤的统治，就能比较顺利地建立起新汗与来归女真之间的牢固的隶属关系。

第二，将分散的诸申编牛录，赐与有功有才之臣辖领。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不少诸申分散地前来“归顺”，也有一些人临阵投降，努尔哈赤把这些诸丁编立牛录，给与功臣和能干之人管辖。

第三，牛录已经成为固定的社会基层组织。努尔哈赤编立的牛录，虽然渊源于女真古老的牛录制，但其内容和性质，却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旧牛录，是临时的武装组织，兵猎完毕即行消失。现在的牛录，是努尔哈赤编立的，不完全依照族寨旧俗，它长期存在，由一个单一的武装组织演变为包括军、政、赋、刑各方面职能的社会组织。万历二十四年入使建州的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写道：努尔哈赤“于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酋长，掌治耕耘”，遇有征战，传令于“各部落酋长，……各领其兵 军器军粮使之自备，兵之多寡，则奴酋定数云。”重要地方，设堡驻军戍守，“军则以各堡附近部落调送，十日相递云”。对于私自潜入

朝鲜渭原采参的女真，“奴酋乃令其部落刷出，每名或牛一只，或银十八两征收，以赎其私自越江之罪”。差役制度是，“役军，则三、四日程内部落，每一户计其男丁之数，分番赴役，每名输十条云。”^①申忠一说的部落，就是努尔哈赤编的牛录。从金派诸申屯垦田地，纳木赴役，到征丁披甲为兵戍守城堡，以及清查私往采参的女真，皆以部落（即牛录）为计算单位，令各部落之长——牛录额真负责安排贯彻执行，可见此时的牛录既已成为努尔哈赤辖束的军政机构，又是女真——满族社会的基层组织。

第四，牛录人丁多少不等，急需划一。上表所列编成牛录的人丁，数目很不一致，有的牛录是一百二十余人，有的一百人，有的五百户编五牛录，有的四百户编一个牛录，有的二百丁一牛录，有的八百户编两个牛录，最少的十八户编一牛录，多的一千余户编二牛录，人丁数量相差悬殊，给统一管辖带来了很多困难。比如，筑造城池的夫役，披甲出征的士卒，是以牛录为单位，各个牛录一样的分派，还是依据人丁的多少按比例金差？分取俘获的财帛人畜，是各牛录均分，还是计丁领取？辖治四百户、五百户大牛录的牛录额真，与仅仅管理十八户的小牛录额真，待遇有无两样，地位是否相同，是同等领取赐品，还是多少不一？居住的地区，耕种的田地，戍守的城堡，是按牛录分配，还是以人丁为依据？等等，纷繁复杂，给统一事业造成了不少麻烦。

第五，归附日众，牛录激增，迫切需要建立严密的分级管辖制度。努尔哈赤原来只是人丁数十的小部之长，经过三十余年的南征北战，到万历四十三年，已经成为辖地上千里、牛录数百、臣民众多的女真国汗了。这样多的人丁，这样多的牛录，如果全由努尔哈赤一人直接辖治，不建立分级管理制度，是不行的，分

^① 申忠一：《建州图录》。

处各地的几百个牛录，势将成为一盘散沙，很难形成真正的牢固的统一体。

因此，努尔哈赤在传统的女真牛录制基础上，加以改组、发展、扩大和定型，创立了八旗制度。万历二十九年，旗分黄、白、红、蓝四色，三百丁为一牛录，置牛录额真管辖。虽然实际上各个牛录并不一定都是三百丁，有多有少，但大体上比较划一。万历四十三年，“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旗）”，正式确立了延续将近三百年的清朝特有的八旗制度。后来皇太极执政时，又新编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连前满洲八旗，共二十四旗，总称为八旗。

三、八旗制度的内容、性质及其影响

《满文老档·太祖》卷四，对万历四十三年八旗制的确立及其基本内容，作了如下的叙述：

“聪睿恭敬汗之聚集之众多国人，皆均匀整齐点数，三百丁编一牛录，一牛录设一额真。牛录额真之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村寨拨什库四人。四章京分率三百丁编为达旦，无论作何事，往何处，按四达旦之人当班计，共同劳动，同出同行。若兵丁之甲冑弓箭刀枪鞍辔等物恶劣，则贬降牛录额真，若俱整修良好，军马肥壮，则擢升牛录额真。诸事豫为立法，俾得遵循。

因若取赋谷于部众，将苦累部众，乃令出一牛录之十丁四牛于公，于闲地耕田，多获谷物，充实仓库，委任十六大臣、八巴克什，掌管库谷之登记收支。……选审断国事公正善良之人为八大臣，再选四十审事官，不贪酒，不索金银。每五日召集诸贝勒、大臣于衙门相议，使公正审断事之是非，

成为常例。

英明汗又言：……诸贝勒、大臣。尔等与其只顾一身而生，不如对下面众伊尔根教以善言，使其摒弃恶念，众心皆明而善，不为主上所罪，尽执忠良之心，则尔等今生令名大著，后世之回报亦丰，此亦功德矣。吾思，生之者，善理上天委任大国之事，审断公正，平盗贼，止恶逆，贫苦之人尽皆养之。如此，合天意，养贫乏，使国家太平，此则报天之大功，己身之大福也。”

《武皇帝实录》卷二载：

“太祖削平各处，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录厄真，五牛录为一扎拦厄真，五扎拦立一固山厄真，固山额真左右立美凌厄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行军时，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队伍整齐，中有节次。……军士禁喧哗，行伍禁纷杂。……又立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都堂十员。……凡事都堂先审理，次达五臣，五臣鞠问，再达诸王。如此循序问达，令讼者跪于太祖前，先闻听讼者之言，犹恐有冤抑者，更详问之，将是非剖析明白。”

这些材料，以及其他记载，表明了，八旗制度是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自然包括了用兵行围职能，是后金国的军事制度。努尔哈齐明确规定，所有人员都必须编入八旗，“聚集之众多国人，皆均匀整齐点数”，分隶各牛录，禁止隐匿丁口脱漏不报，不准离旗外逃。这样，就将来自不同地区的分散的几十万人口，统一编制起来。

八旗实行三级管理制度，三百丁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扎拦（亦写为甲喇），五扎拦为一旗。扎拦，是满文 jalan 的音译，原意为“草节、树节、竹节儿之节，骨节之节”，此处是将甲喇作

为承上启下的中间机构，上为固山(旗)，下为牛录。牛录额真管本牛录的三百丁。甲喇额真管五个牛录(后各甲喇辖隶的牛录不尽一致，有的多达十余牛录)受治于固山额真，归本旗旗主贝勒统治。八旗之上，有汗总辖。这样一来，原来分散的几百牛录被统一编制起来，分级管理，既严密，又灵活，对加强后金国的集中统一领导，起了很好的作用。

有了人丁，就可以金征兵士。八旗的诸申是兵民合一，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当兵，每个诸申皆有出征厮杀的义务。各个时期金丁披甲的比例不一，有时一牛录出五十甲，有时一牛录一百甲，有时一牛录一百五十甲，大体上是三丁抽一。这样，就建立起一支拥用精兵数万的军队——八旗劲旅。

征战之时，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分率本旗、本甲喇、本牛录士卒，在汗或本旗旗主贝勒指挥之下，冲锋陷阵，攻城夺堡，立功受赏，违令惩治。努尔哈赤规定，兵刃交接时，披重铠执利刃者为前锋，披短甲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另行立于一处，观望军情，有不备处，立即前往接应。破敌后，“功罪皆当其实，有罪者，即至亲不赏，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敌不遗，必加升赏”。^①

八旗制不仅是军事制度，而且还包括了征赋金役等财经方面的职能。国家筑城、运输等项力役，皆按旗金派牛录人丁担任。官用粮谷，亦系八旗各牛录提供，每牛录出十丁四牛屯垦闲地，收获粮食交纳公库。若按一丁垦地三十六亩计(这是五年以后实行计丁授田的标准)，当时八旗二百多个牛录，可垦田地八、九万亩，能收粮食十余万石，这对保证军粮供应，起了很大的作用。

^① 《武皇帝实录》卷2。

后金的其他用费，包括临时征战急需的军马和舟船，也由各牛录备办。天命元年，为征东海瑚尔哈部，命“一牛录选骏马六匹，共马一千，牧于田谷之中，使肥之”。又“令一牛录出三人造舟”，往兀尔简河上游森林，“造刳舟二百”。^①因此，进入后金的朝鲜从事李民寅，述其见闻说：“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绝无呈诉弃理争讼曲直之事云。”^②

八旗制又是后金进入辽沈以前的政权的特殊组织形式。牛录是基层政权机构，上为甲喇，再上为固山（旗）。八旗的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既要执行汗的指示，金派人夫屯田服役、披甲当兵，率领士卒战阵厮杀，又要遵奉汗和旗主贝勒的命令，辖治属下人员。努尔哈赤一再谕示各级额真严格管辖旗下人员。他降谕说：“汗所任用之诸大臣，自众额真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尔等当各自谨慎恪守职责，坚持法令，严加管辖，……管教国人。”^③他责令众额真、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牛录章京和村寨拔什库，皆要遵奉此谕，书写誓言，呈汗阅后记入档子，日后背誓犯罪，则依誓言惩治。甲喇额真以上官将共呈誓言说：“谨记勤言汗所下达之任何令旨，若诸贝勒、大臣忘记汗言，不详察所被委任牛录众人之善恶，则贬降诸贝勒、大臣，以知其过。”章京、村寨拔什库发誓说：“诸贝勒、大臣之各种禁令，达于牛录额真，牛录额真应不忘其言，不违时日而转达。……若伪作此言而违之，使牛录额真知其过，告诸贝勒、大臣而杀之。”^④

在辖治旗人的问题上，努尔哈赤谕示群臣，要他们作到以下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

② 李民寅：《棚中日记》。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11。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11。

四条。一为“审断公正”，即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裁处各事，要宽待奴隶主，重惩违令的阿哈、诸申。遇有词讼，都堂先审，次达五大臣，再达诸贝勒，然后由汗裁定。^①二是“平盗贼，止恶逆”，遇逢阿哈、诸申反抗，则严厉镇压，捉获逃亡的阿哈，立即处死。^②三系“遍济贫乏”，施用小恩小惠，赐点食盐给筑城夫役，赏给穷民布匹，以示宽厚，企图使诸申、阿哈感恩戴德，“虽劳苦从事而无怨言”。^③四为“教以善言”，使劳动者之心，“皆明而善”，不怀恶念，不为“盗贼之行”，俯首帖耳，甘作顺民。这样，就可达到“国家太平”，奴隶占有制的后金国太平无事，汗、贝勒便能坐享阿哈、诸申的劳动果实了。

总之，八旗制度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制度，而是包含了军、政、财、刑等各方面职能的满族的根本制度，并且还是进入辽沈以前奴隶占有制国家后金政权组织的特殊形式。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八旗制度对满族和后金——大清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八旗制度的建立，将分散的几十万人严密地编制起来。分则弱，合则强，宋朝便有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的说法。现在，一、二十万女真统一编制，每牛录金甲一百或一百五十，可挑选精兵数万，加上粮草充足，器械精良，战马十万，这支武装力量就成为具有极大威力的强大军队。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劲旅，用兵三十余年，战必胜，攻必克，连下明国重镇，大破明军于萨尔浒，俘获人畜数百万，辖地数千里，极大地增加了汗、贝勒的财富，增强了汗、贝勒的势

① 例如，努尔哈赤曾下严令，不准诸申冒犯宗室贵族，如对“汗之亲戚不逊”，则用鞭狠打，若用手触及宗室身体，则斩。弓匠何岱，因隐藏两匹马，被人告发后畏逃，被处以死刑，而参将永顺射箭杀人，法司本已徇情轻判，只降为游击，努尔哈赤却念其兄阿兰珠战死沙场立功，而尽行赦免。《满文老档·太祖》卷17、33。

② 李民寅：《册中目录》。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18。

力，扩大了奴隶制剥削范围，对后金国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八旗制度的建立，还有力地促进了满族的形成和发展。全部人员，各按旗分、甲喇、牛录居住，原系一族之人往往分隶不同的旗或不同的甲喇、牛录。一旗、一甲喇、一牛录之内又有不同地方和民族的人丁，基本上打破了女真各依族寨居住的旧习，这就使八旗数十万不同民族的人员，居住在同一地区，密切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八旗人丁在汗、贝勒和各级额真的管辖下，耕田种地，纺花织布，牧放马牛，猎捕兽禽，采松摘果，生产迅速发展，改变了部分女真旧日渔猎为生的落后习俗，八旗人员大体上达到了“耕田食谷为生”的水平。

在此之前，有的女真人任意行止，自由谋生，过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生活，辽东地区的汉民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编入八旗以后，各部各地人员，或者是降为阿哈，或上升为奴隶主，或为奴隶占有制国家辖治的诸申，家主剥削阿哈的奴隶制发展为占居八旗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

八旗人员皆须遵守国家法令，阿哈必须交出耕田所获全部粮食，献与家主。诸申必须听从汗、贝勒驱使，屯田服役，披甲厮杀。所有八旗人员，不管是女真，或者是汉民，言谈交际，文移往来，必须使用满文满语，服装发式亦须一律，依照女真习惯剃发，不许妇女缠脚。八旗人员同居共处，互通婚姻，血缘关系日益密切。

这样一来，在八旗制度的辖束下，经过广大八旗人丁的长期辛勤劳动和共同战斗，来自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几十万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赋役负担、国家法令、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等

方面，大体上达到了同样的水平，旧有的差异迅速消失，一致性愈益增多，逐渐形成一个在居住地区、经济条件、语言文字、心理状态等方面基本一致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在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新成员的诞生及成长过程中，八旗制度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五章 国初四大疑案

第一节 三都督舒尔哈齐之死

随着女真国——后金国的建立和发展，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的角逐，也就相应地激烈化了，出现了许多严重影响政局的大事，发生了几起重大疑案，舒尔哈齐之死，即为首案。

舒尔哈齐是显祖宣皇帝塔克世第三子，与太祖努尔哈齐同为宣皇后喜塔腊氏所生。舒尔哈齐，骁勇善战，称雄于部，兄长努尔哈齐起兵以后，军政大事，共同密议，史称其“兄弟始登堦而议，继则建台，策定而下，无一人闻者”。^①舒尔哈齐很早就披甲上阵，领兵厮杀，“自幼随征，无处不到”。^②正是由于弟兄叔侄齐心协力，五大臣等官将奋勇冲杀，因而辖区日广，臣民众多，舒尔哈齐也聚集了大批人丁牲畜和兵将。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朝鲜通事河世国随同明朝官员入使建州时，了解到努尔哈齐麾下万余名兵士、战马七百余匹，舒尔哈齐麾下有五千余名，战马四百余匹。他们先到努尔哈齐处，拜见辞行，再到舒尔哈齐处，亦

^① 黄道周：《博物典汇·建夷考》。

^② 《武皇帝实录》卷2。

“一样行礼”。努尔哈赤杀牛设宴，舒尔哈齐亦宰猪设宴。此时正在修建二人住舍，“各以十坐分为木栅，各造大门，分别设楼阁三处，皆为盖瓦”。朝鲜国王将河世国调查情况，向明辽东副总兵府移咨，先援引河之报告说：“蒙差前往建州，看得奴儿哈赤及伊弟速儿哈赤同坐一城，方调到各处达子，日逐出城操练，……（欲抢朝鲜）”。继而又引议政府状启说：“奴儿哈赤兄弟要于明年正二月进抢本国地方报仇，今方调练人马，广造弓箭”。^①可见，舒尔哈齐已拥有大批兵将，成为女真国中第二位实力人物，虽然他的人马少于兄长努尔哈赤，但基本上是相提并论，分庭抗礼，同为女真王了。

这在对明关系上，也表现得非常清楚。据《明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三年八月，舒尔哈齐已率领“建州等卫夷人”“赴京朝贡”，明政府“如例宴赏”。第三年七月，实录又载：“建州等卫夷人都督、都指挥速儿哈赤等一百员名，纳木章等一百员名，俱赴京朝贡，赐宴如例。”^②万历三十六年十二月，又“颁给建州等卫女直夷人速儿哈赤等一百四十名贡赏如例”。^③《明实录》对努尔哈赤的朝贡，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述的。如万历二十五年五月，“建州等卫都督、指挥奴儿哈赤等一百员名进贡方物，赐宴赏如例”。^④这表明，舒尔哈齐也是女真名酋，与兄长努尔哈赤一样，可以单独率众入京朝贡。因此，明人多称舒尔哈齐为“三都督”。^⑤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舒尔哈齐、褚英、代善、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率兵三千，往迎斐优城归顺女真，收取四

①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167、2183、2184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312。

③ 《明神宗实录》卷453。

④ 《明神宗实录》卷310。

⑤ 黄道周：《博物典汇·建夷考》。

周屯寨，编五百户，回兵途中，遇乌拉布占泰贝勒领兵一万拦劫，双方鏖战，乌拉大败，“尽弃器械牛马而走”，“如天崩地裂”，建州获马五千匹、甲三千副。这一战，对努尔哈赤的盛衰，起了很大作用。朝鲜备边司评论说：努尔哈赤兵力原来不如乌拉，而自此战胜利之后，“其势大盛，雄于诸部，故远近部落，几尽服属。”^①击败了强敌，增加了大量人丁，俘获众多，军威大震，成为努尔哈赤蓬勃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就是舒尔哈齐、褚英等大破乌拉所起的作用。^②然而，功高招忌，势盛逼人，祸随福至，正是由于舒尔哈齐长年征战，骁勇多谋，兵将众多，好比高低，引起兄长严重不满。二强相争，必有一伤，舒尔哈齐也逃不出这个悲惨的结局。

《武皇帝实录》卷二，对舒尔哈齐之死，仅简单地写了一句：“（万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太祖同胞弟打喇汉巴土鲁薨，年四十八岁。”四年之前舒尔哈齐还统兵辖将，大败乌拉兵，三年之前，他又亲领女真，入京朝贡，为什么时过三、四载，四十八岁年富力强的骁勇战将，就突然死去？显然其中自有缘故。《清太宗实录》于天聪四年（1630）六月叙述阿敏之罪时写道：

“阿敏之父，上之叔父行也。当太祖在时，情敦友爱，乃阿敏嫉其父，欲离太祖，移居黑扯木地，令人伐木，备造房屋。太祖闻之，以擅自移居坐罪，既而欲宥其父而戮其子。诸贝勒奏请，谓既宥其父，祈并宥其子，彼虽无状，不

①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829、2837、2881页。

② 《清实录》、《清史列传》都对舒尔哈齐在此战中的表现，作了过低的贬述，说他如何畏战，但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领兵贝勒，舒尔哈齐最长，他自己就率领五百兵，跟随他的大将纳齐布、常书各领一百，合共七百，占全军四分之一，如果他们不拚死冲杀，仅靠褚英、代善分领的一千兵，怎么也打不败乌拉的一万战兵。《清实录》也不得不说舒尔哈齐有所俘获，努尔哈赤特在战后赐与舒尔哈齐“达尔汉巴图鲁”称号，巴图鲁，勇敢之意也，达尔汉，亦为美称，获此称号，正是说明舒尔哈齐在这次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足深较，太祖于是仍加收养。及其父既歿，太祖爱养阿敏，同于己出，俾得与闻国政，并名为四和硕大贝勒。”^①

这段记载，‘固有粉饰之词，贬低舒尔哈齐，宣扬努尔哈赤的宽宏仁慈，但毕竟也透露了一点真情，即舒尔哈齐父子对努尔哈赤不满，力图摆脱其控制，独主一方，因而险遭杀身之祸。

《满文老档·太祖》卷一，对舒尔哈齐与兄长的关系及其去世，作了如下叙述：

“聪睿恭敬汗之弟舒尔哈齐贝勒，因系同父同母所生之惟一亲弟，诸凡部众、贤良僚友、敕书、阿哈，以及一切物品，皆同样使之承受专主。弟贝勒于出征之时，向无殊功，对于大国之治道，亦未进一善见，全无才能矣。然虽无才能，因系汗之唯一亲弟，诸凡物品皆同样给与养之。如此给养，弟贝勒尚不知足，成年累月，怨其兄长。兄聪睿恭敬汗曰：弟，汝之所得家业、部众、僚友，并非吾父所遗，乃兄我给与矣。斥其过恶之后，弟贝勒悍然曰：此生有何所爱，不如一死。遂弃离使其同等承受专主部众、僚友之兄，携带部众，出奔他路异乡以居。聪睿恭敬汗怒，遂于己酉年，聪睿恭敬汗五十一岁，弟贝勒四十六岁，三月十三日，尽夺昔赐与弟贝勒之部众、僚友及一切物品，使为孤子之身，斩不谏并唆使弟贝勒之族人阿萨布，焚杀大臣乌尔昆蒙兀。如此辱弟，使其孤立之后，弟贝勒自责曰：兄汗之养甚厚，吾欲另往，实不当也。遂突然归来。聪睿恭敬汗乃于是年将夺去之部众、僚友，复悉还与弟贝勒。然弟贝勒不慊于安享生计之天恩，不满足于兄聪睿恭敬汗之恩养，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弟贝勒卒，享年四十八岁。”

① 《清太宗实录》卷7。

《满文老档》的这段记载，是了解舒尔哈齐生平的主要材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三个问题。

第一，舒尔哈齐拥有大量兵将、人丁和阿哈。老档说，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发生争执以前，部众、僚友、敕书、阿哈，以及其他物品，舒尔哈齐皆和努尔哈齐一样多，此说虽略有夸张，但与实情出入不大。十几年以前，努尔哈齐麾下已有兵万余名，舒尔哈齐五千余名；现在，大败乌拉兵，征服许多女真小部，灭辉发，人丁牲畜当然大大增加。三年以后，努尔哈齐讲到，曾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各部众五千户、八百牧群、银一万两、敕书八十道，其他儿子也分赐若干。姑以褚英、代善二人为准，已有部众一万户、一千六百牧群、银二万两、敕书一百六十道，据此，舒尔哈齐亦应拥有此数，则至少领有两旗人丁了。

第二，舒尔哈齐埋怨兄长，率众出走，据地称雄，遭兄籍没孤立。舒尔哈齐为什么要怨恨亲兄？怨从何来？弟兄为什么不和？老档未明说，但看看朝鲜人的评述，便可知悉。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朝鲜通事河世国进入建州，看到努尔哈齐与舒尔哈齐二人是并肩之王，动辄弟兄相提并列。两个月后，南部主簿申忠一入使建州，进一步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形。他在《建州图录》中叙述了三个问题。其一，朝使将礼物“送于奴酋兄弟”，他俩专派将官陪伴使臣。正月初一努尔哈齐宴请申忠一，第二日舒尔哈齐即遣人邀请朝使，设宴款待。其二，临行前，努尔哈齐赠送使臣礼物黑缎圆领三件、貂皮六令、蓝布四匹、绵布四匹，舒尔哈齐亦赠黑缎圆领三件、黑靴、精具三件。申忠一致谢说：“膺此两都督重礼，分贻家丁，尤极未安。”努尔哈齐弟兄二人答覆说，“物不足贵，只表行賔而已”。弟兄二人是同等地位，共见使臣。其三，申忠一初住努尔哈齐部将家中，四天以后，舒尔哈齐遣其部将佟羊才，邀请申忠一住其属将之家说：“军官不但为兄而来，

我亦当接待”，遂将使臣安排在其将多之之家。联系到对明朝贡也是弟兄二人分率部众入京，皆系都督，不难知悉，舒尔哈齐的地位、人丁、兵将和势力，及其与兄长比高低，争平等，正是弟兄不和的主要原因，是舒尔哈齐怨恨其兄的真实根源，也是努尔哈齐限制三弟、夺其人畜、孤立其身的唯一原因。

第三，舒尔哈齐并非因病善终，而是被兄所杀。老档在贬低舒尔哈齐文治武功的前提下，指责其忘兄之恩背义出走，被籍没及诛二臣，被孤立之后，“突然归来”，虽蒙兄长宽待，仍不满于兄汗之恩养，两年之后即死。可以想见，这种情况下之死，至少也是遭受压迫忧虑气愤成疾，不治而死，说得重一点，很可能是监禁于牢，死于狱中。明人则认为舒尔哈齐是被兄长杀害。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载：“万历四十年十一月，奴儿哈齐杀其弟速儿哈齐，并其兵。”此说时间上不太准确，晚了一年多，可能是因其得知较迟，但它毕竟也点明了努尔哈齐杀了亲弟。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总录》载，万历三十九年，“奴酋忌其弟速儿哈齐兵强，计杀之”。张鼐的《辽夷略》载称：“奴之祖曰佟教场，建州卫左都督僉事也，生佟他失，有二子，曰奴儿哈齐、速儿哈齐。……速儿为兄奴儿囚杀。”彭孙贻的《山中闻见录》、马晋允的《明通纪辑要》，以及明末清初人海滨野史的《建州私志》，皆说舒尔哈齐为兄所杀。黄道周的《博物典汇·建夷考》，叙述较为详细，该书写道：

“初酋一兄一弟，皆以骁勇雄部中。兄弟始登垄而议，继则建台，策定而下，无一人闻者。兄死，弟称三都督。酋疑弟二心，佯营壮第一区，落成置酒，招弟饮会，入于寢室。御鎗之，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弟有二名婢，以勇闻，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斩之。”

综合《满文老档》、朝鲜调查和明人评述，以及舒尔哈齐的长

子阿尔通阿、第三子扎萨克图被伯父斩杀，第二子阿敏以后欲报父仇另行据地称雄等事实，可以看出，舒尔哈齐确系为兄所羁为兄所杀，成为清宫最早发生的第一个疑案和第一个冤案。

第二节 皇长子褚英的执政及被诛

褚英是努尔哈赤第一个大福金（后称元妃）佟佳氏所生的长子，骁勇多谋，能征惯战，军功累累。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努尔哈赤命幼弟巴雅喇、褚英与噶盖、费英东，领兵一千，往征东海女真安楚拉库路。此时，褚英只有十七岁，但他不畏险阻，披甲上阵，领兵飞速前进，“尾夜驰至”，取屯寨二十处，其余屯寨尽行招服，获人畜万余，胜利回师。努尔哈赤对这个年未成丁的长子，赐以“洪巴图鲁”的美号（巴图鲁，乃满文baturu的音译，意为英勇）。^①这次出征，在努尔哈赤创业建国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里程碑。起兵初期，主要是努尔哈赤亲率士卒，奋勇鏖战，以身作则，二弟穆尔哈齐、三弟舒尔哈齐随同征伐，一些族人跟从攻战，额亦都、安费扬古起了重大作用。万历十六年（1588）何和礼、费英东、扈尔汉等三部长率众来投，五大臣成为带军出征的主要将领。从万历二十六年征安楚拉库路起，开始了由努尔哈赤的子侄——贝勒、台吉统兵辖将转战四方的新阶段，虽然五大臣等开国元勋仍然是战阵厮杀的主要将领，但统军之权，则大多由贝勒、台吉直接掌握，这对提高努尔哈赤的地位、增强他的专制权力、促进宗室贵族的形成，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万历三十五年三月，舒尔哈齐、褚英、代善、费英东、扈尔

^① 《武皇帝实录》卷1。

汉、扬古利等率兵三千，往接蜚优城归顺女真，途中与乌拉万兵交战，此时，舒尔哈齐、褚英、代善各率兵五百，扈尔汉、费英东两员大将领兵三百，纳齐布虾与常书各领兵一百，扬古利的兵数不详。在这关系到努尔哈赤盛衰的重要战争中，三个贝勒领的兵为全军总数二分之一，仅此而论，也可想见他们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之大。

努尔哈赤以褚英“奋勇当先”，赐以“阿尔哈图图门”尊号。^①阿尔哈图图门是满语音译，阿尔哈(arga)，意为计、计谋，图门(tumen)意为万，直译为“万计”，即足智多谋之意，清人称褚英为“广略贝勒”。可见褚英的多谋善断，英勇顽强，为女真国的扩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以后，这位连战连捷屡立军功的“皇长子”，竟突然消失了，在《清太祖实录》中再也找不到他的记载，他有无任职，有何功过，何时去世，是病逝善终，还是战死疆场，或是因罪诛戮，皆无记述。直到三十五年以后，《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七，才第一次提到，“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再过六十年，康熙帝指出：“昔我太祖高皇帝时，因诸贝勒大臣讦告一案，置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燕子法”。^②以后，《清史列传》卷三《褚英传》才简略地写道：“乙卯(1615年)闰八月，褚英以罪伏诛，爵除。”但“悖乱”为何？“讦告”何事？罪犯哪条？皆讳而不述。查看《满文老档》，才了解到此案真相。由于这是记述褚英生平的罕见珍贵资料，因此详细引录如下。《满文老档·太祖》卷三载：

“聪睿恭敬汗承天眷祐，聚为大国，执掌金政。聪睿恭敬汗思曰：若无诸子，吾有何言，吾今欲令诸子执政。若令长子执政，长子自幼褊狭，无宽宏恤众之心。如委政于弟，置

① 《武皇帝实录》卷2。

② 《清圣祖实录》卷234。

兄不顾，未免僭越，为何使弟执政。吾若举用长子，专主大国，执掌大政，彼将弃其褊心，为心大公乎！遂命长子阿尔哈图图门执政。

然此秉政长子，毫无均平治理汗父委付大国之公心，离间汗父亲自举用恩养之五大臣，使其苦恼。并折磨聪睿恭敬汗爱如心肝之四子，谓曰：诸弟，若不拒吾兄之言，不将吾之一切言语告与汗父，尔等须誓之。令于夜中誓之。又曰：汗父曾赐与尔等佳帛良马，汗父若死，则不赐贲尔等财帛马匹矣。又曰：吾即汗位后，将杀与吾为恶之诸弟、诸大臣。

如此折磨，四弟、五大臣遭受这样苦难，聪睿恭敬汗并不知悉。四弟、五大臣相议曰：汗不知吾等如此苦难，若告汗，畏执政之阿尔哈图图门。若因畏惧执政之主而不告，吾等生存之本意何在矣。彼云，汗若死后不养吾等，吾等生计断矣，即死，亦将此苦难告汗。

四弟、五大臣议后告汗。汗曰：尔等若以此言口头告吾，吾焉能记，可书写呈来。四弟、五大臣各自书写彼等苦难，呈奏于汗。汗持其书，谓长子曰：此系汝四弟、五大臣劾汝过恶之书也，汝阅之。长子，汝若有何正确之言，汝回书辩之。长子答曰，吾无辩言。

聪睿恭敬汗曰：汝若无辩言，汝实错矣。吾非因年老，不能征战，不能裁决国事秉持政务，而委政于汝也。吾意，若使生长于吾身边之诸子执政，部众闻之，以父虽不干预，而诸子能秉国执政，始肯听汝执政矣。执掌国政之汗、贝勒，其心必宽宏，公平待养部众。若如此挑拨离间父所生四弟及父举用之五大臣，则吾为何使汝执政耶？先曾思曰，命汝之同母所生兄弟二子执政，部众大半与之。……因此，对汝之同母所生兄弟二子，各给与部众五千户、八百牧群、银

万两、敕书八十道。对于吾之爱妻所生诸子，部众、敕书等物皆少赐之也。……汝如此持褊狭之心，则将赐汝专有之部众、牧群等物品，尽行合于诸弟，同等分之。

故秋季往征乌拉时，知晓长子之心褊狭，不能依靠，令其同母所生之弟古英巴图鲁留下守城。春天再征乌拉时，亦不信赖长子，留下莽古尔泰台吉及四贝勒二弟。两征乌拉，皆不携长子，使留于家之后，长子与其四位亲信之臣议曰：若以吾之部众与诸弟均分，吾不能生，愿死，尔等愿与吾共死乎？此四臣答曰：贝勒，汝若死，吾等亦从汝而死。后汗父出征乌拉，长子对汗父出征如此大国，胜败与否，毫不思虑，并作书诅咒出征之汗父、诸弟及五大臣，祝于天地而焚之。继而又对亲信诸臣曰：吾兵出征，愿其败于乌拉，战败之时，吾不许父及诸弟入城。……（其臣上告于努尔哈赤）聪睿恭敬汗以若杀长子，恐为后生诸子留一恶例，乃不杀，长子阿尔哈图图门三十四岁时，癸丑年三月二十六日，监禁于高墙之屋。两年后，见其毫无改悔，遂诛杀。”

分析上述记载，可以了解褚英一生的基本情况，即军功累累，立为嗣子，执掌国政，争夺汗权，对父不满，被父斩杀。

第一，褚英对女真国的创立与扩展，建立了功勋。老档一开始就讲到，努尔哈赤自思，“若无诸子”，就不能聚成大国，执掌金政。这里明白无误地表述了，努尔哈赤的建国兴邦，是与诸子征战效劳分不开的，尤其是褚英最早出征，屡败敌军，功勋尤著。

第二，褚英被立为嗣子，助父执政。《清太宗实录》等书皆说，“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位之议”，为皇太极理应继位为汗埋下伏笔，但是，上述老档的记录，有力地证明了《清实录》的说法是错误的，与历史实际相距颇远。其

一，老档明确写道，努尔哈赤考虑到，“吾若举用长子，专主大国，执掌大政，彼将弃其褊狭之心，为心大公平！遂命阿尔哈图图门执政”。一则让褚英“专主大国”，再则让他“执掌大政”，三则“遂命阿尔哈图图门执政”，可见褚英确系被汗父立为执政者。其二，褚英这个“秉政长子”对诸弟说，“吾即汗位后，将惩治违命的弟贝勒和各大臣”。努尔哈赤斥责褚英过错时也说，“委政”于褚英，是让他逐渐树立威信，以便部众“始肯听汝执政”。这都表明，褚英已被汗父立为嗣子，将来汗父死后，他就要继位为汗。

第三，褚英与汗父和四个兄弟激烈争夺统治大权。老档说褚英个性褊狭，故虐待四弟和五大臣，其实，这不是什么心胸狭窄的问题，而是褚英与汗父、四弟争夺军国大权。所谓四弟，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都是有权有势的贝勒，他们辖有大批人丁兵将，多次领军出征，甚为汗父宠爱，是聪睿恭敬汗“爱如心肝之四子”。努尔哈赤除掉亲弟舒尔哈齐以后，各旗皆为其所有，他将一些旗和牛录分赐与子侄，使其承受专主，让他们成为牛录之主固山之主。但是，努尔哈赤握有最高所有权，他可以赐与子侄，也可以调换牛录，还可以收回。他这个聪睿恭敬汗是全国之主，是各旗之主，有权惩治或擢升各贝勒台吉。褚英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权力就没有汗父那样大了。褚英奉父之命执政，本身又是大福金所生的“皇长子”和汗位的继承人，亲辖部众五千户，一再领军出征，立有军功。因此，他可以“折磨”四个弟贝勒，“使其苦恼”，但他毕竟是四弟的同辈，原来都是并肩而行的贝勒，现在一跃而为执政之人，摆架子，耍威风，这些贵为固山之主，亲为汗之心肝的四个贝勒，很难心服。而且褚英还只是奉命执政，还只是继承汗位的嗣子，而不是真正的女真国汗，没有汗父努尔哈赤那样大的权力，不能支配其他弟弟拥有的牛录和固

山。老档说，汗父死后，褚英将不赐赍财帛马匹与弟弟，他即位后要杀与其成仇的弟贝勒和大臣，这正表明此时褚英还没有这个权，既不能籍没汗父已经赐与兄弟的财物（实际上也包括部众兵将），又无权赏赐财帛人丁与弟贝勒和大臣，因为他只是一旗之主，还不是全国之主，没有那样多的人畜财帛，而且他还不能诛杀违命的贝勒大臣，汗父没有把这个权交给他。正因为是这样的局面，所以，褚英虽然可以“折磨”弟贝勒，而弟贝勒却不心服，反而联合上告汗父。如果是努尔哈赤这样行事，他们怎敢违命！他们怎敢上告！上有全国之主的汗父努尔哈赤，下有势力强大的四个弟贝勒，还有汗父亲自擢用的亲信五大臣，褚英的位子很难坐稳，统治权力受到了很大限制。褚英要想牢固掌握军国大权，万无一失地继承汗位，就必须限制、打击四兄弟和五大臣，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架空汗父，逐渐掌握全部权力，而这一点，正是四个贝勒和五大臣不能接受的。因此，褚英的褊狭和虐待，四弟、五大臣的联合上告，实质上是褚英与汗父争权，与四弟争权，这是一场争夺汗权、削弱旗主权力与反夺权、反限制的激烈的政治斗争。

第四，褚英心怀不满，被父斩杀。四弟、五大臣上诉于汗，控告褚英的虐待及封锁消息，不让他们将褚英的所作所为向汗报告。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1587）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南征北战三十年，久经政治风霜，好不容易才建立了一个地广人众的强国。他深悉创业的不易，更知晓人心难测和权力角逐的残酷无情，三十来岁的褚英的如此行动和用意，怎能瞒过年过花甲老谋深算的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十分生气，对褚英厉声斥责，严加防备。褚英感到难继汗位，大祸将至，愤怒不平，忧虑万端，死念萌生，作表焚天诅咒汗父、四弟、五大臣，被父发觉，幽禁斩杀，年方三十六岁骁勇善战的广略贝勒，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第三节 大福金富察氏的休离

努尔哈赤第二个大福金富察氏，名滚代，原嫁威准，是景祖觉昌安的三哥索长阿之孙。威准死后，大约于万历十三、四年（1585—1586）再嫁与努尔哈赤，生莽古尔泰、德格类和莽古济格格。《武皇帝实录》卷一载，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努尔哈赤得知叶赫、乌拉九部联军来攻，因尚未天明，怕兵士夜出，震惊城中人，下令天明出兵。“言毕复寝。滚代皇后推醒太祖曰：今九国兵马来攻，何故眈睡，是昏昧耶，抑畏惧耶？”这位与努尔哈赤曾经长期共患难创业建国的滚代皇后，在此以后，很长时间内，《实录》中找不到她的材料，直到天命九年四月叙述景祖、皇后等陵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安葬时，才顺便写道：“其继娶滚代皇后及皇子阿儿哈兔土门灵槨，亦同移于此。”^①这位皇后何时去世？是年老病逝，还是因罪诛戮？按其记述而论，既是“继娶滚代皇后”，仍冠以皇后的尊称，又书其“灵槨”亦移于此，应是病卒，应是善终。可是，《清世祖实录》卷三却载称：“（顺治元年二月戊子）以大妃博尔济锦氏祔葬福陵，改葬妃富察氏于陵外，以富察氏在太祖时，获罪赐死故也。”这样看来，富察氏是有罪被诛了，但她究竟所犯何罪？何时赐死？仍系疑问。

近人唐邦治编辑的《清皇室四谱》卷二载：“继妃富察氏，名袞代。……天命五年二月，以盗藏金帛，迫令大归，寻，莽古尔泰弑之。”贵为皇后，富有全国，为什么会窃取财帛？为什么又要以此小过废除后位，迫令回居嫁家？为什么其子又要弑杀亲母？这一系列问题，在《满文老档》中，找到了合理的答案。

^① 《武皇帝实录》卷4。

《满文老档·太祖》卷十四载：

“(天命五年三月小福金)代音察又告汗曰：不仅此事，更有要言相告。汗询有何言。代音察曰：大福金曾两次备饭，送与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又一次，给四贝勒送饭，四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金一日二、三次遣人至大贝勒家，如此往来，谅有同谋。大福金自身，深夜出院，亦已二、三次矣。汗闻此言，遣达尔汉虾、额尔德尼巴克什、雅逊、蒙哈图四大臣，往问大贝勒及四贝勒。送四贝勒饭未食，属实。送大贝勒饭二、三次，受而食之，属实。又其他之言，亦属实。

对此，汗曰：吾曾言曰，吾身歿后，大阿哥须善养诸幼子和大福金。以有此言，故大福金倾心于大贝勒，虽无任何事，却无故地一日二、三次遣人至大贝勒家。

每逢诸贝勒大臣在汗处赐宴会议之时，大福金即以金珠饰身，斜视大贝勒，众贝勒大臣皆觉而非之，欲告汗，又因畏惧大贝勒、大福金，而不敢告。

汗闻此言，不欲加罪其子大贝勒，乃以大福金窃藏绸帛蟒缎金银财物甚多为辞，定其罪。遣人至界藩山上居室查抄。大福金恐汗见其物多而又加重惩罚，急使人分藏各处，送往各家，以财物三包送至达尔汉虾山上之家。查者返回汗屋后，大福金即遣人往取送于达尔汉虾家之财物，该人误而未往山上之家索取，转向西边之家索之。达尔汉虾知觉，与该人同来见汗，告曰：福金私自匿财，吾岂有领受之理乎？……(汗)遂杀受容财物之女阿哈。

继之又查，蒙古福金告曰：阿济格阿哥家中二柜，藏有大福金帛三百，大福金常为此担忧，欲焚于火，欲投于水，以惜此帛，皆未果。闻此言，即往阿济格阿哥家查看，查出

帛三百，持来。又于大福金母家查看，搜出存放于暖木大箱中之银，持来，大福金又告曰：蒙古福金处，有东珠一串。遣人问蒙古福金，蒙古福金答曰：此乃大福金给与，令藏之也。

又闻，以总兵官巴笃理之二妻，欲作朝衣，大福金给与精美之宝石蓝色倭缎。又给与参将蒙噶图之妻绸缎朝服一件。又报，大福金背汗，私自厚赐财物与村民。

汗大怒，唤村民至，令将大福金所赐之物尽数退回。又将大福金之罪，告于众曰：此福金奸狡诈伪窃盗，人之邪恶，彼皆有之。吾以金珠，饰汝全身，又以人所未见之美帛，与汝穿着，汝乃不念汗夫之恩养，蒙蔽吾眼，置吾于一边，而勾引他人，岂不可杀耶？然若念此罪而杀，则吾爱如心肝之三子一女，将何等悲泣，设若不杀，则此福金欺吾之罪太多。言时十分悲愤，因曰：杀大福金何为，彼诸幼子生病，尚需看护服侍，吾不与彼共处，将其休离，嗣后，此福金给与之物，无论何人，皆不得收受，无论何人，皆勿听其言，若违此命，无论何人听取大福金之言，领受其给与之财物，则不论男女，皆杀之。

于是，遂与大福金别离。”

以上材料，加于大福金富察氏头上之罪有四，一为勾引大贝勒代善，二为窃藏财帛，三为赏赐衣帛与二将，四为私赐财物与村民。老档的这段记载，很生动，很具体，有人证，有物证，讲起来头头是道，振振有词，似乎无懈可击，铁证如山了。可是，联系政局，深入分析，便可发现，这几条罪状，都不能成立。

这里着重讲讲与代善的关系问题，这是大福金富察氏的主要

罪状。^①《满文老档》写道，努尔哈赤相信了小福金代音察的控词，认为大福金勾引代善，关系暧昧，以此为主，将其休离。但是，此说疑点有四：其一，代音察的告状，只讲到大福金曾两次备饭，送与代善，代善吃了，她还陆续遣人到代善家，“谅有同谋”，大福金又曾深夜出院二三次。常言捉贼捉赃，捉奸捉双，送两次饭，有什么了不起的过错，身为继母，备菜送与儿子吃，此乃司空见惯的通例（入关以后，皇后、王妃，经常赐菜与诸子食用，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礼节），怎能以此定为奸罪。所谓遣人至家，就必有同谋，为什么继母就不能遣人至子家，为什么去了就必然是策划阴谋？“谅有”二字，本身就是揣测之词，以此为据，则“莫须有”论亦可成立了。至于深夜出院二、三次，出去没有？到了何处？作了何事？仅此就能断定是与代善幽会吗？显然，这些罪状，皆缺乏根据，都是推测之论，甚至于可以说是“风闻之词”，就凭这几条，定不上什么通奸！

其二，调查者与代善及皇太极二人的关系，有必要剖析一下。老档写道，努尔哈赤派达尔汉虾、额尔德尼、雅逊、蒙噶图四人，调查此事，四人查后报告，皆属实。大福金给代善、皇太极送饭之事，固然可以查清，但代善吃没有吃，怎能确定，皇太极“受而不食”，又怎能查明。此事全在代善、皇太极二人的“口供”，本来是难以定案的，可是调查人却断定代善“受而食之”、皇太极未吃。为什么会得出不利于代善、有利于皇太极的结论？显然调查大臣有倾向性，看看这四位大臣的身份及其与代善、皇太极的关系，也许能解开其中之谜。名列第一的调查大臣是达尔

① 关于此处老档所说的大福金，学术界有两种看法，有的文章提出，这个大福金，是努尔哈赤第三个大福金乌拉纳喇氏，是乌拉满太贝勒之女，乃阿济格、多尔袞、多铎之母。另外一些文章则主张，大福金是富察氏，为莽古尔泰、德格类、莽古济格格之母。我认为，后一说法比较合适，因论述过长，容待另文专述。

汉虾，即努尔哈赤的养子扈尔汉，他和代善，关系很不融洽，代善曾专门向汗父进奏不利于扈尔汉的“谗言”。扈尔汉隶满洲正白旗，此时白旗旗主是皇太极，扈尔汉当然要维护旗主利益，不会也不能作出危害皇太极的事。第二个调查大臣是额尔德尼，此人既是努尔哈赤重用的亲信近臣，又竭力拉拢皇太极，经常违背旗制，私往皇太极处，通报情况，交换意见，是皇太极争夺汗位的小集团的重要成员。第三位调查者是副将雅逊，此人好弄权术，爱作谎言，曾上文书向汗“求功”（即求升职），经审查，皆是将他人之功“伪为己功”，被定死罪，后免死，“单身给与四贝勒”。可见他也是皇太极的旗下人员。最后一人是蒙噶图，隶满洲正白旗。这样看来，四个调查大臣中，三人是皇太极的属人（其中一人与代善有怨），一人为皇太极的党羽，他们的调查结论，当然有强烈的倾向性，当然对代善不利。

其三，大福金这样行事，目的为何？属于什么性质？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一个很易判明的问题，但又是一个无法得出符合实际结论的难题。问题本身，并不复杂，努尔哈赤自己也清楚，因为他曾经宣布，自己去世以后，由大阿哥“善养”大福金及其他幼子，这就是说，代善已被立为嗣子，将要继承为汗。在这种条件下，大福金自然就会想到，要与代善搞好关系，博其好感，因而备办佳肴，送与代善，常遣人前去问候。照说，这也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首告之人偏要小题大作，调查大臣又从中兴风作浪，硬给大福金、代善二人扣上了关系暧昧的帽子，激怒了努尔哈赤。大福金和代善对此无法反驳，因为这个“私通”之罪，并未公开宣布，并未告诉代善，弄得二人想申辩想解释都不可能。

其四，努尔哈赤以“窃藏财帛”为名而休离其妻，根据是不充分的。堂堂一国的国母，至高无上的君汗的大福金，收藏的金银

财帛多一点，有何不可？何况，老档只言其多，没有总的数字，唯一的一个数字是从阿济格阿哥家中查出帛三百匹。三百匹，并不算多，赐与总兵官巴笃理及其弟蒙噶图一、二件衣物，不过是一点小小的礼物。至于赏赐村民财物，这是争取民心宣扬汗恩的好办法，对后金，对英明汗并无损害！可以肯定，大福金富察氏有权收藏财帛，有权赏赐臣将，也有权施恩于民，这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罪。唯一欠妥的是，大福金未将这些事向汗言明，触犯了夫君的威严。

总起来说，大福金富察氏没有大的罪过，她被休离，是一件冤案，而且可以说是一件经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案件，其目的是陷害大福金、大贝勒，争夺后金最高统治权。这从下述代善被废除太子之事，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第四节 “太子”之废

一、军功累累的大贝勒

《清太宗实录》说，努尔哈赤“未尝定建储继位之议”，没有立过嗣子，这在评述褚英的执政，已证明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其实，努尔哈赤不仅曾经委任褚英执政，指定为汗位继承人，而且在处死褚英后，又立了第二个嗣子，并明确称为“太子”。这个太子，不是《清太宗实录》宣扬的“（太祖）圣心默注，爱护独深”的皇太极，而是褚英同母所生之弟代善。努尔哈赤作出这样的安排，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

代善是努尔哈赤第二子，亲母为第一个大福金佟佳氏。褚英死了以后，论嫡庶，代善是中原所谓正宫皇后之子，叙长幼，他

是现存十五个皇子中最为年长之人，就此而言，立为太子，也是够格的。同样重要的是，直至被废去“太子”之前，代善是皇子之中军功最为卓著之人，也是权势最大的贝勒。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代善随叔舒尔哈齐贝勒、兄褚英贝勒，偕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率兵三千，往接蜚优城归顺女真，回返时，乌拉布占泰贝勒遣兵一万，突然冲出，拦路劫杀。敌兵三倍于己，早有准备，以逸待劳。己军远道跋涉，仓促应战，实力悬殊，军心不稳，在这关键时刻，褚英、代善策马愤怒说：

“吾父素善征讨，今虽在家，吾二人领兵到此，尔众毋得愁惧。布占太曾被我国擒捉，铁锁系颈，免死而主其国，年时未久，布占太犹然是身，其性命从吾手中释出，岂天释之耶？尔勿以此兵为多，天助我国之威，吾父英名夙著，此战必胜。”^①

话并不多，然而相当精彩，十分中肯。此时建州军队，面对强敌，最需要的是必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尤其是必败敌军的信心。褚英、代善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着重从两个方面来讲。其一，反复宣扬汗父为天所祐，百战百胜，威名远扬，敌军闻之无不丧胆，因此尽管敌兵众多，亦不足惧，“此战必胜”。其二，大讲布占太战败被擒，送彼回国为主的历史，丑化、贬低其人。这一点，很有说服力。从征兵将，很多人参加过十四年前的古勒山之战。当年，布斋、布占太率领叶赫、乌拉九部联军三万，直奔费阿拉，杀声震天，欲图一举消灭新兴的建州。努尔哈赤虽然将寡兵少，却勇猛冲杀，大败敌军，生擒布占泰。《武皇帝实录》对此事的叙述，颇为生动，它写道：擒获之人跪见淑勒贝勒努尔哈

^① 《武皇帝实录》卷2。

赤说：“我得此人，欲杀之，彼自呼毋杀，许与赎资，因此缚来。”太祖问曰：“尔何人也。”其人叩首答曰：“我畏杀，未敢明言，我乃兀喇国满太之弟布占太，今被擒，生死只在贝勒。”这段记载，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布占泰贪生怕死摇尾乞怜的丑陋形象。布占泰留居四年后，努尔哈赤遣图尔坤黄占、博尔昆费扬占二大臣带兵护送回国，使为乌拉国主，“布占泰感太祖二次再生，恩犹父子”，以妹嫁与舒尔哈齐贝勒。^①褚英、代善把这段往事翻出来，对布占泰嘲讽讥笑，随行兵将当然会引起共鸣，自然就不畏惧这个铁锁系身乞求活命的刀下败将，信心倍增，勇气十足。他们齐声叫喊说：“吾等愿效死力！”遂奋勇渡河。褚英、代善领军“登山而战，直冲入营”，大破乌拉兵。努尔哈赤因代善“奋勇克敌”，斩杀敌军统兵贝勒博克多，赐与“古英巴图鲁”美号。古英，乃满文Guyeng的音译，意为“刀把顶上镶钉的帽子铁”，巴图鲁为英勇，是勇士的美称，既英勇，又硬如钢铁，更是勇士之最。这个尊号，有清一代，仅为代善所独有，可见努尔哈赤对代善的英勇，给予了高度的嘉奖。

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统兵三万，进攻乌拉，连取三城，布占泰领军三万迎击。诸贝勒、大臣欲战，努尔哈赤说：乌拉是与己“同等的大国”，是棵巨大的树，对这样大的树，只能一点一点地砍伐，不能一下折断，这样的大国不能一下灭亡，应先取各城寨，以后再攻其首部。此话固然有理，可是，时不我待，上一年进攻乌拉时，就因为努尔哈赤讲了同样的话，俘获不多，即行回兵，这次再中途而止，士气很难振奋，将会大大延缓统一女真各部的进程。努尔哈赤一向是言出令行之人，一经作出重大决定，很难更改，说不定还要惩办违令者，可是，不讲，不进攻，

^① 《武皇帝实录》卷2。

贻误了战机，今后更难了。在这紧要关头，代善冒险，率群将力争，终于说服了汗父，下令冲杀，顷刻之间，击溃敌兵，杀一万人，获甲七千副，灭了几代相传的强国乌拉。^①代善为后金国的建立，又立下一大功。

后金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进攻抚顺。十四日下雨，欲回兵。代善谏阻说：

“我与明和久矣，因其不道，故兴师。今既临境，若遽旋，将与明复修好乎，抑相仇怨乎？兴兵之名，安能隐之。天虽雨，吾军士皆有制衣，弓矢亦有备雨具，何虑沾湿。且天降此雨，以懈明边将心，使吾进兵，出其不意耳！是雨利我不利彼也。”^②代善的谏言，讲了三个重要问题。

其一，是与明和好，还是对抗为敌，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代善所说的“和好”，不是说平等的两国互利互助友好往来，也不是说中央与边疆正常的经济交流宽厚相待，而是讲建州女真为明臣仆受人欺凌的封建隶属关系。如果因雨回兵，与明“和好”，那么，努尔哈赤就要放弃“覆育列国英明汗”的尊号，照旧充当日为夷酋的建州卫都督，就必须按时朝贡，遵守国法，以辽东巡抚为父，听任边将勒索压迫，也就必须把已经兼并的女真部落吐了出来，使其各自为主，取消已经建立的强大的后金国，三十五载奋斗的丰硕成果，全部付之东流。这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长期南征北伐血染战袍的八旗贵族官将不能忍受的。此路不通。

其二，军机泄漏，后患无穷。代善说，“兴兵之名，安能隐之”，这是不可忽视的要事。几万人马，浩浩荡荡，直奔抚顺，这是难以掩盖的。兵贵神速，尤以出其不意为上，走漏风声，敌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

^② 《清史列传》卷1，《代善传》。

军知觉，严加防备，就很难击败对方攻克城堡了。努尔哈赤深知此事的重要，早在两个月以前，努尔哈赤和诸贝勒大臣已经议定征明雪恨，要砍伐树木制作梯子，又怕明方发觉，遂通告众人说：“诸贝勒伐树，修建马厰”，派七百人砍树。过些时候，惟恐明通事来此，看见做梯子的木材，下令将它做成栓马的栅栏。作梯子，都怕人发觉，这几万大军的行进，明国能不知晓？它一获悉建州反叛，必然要调兵遣将，赶运兵器粮食，加强防守，那时再来进攻，困难就大了。

其三，有备无患，乘雨突袭，变不利为有利。代善指出，天虽下雨，兵士有“制衣”，弓箭有备雨用具，可以照样前进。当然，道路泥泞，行走不便，但是，正因为这样，敌军可能松懈，哪有冒雨远道跋涉进攻城寨的？因此，利用下雨之机，突然偷袭，犹如自天而降，敌方必然措手不及，全军覆没，所以，“此雨有利于我，不利于彼”。

代善的这段话，虽然不长，但从政治决策到战略战术，以及思考方法，都讲得很清楚，必须前进，不能中止，战必胜，攻必克，抓住了关键，根据充足，论证清晰，有辨证法，说服力很强。因此，努尔哈赤“善其言”，撤消了退兵的决定，下令前进，攻取了抚顺等城堡五百余，获人畜三十万，取得了征讨明国的第一个大胜利。在这关系到后金发展的重要关头，代善再建奇勋。

在第二年震惊全国的萨尔浒之役中，代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天命四年三月初一，明军十万余（包括朝鲜兵），兵分四路，直扑赫图阿拉，欲一举踏平建州，消灭努尔哈赤家族。^①此时，

^① 明帝曾刊印擒努榜文，晓谕天下，榜文规定：生擒或斩杀努尔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杀其嫡子亲孙代善、阿敏等八大总管，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世袭。捕斩其叔伯弟侄等十二亲属，升指挥同知，赏银一千两，擒杀其中军、前锋、书记、女婿阿敦、达海、何和礼等十二领兵大头目，赏银七百两，升指挥僉事。捕杀“奴酋亲信”兀能等八十名领兵小头目，赏银六百两，升正千户。叶赫金台石、布扬古擒斩努尔哈赤，“给与奴酋敕书，仍封龙虎将军。”《明神宗实录》卷577。

努尔哈赤已经年过花甲，虽然久经鏖战，经验丰富，善于用兵，但毕竟年岁不饶人，百发百中力敌万夫之勇，已成往事，只能发号施令，作出战略决策，具体的领兵冲杀，^①主要由代善负责了。第一仗是先打明国西路军杜松部。三月初一，代善率领诸贝勒大臣统兵先行，定下作战计划，报努尔哈赤批准后，即挥军冲击，尽杀明兵。第二日，代善又统兵大败明北路军马林部。明东路军主将刘綎，勇猛善战，进军迅速，努尔哈赤留家驻守，代善挥军击溃了敌兵，斩杀刘綎，明南路军李如栢部闻风遁回，后金大获全胜。^②在这场关系到后金兴衰，爱新觉罗家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役中，代善又建殊勋。

正因为代善是中宫之子，诸弟之兄，军功累累，佐父治国，因此倍蒙汗父重用，位居四大贝勒之首，拥有正红、镶红二旗，亲侄杜度主管镶白旗，长子岳托、次子硕托亦已年长，领兵征战，辖有牛录，有权有势，因此，努尔哈赤决定立他为嗣子，谕告众人，代善成为具体主管后金军国大政的太子。

二、太子之过及废黜

天命五年(1620)九月，后金军政要员中间，传播着一条令人震惊的秘密消息：太子被废了。为什么曾为努尔哈赤“爱如心肝”的四皇子之一的代善，会惹怒汗父？为什么功勋卓著的古英巴图鲁会犯下大罪遭受处罚？为什么尊为“太子”、佐父治政、执掌军政大权、亲辖二旗的大贝勒被赶下了太子宝座？废黜之后，军国大权由谁执掌？这一系列关系后金政局的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

^① 《清文档·太祖》卷8。

总观全局，便可发现，在“太子”尊号取革之前，代善便经历了几次政治风暴的冲击，好不容易才步履艰难地渡过了三个难关。第一关，是有人精心设计策划而成的，那就是代善被加上与继母大福金富察氏关系暧昧的罪名，导致大福金被汗休弃。这个阴谋，非常厉害，将会置代善于死地。因为，这可不是小小过误，而是逆天大罪，子奸继母，国法不容，千刀万剐，万夫怒指。这一关，真是难关，本来代善是很难过去的，幸好，努尔哈赤比较明智，克制了怒火，将妻一休了结，没有追查和处分代善，也许他感到证据不足，难以定案，或者是另有想法，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代善总算侥幸过了这一关。否则，如果汗父硬要惩治，哪怕蒙受不白之冤，儿子也是无法反对的，也很难摆脱这种困境。

摆在代善面前的第二道关，可是他自己亲手设置的，完全是自找麻烦，自作自受，这就是建造府宅之争。《满文老档·太祖》卷十四载，就在大福金富察氏被休以后不久，因要从界凡迁居萨尔浒，努尔哈赤前往视察，指定各贝勒兴建府宅的地址。在各自地基整修好了以后，代善看到长子岳托住地比自己整修地址更好，向汗父说：“伊所整修之地，较汗所整修之地既宽又好，请汗居住。”努尔哈赤往观，确比己地更好，便答覆说：“可令大贝勒住我所整修之地，吾住大贝勒整修之地。”代善嫌汗父住地狭窄，不便建房装饰，要另寻宽地，欲重修岳托整修之地而于此建房。三贝勒莽古尔泰未与其他贝勒、大臣商议，即向汗父奏准，发役夫一千重修其地。代善又以此地优良，请汗父居住，努尔哈赤看后下令：以自己原修之地，赐与代善，第二次欲居之地（即代善之地），建大衙门，自己住岳托之地。诸贝勒遂又拨役夫千人整修。三处住房修好以后，代善以汗父赐与己住之房狭小，不要，欲居他处，使二贝勒阿敏向汗报告。努尔哈赤说：“若嫌彼处狭小，则吾仍居吾整修之地。既然汝以汝所整修之地优佳，汝

可携诸幼子于该地装修居住。”于是，努尔哈赤仍住自己原来整修的狭窄住地，而将三次整修的宽广佳地赐与代善。

从上看来，此时的代善，与两年前力主进攻抚顺的代善，好象不是一个人了。当时的代善，以巩固扩大后金国全局为重，进取心强，勇敢果断，不考虑个人安危；而今日的代善，却寸土必争，斤斤计较，总想找块宽地修建好的府宅，这本身就显示出气量狭小，没有远见。一请汗父改居己房，二请汗父住己佳地，好象真是贤孝之子，对父百般孝顺，关怀备至，可是一旦修建完毕，又舍不得，和汗父争地，全未想到，大波刚平，应以韬晦为上，哪能和汗父争执，再加新罪。这样反反复复，实为愚蠢，惹怒了汗父，完全可以定个欺君罔上的罪名。努尔哈赤确实生气了，一则自己的汗宫不如大贝勒府宅宽阔优良，有伤面子，再则儿子朝说夕改，不遵父命，有意戏耍汗父，争居佳地，确系不孝。虽然此时努尔哈赤没有发作，没有惩治代善，但也明确表示了不满，父子之间，又增添了一道裂痕。代善总算是糊里糊涂地混过了第二关。

第三关，也是代善自筑的，他在对待硕托的问题上犯了大错。硕托排行第二，与兄长岳托是代善前妻之子，代善此时的福金纳喇氏，是萨哈廉、瓦克达、巴喇玛之母。硕托与莫洛浑之姐私通，二贝勒阿敏之弟斋桑古与莫洛浑另一妹私通。天命五年九月初三，有人告发，斋桑古、硕托及莫洛浑夫妻欲逃往明国。十三日，努尔哈赤传斋桑古，回告斋桑古与莫洛浑同往牧群，又传硕托，硕托亦不在家，已往拖克索。努尔哈赤认为，三人均不在家，同一方向前往，“恐合谋叛逃”，集诸贝勒大臣议定，“发兵堵截通往明国之路”，至夜，三人各返其家，询其是否合谋图逃，三人均矢口否认，遂幽禁斋桑古、硕托，杀莫洛浑夫妇。代善五、六次跪乞说：若听从继妻之言，虐待硕托，子是父非，则

杀妻，如子“萌奸宄，行悖乱，可将子交我，我当杀之”。阿敏亦如代善，再三跪请斩弟。努尔哈赤不允。二十日，努尔哈赤下令说：释放二人，斋桑古愿与兄长阿敏完聚，听从其便，如不愿意，可自行归入另外贝勒旗下。“硕托愿随其父则罢，不愿，则来依祖父我也。”^①

在硕托一案的处理上，代善太笨拙也太狠心了。硕托、斋桑古，亲为汗侄、汗孙，贵为贝勒。莫洛浑是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之子，兄长乌尔古岱娶大福金富察氏之女莽古济格格，是“太祖”的亲女婿。莫洛浑又娶阿敏贝勒、斋桑古贝勒之妹，也算皇亲国戚了。两个贝勒、一位驸马欲图叛逃明国，此乃空前未有的丑事，虽然努尔哈赤不予深究，果断决定两个贝勒没有合谋叛逆，但心中亦不免有所怀疑，不然，为何要斩杀莫洛浑夫妇。退一步说，硕托就算无意逃走，但与叔父斋桑古的姨妹通奸，也是违法犯纪，应予惩处。一为谋叛大罪，惊动了后金国汗，调兵遣将，四处堵截，一为有伤风化，姑侄通奸，伦理不容，国法当惩，作为硕托之父的代善，既可能因子出走而蒙受瓜田李下之嫌（遣子私通明国），也必然要定上管教不严纵子悖乱的罪名，还可能因宠信继妻虐待前妻之子而遭众非议。处于这样尴尬的局面，代善最好是不动声色，潜施影响，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否定叛逃之嫌，搁置、冷却通奸丑事，使硕托无罪释放，平安无事，自己也就摆脱了困境，不受株连了。可是，曾经是勇猛出众、精明过人的大贝勒代善，却因听信继妻谗言，厌恶硕托，在审案过程中，丧失了理智，竟然再三向汗父请求，以硕托“萌奸宄，行悖乱”为辞，要杀掉亲生之子。他就没有想到，杀了硕托，自己怎能不受牵连，既有可能因此受罚，又将丢尽面子，将来怎能执掌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6。

国政，慑服诸贝勒大臣。真是私念蔽目，既愚蠢又歹毒，代善又为自己设置了另一道难关。幸好努尔哈赤顾全大局，妥善处理了此事，代善才解脱了自作之茧的束缚，侥幸地混过了第三关。

但是，代善被继妻的谗言迷住了，十分讨厌硕托，成见太深，以致完全遮蔽了双眼，失去了理智，弄昏了头脑。他就没有想一想，自己位列四大贝勒之首，尊为太子，统军征伐，辖治黎民，满门显贵，已是登峰造极了。然而，功高震主，权大逼君，声势赫赫之时，也就是成为众人之矢之日，君汗之尊，谁不喜爱，太子之位，怎不动心。为什么小小庶妃代因察敢于首告大福金？敢于将诸贝勒大臣畏惧的大福金、大贝勒加上暧昧之罪？为什么四个调查大臣敢于肯定代因察的诉状，向太岁头上动土？为什么汗父要听信此言休离大福金？为什么汗父既同意自己争房的要求，又要说一些气话？为什么汗父不认真审查就宣布硕托无叛逃之心？为什么汗父不接受自己诛子的再三请求，而将硕托释放，并愿收留于汗之旗下？这一切疑问，集中到一点就是，努尔哈赤对代善是怎样看的，代善的处境是万事如意，还是危机重重，即将大祸临头？显然局面正朝后一个方向发展。面对这乌云密布山雨欲来风满楼严峻形势，让谗言和私念蒙蔽了眼睛昏头昏脑的代善，不清醒地观察形势，采取妥当的对策，反而笨拙地一意孤行，硬要置硕托于死地，终于招来了险些丧身灭门的大祸。

据《旧满洲档·晟字档》记载，释放硕托后，努尔哈赤调查岳托、硕托领有的诸申，知道两人所属部众比其他异母之弟更差，令和济尔哈朗的诸申交换。努尔哈赤质问代善给与硕托的诸申名称，代善不正面回答这一问题，反而说硕托与己妾通奸，有喀勒珠为证。努尔哈赤斥责代善被妻欺压，而将次劣的部众给与前妻之子。代善不服。经查，喀勒珠承认诬陷硕托。努尔哈赤痛责代善，夺其太子之位和所属部众，凌迟喀勒珠。九月二十八

日，代善亲手杀了继妻，向汗父请罪。努尔哈赤调解代善与莽古尔泰的敌对关系，令代善与诸贝勒分头立誓。^①

这件震惊八旗的“太子”之废的大案，反映出了后金政局一系列的重要问题。

第一，代善权势很大，群臣畏惧。从萨尔浒建房争地，到无理要求斩杀硕托，及顶撞汗父，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太子、大贝勒代善地位崇高，这次事件中努尔哈赤的两段话和莽古尔泰、皇太极等人的表现，更加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事实。现将《旧满洲档》的有关记载，摘译如下：

“汗（斥代善）曰：汝亦系前妻所生，何不想想吾之对汝？汝为何听信妻之言语虐待长大成人之子？……再者，吾选择优良诸申赐汝专主矣，汝为何不效法吾将优良僚友给与岳托、硕托？汝系被妻欺压而将次劣诸申给与年长之子，……将优良诸申归与自己 and 让妻所生之幼子专主吧！

诸（贝勒）大臣皆沉默无话。莽古尔泰贝勒曰：父之言语诚是，我等诸弟、子及国内诸大臣皆畏惧兄嫂。……

汗曰：设若如此，为何诸贝勒大臣皆不言语？

莽古尔泰贝勒曰：吾乃代表众人而言。”

在努尔哈赤斥责代善的时候，诸贝勒大臣都不敢说话，都惧怕代善及其妻子，不敢表示拥护汗的教导，不敢随声附和指责代善，那么，在平时，他们岂不是更加畏惧大贝勒？

接着，在查清硕托系被诬陷后，努尔哈赤非常生气，厉声谴责代善，并对诸贝勒大臣说：

“莽古尔泰我们父子（发觉）大阿哥听妻（谗言而犯过错

① 《旧满洲档》，是《满文老档》天命、天聪、崇德元年的四十册原本，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业已影印出版。本书所用《旧满洲档》关于太子废黜一案的材料，系摘译日本冈田英弘教授用罗马字转写的档子。参考了冈田的《清太宗继位考实》一文。

时)，……尔等诸贝勒大臣窥伺大阿哥之脸色，竟一言不发。……尔等之心……，若以我们之言为非，皇太极、阿敏台吉、达尔汉虾，……就应发誓。尔等如果发誓，莽古尔泰我们两位自会认错。……设若尔等不发誓，为何还坐在阿哥那边(徒事敷衍)，快离开吧！”

努尔哈赤已经指出了代善的过失，莽古尔泰已经表示拥护汗父的训谕，在这样明朗的形势之下，诸贝勒大臣还在窥伺大贝勒的脸色，一言不发，可见代善权势之大。

第二，代善行事笨拙，对子太狠，自取其祸。代善被继妻迷惑太深，不能自拔，一心要害死次子硕托，竟然按照妻的指示，诬陷硕托与庶母通奸。代善没有想一想，通奸之事，很难查获，只靠喀勒珠一人的揭发，怎能将案定死，那时岂不引火烧身，自食其果。局势的发展，正和代善所想完全两样。努尔哈赤首先亲自审讯喀勒珠，喀勒珠只好承认，没有见到硕托与代善的二妾通奸的现场，只是推测之词。紧跟着，又调查了与硕托之妻、代善的二妾同行的二十人，皆与喀勒珠所告之词相反，从而断定了硕托是被诬陷，喀勒珠是依照代善福金的指使而作的伪证。这一来，努尔哈赤勃然大怒，严厉斥责代善说：

“汝妻之密谋诬陷，使喀勒珠（出其口），……汝就听信了。设若硕托被诬陷而杀，则又将怎样对待岳托？岳托、硕托（皆汝之子），若听汝妻之诬陷言词而杀亲子，又将怎样对待其他兄弟？若听妻（之谗言）……而欲全杀亲子、诸弟之人，哪有资格当一国之君，执（掌大政）！”^①

第三，努尔哈赤废黜太子，收回大权。虽然代善拥有那样大的权势，使诸贝勒大臣十分敬畏，但这个后金国毕竟是努尔哈赤

① 《旧满洲档·昆字档》。

奋斗三十余年才创立起来的，他是“覆育列国英明汗”，他是诸贝勒、大臣之父，他是八旗的最高所有者，因此，他和代善的斗争，自然要以代善的失败而结束。努尔哈赤责备了诸贝勒大臣窥伺代善脸色的错误态度，并令阿敏、皇太极、达尔汉虾明确表态。要么发誓，以代善为是，要么离开代善，到汗父这边来。三人听后，立即起立，移到努尔哈赤一边。这样，就把代善彻底孤立起来了。

紧接着，努尔哈赤对代善施以严厉的惩罚。他强调指出，象代善这种听信妻子谗言欲杀子、弟的人，没有资格当一国之主，执掌大政。他宣布：“先前（欲使代善）袭父之国，故曾立为太子，现废除太子，将使其专主之僚友、部众，尽行夺取。”^①曾经贵为太子，气焰万丈，势可炙人的大贝勒代善，就这样被废为庶人，一无所有，军国大权悉为汗父收回了。

第四，代善杀妻认错，始创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天命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代善亲手杀掉继妻，遣人向努尔哈赤奏述，要求“若蒙父汗不处死刑而得再生”，希望汗父允已叩见请罪。努尔哈赤表示了宽厚的态度，并调解代善与莽古尔泰的敌对关系，令他与诸弟发誓。代善誓称，因“误听妻言，丧失汗父交付之大权”，故手刃恶妻，今后如再为非、怀抱怨恨，甘愿受天地谴责，不得善终。“八和硕贝勒、众大臣亦立誓书”，对天焚化。誓书指责了代善的过失，又宣布立阿敏、莽古尔泰等人为“和硕额真”，今后大事由八和硕额真裁决。^②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大变化，天命五年九月，就立了八个和硕贝勒，由他们共治国政，而且档子还写出了八个和硕贝勒的名字，尽管此制这时并未真正实行，和硕贝勒的人选，由于各种原

^① 《旧满洲档·辰字档》。

^② 《旧满洲档·辰字档》。

因，也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总是一件出人意外的大事，对后金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此事留待第二编第六章详述。

从天命五年九月二十日释放硕托起，经过查济喀勒珠伪证，严斥代善，废其太子，到二十八日代善与诸贝勒大臣立誓，短短的九天里，政治风暴震撼八旗，几经波折，终于雨过天晴，定了大局。这就是代善丧失了太子之位，但仍居四大贝勒之首，其他贝勒地位上升。

努尔哈赤对代善这样的处理，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代善勇猛过人，南征北战，佐治国政，功勋卓著，本来可以当一个英明君汗，继承汗父事业，但是，他成为太子以后，权大势强，群臣畏惧，地位变了，暮气渐生，更糟糕的是，被继妻迷惑，听其谗言，竟不顾汗父训诫，一意孤行，硬要斩杀亲生之子。这样的人，如不及时悔改，真的继承了汗位，很可能会内听悍妇之言，外听小人之词，颠倒是非，忠奸混淆，诛戮无辜，重用佞臣，杀害忠良，搞乱国政，当然没有资格为一国之主，废黜太子之位，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当然，如果观其全部历史，不局限于一时一事，就会看到，代善为人，一向宽厚，比较谦让，不是奸狡狠毒蓄意夺权的阴谋者，而且确实为后金国的发展建立了丰功伟绩，在八旗贝勒、大臣中，拥有很高威信，此次虽然铸成大错，但也算是一时糊涂，只要除掉祸根，斩其继妻，再加教导，代善还是可以改过从善的，经过这样的磨炼，说不定会尽洗尘埃，振奋精神，统率八旗劲旅，开疆拓地，成为一个文治武功兼备的开国贤君。就此而论，努尔哈赤对代善的处罚，显然是过分了一些。这也许是他对代善的几次顶撞十分不满，大福金之体的遗恨犹在，又怕大权旁落，故而采取这样的决断。

第六章 明满关系的变化

第一节 龙虎将军

一、建州左卫都督

明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觉昌安、塔克世随宁远伯、总兵官李成梁，进攻古勒城主阿台，为军响导，战乱之中，为明兵误杀。祖、父惨死，家道剧衰，部众离散，亲族心变，强敌逼胁，努尔哈赤弟兄突然下降为无人理睬受人欺凌的贫寒之人。刚毅英勇的努尔哈赤当然不会俯首帖耳，跪拜于仇人尼堪外兰之下，甘作顺民，当然要想报仇雪恨，声讨敌人。但是聪睿机智的努尔哈赤，非常冷静地、正确地估计了严峻形势，以二、三十人的力量，要与臣民上亿、大军百万的明帝为敌，那无异是飞蛾赴火，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仇，一定要报，但又不能操之过急，而且在力量不够强大时，不能直斥明帝，还要利用、依赖这个敌人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不然，公开与明对抗，就要落个满门抄斩的悲惨下场。远祖董山的被斩，外祖王杲的槛送京师，叶赫强酋仰加奴、逞家奴的被杀，便是前车之鉴。因此，努尔哈赤决定，坚决

表示对明忠顺，奏讨官职，索要敕书，朝贡互市，藉明之威，辖服女真，竭力避免和明国公开为敌，过早交战。这一策略非常正确，从万历十一年到四十六年中，没有受到明军的征剿，极大地便利了统一女真各部事业的顺利进行。

总的看来，迄至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三月进入辽沈以前，努尔哈赤与明帝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万历十一年至二十六年的十五年，即努尔哈赤“效忠”于明朝，升授高官，朝贡互市，双方关系十分“融洽”的阶段。

努尔哈赤虽恨明兵杀害父、祖，但畏其威，既不敢言，也不敢怒，只有先拿尼堪外兰开刀，要求明将缚送尼堪，不料明将发怒，不仅不杀尼堪，反而扬言要立尼堪为建州左卫之主。关系弄得很僵，努尔哈赤极力挽回，一面“恩威并行”，“招徕各部”，统一建州，一面“与大明通好，遣人朝贡”，多次送还被掳汉民，以示忠于明朝，取得了边将的信任，既承袭了都指挥使职衔，又晋为都督僉事。

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擒斩掠明“夷酋”克五十，献于明，“又因贡夷马三非，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今复身率三十二酋保塞，且钤束建州、毛怜等卫，验马起贡，请得升职长东夷”。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在庭会查后说：“本夷原领敕三十道，系都指挥，伊祖父为向导剿王杲，后并死兵火，良然。今奴儿哈赤屡还人口，且斩克五十有功，得升都督制东夷便。”^①

同年九月，薊辽总督张国彦、辽东巡抚顾养谦、辽东巡按徐元言，据此上奏，详述女真形势，建议晋封努尔哈赤说：

“属夷之为我藩篱旧矣，制驭之策，不出乎抚剿恩威，

^① 沈国元：《皇明从信录》。



顾抚剿恩威之所加，在得其要领而已。所谓要领者，在因其势，用其强，加之赏赉，假以名号，以夷制夷，则我不劳而封疆可无虑也。……东方诸夷，之为卫所甚众，而建州领之，其名曰建州女直，今奴儿哈赤是也。……（为保哈达歹商，曾议欲处置奴儿哈赤）奴儿亦畏威，罢北关，姻歹商，而首先入贡矣。……建州奴酋者，势最强，能制东夷，其在建州，则今日之王台也。既屡送回被掳汉人，且及牛畜，又斩犯顺夷酋克五十，献其级，而慕都督之号益切，则内向诚矣。及查其祖父，又以征逆酋阿台，为我兵乡导，并死于兵火。……若录奴酋父祖死事之功，即当与之都督，亦不为过，而献斩逆酋之级，则又与明例合矣。奏入，上从其请，准与都督金事。”①

以上记载，讲了三个问题。

其一，万历十七年，明辽东督抚巡按认为，努尔哈赤已是建州女真之长，势力“最强”，“能制东夷”，是决定“东夷”（即建州女真）对明忠顺或叛逆的关键人物，笼络住这一酋长，就可达到“以夷制夷”的目标，就可保证边境安宁，使建州女真遵守国法，为明藩篱。

其二，努尔哈赤与叶赫纳林布禄，皆欲侵袭哈达，明为保护忠于朝廷的哈达酋长歹商（名酋王台之孙），出兵攻叶赫，并欲处理建州。叶赫降，努尔哈赤见机急转，绝叶赫，与歹商联姻，入贡明国，并且极力表示忠于明帝，送还被掳汉人及牛马，擒斩扰乱边境的“夷酋”克五十，这样一来，不仅使明辽东督抚打消了惩处努尔哈赤的念头，还使他们改变了看法，认为努尔哈赤对明帝十分忠顺，“内向诚矣”。从一个即将被惩的“逆夷”，一下子在明臣的眼目中变成了“保塞”“进贡”心向朝廷的忠臣，可见努尔哈赤

① 《明神宗实录》卷215：《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17。

的机智聪睿，他处理要事的才干确实是十分出众的。

其三，倚明制“夷”，晋升官职。努尔哈赤深知，要想称雄于女真，除了艰苦奋斗勇猛厮杀武力征服以外，还必须尽力争取明朝中央政府的支持，让明帝封授职衔，承认自己是建州的首领。这样，名正言顺，就能在建州女真中树立起崇高威信，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他“慕都督之号益切”，恳求升职，以“长东夷”。明廷也因其人多势强，保塞有功，忠顺可靠，同意了这一要求，晋为都督佥事，以“制东夷”。

这是努尔哈赤得受明朝“殊恩之始”，有了这个职衔，他就成了合法的建州之长，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他扩充实力，加速完成统一女真的伟大事业，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条件。明人评论此事说：“奴儿哈赤既窃名号，夸耀东夷，则势愈强”、“遂雄长诸夷矣。”^①

二、龙虎将军的册封

龙虎将军，是明朝武官的二品散阶。《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载：“凡武官六品，其勋十有二，散阶三十。勋阶内，正一品为左右柱国。……散阶内，正一品初授特进荣禄大夫，升授特授光禄大夫。从一品初授荣禄大夫，升授光禄大夫。正二品初授骠骑将军，升授金吾将军，加授龙虎将军。”有明一代，女真酋长受封龙虎将军的，仅有两人，一为海西哈达名酋王台。王台初袭祖职为右都督，后来送还人口，擒斩掠边女真，屡受明廷嘉奖。万历三年，王台缚送“建州逆督王杲”，明帝谕称：“王台缚送首恶，忠顺可奖，加授勋衔，二子俱升都督佥事，仍赏银币，以示

^① 茅瑞征：《东夷考略》；海滨野史；《建州私志》。

优奖”。兵部拟请晋封右柱国，帝命“授龙虎将军，视西人。”^①这个龙虎将军封号，比其他女真所封都督更为显赫，实际上意味着明帝让王台高于其他女真酋长，称雄诸部，成为所有女真中最高职衔之人，这对抬高王台地位，辖治海西、建州各部，起了很大作用。

龙虎将军职衔的另一受封者，就是努尔哈赤。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晋为都督佥事，巩固了“建州王”的地位，但他并不满足，还想继续高升，还想高居于大小数百部的酋长之上，要称雄于海西、建州、“野人”女真，渴望得到王台曾经得到的封号。万历二十年八月，努尔哈赤就进呈奏文，“乞升赏职衔冠带敕书”，“乞讨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②这时，努尔哈赤还未完全统一建州女真（长白山部的纳殷、朱舍里二部仍与努尔哈赤为敌），人丁士卒远远少于叶赫、乌拉和辉发，可他却想高居诸部之上，其志固然可嘉，可是其力不足，没有达到目的。但努尔哈赤并不罢休，继续努力。

努尔哈赤的基本策略和过去一样，即竭力表示忠于明帝，甘为臣仆，永作“顺夷”。他主要采取了以下五个方面措施。一是保塞安民，不掠不盗。以往女真通病，微弱之时，倒还安分守法，按时入贡，平等互市，一旦势力强大，就要频繁进边，掠取人口财畜，火焚房舍，闹得边境不宁，干戈时起，因而也经常遭到明军征剿，烧杀掳掠，妻儿为奴，田园荒芜，元气大损，很难迅速恢复。从远祖董山之死，到外祖王杲的磔于京师，以及叶赫强酋仰加奴、逞加奴的被斩，都是由于掠夺明朝财帛人畜，都是犯了掠边之罪，努尔哈赤牢记殷鉴，不派遣士卒侵袭明境，掠夺人畜财帛，扰乱边境安宁。这一点十分高明，赢得了明朝君臣的好

^① 《明神宗实录》卷41；茅瑞征：《东夷考略》。

^② 《明神宗实录》卷251。

惑，掩盖了他埋在心里的图报父祖之仇恨，为晋升职衔，市易抚赏，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为送还人口，邀功讨赏。辽东兵民，常遭蒙古、女真俘掠，努尔哈赤为示忠于明帝，不仅不让属下入边杀取人畜，还常常将其他部落掠来的汉民及其牲畜，送还明朝。朝鲜兵曹判书向国王奏述李成梁厚待努尔哈赤的原因说：“渠多刷还人口于抚顺所，故成梁奏闻奖许。”^①

三为奏请出兵，抗倭援朝。万历二十年四月，日本关白平秀吉出兵侵朝，五月陷王京，朝向明求救。七月，明副总兵祖承训帅师援朝，战于平壤，为日军所败。明廷大震，命兵部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诏天下督抚举将材，令都督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诸军，“尅期东征”。努尔哈赤认为，这是立功邀赏取信明廷的好机会，立即遣使入京，奏请出兵援朝。《朝鲜宣祖实录》载，万历二十年九月，明兵部令辽东都司移咨朝鲜说：

“今据女直建州贡夷马三非等告称：本地与朝鲜界限相连。今朝鲜既被倭奴侵夺，日后必犯建州。奴儿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如今朝贡回还，对我都督说知，他是忠勇好汉，必然威怒，情愿拣选精兵，待严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杀倭奴，报效皇朝。据此情词，忠义可嘉，委当允行，以攘外患。但夷情叵测，心口难凭，况事在彼中，遽难准信。（令与朝商议。朝坚决反对。）”^②

不久，努尔哈赤又奏请“发兵二万，征剿倭贼”，蓟辽总督邢玠欲允其请，因布政使梁云龙反对而止。^③

①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182页。

②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1597页。

③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487页。

努尔哈赤在奏疏中，讲了一句很不真实的话，即所谓有精勇惯战的马兵三、四万和步兵四、五万。万历二十年，努尔哈赤还仅仅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部落之长，人丁并不多，很难超过万丁之数，观其第二年与叶赫九部大战古勒山时，因九部联军多达三万，数倍于己，兵卒惊恐万状，“众皆失色”，军心大震，士气低落。努尔哈赤力言，敌兵虽多，“杂乱不一”，“我兵虽少”，拼死一战，亦可获胜，以此来安定军心，鼓舞士气。如果他真有马步精兵八、九万，何惧这区区三万敌兵！当然，也要看到，努尔哈赤的这句假话，并不是贸然脱口而出，而是经过考虑有意而发的。其一，此时朝鲜大败，王都失陷，明军仓促出援，又受重创，一时调不到兵，难以立即大举征剿，努尔哈赤说自己有八、九万马步兵，仅仅这支军队，可与日兵交锋，旗鼓相当，就可稳住局势，转败为胜，明廷闻听此言，必然欣喜若狂，一定会对建州奔赴国难、“报效皇朝”的忠心大加赞扬。尤其是其他女真酋长，如海西叶赫“强酋”纳林布禄、金台石，乌拉满泰，哈达蒙格布禄，此时实际军力都比建州更强，却坐山观虎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噤若寒蝉，不作任何表示。这样，更显出努尔哈赤对明帝的忠心耿耿，深明大义，因而深受明廷嘉奖，誉其“忠义可嘉”。

其二，努尔哈赤既然拥有精兵八、九万，那就不仅可以逾越叶赫、哈达和乌拉，而且可以高居各部女真之上，成为女真“诸夷”中最强之“酋”。兵多将广，忠于朝廷，远逾王台，这样的条件，还不能获得龙虎将军显赫职衔？当然能达到这一目的。因此，虽然朝鲜反对，明廷最后没有接受努尔哈赤的请求，但出兵援朝之请，在政治上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这件事充分地显示了努尔哈赤确实是精明果断、才干出众的杰出政治家。

四是频繁入京，叩拜明帝。是否按时朝贡，是判定女真酋长

是否忠于朝廷安分守法的一个重要标志。努尔哈赤深知此事的紧要，多次亲自入京朝贡。万历十七年九月晋都督佥事，第二年四月，努尔哈赤就率领属下一百零八人，携带贡品，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朝拜，明帝令“宴赏如例”。^①过了两年，万历二十年八月，努尔哈赤又进上表文，入京奏事，亦“赐宴如例”。^②二十一年闰十一月，他又带领属下，“赴京朝贡，上命赏宴如例。”^③二十五年五月，努尔哈赤及其部将一百人，重至京师，“进贡方物，赐宴赏如例”。^④第二年十月再次入京，明帝特命侯陈良弼设宴款待。^⑤后来努尔哈赤不止一次地宣扬自己曾经长期忠于明帝，主要的论据就是：“忠于大明，心若金石”，“看边进贡”，“年年向帝叩拜。”^⑥“年年向帝叩拜”一词虽略有夸张，但他从受封都督佥事以后，九年之内，五次亲自入京朝拜，次数并不算少，这对争取明帝的信任和嘉奖，显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五为笼络明朝官将，表示忠顺。远在北京深居九重的大明天子，很难知道“属夷”真情，除了发动大军，进边掠取人畜财帛、攻城略地这种明显的行动以外，忠顺与否，关键在于明朝边将对女真酋长的看法和对策，如若招致他们不满、愤恨、厌恶和怀疑，这个酋长就会被判定为僭谋叛逆行为不轨，就会遭到惩处，如若获得他们的欢心，取得他们的信任，这个酋长便会博得忠顺美称，就能晋升职衔，多领“抚赏”财帛互市贸易利。幼习汉书，常入马市，多次至京朝贡的努尔哈赤，深知这一问题的重要，花了很大力气，想了许多办法，施展高超权术，极力笼络明朝辽东官

① 《明神宗实录》卷222。

② 《明神宗实录》卷251。

③ 《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21。

④ 《明神宗实录》卷310。

⑤ 《明神宗实录》卷327。

⑥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与李成梁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李成梁征阿台时，觉昌安、塔克世为明兵误杀。按说，兵有过，将为主，李成梁应是致死努尔哈赤父、祖的仇人。这一点，努尔哈赤非常清楚，李成梁父子也是知道的。《朝鲜宣祖实录》载，万历二十六年二月，李成梁之子御倭副总兵李如梅，对朝鲜国王讲述努尔哈赤情况说：“厥父为俺爷所杀，其时众不过三十。”^①杀害父、祖之仇，不共戴天，努尔哈赤应该立即起兵，书写问罪檄文，讨伐李成梁，诛其弟兄子侄，报仇雪恨。但是，李成梁英毅骁健，身经百战，强酋王杲、阿台、仰加奴、逞加奴皆死于其手，王兀堂、纳林布禄、布寨是其刀下败将。从隆庆四年（1570）始任辽东总兵官，到万历十九年冬离任，二十九年再任。三十六年八十三岁时致仕，坐镇辽东三十年，大破“诸夷”，屡建奇勋，“威振绝域”，“边师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蒙受帝宠，封宁远伯，世袭，禄一千三百石，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皆任至总兵官，父子世握兵权，“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抚镇以下，非其亲姻，无不立被斥逐”。^②对于这样一位统兵十万势焰熏天的大帅，小小的努尔哈赤怎能奈何，不要说兴兵问罪，就是稍露复仇之意，或词色不逊，便会被李成梁发军征剿，家破人亡。相反，若暂埋深仇大恨，对彼奉承维谨，馈送厚礼，卑辞逢迎，倒可获其欢心，擢升奖赏，发展自己实力，扩大在女真各部的影响。聪明的努尔哈赤，明智地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对李成梁百般奉承，力表忠顺，屡送厚礼，甚至以弟舒尔哈齐之女，嫁与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妾。这样，赢得了宁远伯的信任，得到了他的关照，因而利用其权，势力愈强，时人皆认为，建州之兴，与李成梁的受骗受贿提拔努尔哈赤，有着密不

①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476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239、365；《明史》卷238、《李成梁传》。

可分的联系。明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连上奏疏，痛斥李成梁“结连建州”、“建酋与成梁谊同父子，教之和则和，教之反则反，诛成梁而建酋自不敢动”。^① 朝鲜君臣亦以李成梁厚待建州，“与老酋亲”而坐卧不安。^② 兵曹判书李德馨甚至向国王直述说：“助成声势者李成梁也。渠（努尔哈赤）多刷还人口于抚顺所，故成梁奏闻奖许。”^③ 由此可见，努尔哈赤对李成梁采取的策略是十分正确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仅对于李成梁这个宁远伯、征虏将军、辽东镇守总兵官的大帅，努尔哈赤极力奉承，就是对辽东的兵备道、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中下文武官将，他也十分恭顺，竭力笼络，仅举一例为证。万历二十三年，努尔哈赤以朝鲜边将斩杀进入其境采参的女真，欲出兵问罪，明游击胡大受应朝鲜请求，发书谕令建州停征，指责建州违法入朝，努尔哈赤立即遵令罢兵，并上书游击，申诉冤曲说：

“游击宣谕莫与高丽为仇，我并无违法，只是遵守国法，保守九百五十余里之边疆，学好。上年高丽避乱达子地方，收留在家，将一十二名回送满浦，其五名送还天朝，两家为一家，往来行走。达子违法进入边境，杀了，全是无有为仇。……衔冤在诉，请游击转上抚部。……达担国、海西及建州必直有好人歹人，而把好人作歹人，以为违法之罪，难当领受。今将冤曲情由，诉禀游府老爷，将老亦可赤忠顺情由奏与朝廷。……开天门见天日……。”^④

一则说遵守国法，学好，保卫边疆，再则尊游击为老爷，三

① 《明经世文编》卷457，宋一韩：《抚镇弃地啖虏请查勘以正欺君负国之罪疏》，《直陈辽左受病之原疏》；《明神宗实录》卷456、462。

②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816、2865页。

③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182页。

④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165页。

则叩请游击老爷将己忠顺情由，转达巡抚，上奏朝廷，读来确实令人深感其身怀忠顺之心，对天朝皇帝百依百顺，实系“顺酋”，辽东官将当然会赞赏其忠，当然要予以关照，擢升嘉奖。

由于努尔哈赤“年年向帝叩拜”，忠顺不逆，保守边疆，送还人口，乞讨职衔，^①笼络官将，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辽东边将，到中央官员，以及朝鲜君臣，都认为努尔哈赤忠顺可嘉，未怀逆谋。比如，明副总兵佟养正告诉朝鲜国王说：“老胡（努尔哈赤）比岁效顺，贡献不绝。”^②朝鲜备边司上奏国王说：“此胡仰顺天朝。”^③明兵部赞其请求援朝抗倭为“忠义可嘉”。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努尔哈赤于万历二十三年，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龙虎将军”的崇高职衔，成为女真各部中官阶最高、职衔最显的有名酋长，这对提高他的政治地位，扩大势力，加速统一女真的过程，都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第二节 争执频仍

一、致书明巡抚

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到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是明满关系的第二阶段，此时，争执频起，猜忌丛生，但仍保持和平，未动干戈。

自万历二十七年灭哈达起，明朝的一些官员，就对努尔哈赤产生了怀疑，随着其并辉发，灭乌拉，统一女真各部的加速进行，辽东督抚和京师官员，不少人便主张应加强边防，待机发

^①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580页。

^②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660页。

兵，征剿建州。努尔哈赤感到，“军力尚不够强，准备还差，不宜动兵，故一面尽力扩大耕地，储备粮饷，一面又应付明国，有时还甘言上告，委曲求全，延缓了明廷兴师的时间。

万历二十七年，叶赫纳林布禄、金台石贝勒屡侵哈达，哈达向建州求援，努尔哈赤乘机灭了哈达，杀其酋长蒙格布禄。明廷既惊又怒，遣使诘问，责令恢复其国，努尔哈赤虽然不愿放弃已得之地，但又不敢直接拒绝，怕起兵端，只好遵命，并以大福金富察氏所生之女莽古济格格，嫁与蒙格布禄之子乌尔古岱，立为贝勒，护送回还旧土，又于二十九年七月，亲诣抚顺关外，“刑白马，誓抚忽答（乌尔古岱）保寨”，过了一段时间，才再行并回。^①

努尔哈赤因明曾于万历二年起开辟宽奠、大奠、长奠、永奠、新奠等六城堡，“广袤八百余里”，军民屯种，“成家乐业”，欲图移垦侵占，乃行贿李成梁之婿参将韩宗功，疏通关节。李成梁亦以其地“逼邻东虏”，“争扰时起”，“易起边衅”，并欲藉此“援招回之例，冒邀封赏”，遂以“奴酋索地为名”，与巡抚赵楫议定，于万历三十三年，尽弃其地，“凡种地之家，概作逃户”，调军强迫押解入内，不少住户逃入建州，迁入内地的有六万余户。努尔哈赤拱手而得八百余里沃土，而且还以参与“招徕”逃民之功，蒙受明帝奖赏。^②

努尔哈赤的扩展耕地，攻取哈达、辉发和乌拉，用兵叶赫，震动了明朝，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文武大臣，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纷上奏疏，建议调兵遣将，待机征剿建州。万历三十五年，

① 《武皇帝实录》卷2；《明神宗实录》卷366；张鼐：《辽夷略》；茅瑞征：《东夷考略》。

② 《明经世文编》卷467，宋一韩：《抚镇弃地啖虏请查勘以正欺君误国之罪疏》；《明神宗实录》卷455；海滨野史：《建州私志》。

辽东巡按肖淳奏称，努尔哈赤“明肆桀傲”，“声势叵测”，实系大害，应整备兵马，谕令叶赫出兵相助，内外夹攻，“期如昔年剿处仰、逞二奴、杲酋父子故事”，以除祸患。^①万历三十六年二月，蓟辽总督蹇达上疏，力言“建酋日渐骄横”，“殆有不轨之谋”，实为“东方隐忧”，奏请“蚤备战守机宜”，遣使谕劝，“如彼酋输情驯服，照常抚驭，倘果稔恶不悛”，则调兵征剿，“以歼凶恶”。^②兵部尚书李化龙，一再上疏，认为“为患最大，独在建州”。^③内阁辅臣叶向高于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特上《奴贼日横疏》，极言“今日边事，惟建夷最为可忧，度其事势，必至叛乱”。辽镇必失，“天下事将大坏不可收拾矣”，力请“下廷臣会议”，“共作区处”。^④

此时，努尔哈赤虽已攻取哈达、辉发，有兵数万，但叶赫尚存，乌拉长期为敌（万历四十一年，始灭于建州），实力还不够强大，不能与明朝正式对抗，需争取时间。因此，万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努尔哈赤一再上奏申诉辩解，遵令减少车价，退还部分耕地，入京朝贡，并遣大将阿都、干骨里，送第七子巴卜海，入明为质，表现得比较顺从，麻痹了万历四十年、四十一年辽东巡抚张涛，明廷因而放松了对建州的警备，搁置了主战诸臣的建言。^⑤

从下述努尔哈赤对辽东巡抚的回信，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有的辽东大员会相信他的辩解。

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山西布政使郭光复被任命为辽东巡抚，四十二年春到任，遣人赍书，指责努尔哈赤收容逃人，盗窃

① 《明神宗实录》卷441。

② 《明神宗实录》卷443。

③ 《明神宗实录》卷458、464、484。

④ 《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37。

⑤ 《明神宗实录》卷484、488、512。

牛马，谕令送回人畜，解押盗贼。努尔哈赤回信说：

“马法(mafu)尔曰：有云吾来之前，我等之汉人逃往汝处。不仅收取逃来之一、二光棍，六万人畏惧高太监之赋役而来到边境告曰：汝若收容，则我等将出境而至汝处矣。吾曰：于尔光棍，吾有何福耶？吾若将尔收取，则受谴于帝。因而不收。不收取六万人之人，吾岂收容一、二名逃亡之光棍乎！

又云：有于近边地方盗取牛马而携走者。吾自立誓之后，(残)岂有偷盗之理？……吾毫无罪过，若盗摘边境草，吾有所誓，居心贼恶之人，焉能有幸！因吾心之正直而蒙受天帝爱恤之身，岂能附合如斯之恶贼！……

且又云：我等汉人之盗贼，窃取牛马后送尔。汉人之贼，汉人查之，女真之贼，女真查之耳！吾岂能查出汝等汉人之贼乎？万历三十六年，吾闻汉人之二贼给吾等女真送来五头牲畜，查出后，擒此二贼，遣刚古里将其盗窃送来之五畜，尽行送与抚顺王备御，对汉人之盗贼，吾不得而知矣。吾若知之，则将如是捕擒，送往尔方矣。

又云：此皆显系新债矣。吾遣通事赍书，令尔查究送来，尔作不知，未还一人一畜，尔不查出尔之女真之杀人之盗贼。若有盗贼，则查获捕送耳，无盗贼时，吾将捕谁送来耶！

万历三十九年，尔等将我等之五百道敕书裁削一道。此被削敕书之主巴哈多朵之孙，前往抚顺，于夜间杀死汉人一男人，带回一马，汉人不知，未能查究。吾闻悉之后，自动捕捉捆缚。吾曰：大国之人，若违誓言，则违之矣，汝何为毁坏吾誓，杀人牵马而回。我方之人带此人往抚顺教场斩之。该被带往抚顺教场斩杀者之父，以我之数代相传之敕书

被削而怨恨，不令人见，黑夜窃杀明人，明国不知不查。彼因怨削敕书及杀其子，乃携五人五马逃走。我方女真追之，清河地方之人出而迎接该被迫于边境欲捕之人，将逃走之五人五马收容于汉人之村后，汉人出来，与来追之女真对敌射杀，汉人、女真皆受伤。如若亲见追逐带走之逃人尚不归还，吾焉能信赖！今年五月，眼见我方六人六马逃走，进入抚顺河口台，却云不知而不归还，吾今复能信赖谁！

何时能见云贯日出。……思念地方之主，视尔马法如太阳，凡事皆信赖尔马法，而今无吾信赖之人也。……

因吾心如阿哈之忠，故天惠于吾，吾思天亦将推惠于尔大国之人。开原之人，以种种恶言诬吾，吾思‘我地之主马法尔何时到来’而曾信赖于尔，尔却以开原人之言为是，长期不助吾。如斯不归还我之逃人，吾复信谁？吾无摘取境草之恶心……。

马法，吾以尔慈，期待尔将逃去之人马给与。……”^①

这封信，是迄今所知努尔哈赤致明辽东督抚的唯一保存下来的信，内容丰富，十分珍贵，说明了很多重要问题。其一，尊巡抚为上司，自居属下。从信的用词和行文方式看，完全是下级对上司的谦卑口气，是微员末吏对主管长官毕恭毕敬的态度，是地方属臣对“天皇帝”（女真酋长对明帝的尊称）委派的钦差大臣的顺从表情。

此时的辽东巡抚是郭光复，刚从山西布政使加右副都御使，就任本职。辽东巡抚，不过是明朝一省一地的长官，并非中央朝廷的宰相，也不是主管全国某一方面的尚书，一般都以加都察院副都御史或金都御史衔充任，官阶为从二品或正三品。而这时的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74。

努尔哈赤，已自称女真国“聪睿恭敬汗”，吞并了哈达、辉发、乌拉，重创了叶赫，基本上统一了女真部落，第三年（万历四十四年）就登上了“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的宝座。这样一位言出令行、叱咤风云、臣民数十万、辖地几千里的强大的女真国汗，对官阶二、三品的辽东巡抚郭光复，却如此恭敬备至，连称马法（马法，乃满文mafo的音译，是女真、满族下辈对长辈的尊称，意为爷爷、长老、祖辈），尊之为“地方之主”，甚至把巡抚比作“太阳”，一切一切皆信赖于巡抚。努尔哈赤自己则甘居下辈，自比为阿哈（奴仆），一再表白“我心如阿哈之忠”，辩解罪名，申诉冤曲，盼望巡抚不要听信谗言，请求对己关照。这样的称呼，这样的口气，清楚地表明了努尔哈赤仍然以明帝的臣仆身份行事，仍然是辽东巡抚的下属，仍然承认二者之间是上下级关系、隶属关系。

其二，服从君敕，拒收逃人。明帝多次敕谕女真卫所，索要逃亡军民，不许收容汉人。这次辽东巡抚亦来查寻。努尔哈赤极力辩解，坚称未曾容留逃亡的汉人，并举逃避高太监赋役而来的六万人为证。所谓高太监，就是万历帝遣往辽东开矿征税的尚膳监监丞高淮。高淮借口矿税，肆意勒索，鱼肉小民，无恶不作。辽东军民异常愤怒，大批逃走，在接近建州的宽奠六城堡所属地带，数以万计的辽民逃聚其中，耕垦田地，明辽东巡抚赵楫、总兵官李成梁遣兵逼令归还故里，努尔哈赤参与了此事，既拱手得获八百里沃土，又常以此表明不会收容逃人，宣称“不收取六万人之人，我岂收容一二名逃亡之光棍？”

其三，遵守“朝廷法度”，不掠人畜财物。女真各卫必须遵守大明法典，不许入边抢掠人口牲畜，扰乱地方安宁。这次巡抚因为有人报称女真常来掳掠，杀人夺财，责问努尔哈赤，令其送交盗贼，不许胡作非为。努尔哈赤反复强调，立誓之后没有偷盗之

理，以此为辩解。所谓“立誓”，系指万历三十六年的事，当年六月二十日，努尔哈赤“刑白马”，盛血一碗，与辽东吴副将、抚顺王备御为盟：“皆以不越帝境为誓”，违者，杀违誓之人。努尔哈赤现在就援引此誓，坚称未越边境，“无盗摘境草之心”，连草都不拿取，怎会盗窃财畜。他还援引万历三十九年，主动捕捉前往明地行窃的巴哈多朵之孙，斩于抚顺教场之事为例，表明决不纵容部下劫掠，始终是遵守大明国法的。

其四，为帝效劳，查捕汉人盗贼。辽东巡抚命令努尔哈赤，将窃取牛马逃入女真地区的汉人盗贼押送归还，努尔哈赤既乘机表功，列举万历三十六年查获两名汉人盗贼，送往抚顺之事，说明自己确是信守誓言，忠于明帝，又保证要继续侦察，一有所知，立即照样擒捉押解。

努尔哈赤对明朝官员的如此尊崇，美词相奉，婉言申辩，力称忠于明帝，遵守国法，无盗贼之心，无抢劫之行，这样当然会对明臣施加强大的影响，容易被他说服，被他麻痹，从而下不了征剿建州的决心，延缓了兴师问罪的期限，为努尔哈赤加快统一女真的事业，提供了良好条件。

二、伐木之争

努尔哈赤虽然竭力避免与明国过早对抗，公开交战，尽量缓和摩擦，甚至不惜甘言厚币，讨好辽东官将，委曲求全，但矛盾并未消除，危机仍然潜存，万历四十四年(1616)六月，发生了震惊“朝廷”的伐木之争事件，险些诉诸兵端，干戈相见。六月，明清河游击冯有功，遣人出边，进入建州采伐木材，努尔哈赤派兵劫杀，双方发生争执。《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对此事作了如下叙述：

“六月，闻边境汉人皆越境侵入女真地方。汗曰：每年越边刨银采参，搜寻松子、蘑菇、木耳，扰害者甚多，为杜绝混扰，立碑宰白马为誓，今食其誓言，每年经常潜越帝境，我等杀之亦无罪矣。遂遣达尔汉辖，将越边之汉人杀之，约五十余人。嗣后，闻新任巡抚至广宁，遣刚古里、方吉纳二人往见，明国捕刚古里、方吉纳及其他九人，以铁索系之，遣人来告曰：若我等之人出边，尔擒捕解还，何得杀之。英明汗曰：昔碑誓曰：若见出帝境之人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今何不顾其言而如此强为之说。明人不从曰：尔等将为首之达尔汉辖执来，我杀之，不然，事将扩大。以言挟之。英明汗拒而不答不从。明人曰：此事已闻于上，不得隐矣。尔将有罪之人献之，持至吾边上，斩以示众，此事即了结矣。英明汗欲得其遣去之十一人，即将潜往叶赫因而捕置狱中之十一人。解至边上杀之，明国乃释其所拘之十一人遣回。”《明神宗实录》，也载录了这件事：

“（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辛亥）敕辽东巡按御史提问清河游击冯有功，责其启边衅之罪也。初清河与奴酋邻，以金石台为界，旧禁不许汉人出境，有功以协营采木孤山堡，募军丁房，遂私纵军民出金石台，采运木植，奴酋瞰知，遂杀四十余人，辽东督抚移文诘责之，奴酋悔罪认罪，献生事部夷十人，袅斩汉境上。至是，督抚诸臣以奴酋阳顺阴逆，为祸方深，但有功营利启衅，当正其罪，上是之。”^①

另书又载：

“先是，清河游击冯有功，遣军出边，深入夷地，采取木植。为奴贼部夷所觉，先伏贼众三百余人于林莽，以十余

^① 《明神宗实录》卷552。

贼要挟财物，我众不与之，群贼齐出，将军丁及同行商民五十余人杀伤殆尽，有张通者得脱走入报。巡抚李维翰檄令奴酋速献生事部夷正法，奴贼遵谕，缚献生事部夷打刺汉等十名，及罚处牛马，悔罪罚伏。”^①。

明满双方记载，有所差异，都讲有利于己的话，建州尽量删去与明交涉时的卑顺情节，《明实录》则炫耀天朝神威，贱视“东夷”。但对基本事实的叙述，两者还是大体一致的。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此次纠纷，由在明方。为了减少边境争执，万历三十六年，努尔哈赤曾与明副将吴希汉、抚顺王备御商议决定，立誓为盟，于沿边立碑，刻誓词于碑上说：“无论汉人与女真，若窃越帝境，见之即杀越境者”。这次，明清河游击冯有功违背誓言遣派军丁，潜入女真地区采伐木植，完全是不合法的，为利忘誓，侵犯了女真的利益，当然应该受到惩罚。努尔哈赤依据碑誓，劫杀明兵，是遵誓而行的合法行为，是有理的，并非胡做非为。

第二，明国倚势逼人，欺压建州。尽管明国自知理曲，却硬要维护“天皇帝”的威严，强辞夺理，威逼“东夷”。巡抚李维翰，摆着上司的架子，“移文诘责”，檄令努尔哈赤献送“生事部夷”达尔汉辖，要行“正法”，否则，“事将扩大”。这个要求，实无道理，十分专横。明明是自己边将违誓胡来，并非女真无理拦劫，杀人夺财，怎么会是建州“生事”？怎么能逼令建州交出“生事部夷”指名要斩杀达尔汉辖？达尔汉辖是扈尔汉，是清初开国元勋，是努尔哈赤爱如心肝的养子，这样一个后金屈指可数的高级将官，怎能随便缚送听明屠杀！而且，此次交锋，并非达尔汉辖个

^① 《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44，转引自田村实造编纂《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满州篇四》。

人的任意决定，而是遵奉汗命，依据碑誓而行，有法可据，有理为凭，杀了达尔汉辖，就意味着惩治了努尔哈赤，杀了他的替身。这个要求，真是横蛮无理到了极点，实在是欺人太甚。

第三，努尔哈赤被迫从命，委曲求全。努尔哈赤虽然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从道义上完全可以驳倒辽东巡抚，但是他不能不考虑对方的“事将扩大”的威胁。所谓“事将扩大”，所谓明人“以言挟之”，虽不具体，但含义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停止贡市，调兵遣将，兴师问罪。此时，努尔哈赤刚刚被八旗贝勒、大臣尊为“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正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突然与明发生了争端，横遭巡抚指责侮辱，甚至要斩杀达尔汉辖，真是奇耻大辱，怎能忍受。可是，不忍就要反抗，就要与明公开交战，但财力不足，兵力有限，过早用兵，胜负难卜，太冒险了。因此，努尔哈赤忍痛果断决定，遵照明臣命令，“悔罪认罪，献部夷十人，梟斩汉境上”，从而消弭了这场争端，明廷也就乘势下台阶，了却此案。伐木之争，虽已平息，但更加激怒了努尔哈赤及八旗官将，他们下决心，一定要报这个仇，雪这个恨，一定要新账旧债一起清算，不久便以“七大恨”誓师，征伐明国。

第三节 “七大恨”

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天，发军征明，十五日攻下抚顺。

“七大恨”是明满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标志。“七大恨”的具体内容，在明满双方都有记载。四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书七大恨之言”，遣四名被俘汉人持书，进呈明帝求和。《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八载：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建酋差部夷章台等，执夷箭印

文，送进掳去汉人张儒绅、张栋、杨希舜、卢国士四名进关，声言求和。传来申奏一纸，自称为建国，内有七宗恼恨等语，言朝廷无故杀其祖、父；背盟发兵出关，以护北关；暖阳、清河汉人，出边打矿打猎，杀其夷人；又助北关，将二十年前定的女儿，改嫁西虏；三岔、柴河、抚安诸夷，邻边住牧，不容收禾；过听北关之言，道他不是；又南关被他得了，反助南关，逼说退还，后被北关抢去。及求南朝官一员、通官一员往他地，好信实赴贡罢兵，等语。”

《满文老档·太祖》卷六载：

“四月十三日，壬寅，巳时，八固山十万兵征明国，作书告天曰：吾父、吾祖，于明帝边境，不折其草，不扰其土，而彼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吾父、祖，此一恨也。虽杀我父、祖，吾仍欲修好，曾勒誓于碑曰：无论尼堪、女真，若越帝境，见之即杀，若见而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如此誓言，明国背之，遣兵出边，护卫叶赫，此二恨也。自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明国人出边，入女真之地侵夺，我以誓言杀其出边之人，彼不顾前誓，责我擅杀，拘我往广宁叩谒之使者刚古里、方吉纳，系以铁索，挟令吾献十人于边上杀之，此三恨也。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致使吾已聘之女转嫁蒙古，此四恨也。将吾数代看守帝边居于柴河、齐拉、法纳哈三路之女真所种田谷，不容收获，遣兵逐之，此五恨也。听取边外天遣之叶赫所言，备书恶言，遣人对吾施以种种侮辱，此六恨也。哈达助叶赫，两次来兵侵吾，吾报之往征，天将哈达赐吾，而天赐之后，明帝又助哈达，挟令吾必送还原处，叶赫将吾所遣之哈达掳掠数次。夫天下各国互相征伐，天遣之人败而亡，天是之人胜而存，岂有使死于锋刃者更生既得之俘获复还之理乎！……先因呼伦部会兵侵吾，

吾始兴兵，天谴呼伦而祐我。明国助天罪之叶赫，如逆天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为判断，此七恨也。明国对吾欺凌羞辱甚多，实难忍受，故以此七大恨兴兵。祝毕拜天焚表。”

《明实录》和《满文老档》，对“七大恨”的载述，虽然详略不一，用词、语气有所差异，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可以作为评论的依据。首先，对这七恨，需要作些核实工作，看看哪些是真恨，哪些并不能称之为恨。

努尔哈赤所说第一恨，杀其父祖，这既是事实，但又不完全准确。觉昌安、塔克世确是死于明兵之手，但一系“误杀”，是战乱之中误杀，不是蓄意杀害。二则是明军为怨掠边“夷首”阿台，因而出边，攻打古勒城，并非“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父祖。三则事后明臣即承认是误杀，送还遗尸，给与敕书三十道，使努尔哈赤承袭祖职，为都指挥，后又以其父祖有“殉国忠”，晋为都督佥事，“长东夷”，蒙受“殊恩”，这也可算是弥补其过之举。

第二恨为明国违誓出边，“护卫叶赫”，这一恨有些强词夺理，难以成立。建州与明辽东守臣立碑刻誓，仅仅是指双方不要越界，避免因采参伐木引起争端，并不是规定明兵不能逾越边境一步，不能出边。须知，努尔哈赤管辖的建州地区，也是“天皇帝”的辖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女真各卫都督、都指挥，皆系明帝臣仆，其地皆为国土，明廷当然可以派兵进入女真地区，调解纠纷，惩治违法之人。而且，明国为什么要出兵边外，援助叶赫？这一点，努尔哈赤自己是很清楚的。他在万历十九年斥责叶赫纳林布禄贝勒逼其投降献地时说：

“昔我父被大明误杀，与我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送还尸首，坐受左都督敕书，续封龙虎将军大敕一道，每年给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汝父亦被大明所杀，其尸骸汝得收取

否？”①

努尔哈赤列举七年前纳林布禄之父仰加奴，伯卿家奴被明总兵官李成梁斩杀之事，对比自己父、祖“误杀”后的“厚待”，来羞辱叶赫，这些固然是事实，但由此不是更清楚地表明，明朝政府并不是存心褊袒叶赫亏待于己！

第三恨，伐木之争，此事曲在明国，确系欺人太甚，实为大恨。

第四恨，明遣兵出边助叶赫，致使努尔哈赤已聘之女，被叶赫转嫁与蒙古，这就是当时轰动于世的“老女”之争事件。万历二十一年，叶赫布寨、纳林布禄贝勒等九部联军，为建州大败以后，第五年，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共同遣使，请求“更守前好，互相结亲”，愿以布寨之女布扬古贝勒之妹许与努尔哈赤，以纳林布禄之弟金台石之女许与代善，努尔哈赤遂备办鞍马盔甲等物为聘礼，又杀牛设宴，宰白马，盛酒、血，与四国“歃血会誓”，但不久，纳林布禄即背盟违誓，将金台石之女嫁与蒙古喀尔喀部斋赛贝勒，将布扬古之妹另许他人。初许哈达蒙格布禄，万历二十七年哈达亡后，又改许辉发拜音达礼贝勒，万历三十五年辉发灭国以后，又许与乌拉布占泰贝勒。四十一年乌拉亡，布扬古于四十三年将妹改许蒙古喀尔喀部巴哈达尔汉贝勒之子莽古尔岱台吉。布扬古之妹，艳丽多姿，是当时名传满蒙的美女，然而，佳人命薄，由于政治角逐，年方十五即已许聘，中经多次改聘，直到三十三岁，仍未婚娶，成为“老女”，最后嫁与蒙古，一年而亡，实为可悲。②

已聘之女，而且是异常漂亮的美女，不能迎娶到家，反而被悔婚另许，当然是一大恨事。但是，这究竟应该怪谁？是努尔哈赤

① 《武皇帝实录》卷1。

② 《武皇帝实录》卷1、卷2。

及诸贝勒大臣责备的援助叶赫的明国？不是，明国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什么过错，不该负什么责任。以第一次悔婚改聘来说，这时明国不仅不援助叶赫，反而因叶赫数侵哈达而斥叶赫。叶赫纳林布禄及其侄布扬古之所以悔婚，原因有二，一为杀父之仇。九部联军失败时，叶赫布寨贝勒被建州士卒武谈“掩而杀之”，战后叶赫索要遗体，努尔哈赤竟将布寨尸体剖为两半，仅归还一半与叶赫。^①既杀其身，又辱其尸，这样的不共戴天之仇焉能不报，布扬古怎能忘此切齿大辱，其妹怎能卖身事敌。何况叶赫从仰加奴、逞家奴起，中经布寨、纳林布禄，到稍后的金台石、布扬古，皆骁勇善战、兵精将勇，素怀并南关（哈达）灭建州之志，怎能与努尔哈赤永结丝罗之好，昔日的订亲盟和，不过是一时的策略而已。这次的改聘，也包含了政治目的，是一种策略，企图以许与蒙格布禄“昔日所欲之女”为手段，来笼络哈达，乘机兼并，因而置婚约不顾，将女改许哈达。此后，叶赫将“老女”改许辉发，再许乌拉，皆大体上出于同一原因。这三次改许，可以肯定与明国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万历四十三年“老女”之许与蒙古，此时明国固然已经定下了扶持叶赫的方针，但这也是努尔哈赤逼出来的。明朝政府在相当长时间里，是保哈达抑叶赫以巩固边境。因此，万历十二年诱斩仰加奴、逞加奴，十六年又兴兵征剿，杀叶赫部众五百余，以后又多次训诫叶赫安分守法，不得轻举妄动。但是，努尔哈赤异军独起，扩展迅速，兼并“诸夷”，尤其是灭哈达、辉发以后，形势剧变，明才认识到建州才是真正的隐患，乃转而采取扶持叶赫，使其免于灭亡，牵制建州。而且此时辽东巡抚张涛也反对叶赫将“老女”许与蒙古。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布扬古将妹许与蒙古

^① 《明神宗实录》卷528。

莽古尔岱时，明辽东边将还专门派人前往“谕止”，叶赫不听，于七月成婚。^①

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所谓悔婚另许之罪，加不到明朝君臣身上，这个第四大恨，根据不足，难以成立。

第五恨为明国不许收割柴河、三岔儿、抚安三路庄稼，此恨与事实出入很大。所谓柴河等地，原来都是哈达王台、蒙格布禄辖区，努尔哈赤灭哈达后，就遣派人丁，大量耕种哈达旧地，但是，明朝政府不承认建州灭哈达的行动，认为这是叛逆不法行为，而且因为这些地方邻近叶赫，易起争端。威胁叶赫安全，威胁明境安全，故一直不允许建州人员住种收割。万历四十二年四月，辽东巡按崔凤种奏疏对此讲得很清楚：

“(建州五百余人，耕种刘家孤山等地。此地一再谕令撤回)”奴投有不牧种之甘结，詎意倏忽变幻时来。……南关（即哈达）地界，王台存日，自威远堡起，至三岔儿止。后王台故后，猛骨亭罗（蒙格布禄）在时，至抚安堡龙潭冲止，三岔儿一处已为侵占矣。迨猛骨亭罗故后，俱属之建州，旧种之田味斯语也，又侵占抚安堡矣，分遣人牛，临边住种，……。今不论新垦旧垦，但系南关之地，则不当容建夷住种，有五利焉。一不得逼近内地，侦我虚实。二不得附近北关，肆其侵扰。……”^②

万历四十三年正月，辽东巡抚郭光复亦上奏说：

“……至如柴河、靖安、三公、抚安四堡边外地，原系南关旧地，奴酋立寨开种有年，而上年驻令退柴河、靖安二堡地者，谓其逼近北关，以社窥伺耳，但未曾立界，所以今春复来耕种。今奴酋遵我约束其文，愿照界铸碑，惟讨秋收

^① 茅瑞征：《东夷考略》。

^② 《明神宗实录》卷519。

將熟之禾，以后再不敢越种。随行两道，待镌碑后许之，即今將柴河、靖安、三岔界碑上镌番字书，自四十三年春起，不许来种。……”^①

两疏讲得十分明白，柴河等地，是哈达旧地，明不许建州侵垦（因为明根本不承认建州之并哈达），建州也一再上奏具结，并立碑于石，保证不来耕种，但说归说，做归做，不管是具的甘结，或是立碑为誓，都不管用，仍然年年派人侵垦收获。就此而论，这个不许收谷的第五恨，又是强词夺理，缺乏根据，难以成立了。

第六恨为偏听叶赫之言，遣人侮辱建州，此事乃指万历四十二年四月明使入境而言。《武皇帝实录》和《满文老档》皆载称，万历帝遣守备肖伯芝来，“诈称大臣，乘八抬轿，作威势，强令拜旨，述书中古今兴废之故种种不善之言”。^②但究竟作何“不善之言”，二书未叙。此事，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兵部覆辽东巡抚郭光复奏疏时，有所评述。兵部说：“今日筹辽，必以救北关为主。惟是奴酋反覆靡常，顷抚臣提兵出塞，遣羁酋佟修养性为间谍，遣备御肖伯芝为宣谕，谕之退地则退地，谕之罢兵则罢兵。……”^③看来，所谓“不善之言”，可能是肖伯芝宣谕抚臣意旨，责令建州退地退兵，不要耕垦哈达之地，不要攻打叶赫。照此说来，肖伯芝没有什么大错。因为，明朝政府认为，建州本来就不应该并哈达垦其地，不应该一再用兵叶赫。努尔哈赤把此事列为明国对他欺凌侮辱的切齿大恨，其理由似乎不太充分。

第七恨为明国责令建州退还哈达，恢复其国，褫祖叶赫，此事前已论述，谈不上什么恨。

① 《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43，转引自《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3；《武皇帝实录》卷2。

③ 《明神宗实录》卷528。

总之，努尔哈赤所谓明帝欺人太甚的“七大恨”，只有第三恨伐木之争，明国全无道理，第一恨杀父祖之仇，明国应负其责，但不是无故蓄意杀害，而是“误杀”，并且明国还承认其过，有所抚恤和封赏，其他五恨，理由都不充分，根据比较薄弱，都难成立。

“七大恨”的具体仇恨，固有很多不尽准确之处，但努尔哈赤利用这七件事来说明的主要论点，来表达女真——满族对明朝政府暴政的愤怒，却不是没有根据的。“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个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是明国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这是千真万确的，是为两百多年双方交往的历史反复证实了的。明朝的所有皇帝，哪怕是沉湎酒色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昏君万历帝，都自命为承奉天命的真命天子，要女真尊他为“天皇帝”。辽东文武官将，也是高不可攀，贱视“诸夷”，称努尔哈赤为“奴儿哈赤”、“奴酋”，称建州为“东夷”，称蒙古为“西虏”，一切少数民族，都是“蛮夷”，都是低贱之人，对之任意欺凌，百般盘剥。查收贡品，辽东边将“验其方物，貂皮纯黑马肥大者，始令人贡，否则拒之”。^①明将还勒令人贡女真献纳珍珠豹皮等土特名产。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例于日晡时开市，买卖未毕，遽即驱逐胡人，所贡几尽遗失”，^②实为公开抢夺。至于双方来往，那更是一在天上，一在地下，贵贱悬殊。前面曾经提到，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对于一个明朝小小的游击胡大受，努尔哈赤就尊称为“游府老爷”，求他将“老亦可赤忠顺情由奏与朝廷”。就是这个游击，第二年又命差人持书，宣示建州守法，不许攻打朝鲜，其《宣谕文》有下述言语：以尔与朝鲜构怨，“故差官余希元前来宣谕”，“尔达子若不量而妄动，则所欲如缘木求

① 《明宪宗实录》卷35。

② 李民安：《建州闻见录》。

鱼，所为如以肉投虎。况皇灵震叠，敌国议后，一举足间，而他日之大祸判矣”尔“当敬恭承命，体领至意，传谕各众头目，自此以后，务要各守封疆，永遵禁约”，否则，圣天子在上，顺抚逆剿，……毋貽后悔”。^①一则大模大样地叫什么“宣谕”，二则既贱称为达子，还要加个犬旁，视如禽兽，三则勒令遵守国法，服从命令，否则大军征剿，从内容到形式，自事情到称呼，皆令人难以忍受，辱人太甚了。这只是小小游击的所作所为，至于威镇东北的辽东总兵官征虏将军，辽东巡抚，中央兵部尚书，以至“天皇帝”，其贱视女真的恶劣程度，更是不说自明。

对于这种被视如禽兽的极端低贱的恶劣待遇，女真无不痛心疾首，十分愤恨。《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一载，皇太极致书辽东巡抚袁崇焕说：“我两国之所以构兵者，先因尔驻辽东、广宁各官，尊尔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犹如神人，俾天生诸国之君不得自主，不堪凌辱，遂告于天，兴师征讨。”

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领兵出关，攻城略地，发布木刻揭榜的七大恨文，告诉汉民说：

“金国汗谕官军人等知悉：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诬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欺凌，千恣莫状。”^②

《满文老档》还具体地总括了明满交往中，明朝官将侮辱女真族的情形：

“昔日，太平时期，女真与尼堪（明国）贸易往来之时，不仅明国官员之妻子，就连小人之妻子，也禁止女真看到，

^①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186页。

^② 木刻榜文原件藏北京大学，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

藐视女真诸大臣，欺侮凌辱，用拳殴打，不许站在门口。明国的小官、无职之人，到达女真地方时，随便进入诸见勒、大臣之家，同起同坐，恭敬设宴款待。”^①

这三段材料，深刻地、科学地、有力地谴责了明朝昏君贪官劣将自比天高，贱视凌辱女真的横暴行为，尤其是榜文所说，明国“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止”，真是十分准确，异常生动，感人肺腑。

明朝君臣之可恶，还在于他们制定的对待女真“分而治之”的方针，“七大恨”反映了努尔哈赤及整个女真族的另一主要目标，就是反对明朝破坏统一女真的事业。“七大恨”的第二、四、五、六、七恨，虽然不够准确，根据薄弱，但它所讲的，都是明朝政府干涉女真事务，破坏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正义事业。明代两百多年的历史证明，女真只有克服涣散分裂状况，联合起来，统一起来，才能强大，不怕他族侵袭，摆脱明朝贪官劣将的盘剥，抵制明朝政府执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生产才能大发展，民族才能迅速发展、进步。而这正是明朝政府所担心的事，它一定要执行“犬牙相制”、“以夷制夷”的分而治之政策，为此不惜重金收买，巧言相骗，调兵遣将，武力镇压。从董山到王杲，从仰加奴、逞加奴到纳林布禄和布寨，以及对努尔哈赤的多方刁难甚至准备兴师问罪，都是一个目的，不许女真各部统一起来。分则弱，为明所喜，合则强，为明所惧，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努尔哈赤就是要用“七大恨”来表达他和全体女真坚决反对明朝政府的欺凌，坚决反对明朝阻碍女真统一目的，他要维护女真的正当权益，他要当统一女真各部的强大的女真国汗，仅此而已，并没有与明为敌，取而代之，入主中原的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4。

想法。

“七大恨”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目标，是正义的，是合理合情的，女真就是应该统一起来，这是时代的潮流，民族的希望，应予以充分肯定，应当支持的，它对激励女真奋发图强，英勇冲杀，艰苦创业，反抗明朝政府的压迫，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四节 萨尔浒之战

一、腐朽明朝欲灭建州

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征明，十五日抵抚顺。虽然抚顺只有守兵一千余人，城池也不坚固，但努尔哈赤并不挥军强攻，而是采用了诱骗之计。前一日，他遣人于抚顺马市传说：“明日有三千达子来做大市”，次日寅时，果来叩市，“诱哄商人军民出城贸易”，随即“乘隙突入”，轻取抚顺，降游击李永芳，接着又取东州、马根单等城堡台五百余，掠人畜三十万，编降民千户。二十一日，击败辽东总兵官张承胤、副将颇廷相来援之兵一万，杀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等官五十余员，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①

败报至京，“朝野震惊”。除了立即遣兵数千出关，加强防御以外，明廷决定调兵四方，大举征剿，议兵十万，议餉三百万，起用杨镐为经略，李如柏为总兵官，尅期进取。明朝政府这次发兵，并不仅仅是为了打退建州的进犯，将其逐回旧地，护卫辽阳、

^① 《明神宗实录》卷368；《满文老档·太祖》卷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沈阳，保证辽东安全，而是欲图诛戮“元凶”，彻底消灭建州。

建州攻下抚顺不久，同年闰四月，明辽东巡抚李维翰立即移咨朝鲜“申严防备”，待机合剿。咨文说：“今照建酋奴儿哈赤，猥以属夷，无端生事，计袭抚顺，公行叛逆，罪大恶极，法当诛讨。”^①六月，李维翰又移咨朝鲜驻兵义州，“遥为声援”，强调指出：“看得奴酋逆天犯顺，罪在不赦，业蒙皇上大奋赫怒之威，慨发三百万帑金，调募十数万精兵，特遣经略专主征讨。彼么麽小丑。曾足膏吾铁钺哉？”^②

征虏将军、辽东总兵官李如柏，讲得更加明白。他移咨朝鲜说：

“盖夷人之性，大类犬羊，负义忘恩，无所顾忌。近如建州夷人奴儿哈赤，数十年来受我天朝豢养之恩，许开市通贡，养成富强。及羽翼甫成，遂生心背叛，袭破我城堡，戕害我将士，此乃王法所必诛，天讨所不赦者也。今已有明旨，选精兵百万，勇将千员，分路并进，务擒元恶，梟首藁街，献之九庙，灭此而后朝食也。”^③

既说依法必诛，罪不容赦，又说要生擒努尔哈赤，梟首藁街，献与九庙，这样的处置，与四十四年前将其外祖王杲押解京师，献俘阙下，磔杀示众，完全一样。

如果说这些咨文都只讲到对“元恶”的惩治，那么，明帝批准颁发的赏格，包括的范围就更广了。

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经略杨镐奏上“擒奴赏格”，兵部尚书黄嘉善覆奏，万历帝批准，颁示天下及海西、朝鲜。“赏格”规定：

①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940页。

②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974页。

③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994页。

“有能擒斩奴儿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世袭。擒斩奴酋八大总管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世袭。擒斩奴酋中军、前锋暨领兵大头目者，赏银七百两，升指挥僉事世袭。擒斩奴酋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者，赏银六百两，升正千户世袭。以上应赏功级，皆自军卒言之。……北关金、白两酋，擒斩奴酋，即给与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其朝鲜擒斩，照中国例一体升赏。……”^①

“八大总管”，是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即“贵营捌兔（代善）、忙谷太（莽古尔泰）、阿卜太（阿巴泰），黄太住（皇太极），把布亥（巴布海）、羊羔儿太、汤哥太（汤古岱）、堵堵（杜度）”，“十二亲属伯叔弟侄”，指阿敏等人。中军韦都为额亦都，前锋阿堵为阿敦，书记大海是达海，女婿火胡里为何和里。^②这个“赏格”，既悬赏擒杀努尔哈赤，又要诛其子孙叔伯弟侄，已经是全家全族问斩了，还要屠杀其女婿、大将，连书记也未漏掉，所有大小头目都在劫难逃，这与一人犯罪，株连九族，十分近似。不仅如此，建州的一般女真，也要遭殃，因为赏格规定，叶赫金台石，布扬古（白羊古）贝勒，如果杀了努尔哈赤，他们就取代了其龙虎将军之位，就得到了建州敕书，占了建州地区。简而言之，大军征剿，既要将努尔哈赤家族斩尽杀绝，又要把整个建州（实即整个满族）全部消灭，这就是明廷发动萨尔浒之战的目的。

经过十个月的紧张筹备，兵、将、粮、马、甲、炮大体备办完毕，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薊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在辽

^① 《明神宗实录》卷578。

^② 《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47，转引自《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满州篇四。

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誓师讨敌。议定兵分四路，北路为开原铁岭路，以原任辽东总兵官马林为主将，下辖管开原副总兵事游击麻岩等官将，监军为开原兵备道僉事潘宗颜，岫岩通判董尔砺赞理，共二万余人，从靖安堡出边，由北进攻赫图阿拉，叶赫出兵二千相助。西路为抚顺路，以山海总兵官杜松为主将，保定总兵王宣及原任总兵赵梦麟为副，分巡兵备副使张铨监军，按察司经历左之似赞理，官兵二万余，由抚顺关出，从西进攻。南路为清河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管辽阳副总兵事参将贺世贤等随从，分守兵备参议阎鸣泰监军，推官郑之范赞理，兵二万余，从鸦骨关出边，由南进攻。东路为宽奠路，以总兵刘铤为主将，海盖兵备副使康应乾监军，同知黄宗周赞理，兵一万余，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领兵一万三千余从征，由亮马佃出边，从东进攻。四路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叶赫兵，共十万零三千五百余人，号称四十七万。杨镐宣布军令十四款，当场斩杀抚顺逃亡的指挥白云龙，枭首示众，密令各总兵自二月二十一日依限出边，“务期尽灭贼”。

十万大军，千员上将，枪炮数万，四路合击，真是军威雄武，声震山岳，看来小小建州难敌天朝，将遭灭族灭种之灾了。可是，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出师之前，明朝政府的腐朽，已经决定了明军必然惨败的命运。

以至高无上的皇帝明神宗朱翊钧而言，此人不文不武，因循苟且，晏处深宫，沉湎酒色，厌理国务，二十多年不上朝，开创了懒君的记录，并且他还爱财如命，广括公私财帛，仅以祸国殃民的矿税一项，每年就额外征银五百余万两，纳入内库。朱翊钧骄奢淫欲，挥金如土，营建三殿，仅采楠木、杉木于川、贵、湖广，就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御用袍服，岁费数十万。册立太子，只是采办珠宝一项，就下诏取银二千四百万两，而每年，“天

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①其子福王就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多达四百万亩。^②这样的昏君懒帝，怎能富国强兵，怎能处理消灭新兴后金强国的军机要务。

君如此，相又如何？此时明朝政府的中枢——内阁，正由著名庸臣方从哲独理阁政。此人才具平庸，柔懦媚上，“顺帝意”，“昵群小”，既无治政用兵之才，又缺乏匡时救弊奋发图强之志，也无识人任贤之眼，凡事敷衍塞责，苟且度日，当然也担当不起击败强敌巩固边疆的重任。

君昏相庸，政务必然废弛。官多缺员，六部堂上官只有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给事中、御史按制应有一百五、六十员，可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无掌印之官，十三道亦止五人，一身兼数职。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官，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與哀诉”，真是“职业尽弛，上下解体”。^③

万历年间，本来已是民贫国穷，矛盾激化，人心思乱，贪婪的明神宗还从万历二十四年起，遣派豪横太监，分赴各省，开矿收税，大兴“矿税之祸”。这批矿监税吏，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到处“树黄旗，揭圣旨”，“吮人之血，吸人之髓，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甚至“伐冢毁屋，剝孕妇，溺婴儿”，致使全国“公私骚然，脂膏殫竭”，“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④朱翊钧的暴行，激起军民公愤。从东北的辽河平原，到西南的云贵高原，自长城内外，到南海之滨，由边疆“夷寨”，到京畿重地，民变烽火到处燃烧，十余年间，大

① 《明史》卷82，食货六；《明史》卷240，《朱国祚传》。

② 《明史》卷77，食货1。

③ 《明史》卷218，《方从哲传》。

④ 《明神宗实录》卷331、376；《明史》卷237，《冯应京传》。

的“民变”多达数十起。

就全国而言，赋重役烦，国库空虚，军政废弛，兵变频仍，民穷财尽，人心思乱，而首当建州其冲的辽东，危机更为严重。要打仗，必须有兵，而且必须有精兵，有得到辽民支持的精兵。但是，此时辽东，既无精兵，更无受到人民拥护的好兵。辽镇马步官军原额九万四千六百九十三人，万历三十七年，实少二万二千人，除见在老弱，“其精壮不过二万有奇”。^①士兵之所以逃亡和衰疾残弱，主要在于官将的科派掊克。万历中期，兵科都给事中侯先春“阅视辽东”以后，上奏极言辽镇元气大损，总的是：

“今辽虏患频仍，民生涂炭，权归武弁，利饱囊中。狐假虎以噬人，狗续貂而蠹国。钱粮冒破，行伍空虚，民脂竭于科求，马力疲于私役，法令不行，将不用命，民不见德，远迩离心。”^②

他还具体地叙述了官将勒索士卒的详细情节：

“迩来私役百端，科索万状。即如镇静之夷马，开原之貉皮，清河、抚顺、宽奠、绥阳之人参皮张松果等类，无论其把持夷市，压买商贾，而牧放夷马，治料参斤，以至搬运百货，约用军士不止千名也。其采取木植，而清河等堡之军，昼夜皆居塞外。烧炒铁斤，而宽奠等城之军，终岁不得宁家。盖州之布帛，长奠之金银，海州之海参……如此之类，难以枚举，凡可谋利生财，无非军士取办，其包赔之苦，服役之劳，盖万万不可言也。如春发银五钱，秋收参一斤。（笔者按，人参一斤，市价为十两银左右。）春发银一厘或一卵，夏索鸡一支。……又以弓矢衣物鞍辔皮张等类，势给各军，而厚收其利，皮袄一则，索银七钱或五、六钱，皮

① 《明神宗实录》卷456。

② 《明经世文编》卷428，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

裤一则，索银四钱或三钱五分。披肩段一块，长不满尺，阔不及半，则索银一钱。……夫辽左之军，惟家丁选锋月粮一两二钱耳，更叠科尅，所余几何。逼之以不得不从之威，而挟之以不敢不扣之势，何怪乎营军之家十九之为悬磬也。既疲其力，又夺其财，则安望其出死力抗强虏哉。”^①

既是弱军，难御强敌，又是暴军，鱼肉人民。侯先春尖锐指出：

“大将军遣各将领，提兵屯驻各城堡，近者一月，远者两三月，或更番往返，岁以为常。每丁军阶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一家倾竭，蚕食别室，稍不如意，尽行毁虏。马蹄经过，鸡犬一空，弓刀悬门，人皆丧魄。且领卒将官，尽是婪秽之辈，非惟不知禁戢，又身先导之，被害者安所控诉乎。其丁军未必御虏，而先遭一强虏也。民谣有云：若遭大虏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盖深苦之也。”^②

辽东本已民穷财尽，兵戈时起，又加上矿税太监高淮的骄横跋扈，掊尅万端，更闹得天怒人怨，难以聊生。高淮从万历二十七年到辽东，至三十六年被辽东军民赶走，祸害辽民十年。他带领家丁数百，“自前屯起，辽阳、镇江、金、复、海、盖一带，大小城堡，无不迂回遍历，但有百金上下之家，尽行搜括，得银不下十数万，闾阎一空”。^③他“扣除军士月粮”，散发羸马给军，“收好马之价十倍”，又将“布鞭香袋米面诸货”，“无不派勒各营及民间”，勒收高价。^④当时辽东军民编了一首民谣，刻画高淮的贪婪和狠毒：“辽人无脑，皆淮剗之。辽人无髓，皆淮吸

① 《明经世文编》卷428，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

② 《明经世文编》卷428，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

③ 《明经世文编》卷436，朱廣：《论辽东税监高淮揭》。

④ 《明史》卷305，《高淮传》。

之!”^①这种“生命戕于鞭敲，脂膏竭于咀吮，十室九空”，“辽民极困”，“痛心饮血”的局面，^②怎能使军民一致，齐心抗敌！

君昏相庸，国穷民贫，赋重役烦，官将掊克，民不聊生，本已决定出师必败，再加上主持征伐的经略，任用非人，更加速了明军的覆灭。由部会推，经帝任命的经略杨镐，原任“经略朝鲜军务”要职，万历二十五年率兵四万，围攻岛山，倭将行长领兵来救，镐大惧，狼狈先奔，敌军追击，明兵大败，死亡二万余人，“辎重多丧失”。时人评述说：此战，“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③这个杨镐，还不知羞耻，隐瞒败状，“诡以捷闻”，为帝褒美，遭人揭发后，神宗震怒，欲令处死，后免死罢任。这样一个贪生怕死丧师辱国诿败冒功的劣材，竟被文武百官捧为克敌制胜安邦定国的大帅：从一个闲官，提升为兵部左侍郎兼右金都御史，荣任辽东经略，怎能不贻误军机。

领兵冲杀的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将官，多系“婪秽之辈”，爱财如命，畏敌如虎，尤其是对新兴建州的八旗劲旅，更是久闻威名，谈虎色变。早在万历二十六年，努尔哈赤还只是辖领建州女真的一部之长时，号称骁勇善战的明朝副总兵李如梅，就对建州兵的精锐感到恐惧，他郑重其事地警告朝鲜国王说：“此贼精兵七千，而带甲者三千，此贼七千，足当倭奴十万。……虽以十人来犯境土，即报辽东而求救。西北虽有达子，皆不如此贼，须勿忽。”^④以区区十人之数，就敢进犯边境，致使拥兵上千的各城游击、参将，张惶上告总镇，乞求援兵，可见建州兵之精壮，锐不可挡，也充分反映出辽东边将的胆怯畏敌思

① 《明经世文编》卷467，宋一韩：《直陈辽左受病之原疏》。

② 《明神宗实录》卷429。

③ 《明史》卷259，《杨镐传》。

④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476页。

想。随着建州的迅速扩展，明将对八旗军更是异常畏惧。比如，历任宣府、延绥、大同总兵官的麻承恩，是将门之后，早年“更历诸镇，以勇力闻”，万历四十年辽事紧急，以原官入辽，听辽东巡抚、镇守总兵官调遣。这位专任“援辽”的总兵官，当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抚顺失陷，辽东总兵官张承胤率兵往援时，竟率本部藉口“调防清河”而匆匆逃走，致使张承胤兵败被杀，全军覆没。七月，八旗军攻清河，麻承恩又以开原檄调为名，领军离阵，“致清河将吏一时陷没”。^①

万历四十六年六月，江西道御史薛贞上奏说：“近者杨镐疏中言，调到援兵，皆伏地哀号，不愿出关。又传塘报帖言，钻刺将领，见奴氛孔亟，都哭而求调。臣闻之不胜愤懣。”^②堂堂七尺之躯，以上阵厮杀斩入首级为专任的援辽将官、士卒，竟然伏地痛哭，乞求改调，不敢出关迎战，如此的畏敌如虎、贪生怕战，实为罕见，难怪御史“闻之不胜愤懣”了。

赋重役烦，国穷民贫，君昏相庸，帅劣将怯，士气不振，人心思乱，这样腐败的明朝政府，怎能与新兴后金相争，这样松弛胆小的弱军，怎能打败兵精马壮的八旗劲旅，萨尔浒之战，只能以明军的惨败而告终。

二、新兴后金大败明军

萨尔浒，位于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今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初二日，八旗军大败明西路杜松军于此，随即击破明北路、东路军，史称“萨尔浒之战”。

^① 《明神宗实录》卷573、574。

^② 《明神宗实录》卷571。

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会集四路官将，告天誓师，欲于二十一日分路出击，因十六日天降大雪，跋涉不前，改于二十五日兴师，定于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十万大军，战马成群，火器数万，声势浩大，怎能掩人耳目，因而“遐迩共闻”，“师期豫泄”。^①一向重视侦察敌情善于用间的努尔哈赤，对明军的动态早就了如指掌，全国皆知大战将临。与二十六年前九部联军三万来攻相比，那时，众寡悬殊，建州兵将“皆失色”，十分惊恐，军心不稳；现在，虽然面对号称四十七万的天朝“圣兵”，敌众我少，八旗劲旅却镇静自若，从容应战。出现这样大的变化，根本原因有二，一为保家保族，必战必胜。兵法所云：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满族正面临灭种族之灾，不打退明军的进攻，努尔哈赤家族固然要斩杀无遗，八旗官将士兵也在劫难逃，整个满族就要被彻底消灭，至少是大部诛戮，残存少数“顺民”，也必然要再遭明帝奴役，重新陷入明朝政府压迫女真的苦难深渊。这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是反对明朝民族压迫，保护本族生存，争取继续前进的决定性一战，反压迫、求生存、图发展的战争正义性质，激励了广大满族人民拼死抗敌的强烈斗志，坚定了他们必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对大军压境无所畏惧。

另一根本因素是，后金正处在兴旺发达迅速前进的勃兴阶段。三十六年以前，女真部落林立，贫穷落后，饥馑频仍，惨遭明臣欺凌鱼肉，社会停滞不前，人丁稀少，度日艰难。

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经过三十六年的南北征战，由一个微弱小部，发展为辖地数千里，人口上百万的强大的后金国，分散的几百个女真部落合而为一，又吸收汉、蒙人员，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举国上下，练兵习

^①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海滨野史：《建州私志》。

武，竟图进取，一派兴旺发达景象。八旗劲旅，取抚顺，下清河，阵斩辽东镇守总兵官张承胤，所向无敌，因而对与明交锋，满怀信心，沉着应战。

战争的正义性质，新兴国家、新兴民族的强大活力，八旗士卒誓灭强敌的坚定斗志，为击败明兵奠定了基础。而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又为重创敌军提供了有利条件。努尔哈赤身经百战，熟谙兵法，善于发挥所长，克敌所短，以少胜多。明军虽然四路进发，但又不完全是分散兵力，而是约定于二道关前会师，再集中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如果建州分军迎战，很难取胜，那时明兵会合，全师进击，赫图阿拉就危险了。努尔哈赤果断决定：“恁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①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撤回各屯寨士卒，只留少数兵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主要迎战明西路杜松军。

明军枪炮众多，利远攻，不便于近战，后金兵使用弓矢刀剑，长于骑射，利突袭决胜，不利于缓慢厮杀。明兵远来，人生路疏，粮饷难继，建州则生长于斯，险易尽晓，行动便捷。努尔哈赤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所长，尽量利用敌军之短，他不打列阵通报姓名、摇旗呐喊的正规之战，而是设下埋伏，诱敌人圈，突然奇袭。正当杨镐大张声势调兵遣将，行将出征时，努尔哈赤早已胸有成竹，“调度安排，机构周密”了。^②

明军四路，以西路为最精锐。西路军主将杜松，乃将门之家，其兄杜桐，由末弁，以军功，升至大帅，历任延绥、宁夏、保定总兵官，授右都督，史称其屡败蒙古，“积首功一千八百，时服其勇”。杜松，“勇健绝伦”，由舍人从军，久历戎阵，遍体

^① 海滨野史：《建州私志》。

^②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鳞伤，“刀箭瘢如疹豆几十朝时，间有红处，乃良肉”，屡立军功，升至总兵官，历镇延绥、蓟州、辽东、山海关，威名远扬，建州亦知其勇，“酋素畏杜，称曰太师”。更为难得的是，杜松还是一位廉洁大将，秉性清高，不巴结上司，不笼络权贵，他在奉命援辽师出潞河时，明告送者说：“杜松不识字武夫，惟不学读书人贪财怕死耳。”^①但是，此人性急“尚气”，刚愎自用，图功心切。按照经略和各路将官的决定，三月初二日会师二道关，西路军应于三月初一出抚顺关，而杜松“欲贪首功”，又藐视建州，骄傲轻敌，提前于二月二十九日出边，日驰百余里，第二日，三月初一，即抵浑河。天色近晚，水深流急，人马渡河，溺死数十骑，诸将恳请留宿，监军张铨谏止，总兵官赵梦麟劝阻，杜松不从，挥军急渡，“水深没肩”，士卒“没于河者几千人”，车营枪炮辎重皆遗岸后。全军拥挤过河，飞奔前往，进入伏中，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劲旅，以两倍于敌的兵力，勇猛冲杀，在萨尔浒迅速消灭了西路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②。随即转攻明北路军。马林率兵于三月初一夜，进驻尚间崖，离萨尔浒三十余里，闻听杜松兵败，士卒大哗。第二日，两军交战，明兵施放枪炮，八旗军奋勇奔袭，很快就击败敌军，马林领兵万余提前逃走。后金军又回过头来迎敌刘铤部队。

刘铤，为勇将虎子，其父刘显，少年家贫落魄，曾自杀未死，投笔从戎，屡立军功，由一名小卒，升至都督同知、总兵官，历镇广东、狼山、浙江、贵州、四川。刘铤，初因父功，荫为指挥使，“勇敢有父风”，所使镔铁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风”，列骏马五十余，跳跃其间，“来往轻于舞蝶”，因

① 《明史》卷239《杜松传》；《明经世文编》卷502，宋懋澄：《东征集略》；《明神宗实录》卷580。

② 《明史》卷239《杜松传》；《明神宗实录》卷58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功先后升任守备、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久镇四川，后因“军政拾遗罢”，万历四十六年，以原官起用。刘铤一向依靠川贵土司士卒和川兵，累立军功，因而一再申请，征调四川、云南、贵州“各土司马步兵”二万余，“皆本官统驭旧人，矫捷善战”，但兵部覆议，只准调“汉土官兵”九千余人，而且战前并未全到。刘铤颇有将才，又久经战阵，熟谙兵法，老成持重，行军之时，规定人人皆持鹿角枝，遇敌则置鹿角于地，“绕营如城”，“转瞬成营”，“虏骑不能冲突”，己兵“得暇列置火具，虏前队毙于火攻，则不能进”，己军乘间出劲骑格斗，疲则还营少休，不怕遭遇敌人埋伏，不怕敌军突袭。这样一员智勇双全之将，却因与杨镐有隙，“自前不相好”，受杨排挤，“必要致死”，指定他带东路军，仅万余人，从宽奠出，道路遥远险恶，“重岗叠岭，马不能列”，粮饷不继，朝鲜从征兵一万三千，亦疲弱怯战。三月初四日，军至阿布达里岗，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这时，努尔哈赤早已遣派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大臣和八旗官兵，前来迎战，“设伏于山谷”。初五日晨，后金遣明降官，持所得杜松的“号矢”（号矢即令箭，经略授总戎，“以驱策偏裨者”），驰至刘营告急说：杜松已抵“酋城”，“深入敌疆，虞攻之不继，敬遣材官某，请将军会师夹攻。”刘初犹豫，继而“心动”，恐杜“独有其功”，令诸将拔营前进，行二十里，耳听炮声隆隆，以杜将先入城，则己“宿名顿坠”，令士卒尽弃鹿角，急速前往，队不成列，进入伏中，代善挥令八旗劲旅突起冲刺，斩杀刘铤，明军措手不及，全军覆灭，朝鲜元帅姜弘立率众降金。①南路军李如柏，因杨镐知悉杜、马二军惨败，檄令回师，仓皇撤退。明兵四路出击，三路败

① 《明史》卷247，《刘铤传》；《明神宗实录》卷580；《明经世文编》卷502，宋懋澄：《东征纪略》；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2；茅瑞征：《东夷考略》；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3025、3026页；李民赞：《播中目录》。

没，四总兵战死，阵亡道员、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二万八千余匹、头，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二万件。^①闻名于世的萨尔浒之战，以明军彻底失败而结束。

萨尔浒之战，是明满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军心振奋，器械充足，战马成群，俘获众多，军威远扬，为取开原，灭叶赫，下辽沈，奠定了基础，而明国则君惊臣恐，官兵畏战，人畜火器损失巨大，兵无斗志，陷入了被动困窘的逆境。

天命四年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开原。开原东邻建州，西接蒙古，北与叶赫相连，是辽阳所恃“以断夷虏之路”，联络北关的军事重镇。开原是“古之黄龙府而元之所谓上都”，城大且坚，军民十余万，“物力颇饶”，金银财帛数百万。^②总兵官马林镇守，火器众多，照说是可以抵挡后金军进攻的。但是，萨尔浒惨败，严重影响了士气，“人心不固，兵气不扬”。^③加上，此时摄开原道事的推官郑之范，一贯贪婪横暴，盘剥军民，“赃私巨万，天日为昏”，以致“素失民心”。此人既贪财，又怕死，四路出征时，郑是南路李如柏部的“赞理”，见事不妙，随李狼狈逃回，眼看开原危急，却置敌不顾，继续尅扣军饷，勒索士民。备御罗万言以高价买到军马，到郑处支领草豆饲料，“并无升束”，一日饿死战马二百四十九匹。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月不给，各军衣物尽变，马倒人逃”。上万马匹，缺少饲料，

①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明经世文编》卷488，徐光启：《辽左陆危已甚疏》。

② 《明神宗实录》卷58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③ 《明神宗实录》卷583。

散放牧于百余里外，“贼至猝不及收”。因此，八旗军轻取开原，“易如拉朽”，斩杀马林等官将。^①紧接着，七月二十五日，后金军攻克了铁岭，生擒蒙古喀尔喀部名酋斋赛。努尔哈赤班师回京，略事休整，八月二十一日，又领军灭了叶赫，杀其城主金台石与布扬古贝勒，编户万余，大胜而归，后金军威，声震天下。

^① 《明神宗实录》卷58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第二编

(1621——1626)

第一章 进驻辽东

第一节 辽沈之战

一、坐失良机

后金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 1619), 努尔哈赤于三月在萨尔浒大败明兵, 六月取开原, 七月下铁岭, 八月灭叶赫, 所向无敌, 进展神速。可是, 从此就按兵不动, 直到天命六年三月才进攻沈阳、辽阳, 足足有二十个月之久, 没有发动大的进攻。出现这样的情况, 并非由于汗、贝勒看到明经略熊廷弼调度有方, 不易攻取, 因此明智地暂时克制, 集军待变。而是号称“英明汗”的努尔哈赤, 在此时刻, 不够英明, 不太聪睿, 决策上出了差错, 贻误了战机, 延缓了君临全辽的时间, 对以后攻取辽阳、沈阳带来了不少困难。

天命四年八月灭掉叶赫以后的几个月里, 是努尔哈赤挥师西征, 攻取沈阳、辽阳的最佳时间, 这时明国的窘困局面, 为他成为辽东王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无需动用巨大的兵力, 不必花费多少代价, 不会遇到强有力的抵抗, 就能轻取沈阳、辽阳, 可以说

是乘胜前进， 势如破竹， 易如反掌。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因素。

其一，明廷惊慌失措，调度无力。萨尔浒之战明兵的惨败，开、铁的失守，使得“朝野震动”。身肩军政要务的庸相方从哲，拿不出什么有力的对策，只是再三呈述“东事危极，京师万分可虑”，“京师之危，真在旦夕”，恳请神宗视朝， 集臣会议军务，发给内帑，委任新人。^①昏君朱翊钧，听凭百官跪奏， 藉口“头目眩痛，心腹烦懣”，不上殿理政，不召见群臣， 还指责户部拖欠金花银两，又诡称“内库空虚，搜括无遗”，拒绝发放内帑。^②这样一个醉生梦死腐朽荒淫的老皇帝， 配上一个顺从帝旨的庸相，怎能制定出拯救辽东危局的大政方针，怎能应付瞬息万变的军机要务！

其二，残兵败将， 畏敌如虎。 万历四十六年三月萨尔浒之战，四路出兵，三路覆灭，虽然官府多方招聚，到六月，勉强凑有“败残新集士卒四、五万人，皆有名无实”，开原之陷，损失又逾万数。七月铁岭失陷，八月叶赫被灭，明兵更加怯战思逃。八月底，辽东经略熊廷弼题报辽阳、沈阳情形说：

“虽有总兵李如桢等专守沈阳， 帮以河西冉光荣之兵，共有万计，而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总兵贺世贤专守虎皮驿，应援辽沈，兵虽数千，而堪战者不过二千四、五百人。总兵柴国柱专守辽阳， 虽有川兵及残兵零杂之众二、三万人， 然皆无甲无马无器械， 既不能战， 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 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 辽至今日，可谓无兵。”^③

① 《明神宗实录》卷580。

② 《明神宗实录》卷580。

③ 《明神宗实录》卷585。

熊廷弼后又补充说，大败之后，无车无牛无脚夫，没法运送粮草，致使全军严重缺粮，兵仗器械亦荡然无存，“军无片甲，手无寸铁”。^①沈阳重镇，能战之兵只有一、二千。辽阳要城，残兵二、三万，且无甲无马，无将无粮，“可谓无兵”。一向被誉为兵强马壮的辽东军事重镇，竟落得如此地步，真是可悲。兵少将缺，粮饷不继，守具缺乏，自然更加剧了将官的怯战情绪。他们逗留不前，战守不力，畏敌如虎，一战即溃。就连熊廷弼推崇为大将的甘肃总兵官李怀信，虽然久经沙场，屡立军功，史称“勇敢有谋”，“威名著河西”，然当其委任为援剿总兵官，率师赴辽时，尽管经略连上奏疏，特地奏请皇上命李急行出关，帝令立即赴援，“兵部马上差人守催”，限于九月初八日出关，十二日抵辽阳，可是，限期已过，李怀信却仍然安坐甘肃，且投文兵科，要钱要马要兵，寸步未行，究其内心，“不过惮于援辽，另寻枝节”而已。^②号称勇将、大将之人，尚且如此，其他将官之贪生怕死临阵溃逃，更是不言而喻了。

其三，士气不振，人心惶惶，军民思逃。萨尔浒之战，十万大军数日尽没，开原坚城，顷刻覆灭，在心理上给予辽东军民沉重打击，兼之旧经略杨镐昏庸笨拙，束手无策，领兵将官畏敌如虎，使得辽民心惊胆战，昼夜不安，一有风声鹤唳，便仓皇逃散。早在万历四十七年六月末，开原刚一失陷，中固、铁岭、懿路、汛河数城，“妇女老幼，空国而逃”，永奠、新奠、大奠、礮阳、孤山、抚安、柴河等数十堡，不战自弃，“沈阳之民又逃，军亦逃矣。”^③七月初一，大学士方从哲根据辽东经略、监军的题本，上奏说，“铁岭、沈阳人民，逃窜几空，辽阳之危，只在旦

① 《明熹宗实录》卷1。

② 《明神宗实录》卷586；《明史》卷239，《李怀信传》。

③ 《明神宗实录》卷583。

患，真剥肤不足喻其急。……廷弼自以势不可为，力不能支，请皇上早作区处，其情亦甚迫矣。……”^①

正因为辽沈危在旦夕，难御后金，熊廷弼苦心思索，找不到救急良策，无可奈何，于九月初提出了放弃沈阳，专守辽阳的建议，上奏朝廷说：“自奴陷北关以来，人心逾溃，沈阳空垒，独力难支。据道臣韩原善、阎鸣泰及该城官生人等，咸欲归并辽阳，还兵自保，揆之人情事势，实不得不然。退缩自固，羞愤何言，倘邀皇上之灵，守得辽阳，俟明春二三月间，大兵厚集，再图恢复。”^②

这个方案，并不可取，辽阳离沈阳只有一百二十里，后金军进入空城沈阳之后，一天即可包围辽阳，几万残兵败将，怎能抵御八旗劲旅，这一计策，实属下策，可谓无策，但既然缺兵少将，就只有走这条绝路了。

综上所述，可以绝对肯定地说，在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取开原、八月灭叶赫以后的几个月，是后金军夺取沈阳、辽阳进驻辽东的最好时间，不需要花费多大力气，就可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努尔哈赤并未挥师西征，而是安坐建州，按兵不动，错过了轻取辽东的良机，一年半以后，只是在率军猛攻、伤亡累累的情况下，才将沈阳、辽阳打下，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重大代价。

二、挥军猛攻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军机兵情瞬息万变，努尔哈赤本来可以

① 《明神宗实录》卷586；《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47，引自《明代满蒙史料》
《明实录抄》。

② 《明神宗实录》卷586。

乘胜进军，轻取辽沈，但他没有率师继续前进，停了一段时间，这样一来，战守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明国辽东新经略熊廷弼整饬兵备加强边防，阻碍了后金的进兵。

熊廷弼，字飞百，湖广江夏（武昌）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廷弼身長七尺，有胆有识，才华横溢，秉性刚直，不畏权贵。他虽然身列文班，却因边患孔亟，积极钻研兵法，苦练骑射，连清修的《明史·熊廷弼传》，也赞其有“盖世之材”，“善左右射”，实为文武双全之能臣。万历三十六年，廷弼巡按辽东，覆勘原任辽东总兵官宁远伯李成梁与巡抚赵楫丢弃宽奠等六堡新疆八百里之事，查明二人弃地驱民之过，疏劾其罪。廷弼早就看到建州发展迅速，必为大患，连上章疏，大声疾呼，奏请核边地，兴屯田，饬营伍，增士卒，联络南关北关，所言皆中时弊。^①后因事与某官相讦，听勘归田。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初萨尔浒惨败以后，因熊熟悉边事，吏部等衙门连疏奏荐，于三月末特予起用，升任大理寺左寺丞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宣慰辽东，六月又擢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代杨镐任辽东经略。

熊廷弼面对敌强我弱、危在旦夕的险恶形势，毫不畏惧，在大学士、兵部尚书等达官大僚畏敌成疾纷纷引病告退的浪潮冲击下，他毅然挺立，逆流而进，力挽狂澜，担起了拯救危辽的艰难重任，在短短的一年里，彻底扭转了危局，稳定了辽东，巩固了边防，增强了军力。这个奇迹之所以能够出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熊廷弼不畏艰险，亲自巡视边境城堡，收拾残局。廷弼尚未出京，开原失陷，刚出关，铁岭又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他虽然仅仅带了几百名疲弱士卒，却

^①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明神宗实录》卷455、456、459。

并不畏难而退，反而兼程前进。八月刚到辽阳，即令金事韩原善往抚辽阳，但韩“悼不敢行”。继命金事阎鸣泰往，阎至虎皮驿（沈阳城南），不敢前行，“恸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历，自虎皮驿，抵沈阳，复乘雪夜赴抚顺，总兵贺世贤以抚顺离建州太近，恐有危害，力行谏阻，廷弼泰然自若地说：“冰雪满地，敌不料我来”，遂鼓吹而入。时兵燹之后，数百里无人迹，廷弼祭悼死难兵将士民，招流移，缮守具，分置士马，耀兵奉集，相度形势而还，这对稳定民心，振作士气，起了很大作用。因而“人心复固”。^①几个月以后，为了巩固东南防务，廷弼又从奉集至威宁，历暖阳、宽奠，缘鸭绿江岸抵镇江城，复迂道看险山旧边，转渡夹河，登凤凰山寻莫利支屯兵处，再从镇夷、镇东、甜水站而归，往返十三日，行走千余里。^②

其次，确定了正确的抗敌方针。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熊廷弼在巡视边城观察形势以后，上呈《敬陈战守大略疏》，提出“以守为稳着”，“守正所以为战”的根本战略方针，奏请集兵十八万，马九万匹，分驻暖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及镇江六处险要地方，每路设兵三万，置裨将十五六员、主帅一人，画地而守，无警就地操练，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相应援，辽阳设兵二万，策应四方。这套战略布置，是十分正确的，发挥其长，克服其短。当时，后金军善骑射，士气高，惯于猛冲猛打，交战之时，万马飞驰，“铁骑冲突，如风如火”，瞬息而至，箭射刀劈，敌不及防，片刻即亡，^③萨尔浒之胜，即系一例。但他们缺乏火器，长于野战，短于攻坚，遇逢深堑宽濠高墙坚城，骑兵难以施展，只有使用计策，诱敌出战乘机歼灭，或纵间入城，从中破

①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熊襄愍公集》卷8。

② 《明神宗实录》卷596。

③ 《明熹宗实录》卷16。

坏，开门内应，趁乱而入。开原之失，就是智取的成功。明军大败之后，斗志不旺，弓箭不佳，但火器众多，凭借坚固城池，据险扼守，以逸待劳，便可克服不善野战的短处，发挥枪炮的威力，依靠人多地广财源丰富的优越条件，打一场比资源、拼物力、人力，以守为主，由守而战的持久战，就能抵消敌之长处，暴露对方弱点，发挥自己优势，挡住后金军进攻，守住城池，稳定战局，再伺机而进。

其三，征兵调将，赶制器械，修建城池。熊廷弼屡上奏疏，多方催督。征调川浙土兵，招募各方勇士，很快就改变了兵少又弱的状况，从区区二、三万败残之卒，演变为拥兵近二十万的庞大军队。原来粮草奇缺，士卒饥疲，他督促部属，征集牛车三万余辆，“昼夜赶运”，“军中始有粮草”。萨尔浒惨败之后，“军无片甲，手无寸铁”，熊廷弼奏发京城大炮数千位，又增造大炮数千，枪炮数万，并打造弓箭，赶制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辆安灭虏炮二、三位，以及“火箭火轮之类，无所不备”，自此军中“始有弓矢”，“军士始有攻守具”。^①同时，大修城池，辽阳墙垣，“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外挑濠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二丈，濠外复筑大堤渚水。沈阳亦修缮加固，“城颇坚，城外浚壕，伐木为柵，埋伏火炮”。城外挖有与人身相等的陷井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桩，陷井之后挖有四道大壕，插满尖木桩，又树立用一、二十人抬的大木头修筑的柵栏，沿内壕排列楯车，每车安置大炮二门、小炮四门，两车中间又放置大炮五门。奉集堡、虎皮驿亦开河建闸修缮坚固，时人称四城犹如“金汤鼎峙”。其他要地，亦各各加固。^②

与此同时，整军纪，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

① 《明熹宗实录》卷2；《熊襄愍公集》卷4。

② 《明熹宗实录》卷3、7、8；《满文老档·太祖朝》卷19。

节官兵，诛贪将陈伦，劾罢庸懦怕死的辽东镇守总兵官李如楨。

在熊廷弼精心安排全力奋斗的影响下，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兵、马、将，粮、火器、军械无所不备，城池坚固，人心安定，士气有所振作，令严法行，“守备大固”，辽东转危为安了。^①后金国汗努尔哈赤及诸贝勒，见此情形，深知难以轻易取胜，只好按兵不动，待机而行。

明国本可利用这一难得的好机会，继续增强实力，巩固边防，但明王朝腐朽已极，竟将赤胆忠心有勇有谋的熊廷弼换掉，自毁长城。尽管熊廷弼竭尽全力保卫辽东，功高过人，但他办事严格，求成心切，性格刚直，不徇私受贿，不逢迎权贵，不受压于科道，招致了一大批夸夸其谈的言官不满，惹怒了因循苟且的文官武将，内阁兵部对彼亦颇有意见。御史顾造首劾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尚方之剑，逞志作威”。御史顾三元接着上疏，弹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言不罢其任，“辽必不保”。御史张修德更诬其破坏辽阳。虽然廷弼连上奏疏辩解，并伤心地说：“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但朝议仍定，于泰昌元年（1620）九月，罢革廷弼，听候勘问，改以辽东巡抚袁应泰继任。^②

袁应泰，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任知县、工部主事、兵备参议、右参政，按察使和辽东巡抚，精敏强毅，善于治政，但他短于兵事，持法太宽，对熊廷弼所作，“多所更易”，又广招归降蒙古，这正为后金遣人诈降用间提供了有利条件。

努尔哈赤侦悉明朝经路易人，新官不谙兵法，决定大举征明，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日，亲率大军出发，十二日晨到达沈阳，在城东七里河的北岸造木城屯驻。此时，沈阳

① 《明熹宗实录》卷2、3、7；《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② 《明熹宗实录》卷1。

有贺世贤、尤世功二总兵官，各将兵万余，总兵官陈策、董仲揆引川浙兵万余自辽阳来援，守奉集堡总兵李秉诚、守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领兵三万来援，就军队总数而言，双方不相上下，兼之沈阳城坚濠宽堑深，枪炮众多，据城死守，本来是不会轻易攻陷的。努尔哈赤知悉单凭硬攻，难以奏效，战事拖延，辽阳明兵大批来援，更为不利，遂采取了智取与力攻同时并用快速解决战斗的方针。首先是猛攻沈阳，十三日，先派赢卒挑战，诈败诱敌。行武出身的勇将明总兵官贺世贤，见敌疲弱，率家丁千余出城冲杀，宣称必“尽敌而反”。努尔哈赤一见敌入伏中，下令包围，“精骑四合”，贺世贤兵败返回，身中四矢，城中闻贺败归，军民大惊，“汹汹逃窜”，诈降蒙古乘机内应，砍断吊桥，截断归路，世贤战死，后金军乘势猛攻，尽歼守兵，攻下沈阳。努尔哈赤立即挥师迎战明川浙兵，陈策、董仲揆率兵死战，以万余对五万之敌，杀敌五千余，力竭而死，全军覆没。朱万良、姜弼起初畏战不救，后仓皇接战，一战即溃，遁回辽阳。一日之内，努尔哈赤率军败敌数万，攻下沈阳要镇。^①

努尔哈赤屯兵五日，论功行赏，将所获人畜分于官兵，先行押回建州。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召集八旗贝勒大臣，商议去向。他提出：“沈阳已拔，敌兵大败，可率大军乘势长驱，以取辽阳。”诸贝勒大臣一致拥护，议定，即统军前进，至虎皮驿，明军民俱弃城逃走，遂于此安营立寨。

努尔哈赤决定乘胜进取辽阳，固然是十分正确的，但这也表明，在此之前，他没有制订出迅速夺取辽、沈的全盘计划，不然就不会打下沈阳足足五天之后，才集八旗贝勒大臣议定下一步行动，而这一失算，又放过了轻取辽阳的良好战机。

^①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沈阳一失，辽阳真是危如累卵。巡按张铨遣人飞奏明廷说：“辽之战将劲兵，半萃于沈、奉，半分应援，见今辽城，兵不满万，皆真、保、山东之兵，身无介冑，器不精利。……今贼克沈阳，无数枪炮火药，皆入其手，万一用以攻城，更可忧也。”“辽阳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断绝，胡骑充斥。”军民逃散，兵不满万，如果努尔哈赤于十三日破沈阳后，不休整，立即挥师西南，十四日围辽阳，一天之内，即可轻取。但努尔哈赤计未出此，耽误了五天，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此机，飞速征调援军，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五日之内，凑集了十三万大军。

此时，论兵数，明多于金。论地形，明防守，得地利，辽阳城墙十分坚固，又引入太子河水，灌满护城深壕。熊廷弼在任时，曾准备了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是兵部“协理戎政尚书”黄克缙专募能铸西洋吕宋大铜炮的高超工匠来京铸造的，最重的三千余斤，其余亦重千余斤、二千余斤，一发可击毙敌兵数百人，威力很大。^①十三万大军，战将数百员，枪炮众多，城坚壕深，防守相当严密。《武皇帝实录》卷三叙述辽阳守备情况说：“（明官）放代子河水于壕，塞其西闸，内列火器于城上，排兵四面，守御甚严。”朝鲜文献甚至记述了后金军望城生畏的情形，指出：“（八旗军队）至辽阳，望见城池险固，兵众甚盛，虏皆意沮欲退。”^②如果明经略袁应泰熟谙兵法，调度有方，据城死守，辽阳是不会轻易失落的。设若努尔哈赤不讲策略，一味硬攻，以弓矢对枪炮，用血肉之躯强登高城，伤亡必大，难以克城。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争中，统帅决策的正确与否，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

^① 《明熹宗实录》卷9。

^②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3147页。

努尔哈亦在这样严重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非凡的军事才干，夺取了胜利。首先，他针对士卒畏难欲退情绪，严正宣布必战死战的决心，声色俱厉地谕告众人说：“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立即“匹马独进”。^①这样斩钉截铁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对八旗官将兵卒发挥了巨大影响，使他们转怯为勇，知难而进，军心大振，为打败明兵攻取辽阳奠定了精神基础。

其次，发挥所长，克服所短。后金军在屡败明兵的战争中，缴获了大批枪炮和匠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火器和燃放枪炮的人员，但毕竟数量太少，且多系轻型铳炮（重炮或被明人埋没，或缺乏匠人不能燃放），单靠这些，攻不下坚固的辽阳城。因此，努尔哈亦决定发扬骑射野战的长处，尽量诱使明兵出城入伏，合歼敌军，同时遣派“细作”，混入城内，待机响应。三月十九日，他派遣少数人马横渡太子河，引诱敌人，果然明军中计了。明辽东经略袁应泰，本来已与诸将议定，“畏敌多，主守”，但见后金马兵太少，“其骑可数”，遂因“见贼少而主战”，亲督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五总兵，率兵出城五里，在教场扎营。明军原已畏敌，至是又忽守忽战，“军心不定”，努尔哈亦乘机指挥军队“奋力冲杀”，“明兵大溃而走”，“军败多死”，追杀六十里，至鞍山始回。另一营明兵从武靖门出，亦被后金军击败。第二日，努尔哈亦亲自督促兵士奋勇猛攻，鏖战多时，明兵又败。第三日，后金军乘胜进击，原先派入的“奸细”，从中内应，攻下辽阳，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②

努尔哈亦带领八旗贝勒、大臣，进入城内，驻于经略衙门，

①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3147页。

② 《明熹宗实录》卷3、1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武皇帝实录》卷3；《明史》卷259《袁应泰传》。

谕令汉人归顺，辽河以东的宽奠、镇江、汤站、武靖营、长静、长宁、三河、十方寺、永宁、镇夷、威远、孤山、甜水站、草河、奉集、平虏、蒲河、懿路、鞍山、海州、耀州、盖州、熊岳、复州等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①

这两次攻城，后金虽因先前误失轻取良机，不得不挥军猛攻，伤亡累累，费了很大力气，但毕竟是胜利了，打败了明军二十万，取了辽阳、沈阳两大军事重镇及辽东最富之城，得获的金银财货堆积如山，掠夺巨量人口牲畜，得了大批火器（明人说，丢失火器两万），尽占辽河以东的广阔土地，努尔哈赤登上了“辽东王”的宝座，开始了进驻辽沈地区的新局面。

第二节 西征广宁

一、按兵不动

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三取沈阳，二十一日下辽阳，八旗军进驻辽河以东十四卫广阔地区，后金汗、贝勒忙于遣派士卒，分戍各地，清查丁口，征收赋税，没有乘胜西征，攻取广宁，席卷河西州县，在决策上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失去了轻取广宁的好机会。

辽沈惨败，大军被歼，城池失陷，明国官将畏敌，民无固志。辽阳一失，“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②明朝帝王将相文武百官，拿不出应变办法，找不到抵抗金兵固守河西的出路，严重影响了河西十一卫的防

^① 《武皇帝实录》卷3。

^②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守。他们惟一的希望是守住广宁，拖延时间，再集军应战。

广宁，本系辽东都会，巡抚、总兵、镇守太监的官署皆设于此，河西十一卫中，以广宁命名的就有广宁卫、广宁中卫、广宁左卫、广宁右卫、广宁右屯卫、广宁后屯卫、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广宁前屯卫等九卫，其中广宁卫、广宁中卫、左卫、右卫、皆在广宁，一向设有重兵驻防。但是，开战以来，明军群集辽、沈，“河西兵马之精劲，及糗粮器具之转输，无一不为河东蝼蹶从事”，辽沈失守，河西财力兵力俱尽。四月初三，辽东巡抚薛国用上奏说，现今“虚拥空城”，“欲募兵，而居民俱窜”，“欲措饷，而帑藏如洗”。^①堂堂辽东数千里的军政重镇广宁，“存城之兵，不满千人，又半系创残之余”。新任辽东巡抚王化贞虽然竭尽全力招募，但一月已逾，所招残兵不过万余人，且“皆赤身徒手，马匹械仗，无处寻觅”。明臣惟一倚以阻敌的是狭窄水浅的三岔河，而这长达一百五十里的河防，竟只有一千兵戍守，实际上等于无人。^②

刑科给事中熊德阳，奉命往辽，祭告医无闾山之神，回京后，于五月中上奏，叙述耳闻目睹的辽东情形说：

“若关外一线之路，寄于海与西虏之间，村落残破，驿递萧条，……至广宁虽稍成城镇，然实不及江南一中县也。城在山隈，可俯首而窥，聚族几何，可屈指而尽，所恃三岔河，而黄泥洼可褰裳而渡，日望援兵，不啻拯焚救溺。……辽陷一月，援兵尚未至广宁，虽有不弃广宁之名，已有弃广宁之实矣。”^③

熊德阳的这份奏疏，道明了广宁危如累卵和明已实弃广宁的

① 《明熹宗实录》卷9。

② 《明熹宗实录》卷10。

③ 《明熹宗实录》卷10。

真情。无兵无将无粮无饷，甲仗火器荡然，地形不利，援兵不至，广宁怎能坚守？因此，明人皆谓“河西必不能保”。^①监军御史方震儒更指出：辽阳失守消息传到广宁，军民官绅万分惊恐，“人又奔散，生员缢于学宫，推官缢于衙宇”，巡抚亦欲逃窜。^②从辽阳逃出来的监军高出，竟上揭明廷，力言“广宁不可守，请捐以予西虏，资其扞御”。^③

如果努尔哈赤打下辽阳之后，立即挥师西进，全歼这千余残兵，攻取防守不严的广宁城，尽占辽河以西广阔土地，易如反掌，努尔哈赤就能轻易地成为君临全辽的英明汗了。可是，他计不出此，忙于掠人畜，征粮赋，按兵不动，重蹈覆辙，失去了轻取广宁的极好机会，为明朝调兵遣将，加强防御，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经抚不和”

后金天命七年（明天启元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率八旗贝勒、大臣，统军西征广宁，明金之间第三次大战开始了。

从战守形势看，双方情况很不一样，各有利弊，互有短长。后金的有利条件是，自天命三年取抚顺起，中经萨尔浒之战，下开原、铁岭，到重创明军于辽阳、沈阳，四年之内，屡败敌兵，所向无敌，进驻辽河以东广阔地域，扩地数千里，军威远扬，士气高涨。然而，金兵虽然善于野战，长于骑射，但火器不多，尤其是重型大炮数量更少，因而短于攻坚，辽阳、沈阳之战，都是诱

①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② 《明熹宗实录》卷13。

③ 《明熹宗实录》卷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敌出城歼灭敌军后，加上“奸细”内应，才能打下城高堞深的两大重镇。除了这一原有弱处以外，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辽东人民猛烈反抗金军的进占，或投毒药，或斩杀旗兵，或与明臣联系，约定期限，里应外合，大批辽民拼死外逃，掀起了反对奴隶制剥削、压迫的强大斗争（详见本章第三节），严重消耗了后金的财力、物力和兵力，牵制了金兵的西进。汗贝勒不得不留下部分军队，驻戍要害城堡。后方不稳，必然影响出征，给军事统帅带来很多限制。首先，他们被迫力求必胜，因为万一失利，辖区汉民一定会乘机而起，砍杀守兵，内外夹击，切断金兵的退路，那时不仅在辽沈地区立足不稳，建州老营也回不去了。其次是汗、贝勒不得不采取迅速决战，一攻即克，一打便胜，不能延误，不能长期对垒。否则，既在人力、财力、物力（粮饷、火器等）上比不过明国，不能打消耗战，而且，后方辽民必然要与明军联系，待机起义。这种只能胜不能败，只能速胜不能僵持，孤注一掷没有后路的局面，甚为兵家所忌，往往导致失败。

就明朝来说，明廷确实下了最大的决心，花了极大的气力，可以说是竭尽全力，来对抗后金的进攻。熹宗朱由校即位以后三月内，就连发两次帑金，共二百余万两，用于辽东军务，天启元年三月、十月，又两次发银二百万两^①。一年之内，就从皇帝私库拨银四百余万两，作为辽东兵费，其数量之大，空前未有，足见明帝抵御后金的决心。

因此，明廷竭力征调兵马，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失陷，四月初三即募兵于通州、天津、宣府、大同，十三日又募兵于陕西、河南、山西、浙江，又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擢参议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四处抽调召募兵

^① 《明熹宗实录》卷10、15；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6。

丁，到七月末，除河西额设旧兵及留守山海官兵外，广宁有援辽出关官兵三万九千余人，召集残兵二万九千余名，招募乡兵一万六千余，共八万四千八百余人，出关军马二万六千余匹，工部解过紫花布铁甲三万副、选锋梅花甲三千四百副、帽儿盔六万顶，以及大批刀斧弓箭钢铁和枪炮。^①九月底，广宁旧兵及新募征调，已达十四万余人，有马五万余匹，工部解过紫花等甲八万四千副、纸甲三千副、盔八万顶、刀枪斧等兵器七万八千六百余，“弓矢铳炮火药称是”，海运米豆百余万石，熊廷弼还亲统京兵五千、战马六千匹出关。^②明军火器很多，仅由京解运出关的灭虏、虎蹲炮就有五百一十门，运至广宁的硝磺火药有二十一万余斤，还有二十二万余斤留驻永平。^③到交战前夕的十二月，援辽官兵出关总数已达二十万。^④其中，广宁有兵十三万，熊廷弼领兵一万，驻右屯卫。

就兵数而言，明军超过后金兵，以武器而论，明方火器众多，又是以守待攻，因此这次大战，应是不相上下难分胜负的。但是，明军存在着致命的弱点。明朝政府已十分腐朽，承担不了抵御后金的重任，兵再多，将再广，武器再好，也挽救不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这集中地反映在所谓的“经抚不合”问题上。

“经抚不合”，是当时明廷朝野中十分流行的一个专用名词，指的是辽东经略熊廷弼与辽东巡抚王化贞二人意见相左，势如仇敌。熊为经略，应当总理辽东军务，应是主管辽东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最高官员。王化贞是辽东巡抚，理应为熊属员，听其指挥，但实际上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明廷（主要是阁臣和兵部尚书张鹤鸣）对王化贞言听计从，宠信备至，授予军事指挥大

① 《明熹宗实录》卷12。

② 《明熹宗实录》卷12、14、15；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

③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

④ 《明熹宗实录》卷16。

权，对熊廷弼则多方遏制，屡出难题，驳其立议，而且纵容科道对彼纠参。王化贞独镇广宁，拥兵十三万，而号称经略的最高长官熊廷弼，只有官兵一万，对军事行动没有决策权，进止悉由王化贞独专，熊则困坐山海关，“徒拥经略虚号而已”。交战前夕，帝命群臣集议战守大计，除太仆寺少卿何乔远、御史夏之令、给事中赵时用的主张与熊相同以外，“余多右化贞”，兵部尚书张鹤鸣更力主专用化贞，撤掉熊廷弼。^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是明帝认为熊无才干或一直不信任熊廷弼吗？不是。天启元年三月十三日沈阳失守，十九日报至京师，朝野震动，帝即传谕内阁，速上应急长策，二十日，大学士刘一燝立上奏疏，极言“熊廷弼守辽一年，奴酋未得大志，不知何故，首倡驱除，及下九卿科道会议，又皆畏避，不敢异同，而廷弼竟去，今遂有沈阳之事”。又说：“昨辽东按臣张铨遗书长安，谓今日急着，非旧经略熊廷弼不能办此事”。^②二十五日，帝命起用旧经略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马上差人守催”，令其即来任职。二十六日辽阳失陷消息至京，“京师戒严”，诏令廷臣集议，均无良策。二十九日，帝特遣专使捧敕，往谕熊来京任职，其敕说：

“朕惟尔经略辽东一载，威慑夷虏，力保危城，后以播煽流言，科道官风闻纠论，敕下部议，大臣又不为朕剖分，听令回籍，朕寻悔之。今勘奏具明，已有旨起用，适辽阳失陷，堕尔前功，恩尔在事，岂容奴贼猖獗至此。尔当念皇祖环召之恩，今朕冲年，遭兹外患，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其即日叱驭前来，庶见君臣始终大义，特命该部赍敕召谕，如敕奉行。”^③

^①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② 《明熹宗实录》卷8。

^③ 《明熹宗实录》卷8。

此敕高度赞扬了熊廷弼“威慑夷虏”保全危辽的卓越才干和特殊功勋，谴责了言官和兵部乱发议论排挤能臣的过失，责备了自己误听闲言的错误，恳请廷弼出山，为君分忧。这最有力地表明了天启皇帝和内阁大学士知道熊是保全危辽的能臣，既有才干，又树立了功勋，因而重新起用，特予恩宠。

四月初二，帝又谕部院说：“……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当时倡议何人，扶同何官，将祖宗百战封疆，袖手送贼，若不严核痛稽，何以惩前警后”。^① 随即将弹劾廷弼的御史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郭巩、阅视辽东的给事中姚宗文等，分别论处。

五月廷弼入朝，六月初一上抗金保辽的三方布置策，主守广宁，出舟师入辽南。初六日，明帝升廷弼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关，经略辽东等处军务。在此之前，辽东先后用了三个经略，即杨镐、熊廷弼、袁应泰，杨是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熊、袁都是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右侍郎是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是正五品，而此次廷弼升为兵部尚书，官品是正二品，兼右副都御史，官品为四品，皆比过去的经略官品更高、职衔更崇。七月初三，以廷弼将离京赴任，帝从阁臣请，以经略尚书奉命专征，“宜重事权”，“隆礼数”，除专敕外，加赐敕书一道、尚方剑一把，将士“不用命者”，副总兵以下，先斩后奏，又特赐大红麒麟服、彩币四。按明制，武官一品二品的官服，是绣的狮子，公、侯才能绣麒麟，这也表明廷弼是蒙受殊宠的。明帝又赐宴廷弼于都城外，命五军都督府及六部、戎政、都察院、翰林院等部院堂上掌印官陪钱。^② 《明史》评述此事说，

^① 《明熹宗实录》卷9。

^② 《明熹宗实录》卷12。

此乃“异数也”^①，即廷弼受到明帝的特别宠遇和优待。

就是过去好与人争喜责经略的科道言官，在辽阳、沈阳失守后，也一致建言立即起用熊廷弼，催其迅速赴任，以救危辽，“外无他策”。^②天启帝因观看文书，“见科道条议，请敕马上差人催取熊廷弼等来京”，而内阁拟进的谕札，没有“写敕之议”，命阁臣重拟。阁臣遵旨回奏说：“张鹤鸣（拟升为兵部尚书）、熊廷弼，朝议称其才可济变，急需前来，即欲委以兵革之事，推毂加隆，原不为过。”^③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了，熊廷弼曾经受到朝野一致的推崇，明帝把保住河西、抵御后金的重任，寄托在他的身上，给予了他特殊的优遇。

那么，为什么明廷后来重用王化贞冷落熊廷弼呢？明臣和清修《明史》的史官，大都是从门户之见以及廷弼好胜负气，得罪了言官和兵部尚书张鹤鸣来解释，近人亦多持此议。总观辽东战守全局，看来此论虽不无道理，可是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没有抓住关键问题。熊廷弼的失宠和受排挤，王化贞的得势及其独专辽东兵权，根本原因是二人的主张互不相同，而王化贞的意见符合了明廷的愿望。

王化贞，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任宁前道，分守广宁。辽沈战起，蒙古炒花诸部长“乘机窥塞下”，化贞极力“抚之”，“皆不敢动”。泰昌元年（1620）十一月，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奉旨往辽，会勘经略熊廷弼功过，天启元年三月初二日，以勘辽完毕，回京上奏辽东情形时，极言化贞得蒙古心，“勿轻改调，以堕抚局”。^④

①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② 《明熹宗实录》卷8。

③ 《明熹宗实录》卷8。

④ 《明熹宗实录》卷8；《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失，“远近震惊”，“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驿，烟火断绝”。^①闾阳驿在广宁西南，塔山又在闾阳驿之西，这二百多里地区居民都因畏惧金兵侵袭而逃走一空。在这两处东北的广宁，离辽阳更近，威胁更大，更危险，军民更怕，早已是畏敌“俱窜”了。^②此时广宁仅系孤城，止存老弱残卒一千，甲仗皆无，火器缺乏，时人皆谓广宁必失，“河西必不能保”。而王化贞却招集散亡，得万余人，“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把广宁守住了，把河西十一卫保全了，立下大功。因此，甚得朝野称赞，“时望赫然”，明廷认为王有胆有识，才干超群，倚以为重。四月初三，湖广道监察御史方震儒奏称：“宁前道王化贞甚得西虏之心，宜加金都御史职衔，令其便宜从事，与薛国用同守河西”。^③初五日，谕升辽东巡抚薛国用为经略，升宁前道右参议王化贞为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巡抚广宁（即辽东巡抚）。

王化贞以辽东军民猛烈反抗后金，思与明朝联系，遣都司毛文龙率兵二百二十余人，由海进取镇江（今辽宁丹东县）。毛至朝鲜弥串堡，侦悉后金游击佟养真发兵外掠，城中空虚，与右卫生员王一宁定议，遣千总陈忠夜渡鸭绿江，与镇江原中军陈良策密商，于七月二十日突然进攻，陈良策从中内应，生擒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等“贼党”六十余人“民皆大悦，羊酒迎劳者几万人，数百里之内，望风来降者络绎不绝”。汤站堡、险山堡兵民闻风起义，捕捉后金守将，交与文龙，后皆押送北京，斩首示众。辽南四卫群情振奋，“南卫震动”。八月初，捷音至京，“举朝大喜”。^④

① 《明熹宗实录》卷8；《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② 《明熹宗实录》卷9。

③ 《明熹宗实录》卷9。

④ 《明熹宗实录》卷13；《满文老档·太祖》卷24；《明史》卷259，《熊廷弼传》、《袁崇焕传》；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

大学士刘一燝等立即上奏说：“屡败之余，有此奇捷，皆繇国家德泽深厚，人心原不忍背”，应立即调兵往援，帝从其议。^①

总理户、兵、工三部军需的左侍郎王在晋，紧接着就此事上奏说：

“迺闻辽东抚臣王化贞，密委都司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请立即发兵往援。^②

天启皇帝亦对此战给予了极高评价，于八月初七、初八，两次降谕兵部说：“朕览文书，见辽东巡抚王化贞本内称，毛文龙收复镇江，……克著奇捷，朕心忻慰，有功人员，着即与查明优叙。”接着又谕兵部说：“镇江奇捷，辽左恢复有机”。三道谕旨，皆责兵部传令经略、巡抚及有关官将，立即发兵发银运粮运甲仗兵器，前往接应毛文龙。^③

毛文龙于八月初七日升副总兵，随即晋总兵，后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

镇江之捷，为王化贞增添了莫大光辉，朝野一致认为，他建立了又一特大功勋，是保全危辽抵御后金的卓越人材。王化贞有了守广宁、取镇江这两大功勋，固然为他独专兵权总管广宁军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仅此还不能排挤掉熊廷弼实现这一目的。因为，举朝公认熊、王皆是有功之人，皆是有为之士。熊立功于前，扭转了萨尔浒之战，开原、铁岭失守以后的危局，保全了辽阳、沈阳及辽河以东辽阔领地；王立功于后，坚守广宁孤城，保住了河西十一卫。论功勋，彼此不相上下，皆系树立特大

① 《明熹宗实录》卷13。

②③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

功勋的功臣，论才干，论胆略，二人亦难分高低，都曾经是藐视强敌，敢挑重任，力挽狂澜，为他人所不敢为的勇士，都曾显示了个人的卓越才干。正因为这样，所以熊廷弼从一个放归林下的闲员，初以原官兵部右侍郎起用，继即超升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蒙受殊遇，王化贞由从四品的左参议、宁前道，擢任辽东巡抚，在辽、沈失守以后的三、四个月内，明廷对二人是同样优遇的。后来之所以发生了重王轻熊、专任王化贞的重大变化，主要在于二人用兵的方针，互不相同，王的主张适应了明廷的需要，符合了它的愿望，因而赢得了明廷的信任。

其实，被明廷夸奖的王化贞，并没有什么才干，他之所以能够立功，纯出偶然，得之于侥幸。广宁之能存在，并非王力御强敌的结果，而是努尔哈赤按兵不动，没有立即西征，广宁才未失守。毛文龙的镇江之捷，亦出于金兵不备，而且努尔哈赤立即派四贝勒皇太极、二贝勒阿敏领兵前往，平定了镇江的起义，对南四卫进行了血腥屠杀，迫使毛文龙逃往朝鲜。^①王化贞既不谙兵法，又刚愎自用，轻敌自傲，且不问军务，“一切士马、甲仗、粮、营垒，俱置不问”，只知胡写乱说，“务为大言罔中朝”，骗取朝廷信任。

王化贞主战，主速战，极言可以不用多少兵马钱粮，就可迅速获胜，收复辽河以东十四卫。他为用以制敌之策所列举的论据主要有三项。一为用西虏，以西虏制东夷，即用蒙古打后金。早在天启元年三月辽沈失陷前夕，身任辽东宁前道的王化贞就上奏说：“奴氛益恶，辽势将墟，亟救燃眉，惟有用虏一着。……请发帑金百万”，宣谕蒙古诸部，有能讨金者，赐金银，有能灭金者，“有其地仍比顺义王例，岁赏若干”。如此，则蒙古各部“未有不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4；《明熹宗实录》卷1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

争赴者”，“奴不敢复深入矣”。^①五月二十四日，兵部从巡抚王化贞之请，发银一百万两于广宁，以抚赏蒙古招其抗金。^②九月，王化贞又上揭兵部说：“虎墩兔汗调兵四十万，助攻奴酋，先遣夷使伯言顾哈等报知，随后齐到”，请发帑金三十万，作赏功之用。^③这个虎墩兔汗，就是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王化贞的用西虏制东夷主张，是明万历后期的一贯方针，根据有三，一是蒙古、女真一向不和，建州兴起，蒙古不服，欲图诛剿，压其威势。二是蒙古善于骑射，兵力强大，素为明朝所畏，用以抗金，可收其效。三是蒙古各部贪明市赏，断市停赏，蒙古不堪其苦，重金抚赏，蒙古将恋财而为明用。万历末年以后局势，确实如此。一些蒙古部落与明相联，共抗后金，尤其是察哈尔部林丹汗，更是一贯与努尔哈赤为敌，蔑视新兴的建州。

天命四年十月，林丹汗遣使入建州，致书努尔哈赤说：

“四十万蒙古国之主巴图鲁青吉思汗谕：致问水滨三万诸申之主恭敬英明汗平安无恙否？明国与我二国昔为仇敌。吾闻自午年至未年，明国为尔骚扰。今此未年之夏，吾曾亲至广宁，降服其城，收取贡赋。今尔出兵广宁，吾将威制于尔。吾二人素未开战，若吾所服之国为尔所取，则吾名安在？如若不听我此言，则吾二人之是非，天将鉴之！先前我等互相遣使往来，后以尔使捏告吾太骄傲，因而断交。如以吾言为是，尔可遣使前来。”^④

此信用词之粗野，口气之狂妄，对建州的轻视和威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激怒了后金八旗贝勒大臣，半主杀其使者，半主割使臣耳鼻。努尔哈赤决定，“对彼之恶言，我等也以恶言

① 《明熹宗实录》卷8。

② 《明熹宗实录》卷10。

③ 《明熹宗实录》卷14。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13。

相报”，遂回书林丹汗，痛讥其伪称四十万蒙古之主，实则仅系拥众三万之小部头人，讽其不敢用兵于明国（甚至曾被明所败）一心想讨要赏银，以致为明所骗。^①金蒙相恶，明是可以拉蒙抗金的。

二为用降臣，依靠李永芳等降将的反正，里应外合，击败金兵，收复失地。王化贞认为，李永芳等降将，久怀内附之心，连续遣人入金，劝诱归顺，李永芳亦佯为允诺，伪愿内应，王信以为真，寄予厚望。

三为倚辽民，等待河东十四卫辽民武装起义，迎接官兵，灭掉建州。王化贞一直认为，河东辽民痛恨后金，明兵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可以作为明兵抗金御敌的重要支柱。他曾上疏详述辽民情况说：后金搜掠民间米粟牛羊，将堆积如山的财货，尽运旧寨，大杀辽民，辽民恨之人骨，等待官员往征。“河东之人引领以望，以日为岁，吾使人所至，望屋而室，贼至则匿之，去则导之，及河则泣送之。豪杰聚众，俟吾兵至，则共执伪将以降，虽多有事漏被杀，不悔也”。^②

因此，王化贞轻视大敌，“好谰语”，“欲以不战取全胜”，甚至直到十二月广宁势危，官民思逃的时候，王还上疏明帝，狂妄宣言：“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厚资从征将士，辽民赐复十年，海内得免加派，臣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③

熊廷弼则与王相反，力主固守，主持久战，强调征集大军，广储粮饷，备足器械。六月初一，廷弼即上恢复辽左的“三方布置”策，初六就任辽东经略，十七即奏请抽选各镇各省精兵二十余万，催促到山海关。兵必精，饷必足，弓矢器械硝黄布匹必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4。

② 《明熹宗实录》卷10、13。

③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备，如有差错，兵、户、工部当负全责，帝从其请。寻即议准，调兵三十万，年需兵饷一千余万两。^①廷弼坚决反对王化贞的错误主张，力言蒙古不可恃，李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不能浪战，玩师必败，必须以守为主。^②论兵法，观战局，廷弼的方针是对的，史称廷弼与化贞，“无一事不一力争，无一言不奇中”。^③

但是，当时，明帝和文武大臣，以及显要太监，多以王化贞之言为是，多主进攻，多主速胜。形成这种“群议皆是化贞”的局面，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第一，精神上的压力太大。区区建州，弹丸之地，竟敢反叛朝廷，兴兵作乱，与幅员百万里臣民上亿的大明对抗。二百年来先祖世为明仆，本身又受明政府封赐，为帝阿哈的建州“夷酋”努尔哈赤，居然忘掉殊恩，背弃臣节，黄衣称朕，指责朝廷，与君临四海的天皇帝分庭抗礼，甚至屡败官军，连克重镇，逼得至高无上威严无比的明帝，下诏罪己，真是奇耻大辱，令人羞惭万状。不报此仇，不雪此恨，熹宗难慰皇祖亡灵，阁臣、九卿愧对君民，一向健谈好议的科道，也是妙笔难书，巧口难言。要雪“国耻”，要出兵，要速胜，成为明朝君臣的共同愿望，王化贞的主战以求速胜方针，正迎合了这种愿望，当然会得到明廷的信任。

第二，辽东之失，威胁明都。辽东邻近蒙古、女真，内接关内州县，是京师的蕃篱，如若失陷，对都城影响太大。因此辽阳一失。“朝野大惊”，“人心震动”，“京官皆思借差避兵”，“京师士民亦多逃避”，都城立即戒严。^④

① 《明熹宗实录》卷11、13。

②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③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④ 《明熹宗实录》卷8、10、1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第三，战事持久，费用浩繁，民心思乱，江山难保。这是决定熊廷弼失势王化贞得宠的最主要因素。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抚顺失守，中经萨尔浒交锋和辽沈之战，迄至天启元年十二月，三年多的时间，全国都为“东事”担忧，都受到“东事”的损害。征兵各地，赶运粮草，打造器械甲仗，凑办军马，收取赋银，将士伤亡，城池失陷，辽民流移，闹得全国鸡犬不安，人力、财力、兵力俱损。天启元年八月，总理户、兵、工三部的兵部左侍郎王在晋，上疏奏述辽事影响之大及其危及全国各个方面的情形，对此作了总结性的概括，现摘录如下：

王在晋题：“我国家幅员万里，声灵赫濯，祇缘逆酋为难，致开、铁、辽、沈、南卫相继陆沉，二百年来生养，横罹荼毒，衣冠化为辮发，名城遽尔丘墟，殫天下之财力，不能力制狂酋之死命，目前五空八竭之状，有匪一言可悉者。盖自金钱尽输于塞外，上颁转散于行间，决如壅泉，去如流水，而帑藏空。赋税既溢额以加编，旱潦又相仍而不已，烟寒环堵，月照逃亡，而田野空。少壮僉名以应募，丁夫僇力以从戎，比屋靡宁，穷乡滋扰，而闾阎空。强者毕命于戈矛，弱者惊嵬于风鹤，抱头鼠窜，暴骨如林，而行伍空。青闺有劳人之梦，黄沙有夜泣之鬼，妇子凄其，藁砧寂寞，而家室空。三路北，而正偏裨将领死者三百一十余员，迨辽沈沦亡，不知凡几，而将材竭矣。抚顺开铁破，而姓名登鬼录者五万六千五十余人，又杀戮人民不可胜算，而生命竭矣。宽奠败而马骡驼死者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只，又东运买牛倒死数万，而牲畜竭矣。飞輓飘寒于渤海，转输汗漫于沧冥，括同珠玉，委若泥沙，而刍粮竭矣。雇募则索舟楫于海滨，打造则僇材木于江皋，飓汛时侵，水滨莫问，而舟航竭矣。火药利器，极万输边，大铕神枪，累千藉冠，我失其御，彼得

其资，而器械竭矣。芜湖之铜商不至，武库之建铁已穷，炉冶空悬，采办莫继，而五金竭矣。熬骨之诛求未已，剥肉之偿补堪怜，渔泽无遗，焚林几尽，而民间之膏血竭矣。似此五空八竭之形，海内可胜惫顿乎？”^①

王在晋的奏疏，对“东事”影响之严重及明廷的危机，讲得很全面，简洁清楚，现对其中所提兵器、军饷二项，引录具体数字，作一补充。

天启二年三月十四日，工部开列自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元年，三年零八个月中，发过援辽军需火器数目，向帝奏报，计有：天威大将军十位（一位重一、二千斤，每发一炮，可击毙敌兵数百人），神武二将军十位，轰雷三将军三百三十位，飞电四将军三百八十四位，捷胜五将军四百位，灭虏炮、虎蹲炮、旋风炮、神炮、威远炮、涌珠炮、连珠炮、翼虎炮，共九千九百六十位，铁铳五百四十位，鸟铳六千四百二十五门，五龙枪、夹靶枪、双头枪、铁鞭枪、钩枪、快枪、长枪、三四眼枪、旗枪，共三万四千零五十二杆，大小佛郎机四千零九十架，硝黄一百六十八万三千一百五十八斤，火药九万零五百斤，大小铅弹，铁弹一百三十九万五千五百六十八个，盔三十六万顶，甲二十七万五千五百八十九副，刀十二万四千七百六十一把，弓四万二千八百张，箭二百四十六万四千支，黑铅六十万斤，真钢四万斤，建铁、西铁、不堪炮甲代铁，共九十八万一千二百五十斤，以及大批皮张、棉花、袄裤等物。^②这还不包括辽东经略、巡抚在本地备办的火器甲仗。

从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起，至泰昌元年九月止，户部共发过

^①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

^② 《明熹宗实录》卷20。

辽东新饷一千零五十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三两。^①泰昌元年十月初一至十七日,十七天内,户部又发过辽东新饷九百四十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七两。^②到天启元年十二月,又是一年多的时间,又将发放上千万两。这还不包括熹宗皇帝一年内从私库拨出的帑银四百余万两。户部每年太仓岁入银才四百余万两,加上“辽饷”加派五百二十万两,也不到一千万,而熊廷弼要调兵三十万,年需兵饷一千二百万两,从何而出?明臣多因饷费兵冗苦累全国而担心,纷上奏疏。御史徐景濂奏称:“如兵必满三十万,饷必盈千余万,而后大举,几阅春秋,恐点铁无术,饥寒溃敌,更可寒心。”^③刑科右给事中孙杰疏言:“且往年兵议十八万,饷议七百万,尚苦不凑,今兵需三十万,饷需一千二百万,恐竭中国财力不足供也。”^④

庞大的军费,怎样筹办?天启元年九月,署户部事左侍郎臧尔劾,奏上理财疏,提出十项建议,主要是从皇帝、王公贵族及军民身上打主意,要将年供内库的金花银一百万余两,拿出一半,解充辽饷,要叫岁禄八千石以上的亲王、岁禄六千石以上的郡王,将其超过的禄米捐助辽饷,要增加崇文门、北新关等所收税银等等。^⑤这直接损害了帝王的私人利益,熹宗当然不会采纳,结果困境无法摆脱。

军饷浩繁,民力难支,广征兵士,亦祸害无穷,四川、贵州相继发生征兵激变之事。天启元年七月,科臣明世举捧檄起土司兵援辽,“诛索无厌”。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令土目带兵一万,诣重庆点阅,巡抚徐可求置之不理,谩言兵少,土兵伺候月余,

① 《明熹宗实录》卷1。

② 《明熹宗实录》卷5。

③ 《明熹宗实录》卷14。

④ 《明熹宗实录》卷16。

⑤ 《明熹宗实录》卷14。

“汹汹思乱”，而可求却滥施淫威，杖责头目，并欲“尽黥土兵之面，以别记验”，土兵忍无可忍，杀巡抚、道臣、知府、推官及总兵、参将一百五十余员，奢崇明随即兴兵，踞重庆，围成都，“川东、川西、川南四十九州县望风瓦解”。^①

十二月，内阁首辅叶向高，以熊经略主守，反对速战，力言必集兵三十万，才能进军，致书廷弼，十分忧虑地说：“承教，辽事未可战，自是确论。然须当讲求三十万兵，势必不能集，海内坐此，骚动已极，若征调不止，其祸变恐不但蜀中，即使保得广宁，复得辽阳，而天下事亦已去矣。”^②果然，第二年二月，水西土同知安邦彦起事于贵州（延续了十七年），五月，白莲教徐鸿儒举义旗于山东，各地兵变频仍，不久，又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明廷即将崩溃衰亡，叶向高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确有真才实学，熟知敌情，善于用兵的辽东经略熊廷弼，所上主守的正确方针，得不到朝廷的赞同，反因直言得罪了言官及兵部尚书张鹤鸣，失宠于明廷，被排挤，缺兵少将，一筹莫展，而夸夸其谈，巧言诡辩，腹中空空，不知用兵为何物的王化贞，却以速战速胜论，骗取了明廷的信任，独掌辽东军务大权，终于导致广宁失守。这场“经抚不和”之争，以及王化贞的得势，熊廷弼的闲置，最集中、最有力地表明了，明王朝确是腐朽万分，不能挽救辽东危局，无法抵挡金兵的进攻了。

三、轻取广宁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统八

^①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明史》卷312，四川土司。

^②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

旗劲旅，西征广宁，二十日，围西平，二十一日取西平，大败明军于平阳桥，二十四日入广宁，明金第三次大战又以明朝惨败而结束。

明、清官员、史臣，以及近人论著，多认为此次明国的失败，是由于“经抚不和”，此说虽然不无道理，但并未抓住实质问题，没有找出关键因素。经、抚不合，熊、王二人及其同僚好友，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彼此舌战笔战，争输赢，定是非，比高低，互相攻击，固然对用兵有些影响，但并不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总观当时战局，熊廷弼已失去主管辽东的大权，一切以王化贞之意为进止。王掌握了用兵之权，甚至在广宁失守前夕，明廷已决定升王为经略，让他名正言顺地独主辽东。因此，广宁之战，经略熊廷弼已不能过问军事，纯由巡抚王化贞主管，实际上是王化贞与努尔哈赤交战，是对王的战略、战术及其指挥才能的严峻考验。战争的结果证明，这个自命不凡的王化贞，虽被明廷吹捧为不畏强敌的大丈夫，独守孤城保全河西的大豪杰，力挽狂澜誓死报国的大忠臣，原来却是一个不懂兵法的门外汉，大言不惭哗众取宠的骗子，游手好闲不理军务的懒人，并且还是一个胆小如鼠见敌即溃的逃将，他的错误用兵方针和拙劣的领导才能，正是直接造成明军惨败的根本因素。

辽东巡按、监军御史方震儒，在战后上奏说，明兵之败，是因撤广宁、镇武之兵，调往西平，与金兵交战，使得广宁空虚，人心汹汹，河西失守。^①此说亦难成立。王化贞本来一向主张进击，不重防守，但几次出兵浪战，皆未成功。大战之前，军情严重，才不得不请熊廷弼商议战守大计。天启元年十一月十一日，熊、王及一镇三道会议于西平，王束手无策，只好向熊求教说：

^①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

“前实不曾依奉公行，今只当辽阳初失，惟公指教矣。”廷弼着实教训了他一番，批评王不讲实效，只知浪战，最后又声色俱厉地对王说：“劝公内防而外谢之，一味密密厉兵秣马，储粮治械，干我正经事体，自隐然有不可犯之势，辽东尚可为也。”王化贞惟惟答应，“各道镇亦首肯，不敢对”。廷弼遂收集各屯涣散人马，议定以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王化贞驻广宁，命辽东总兵官刘渠统二万兵守镇武，援辽总兵官祁秉忠领兵一万守闾阳，令副总兵罗一贵率三千人马守西平。廷弼又下令，严禁临阵脱逃，规定：“贼来，越过镇武一步者，镇、道、将诛无赦。贼至广宁，镇武、闾阳不夹攻，掠右屯饷道，而三处不救护者，俱如此。”各处俱“缮陞坚垒”，勿浪战，“急则互相援，违者必诛”。^①

镇武堡，在广宁东南九十里，西平堡又在镇武堡东南，为辽河防线的要塞，右屯全名为广宁右屯卫，在广宁之南，偏东邻海，距广宁一百二十里。廷弼这样的布置，既注意发挥明兵凭城发射火器的长处，避免中敌圈套出城野战短于骑射的劣势，又针对官兵怯战好逃的恶劣传统，下死命令，严禁溃逃，有事互相应援，这种安排，还是不错的。

此次交战，八旗军队确数虽难查明，但可以肯定，数目不会太大。十个月以前，八旗一共才二百三、四十个牛录，按一牛录三百丁计，约七万丁左右，进入辽沈以后，没有什么增加。新编了一批汉兵，人数不多，装备不良，而且很不可靠。兼之辽民激烈反抗，必须留下相当多的军队，驻戍各地。照此算来，努尔哈齐统领的军队，只有几万人。辽东巡按方震儒根据参将周守廉的塘报上奏说，攻西平的“奴兵五万，又益以新练辽兵四、五

^① 《明熹宗实录》卷1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明史》卷259，《熊廷弼传》、卷271，《罗一贯传》。

万”。^①金兵五万之数，比较可信，至于“新练辽兵四、五万”，显然是过分夸张。

明军人数，超过了金兵。经略熊廷弼有兵一万，驻右屯。巡抚王化贞统兵十三万，除去西平、镇武、闾阳三处兵三万余外，大都集聚于广宁。无论在军队数量还是武器装备上，明军都居于优势。

明军士气固然不振(详后)，但猛将勇士并不乏人。甘州卫人罗一贵，以参将守西平堡，辽阳失，西平位列前线，“地最冲”，一贵“悉力捍御”。游击刘征，亦勇猛善战。辽东监军方震儒对二将特别称赞，上奏荐举二人驻守要地镇武说：“窃见诸将中，胆勇绝人者，无如游击刘征、参将罗一贵，若加以副将职衔，使各统兵万五千人，为死守计，撑持得住，明年便以大将与之，二将必有可观者。”^②王化贞亦赞同对罗一贵等，“破格加升，以鼓其气”。^③可惜明虽升罗、刘二将为副总兵，但仅令罗领兵三千守西平，^④并未授与重兵令二将统率，驻守镇武，大材小用，影响了战局。当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正月二十日进围西平时，参将黑云鹤坚主出城交战，罗一贵劝阻不从，黑云鹤出战败没，金兵五六万大举攻城，罗一贵激励军民，“凭城固拒”，“用炮击伤者无算”，“打死奴兵无数，贼尸几与城平”。李永芳奉汗之命，使人持旗大声劝降说：“知道守城罗将是好汉，速降，同享富贵。”一贵大骂李永芳说：“朝廷何负逆贼”，并使人也持旗招金兵降说：“贼速降，免贼死”。金兵猛攻，城内“矢石火药俱尽”，金兵用云梯登城，守兵仍在城上、城北拼死巷战，“杀伤贼甚众”，一贵被射中目，“不能战”，外援又不至，乃向北跪拜

①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

② 《明熹宗实录》卷15。

③ 《明熹宗实录》卷15。

④ 《明熹宗实录》卷16；《明史》卷271，《罗一贵传》。

说：“臣力竭矣”，自刭而死。^①罗一贵仅只率兵三千，便能坚守孤城，“相持两昼夜”，击毙敌兵数千，前所未有。方震儒为此专奏说：“西平之战，罗一贵有大功，杀贼数千，以身殉国，从来所未有”。^②后一贵被追赠都督同知，世荫副千户。

如果总、副、参、游诸将，皆能如罗一贵这样以身殉国，拼死血战，那么，尽管明军为救西平，从广宁、镇武、辽阳发兵往援，也不会一战即溃的。可惜的是，由于辽东巡抚王化贞的错误领导，严重影响了士气和民心，致使将士多无斗志，官民纷思逃窜。

想当年，开铁失守，辽东大震，熊廷弼就任经略后，立即察边情，修城堡，备器械，集粮饷，调军马，数月之内，使辽阳、沈阳二城固如金汤，战将云集，大兵屯驻，马上就转危为安了。而现在，王化贞掌权之后，惟知罔言欺上，“一切士马、甲仗、粮粮、营垒、俱置不问”，广宁重镇未加固，镇武、西平要塞未扩建，海运米豆百余万石，青草一千数百万束，分置右屯卫和觉华岛等地，未运至广宁，使得城池不牢，粮饷不继，军纪不整，“各兵沿村乞食，弓刀卖尽”，骑马倒毙。这种战不能战、守不能守的局面，在精神上使广宁军民受到严重打击，人心不定，将无固志，纷欲逃走，

天启元年十月，辽东监军御史方震儒叙述广宁情形说：

“河西兵将，见河冰不开，夷情紧急，人人备好马思逃，而又愁经臣把住关门不放，于是有差人看一片石者，有差人看觉华岛者，臣密察之，情状甚真，而监军道亦数为臣言之也。”^③

① 《明熹宗实录》卷18、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明史》卷271，《罗一贵传》。

② 《明熹宗实录》卷15。

③ 《明熹宗实录》卷15。

方震儒又接着说：“广宁城中，富家大户尽数西奔，提督王威又中风不起，一切兵马漫无头绪，且各兵沿村乞食，弓刀卖尽，臣虽有挑兵之谕，而至今未挑，以兵马逐村就食不便挑也。抚臣心慵意懒，三监军皆杜门，河西安得不危。”①

总理户、兵、工三部军需的兵部侍郎王在晋，亦上奏说：“今河西兵十余万，全无固志，一望虏兵，即思逃遁。”②

督运军器至辽的工部主事张廷玉，“亦以出关所见人无斗志，纷纷思逃情形入告。”③

因此，由于王化贞的虚夸、浪战、轻敌、无能和懒散，带来了如此严重的恶果，影响了士气和民心。这才是造成广宁失守，明军惨败的根本原因。

王化贞的昏庸笨拙，不分忠奸，任用非人，也是促使明军失败的重要因素。王最信任孙得功，孙系辽人，王招募辽民为兵，“出孙得功于狱，用为辽人帅”，“倚为心腹”，而孙却早有降意，终于败坏了战事。④

正月二十日金兵攻西平，王化贞听信孙得功之计，发广宁军七、八万，令孙统领，往会驻闾阳的援辽总兵祁秉忠，前援西平。熊廷弼亦檄令驻镇武的辽东总兵官刘渠，撤营赴援。三处兵合共有十万左右，比金兵还多，本来是可以决一死战的。但是，二十一日，双方交锋于平阳桥，刚一接触，孙得功即将所领兵士“开阵两分”，率先退走，“众遂大溃”，尽管刘渠、祁秉忠、刘征等奋勇冲杀，亦难挽危局，相继战死，明兵大败。二十二日，孙得功一还广宁，立即倡言金兵已近，即抵城下，城内虽有守兵一

① 《明熹宗实录》卷15。

②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

③ 《明熹宗实录》卷15。

④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

万六千余，但被孙得功等煽惑、威胁，尽皆弃城而逃，“城中大乱”。孙得功、黄进等，封府库、火药库，备龙亭，欲生擒巡抚降金立功。在这兵民逃散，叛贼猖獗，危在顷刻之时，一向自命为精明练达有经国纬世之才的辽东大帅王化贞，却如在梦中，一无所知，静坐卧室，观书自娱，不是参将江朝栋闯入府内，挟王急逃，就将成为后金俘虏，斩首教场了。

孙得功、黄进(守备)等，把守广宁城门，遣七人请降，努尔哈赤在西平堡分赏官兵，二十三日离西平，二十四日至广宁，孙得功等率士民于城东三里外望城岗，抬龙亭，设鼓乐，执旗张盖，叩见“太祖”。迎入城中，驻巡抚衙门。平阳、西兴、锦州、大凌河、右屯卫、松山、杏山等四十余城官兵俱降。二月十七日，努尔哈赤命诸贝勒统兵守广宁，将锦州，义州等处官民迁于河东，回归辽阳。

第三节 辽东军民的抗金斗争

一、抗金斗争的历史背景

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三月下沈阳、辽阳，第二年正月取广宁，八旗军进驻辽东地区，辽东军民反抗奴隶制剥削，反对后金汗、贝勒奴役的斗争，也就迅速地开展起来。

辽东地区，久已开发。商、周时肃慎人在此地居住，战国时归燕管辖，秦设辽东、辽西二郡，汉初沿袭。魏置辽东五郡，隶平州，唐置盖、辽二州及九都督府，统于安东都护，后为渤海国。辽、金为东京，元改为辽阳路，设辽阳行中书省。明置辽东都指挥使司，革所属州县，设定辽、广宁、义州、东宁、宁远、海

州、沈阳、辽海、铁岭、盖州、复州、金州等二十五卫，又置安乐、自在二州。按每卫编制五千六百名兵士计算，达十四万名，连带随营的余丁、家属，约数十万。明又令军卒屯垦。洪武二十七年(1394)，命辽东军士“自明年俱令屯田自食”，随即改为全辽官军八分屯种，二分守城。永乐十二年(1414)，变为三分之二守城，三分之一屯田。洪永年间，辽东军屯多达二百五十余万亩，年征屯粮七十一万余石。^①屯军的辛勤耕耘，农民的艰苦开垦，使得辽东地区的农业发展十分迅速。

辽东资源丰富，手工业也很发达。各卫皆有盐场、铁场，辖煎盐军、“炒铁军”数千名，年征额盐三百七十七万四百七十三斤，岁收额铁三十九万五千零七十斤。还有大批兵民私自开办的民营矿场。明辽东经略熊廷弼上奏抗金计策时，力主招募矿徒，建议对能聚一千的头目委署都司，能招五百人的委署备御、守备，这样，“将一呼而应，一、二万兵可立致也。”^②一下子就能从矿徒中招兵数万，可见矿徒之多和民营矿业的发达。

《辽东志》总述明初到明中叶辽东社会生产发展情形说：“辽物产之丰，繇来尚矣。国初疮痍新愈，民习勤苦。百余年来，兵戢不试，事简俗质，是故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其得易，其值廉，民便利之。”“故往时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货贿羨斥，每岁终，辇致京师，物价为之减半。”^③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兴旺起来，城市经济十分繁荣。以中小城市抚顺而言，它专与建州女真贸易，商业发达，商贾较多。努尔哈赤进攻抚顺时，定下计策，先令人传言，“明日有三千达子(女真)来做大市”，诱哄商民出城贸易。取城以

① 《明太祖实录》卷87、179、232；《明宪宗实录》卷172、244；《明经世文编》卷198，潘潢：《会议第一疏》。

② 《明熹宗实录》卷10、11、13。

③ 嘉靖十六年重修《辽东志》卷3。

后，“有山东、山西、涿州、杭州、易州、河东、河西等处商贾”，以七大恨之书付给，令彼带回，可见抚顺商业的发达。比抚顺更富的城市，还有很多。象金州、复州、盖州、海州，素为“膏腴之地”。开原，为古之黄龙府，元之上都，“城大而民众，物力颇饶”，“金钱财货，……何止数百万”。沈阳、辽阳两大重镇，兵民数百万，商贾云集，十分繁华。明经略熊廷弼说：如努尔哈赤“全有辽镇，所获金钱财货，何止数千万。”^①明宁前道王化贞报告金兵取辽阳后，七天内，大杀兵民，“辽之商贾，死者四、五万人”，^②礼科给事中周士朴亦上奏说：“奴杀西兵二万，复杀商贾五、六万。”^③财富之多，商贾之多，充分表明了辽东诸城的富庶和农、工、商业的发达。

辽东地区，久已实行封建制。屯军领种官地，交纳屯粮，充当夫役，遭受封建国家和军官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猛烈兼并土地，田连阡陌，役使佃农耕种。民人或系佃农，承种官将豪绅田土，交纳私租，或系自耕农、半自耕农，上交国赋，从事力役，皆摆不脱繁重的封建租、赋、徭役的压迫。

赋重差烦，官将贪酷，豪强欺凌，实难容忍，辽东军民奋起反抗。从正德年间以来，辽东军士、余丁举行的“兵变”，就十分频繁，先后发生过反对刘谨党羽户部侍郎韩福丈田苛刻、辽东巡抚吕经贪酷虐民的兵变，“殴逐委官”，执缚巡抚，押解游街，批打其颊，“窘辱备至”。^④这些大规模的“兵变”，严重冲击了封建制度，狼煞了地主、官将的威风。

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神宗遣尚膳监监丞高淮，往辽东开矿征税。高淮极端贪残，无恶不作。他盘剥军卒，“扣除军士月

① 《明神宗实录》卷583；《明经世文编》卷480，熊廷弼：《河东诸城溃陷记》。

②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0。

③ 《明熹宗实录》卷9。

④ 《明武宗实录》卷53；《明世宗实录》卷173、174。

粮”，将羸马散给士卒，勒收“好马之价十倍”。当时有人揭发：“辽军已数年不得钱粮，凡给散钱粮，为将领扣去高淮，军士分厘皆不得沾矣。”^①他“借税杀人，黠货无厌”，带领数百家丁，从前屯卫，到辽阳、镇江、金州、复州、盖州、海州等地，“大小城堡无不迂回遍历，但有百金上下之家，尽行搜括，得银不下数十万，闾阎一空。”^②辽东巡按肖淳指出：高淮到辽以后，“生命戕于鞭敲，脂膏竭于咀吮，十室九空”，“辽民极困”，^③辽东军民编了一首歌谣，痛斥高淮的残忍说：“辽人无脑，皆淮剗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④

辽东军民愤恨异常，猛烈反抗。高淮于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入辽，六月就激起开原民变，“比至开原，严利激变”。^⑤九月，又爆发了金州、复州地方民夫沙景元领导的抗拒开矿的民变。^⑥第二年六月，其委官廖国泰，又“激变土民”。^⑦三十六年四月，又爆发了前屯卫兵变，前屯卫“各营男妇数千人”，愤怒打死高淮党羽汪政，“歃血摆塘，誓杀高淮而后已”。^⑧五月，大学士朱赓叙述辽东时局说：“夫激变之事，不数月间，一见于前屯，再见于松山，三见于广宁，四见于山海关，愈猖愈近。”^⑨第二月，山海关内外军民“聚众数千攻围，高淮窘急”，狼狈逃窜，进入关内。明帝不得不下诏，指责高淮“骚扰地方”，“扣剋军士粮饷”，

① 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1，戎政尚书李化龙题：《为辽左危在旦夕疏》；《明史》卷305，《高淮传》；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辽东略。

② 《明经世文编》卷436，朱赓：《论辽东税监高淮揭》。

③ 《明神宗实录》卷429。

④ 《明经世文编》卷467，朱一韩：《直陈辽左受病之原疏》。

⑤ 《明神宗实录》卷336。

⑥ 明代辽东档案丁种21号卷。

⑦ 《明神宗实录》卷348。

⑧ 《明神宗实录》卷445。

⑨ 《明神宗实录》卷446。

命即回京。^①逞凶十年的高淮，终于在辽东军民强大斗争的压力下，滚出了辽东。

综上所述，明代辽东农、工、商业进展较快，封建经济相当发达，地主阶级广占田土，役使佃农耕种，进行封建剥削，辽东军民坚决反抗明王朝的残酷压榨，反对封建制度的沉重剥削。这就是明末辽东地区的基本情况，这也是天命六年三月以后，汉满人民激烈反对奴隶制、农奴制剥削，反抗后金国统治的强大斗争的历史背景。

二、反金斗争蓬勃开展

天命六年(1621)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掠民为奴，极力扩大奴隶制剥削范围，加深了辽民的苦难。辽东军民一向勇于斗争，对封建制的剥削都难以容忍，对更野蛮、更落后、更残酷的奴隶制剥削，当然是更加痛恨，因此，尽管后金国汗、贝勒实行抗拒者杀，家口为奴的高压政策，滥施屠掠，血腥镇压，辽东军民仍然挺身而出，英勇反抗。

就在辽阳失陷后金兵据城的恶劣处境下，城民也未俯首帖耳甘做顺民，而是针对后金贪婪好掠的传统恶习，“放火焚家，锅、瓮、窗纸，尽皆毁坏”，以示抗议。^②

辽东军民和满族阿哈采取的斗争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逃亡、起义为主。金军入辽初期，虽然各城明朝官将多已降顺，但广大辽民却高举义旗，英勇反抗。金国汗遣降将陈尧道为宽奠参将，同守备郭彦光、吕端招降四卫，行至镇江，古河屯民陈大等人，“不受伪命”，刺杀陈尧道三贼，“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

^① 《明神宗实录》卷447。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马虎山民任九，锡头山民金国用，马头山崔天、泰卓山、王恩绍等，“及东山矿徒”，“不肯降奴，各聚众以待大兵（明兵）”。^①盖州生员李遇春及其弟李光春等，“聚矿徒二千余人以守，奴使六人降之，遇春杀五人，其一人逸”。^②清朝官修的《明史》卷二百五十九也载称：“时金、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多结砦自固，以待官军。”

此后，镇江兵民起义，擒捉驻城游击佟养真父子，金兵往剿，“屯民结聚铁山拒之，奴仰攻，被伤三四千人”。^③广宁附近山区居民三万余人坚守山寨，拒不降金，复州民集议反金，约请明兵来援。各地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开展。

逃亡，是辽东汉满人民采取的又一主要斗争方式，被掠为俘沦为阿哈的汉人，愤怒反抗野蛮的奴隶制剥削，为金编户的辽民，痛恨金兵的屠杀掳掠，纷纷大批逃走。他们有的逃入朝鲜，待机返明。天命六年五月，“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④七月，镇江民又有三万余人渡江，逃入朝鲜。^⑤努尔哈赤为此于七月致书威胁朝鲜国王说，“据闻我所获得之辽东之民，多有逃往尔国者”，务须送还，否则将结仇怨，于朝不利。^⑥

逃往沿海岛屿及渡海入山东的，也很多。天命六年五月，仅山东登州、莱州，就接渡辽左金、复、海、盖四卫官民男妇三万四千余名。^⑦毛文龙据皮岛，辽“民多逃岛中”，众达十余万。其他长鹿、石门等岛，也有大量逃民。

进入关内的兵民更多，天命七年，已多达二百八十余万

① 《明熹宗实录》卷10。

② 《明熹宗实录》卷11。

③ 《明熹宗实录》卷14。

④ 《明熹宗实录》卷10。

⑤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

⑥ 《满文老档·太祖》卷24。

⑦ 《明熹宗实录》卷10、11。

人。①此后，逃者仍然络绎不绝。比如，以天命八年为例，这一年里，沙安峪等四村民众三千人，向明境逃去，清河、岫岩和礮河，都发生了大批逃亡的事件，复州城民一万八千余丁，欲尽数逃入明境。②

辽东军民还采取了投放毒药等方式进行斗争。不少汉民投放毒药于井水，以药饲养牲畜，放毒于食品中，以图毒死汗、贝勒和八旗官兵。后金刚打下辽阳不久，五月二十六日，便“发觉明人于汗都之各井，投放毒药”。二十八日，努尔哈赤到海州巡察，坐下吃饭，又发现八名汉人向井中投毒。③努尔哈赤不得不多次下达汗谕，告诫八旗官兵谨慎小心，明确指出，有人投毒于水，在盐中放药，以药养猪出售，谕令官兵不要在买猪当日宰杀，须过几天药毒散尽以后，才能宰食。用水用盐，都要格外小心，仔细检视，对于买来的葱、瓜、茄子，以及鸡、鸭、鹅等，也要谨慎察看，防止中毒。他还下达严谕，命令店铺主人，必须将店主姓名刻于石木上，立在店前，违令不办者，治以重罪。又禁革沿街流动售卖的小摊贩，因为这些人常用毒药谋害八旗官兵。④堂堂一国之主，竟要下达这样的谕旨，历史上是很少有的，可见汉民以投毒来进行斗争的行为，是十分频繁的，已经对后金统治者造成相当严重的威胁。

汉民还使用了其他方式，反抗后金统治，有的私藏兵器，违令不交，为起义作准备；有的藐视汗谕，收留“逃人”，清点人丁时又隐瞒不报，对抗搜捕逃人的严令；有的打死为非作歹的八旗官将，惩治欺压人民的暴徒；有的还张贴书文，斥责努尔哈赤是

①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0。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9、54。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2、23。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23、42、52。

“说尧舜之话，而心是桀纣之心”。①

《满文老档》载录了两条辽东人民反抗斗争的总结性材料，一条是着重讲逃亡的问题。天命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下令大杀“无谷之人”时，曾怒气冲冲地说：“应以无谷之人为仇敌”，因为，“盗牛马而杀者，火焚积谷及村中房宅者，皆系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也。”《满文老档》编写者解释说：“得辽东后，汉人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而不勤力耕田，故发怒而言也。”②

这是得辽东以后第四个年头时的局面，不管汗、贝勒如何巧言劝诱和严格控制残酷屠杀，包衣阿哈和一般汉民，就是不定居，就是要逃走，逃，逃，逃，不断地逃，大批地逃，根本无法控制。

第二年，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列举辽民武装反抗事例说：

“我等得辽东之后，不杀尔等，不变动住宅耕田，不侵犯家中谷物而养之。如斯育养，不从。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镇江之人，捕我任用之佟游击，送与明国而叛。长山岛之人，捕我所遣之使，送往广宁。双山之人，约期带来彼方(指明朝)之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行，为魏秀才告发。复州之人叛，约期带来明国之船。平顶山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

不念我养育之恩，仍向明国，故杀有罪地方之人。若念无罪地方之人，仍居其地，恐乱将不绝，因而移之，带来于北方。带来之后，住宅田谷，悉皆给与而养之。虽如此育养，仍放入奸细，受其割付，叛逃而行者不绝。今年，川城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2。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60。

之人，耀州之人，以被令带其户来，遣人往明国，约期率兵前来。彰义站之人，以明兵来时将棒打女真，而准备棍棒。又鞍山、海州、金州、首山，其周围各堡之人，皆放入奸细，约期引兵前来携之而去。”^①

这次汗谕，清楚地表明了辽东军民武装斗争的普遍性和连续性，从全军进驻辽东开始，斗争就风起云涌，连续不断，迅速扩展，遍及后金整个辖区。

尽管斗争十分残酷，满汉人民付出了很大代价，成千上万的起义逃亡者，惨遭屠杀，妻儿为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但是，鲜血没有白流，满汉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辽民大批逃亡，武装反抗，形成了“叛、逃甚多，乱”的局面，^②使得后金国中，城乡不宁，境内混乱，严重地影响了财力、物力和人力，威胁到统治者的根本利益。

在汉满人民强大的反金斗争沉重打击下，要想在高度封建化的辽沈地区，延续和扩大已经没落的野蛮的奴隶制，或者实行封建制与奴隶制并存齐行的方针，是办不到的，金国必将更乱。因此，以努尔哈赤为首的领导集团，不得不推行“各守旧业”、“计丁授田”等政策，承认封建制，进一步发展封建剥削制度，陆续缩小奴隶制的范围。后金国迅速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60。

第二章 过渡性质的新政策

第一节 “各守旧业”

“各守旧业”，是金国汗、贝勒进驻辽东以后对汉民采取的重要政策，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以后，它延续、演变为“民复其业”，对安抚汉民、稳定全国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所谓“各守旧业”的“业”，是民间习惯用语，用来称呼“百行百业”、“各行各业”的业，泛指农、工、商等各方面，按科学意义来讲，则应包括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等问题。比如，要说农业的业，则首先应该包含土地等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以及怎样进行生产等内容。

努尔哈赤多次对辽东汉民宣布“各守旧业”政策。最早的一次，是在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四月初一，即攻下辽阳后第七天，谕劝海州、复州、金州民归降时，正式提出来的。他下达汗谕说：

“攻取辽东城(辽阳)时，吾之兵士，死者亦多。如斯死战获得辽东城之人，尚皆不杀而养之，各守旧业。尔等海州、复州、金州之人，岂如辽东之攻战。尔等勿惧，……多

肆杀戮，能得几何，瞬时亦尽矣。若养而不杀，尔等皆各出其力，经商行贾，美好水果，各种良物，随其所产，此乃长远之利矣。”^①

同年五月初五，第二年七月二十八，第三年四月十二、六月十五，以及天命十年十月初三，又多次宣布和讲述“各守旧业”政策。^②从这些汗谕和督堂的告示，表明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后金汗、贝勒实行各守旧业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恢复统治秩序，稳定境内局面，安抚、控制辽东汉民，征租敛赋金派力役，而并不是为民着想，让辽民安居乐业，保障他们的田园财产。汗、贝勒拥有精兵十万，能对辽民大肆屠杀，可是，总不能全部杀光，尽杀以后，虽能席卷辽民所有财产，掠得大量金银财帛土地房宅，但以后怎么办？抢来之物，能用多久，“瞬时亦尽矣”。民皆杀戮，谁来耕田，谁来建造房屋，谁来贩运货物经商行贾，谁来栽植果树养花种菜，谁来养猪饲羊牧马放牛，米谷从何而出，菜蔬由何而生，棉衣从何而产，肉禽蛋瓜果从何而至，衣布又由何而成，就会如努尔哈赤所说，将辽沈人民的劳动果实——“口粮”，全部丢弃了，而各守旧业，让辽民继续耕田种地，修建房宅，贩运货物，却能获得“长远之利”，能够长期征收国赋私租金民赴役，永取于民。

第二，这项政策，保护归顺新汗的汉族地主、官绅和财东的利益，对劳动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各守旧业”政策，强调各自保有自己的祖业（如田地、房屋、店铺等等）。过去这些田宅为谁所有，今日仍旧物归原主，不得变更。辽东地区，本来贫富已很悬殊，广阔田地，主要为地主霸占，正如努尔哈赤所说：“昔日尔等明国富人，多占田地，雇人耕种，食之不尽，将谷出卖。贫困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1、37、49、55、66。

之人，无有田谷，买而食之。”^①金军进驻以后，汉族地主豪绅，¹既怕新君没收庄田霸占祖产，又怕劳动人民乘机反抗，夺取土地，抗租不纳，惶惶终日，坐卧不安。现在实行各守旧业政策，后金不没收民田，各人保有原来所有的产业，他人不得侵占。这首先是禁止佃农、长工、劳苦农民侵占田土，已经占取的，必须退还田主，尚未占夺的，不准再占。

当时，汉族地主、官绅和富商大贾，不少人死于战乱之中，许多人逃入关内，出现了大量的“无主之田”、“无主之宅”、“无主之谷”和“无主牛马”。仅在辽阳地带，以及辽南金、复、海、盖四卫，无主之田就多达一百八十万亩，与明朝嘉靖年间辽阳五卫、沈阳中卫和金复海盖四卫屯田额数一百九十四万余亩，相差无几，为辽东都司二十五卫军屯总额三百一十六万二千亩的一半，可见，相当多的汉族官绅地主遗下了大量的“无主之田和无主财谷”。兼之，此时金军新人，统治还不巩固，八旗官兵主要聚居大城要塞，边远州县尤其是乡村，戍兵很少，很多屯堡村寨，后金政权的势力还未达到，正是“叛、逃甚多，乱”的形势，这为贫苦人民夺取田地财谷，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农民占耕地主庄田被迫退回原主的直接材料，但下述一些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天命六年九月初八日，努尔哈赤谕令副将刘兴祚说：“查明盖州、海州属下无主谷、草，从速计量，给与我等兵士。”^②十六日谕佟驸马说：“佟驸马，尔告八游击、二都司：无主之谷、草，从速调查处理，征取送来，给与未给饲料之马。此事若不从速料理，无主之阿哈，将擅自卖尽矣。”^③又谕令新城游击说：“边境各处无主之谷，与其弃之，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4。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6。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6。

不如令欲取之人拾取。”^①

这三次汗谕，反映了三个问题。一是出现无主之谷、草的地区相当广泛，不只是盖州、海州和新城，而是整个辽东地区。因为，佟驸马是努尔哈赤委令专管辽东汉民事务的总兵官佟养性，八游击、二都司是进驻辽东以后新任之官，专门具体负责辽民之事，汗命他们清查无主之谷，就是让他们在所有汉民地区进行这一活动，足见出现无主之谷的地区是何等广阔，

其二，出现了相当多的“无主之阿哈”。这些“阿哈”就是汉族官绅地主的家内奴仆和穷苦佃农、雇工。汗谕未指出具体地区，而是命令专管辽东汉民事务的八游击、二都司清查，可见，在相当多的州县村屯里，地主富绅或死或逃，许多佃农、雇工、奴仆摆脱了业主、家主和东家的控制。

其三，这些“无主之阿哈”将主人的谷、草占为己有售卖与人的行为相当普遍，以致如不从速清查禁止，则将被他们出卖罄尽了，故努尔哈赤在八天之内，连下四谕，责令八游击、二都司赶紧清查和处理。

乡村如此，城市也不例外。天命七年正月二十四日金兵进入广宁，第三天，督堂就命令城内居民说：“无主之财物、人畜，以及店库所存之金、银、闪缎、蟒缎、帛、布、翠蓝布，各种物品，尔等所得甚多矣！今令尔等拿出，尔等取一半，另一半给与我等之有劳兵士。”^②

贫苦农民既能夺取无主之谷，就更有可能占耕死于兵火及逃走在外的地主的庄田，何况这些田地本来就是他们佃种佣耕的，当然不会抛荒不耘，一定会照样耕地种田收割庄稼，只不过是没有人鞭责催租罢了。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6。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33。

劳动人民的这些革命行动，打乱了旧统治秩序，破坏了旧剥削制度，引起地主阶级极端仇视，但他们又没有办法。现在，后金实行“各守旧业”政策，强迫劳动人民交出斗争成果，将无主田宅退出来，不许再占，帮了汉族地主的忙，这是真正的反攻倒算。

第三，后金汗、贝勒从推行“各守旧业”政策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首先，这项政策的实行，表明了从前屈居偏僻山区的小邦之汗努尔哈赤，已经一跃而为辽东的最高统治者，对各行各业都有权支配，有权调拨，可以让拥护新汗之人“各守旧业”，也可以将反金之人祖业全部没收，一切皆由汗安排，辽民俱为汗臣仆。后金辖区，尽系汗土，全为汗民。

其次，汗、贝勒拥有辽东全部土地的最高主权，霸占了全部无主田土。汗、贝勒可以迁民分地，可以赏赐臣僚庄田，也可以籍没罪人田产，当然更可以调拨土地，设立汗、贝勒的拖克索。一切逃亡、死绝之人留下的“无主之田”，皆归汗有。新君可以让逃亡的地主回来以后，根据规定的条件，归顺金汗，手持银钱，向督堂叩首乞求，从而领回自己的府宅、庄田、粮谷，收复旧业。^①汗、贝勒也可以令无田之民分种无主田土，纳赋服役，听汗驱使。

再次，拉拢汉族地主，为建立以满族贵族为主的新的满汉统治阶级联合专政，提供物质条件。要想统治以汉民为主的辽东，必须依靠和利用汉族上层人物，没有汉族地主的支持，区区数万丁的“满洲”，是不能在辽东站稳脚跟的，更不能长期统治下去。而要使汉族地主中的多数能够归顺金国，只靠汗谕的劝降，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多的东西，特别是涉及汉族地主根本利益的田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7。

产、府宅、银钱等等，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必须保障他们的所有权。“各守旧业”政策，使未逃的汉民地主，能够继续占有祖产，重收租谷，收回丢失被占的田宅财谷，当然会减少他们对新君的不满，促使他们拥护金国的统治。一度逃过河西去往广宁的人，返沈以后，只要投顺新主，也可依凭“各守旧业”政策，交纳一些银钱以后，领回祖业。这样，“各守旧业”政策第一次把满族贵族与汉族地主连接起来了，有了共同的阶级利益，为二者的联合统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又次，打击了反金官僚地主，扶植和加强了拥金地主、官绅的势力。“各守旧业”政策，使降金的官将、豪绅和富商得以收回失地，取回遗物，确保祖业。但对反金之人，则从重惩办，没收田宅财谷，新杀家主。这样一来，反金的地主、官僚势力大为削弱，拥金的官将、地主则实力犹存。而且，在这样的威胁利诱之下，有可能促使许多观望犹豫的地主投降新君，充当顺民，至少暂时不叛不逃，拥护金国。这就使汗、贝勒有了不少的忠顺臣民，有利于巩固和加强金国的统治。

最后，“各守旧业”政策，有利于鼓励业主认真经营自己的产业，役使佃农、雇工耕垦已荒之地，修渠开沟，施肥整地。再加上汗、贝勒实行的逼民定居，禁止叛逃等措施，强使辽民各自从事自己的行业，耕田种地，筑造房宅，这对改变当时田园普遍荒芜的局面，是有利的，也为逼令辽民纳赋服役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总的来说，“各守旧业”的政策，为后金统治者所想收到的“长远之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从阶级实质看，“各守旧业”是为后金统治者和降金汉民地主利益服务的政策，是奴役劳动人民特别是束缚贫苦佃农、雇工的政策，是阶级剥削的政策。从这一点看，它与历代王朝初期推行的“招民复业”政策，基本上是相同的。可是，它也有

其特殊之处，这就是满族贵族成为辽东的新主。因此，“各守旧业”就包含了民族歧视的因素，对反金的汉族地主严加惩处，对降金的地主、官绅则予优待。但是，归根到底，它仍然是阶级压迫的政策，只不过增添了一些民族歧视的色彩而已。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各守旧业”的政策，意味着辽东新主金国汗，承认了过去各行各业的旧传统、旧的产权形式和旧的经营方式，即承认和延续辽东过去存在的旧的剥削制度，而且还使一些旧制度暂时被冲垮、被打乱的地区恢复了原状。这就是说，奴隶主专政的后金国，进入长期封建化的辽沈地区以后，承认辽民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可以延续，并保障封建制，甚至在一些地方恢复封建制的剥削方式。

第二节 “计丁授田”

一、“计丁授田”的基本情况及其阶级实质

天命六年三月金军进驻辽沈以后，实行了“计丁授田”政策。这和历代王朝招民垦荒、授民以田，有很多相同地方，与明代辽东的军屯也有一定的联系，但它又有其独特之处。

《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四载，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计丁授田说：

“为分田事，先期传谕各村曰：海州地方取田十万日，辽东地方取田二十万日，共征田三十万日，给与我等驻居该处之人马，至于我等之众百姓之田，仍令在我等之地方耕之。尔等辽东地方诸贝勒、大臣及富人之田，荒芜者甚多矣，将该荒芜之田，入于我等所取之三十万日田内，亦可足

矣。设若不敷，可取自松山堡以东之铁岭、懿路、蒲河、范河、浑托河、沈阳、抚顺、东州、马根丹、清河、孤山等地之地耕之。如此，若仍不足，则可出境耕地。……今年耕种之谷，准其自行收取。吾今计算田亩，一丁给与种谷之田五垧，植棉之田一垧，均行给与。尔等勿得隐丁，隐丁，则不能得田矣。嗣后，原为乞丐者，不得乞食，乞丐、僧人皆分与田，勤加耕种。三丁耕官田一垧。每二十丁，征一丁当兵，以一丁服官役。”

同年十月初一日，努尔哈赤又下汗谕：

“降谕汉民曰：明年征收兵士之食粮、饲马之草料及耕种之田地。辽东五卫之人，令种无主之田二十万日，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之人，亦同样令种无主之田十万日。”^①

从这两次汗谕，我们可以了解到实行“计丁授田”的主要内容。其一，从法例角度说，用来分授的田地，不是有主之田，不是将现存辽民耕种、占有的土田没为官地，用来分配。而是明朝“诸贝勒、大臣、富人”即逃亡、死绝的汉族官绅、地主遗弃的田地，是没有业主的田土，是“无主之田”。其二，这些无主之田，既授与满族兵丁，也分与汉民。已经进入辽沈的八旗官兵，计丁承领无主田地，辽东五卫及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亦即辽沈地区的多数汉民，也计丁领地，每丁六垧，五垧种谷，一垧植棉。其三，辽民皆须首报人丁数目，清点编制，不许隐瞒，不得遗漏，均应固定在土地上，按丁承领无主田地，开垦耕耘，不准弃地不耕，四处行走。其四，授与田地，并不是白送，而是为了征收国赋，勒派差役，金民当兵。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7。

“计丁授田”政策的推行，对后金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满汉各阶级各阶层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阶级获利甚多，有的阶级则遭害极大，对于降金或不反后金的汉民地主来说，由于用来授与之田，是“无主之田”，不是没收他们的土地，因而他们的庄田，照旧归他们所有，祖业并未遭到损害。而且，地主富家丁多，努尔哈赤自己就说过，辽东贫富之间，人丁不一，悬殊很大，有的“一户有四、五十丁，或一户有百丁”，而有些户只有一、二丁。^①富人既有自家的老爷、少爷，又有雇佣的工人、家奴和佃农，原有人丁已经不少，开战以来，许多农民、市民流离失所，投靠富翁，又增加了很多丁。因此，如果他们的庄田，少于每丁六垧的数目，便可根据计丁领地的规定，分取无主之田，扩大自己的庄园。设若地多丁少，则可依照“各守旧业”的政策，保留全部祖产，不拿出多余的田地，让人分走。

至于贫苦农民，并不能从“计丁授田”法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所谓计丁授田的丁，并不是指一切成年的丁，不是单纯指年龄和性别而言，而是包含有特定的阶级属性的，包衣阿哈、雇工和佃农，都不能成为独立的丁，都不是计丁授田的丁，都必须包括在他们的家主、雇主、田主的户内。由此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在宣布实行计丁授田的汗谕中，虽然已经说到富家“雇人耕种”，即已经知悉并提到了雇工和佃农，但在叙述授田的具体办法时，除了列举乞丐和僧人领种田地外，并不明确提出阿哈、佃农、雇工可以分田，原因就在于此。联系到辽东土地占有和经营方式的基本现状是“富室多占土地，雇人耕种”，“贫苦之人，无有田谷”，那么，原为地主佣耕、佃种的大量贫苦农民，都包括在地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8。

主户内，都不能依靠“计丁授田”法按丁领受土地了。

“计丁授田”法，对巩固金国汗、贝勒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提供了大量军粮，保证了赋役的来源。按照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的第一次计丁授田谕，辽阳、海州取无主之田三十万垧，进行分配。一丁授田六垧，三十万垧可授给五万丁。照汗谕规定汉民三丁合耕官田一垧的标准来计算，汉民五万丁当耕一万七千垧，折合十万亩，以亩产一石五斗算，可收谷十五万石，一兵月食三斗，可供四万五千名兵士全年的口粮。当时，八旗兵丁总共只有四——六万丁，这就是说，将“无主之田”三十万垧分授汉民五万丁以后，征足额粮，可以收到供应八旗兵丁所需的大部分军粮。每二十丁征一丁当兵，以一兵服役，又可征金大量人夫。可见，实行计丁授田，对增加后金国收入，保证赋役来源，确是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这样演算，是为了说明授田的作用而简化计算的，实际情况自然更加复杂得多。比如，三丁合耕官田一日的规定，后来并未实行，而是征收赋谷赋银，一丁合共交银三两，五万丁可收银十五万两，能买谷数万石。又如，计丁授田，是后金基本政策之一，以后多次授地与民，用来分配之田，远远超过这三十万垧，它所起的作用，当然更大得多。但是，通过上述这样概括的简化计算，对认识计丁授田的问题，还是有好处的。

其次，保证了兵源，为建立和扩大八旗军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天命六年三月数万八旗军队打下辽阳以后，满族人丁陆续从建州老营迁往辽东，分拨田土，每丁六垧，逼令诸申纳赋服役，充当甲兵（详见本章第三节）。通过三丁抽一或二丁抽一当兵的制度，汗、贝勒获得了大批人手，建立了一支人数众多、开支很少（无月粮，军装、战马、兵器自备）的强大军队——八旗劲旅。汗、贝勒使用这支军队，残酷镇压反金武装，捕捉逃亡的阿

哈和汉民，强迫辖区内满汉人民交赋服役，并一再进攻明朝城镇，掠夺人畜财帛。不采用“计丁授田”的办法，就不能实行这样的“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耘，有事征调”的“兵农合一”的制度，就不能确保兵士的来源，就不利于巩固汗、贝勒的统治。

再次，为汗、贝勒拉拢汉族官僚地主，扶植拥金人员，增强统治基础，准备了有利条件。满族贵族进入辽沈以后，需要利用汉官来征赋金役，巩固金国统治。要用汉官为汗出力效劳，不仅要授予官职，给与政治特权，而且要让其有财可求，有福可享，能够在经济上得到实惠。可是，初入辽沈，国库空虚，财力不足，没有固定的大宗收入，不能沿袭明朝旧制，论官给与俸银禄米，只有依循满族故例，给与人口，计丁授田，让降金汉官收取租谷，金夫服役。这一点，皇太极讲得很清楚。他在天聪八年（1634）正月训谕众汉官时，追述了入沈初期情形说：“我国家地土未广，民力维艰，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势有不能。然蒙天眷佑，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获地土，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①

这样一来，降金汉官（尤其是原系末弁微员的汉官）通过计丁授田，得到大量田地，一个个成为人丁众多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大财主，当然会对新君感恩戴德，为汗、贝勒江山的巩固而效尽犬马之劳。他们的庄田增加越多，财势越大，在汉族地主中的影响就越大。这批汉官的命运和汗、贝勒紧紧相连，成为拥护、支持金国统治的一股重要势力。

最后，计丁授田，为满族贵族、官将继续剥削阿哈，榨取财富，提供了物资条件。原在建州时，汗、贝勒和八旗将领掠夺了

^① 《清太宗实录》卷17。

大批人丁，设立拖克索，迫令阿哈耕田种地，采参打猎。进驻辽沈以后，一方面掠民为奴，没民为奴，同时又将旧有阿哈大部分移往辽东。这样，人丁很多，劳动力是有了，可是，如果没有土地，也就不能使用这些劳动力，就难以坐享其成了。通过计丁授田，解决了这一问题。满族贵族、官将，按丁（主要是占有的阿哈）分取大批田土，役使阿哈耕种，纷纷成为广占良田沃壤，敛取租谷差银的大土地占有者和大庄园主。

二、“计丁授田”之田的生产关系

一般地说，“计丁授田”，本来是讲授地与谁，归谁所有之事，只涉及土地的分配和土地所有权问题，并未直接谈到生产关系的形式。它可以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领取大量土地的家主，役使奴隶劳动，粮谷收入全归主人，奴隶一无所有，衣食于主。它也可以是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或者是农奴耕种其地，给主子交纳差银租谷，或者是佃农承领土地，向地主纳租贡物，或者是主人雇佣封建性质的长工、短工，给付工银，占有产品。它也可以是领地农民自耕自食，向国家交上官赋，为国出役。它甚至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分得田土的所有者，雇募人身自由的工人，支付工钱，进行资本主义的剥削。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因此，不能一见到“计丁授田”，就不加分析地断言这是封建制或其他什么形式的生产关系，还须联系全局，综合研究，具体分析。

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七月宣布实行的“计丁授田”法，既涉及土地所有权形式，也包含了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同类型的领地者，其所采取的经营方式和生产关系，亦各不相同。从土地所有权的角度来看，汉民按照“计丁授田”法而承领的“无主之田”，

实际上已归他们占有，已经成为与其他“业主”占有的土地基本相同的“民田”了。金国英明汗对这部分土地，如同对其它民田一样，有最高的主权和最高的所有权，必要的时候，可以调拨，可以另行处理。但是，宣布授田的“汗谕”，并未对受田者施加特殊的限制，没有规定不准出卖、不准转让、不准传给子孙，也未要求限期归还，亦未命令受田者死后田土入官。在赋税征收上，也没有专门增添的新项目，而是和对待一般的“旧业”、一般的“民田”一样，施行同一标准，不象明朝对官田与民田的征赋，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从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看，天命六年七月和十月的两次“汗谕”，并未说明授与汉民的田地应该怎样经营，是什么样的经营方式？也没有明确规定产品如何分配？是归民所有，还是其他？可是，有几点需要注意。其一，不能忽视辽东地区原先土地占有和经营形式的基本状况，即主要是地主占有田地，奴役贫苦农民，进行封建的租役剥削。这是左右辽民的基本生产关系、基本土地经营形式。实行“计丁授田”，不可能完全离开这个范围，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不受其制约。何况不少的降官、降将，本来就是封建地主，对佃农索要租谷，他们按照人丁领受土地后，能不照其老样、照其祖传方式，来经营领来的土地吗？

其次，汗谕只规定了领田的民丁需要纳赋服役，并没有说生产的粮谷全部归汗所有，这和明朝政府对民田的规定，是完全相同的。既然要交纳租赋，就意味着田地所获归民所有，只有一部分产品以赋税形式上交国库，明朝的民田也是如此。

再次，《满文老档》卷五十五，载明了土地经营的情形。天命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后金令迁南方州县汉民时，下书晓谕汉民说：

“尔等移来之人，父兄当先来，记取受领尔等之住宅、

田、谷。诸子弟率领包衣(booiniyalma)善为耕作，收取田之谷物。对于尔等之谷物，我等不干与，任凭尔等之意，运各自之谷而食。”

这里明白地指出，田主的子弟率领包衣种地，收获谷物。此处讲的辽民“包衣”，并不是满族的包衣阿哈，也不是奴隶或农奴，而是汉民的佃农、雇农，即努尔哈赤所说的“耕田阿哈”。而且，这里用的行文方式，是概括性的叙述方式，泛指南迁汉民，不是指迁民中某一户、某几户，可见此时汉族地主役使佃农、雇农耕田的行为，是相当普遍的。这和金军进驻之前，辽沈地区普遍存在的封建租佃关系是一致的。

当然，也可能有少数汉官使用奴隶性质的包衣阿哈耕田种地，采用奴隶制剥削方式，不应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从上述几个方面看，在授与汉民的土地上，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仍然是基本的、主要的生产关系。

综上所述，天命六年三月八旗军进驻辽沈以后，汗、贝勒确实在全国辖区内推行了“计丁授田”政策，将大批“无主之田”按丁分与满汉人员。这样一来，使封建制的剥削方式在授与汉民的广阔土地上延续下去，满族贵族、官将占有了大量田地，增强了拥金汉族官僚地主的力量，促进了满族贵族与降金的汉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结合，为二者的联合专政(当然是以满族贵族为首)，提供了又一重要物质条件，对加速后金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第三节 按丁征赋金役

一、封建赋役制度

努尔哈赤很重视征赋金役的问题，进驻辽沈后，多次下谕催收国赋。直到天命十年(1625)十月，他降谕大杀反金汉民时，仍专门指出，将“小人”留下，不杀，因为“小人”是“筑城纳赋之人”。^①努尔哈赤所说的“小人”，就是耕田种地修建房屋的劳动者，这就是说，让百姓活着，就是为了使百姓给统治者筑造城池，纳粮当差，讲得够明白的了。

对于汉民的赋役项目和数量，努尔哈赤在天命六年七月宣布计丁授田的汗谕中，曾规定“三丁耕官田一日”。这种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太古老了，根本不适合于长期封建化的辽东地区，不能推行，只有另订新法。

天命六年八月十七日，努尔哈赤下令：“从速逼迫催征依照旧例征收官赋之谷草”。九月十六日，又谕佟养性转令八游击、二都司，“官赋征收之谷，须并征以草”。十二月初十日，再下汗谕，指责盖州副将刘兴祚说：“依照旧例征收之谷、银、炭、铁、盐等官赋，何故不从速催督遣送。”并指令“遣佟备御率兵一百，令其催征依照旧例征收之赋。若无兵，谁畏殴打耶？”不久，又连下三谕，催征官赋。^②

这些“汗谕”，是针对全体汉民而言，所有汉民都要遵守，不是只局限于个别地区的民户。有的谕令一开始就明确写：“汗之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5、26、30、31、32。

谕下于汉人曰：”，即是说，不管是辽南，还是辽北，不管是边境，还是辽阳、沈阳中心地区，也不管是计丁授田之田，还是“各守旧业”之田，所有汉民都必须遵守这些谕令，交纳官赋。

这些汗谕，都着重强调依照“旧制”、“旧例”，征收各种官赋。这里所说的“旧制”、“旧例”，并不是建州故制。因为，从女真国到后金国，进入辽沈以前，辖地不广，人口不多，且主要是称为“诸申”、“女真”的满族，汉民基本上沦为阿哈，全体居民都编入八旗，没有专门的汉民，征赋金役时，是按八旗制进行的，没有成套的、固定的、正规的赋役制度，一切军费、用费，皆由八旗各牛录临时摊派，没有固定的额赋，也就是说没有“旧例”。

这些汗谕所讲的“旧例”、“旧制”，不是其他国家、民族的故俗，而是明朝政府在辽东征收国赋的赋役制度。第一道对汉民征赋的“汗谕”，即天命六年八月十七日的汗谕，就命令“从速逼迫督催依照旧例征收官赋之谷草”。金军是三月入沈，八月是其进驻以后第一次收获季节，也是第一次在新的辖区专门对汉民征收官赋，可见，汗谕中所说的“旧例”，应是明朝的征赋制度。

十二月初十日的汗谕，讲到“依照旧例”征收的官赋项目说，有“谷、银、炭、铁、盐等官赋”，这和明朝政府在辽东征赋的项目基本相同。明嘉靖年间，辽东都司额田三万一千六百二十顷，额粮三十六万四千九百石，额盐三十七万七千四百七十三斤，额铁三十九万五千零七十斤，额草五百九十四万六千三百束。这也表明，“汗谕”说的“旧例”，就是明朝征赋的办法。

十二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在谕令副将刘兴祚“依照旧例”征收官赋时，又着重指出，“汉官私下擅自征收之谷、草、小麦、芝麻、线麻、蓝靛、笔、纸等物，俱皆革除”。将此谕和五个月前的“计丁授田”谕相比较，该谕中努尔哈赤明确指出，要将过去明朝官将私征各物，尽行革除。他说：“尔等明国之参将、游击，

一年所取者，豆、高粱及粟，合共五百石，还有麻、麦、蓝靛，每月食用之米、菜、木炭、纸，又取银十五两，我今将此苛政，尽行革除。”^①两谕列举的汉官私征之物，何其相似。这也说明，“旧例”就是明朝政府的“旧制”。

当然，金国与明国很不相同，剥削方式与传统习惯，与明也不一样。因此，在赋役制度上，也有其特殊之处，主要是从天命七年起，在保留明朝征收封建赋税的主要项目和正额数量的条件下，渗进了入驻辽沈前的传统作法，即实行以丁为主要计算单位的计丁征赋金役制，而不是象明朝着重以田土为纳粮单位的计算办法。我们可举下列诸例为证。

其一，努尔哈赤规定，八旗官将计功分等，各食若干丁的钱粮。比如，总兵官额亦都，因有大功，本人及子、孙三代，都“食百人之钱粮”；车尔格代子参将，“一等备御之钱粮十人”；哈拉代子参将，“三等游击之钱粮十二人”；达珠瑚代子副将，“一等游击之钱粮十六人”；贝和齐，“食二等参将之钱粮，二十二入”；巴锡，“二等备御之钱粮八人”；额和诺，“三等备御之钱粮六人”；“千总，四人”；“把总，各三人”；“守堡，各二人”。^②

所谓食多少人的“钱粮”，就是指这些人丁每年应上交国家的“钱粮”，不交官库了，作为俸禄，由这些官将享用。天聪八年（1634）正月，众汉官要求减免所占有的人丁徭役时，奏称：“我等向蒙圣恩，每一备御免丁八名，止免其应输官粮”，其余杂差，“仍与各牛录下堡民三百十五丁一例应付”。^③这八丁免去的“应输官粮”，就归家主享用，可见，赋税（官粮）是按丁核算计丁征收的。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4。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62。

③ 《清太宗实录》卷17。

其二，天命七年正月初八日，努尔哈赤下令：“以平虏堡之四百三十四丁，给与蒙古恩格德尔额附。……一年征收官赋，银一百两，谷一百石，以我之手给与。”^①平虏堡在辽阳西北，接近蒙古地区，没有实行计丁授田。努尔哈赤以平虏堡汉民赐给恩格德尔，一年四百三十四丁征官赋银一百两、谷一百石，平均每丁征银六钱三分、谷二斗三升。这些银谷本应上缴国库，因堡民赐与恩格德尔额附，故交与他。这里，根本未提此堡有多少田地，每亩应交多少赋银赋谷，而一概以丁计算。足见在未实行计丁授田的地区，对汉民的征赋，也是按丁计算的。

其三，天命八年二月十二日，努尔哈赤以厚赏劝诱恩格德尔来归定居金国时说：过去，“曾给汝之一千丁，一年所取之六十六两银、一百一十石谷，仍照旧给与”。现在，如来长住，将赐尔等八千丁之赋谷赋银，“一年取银五百二十两、谷八百八十石，服役之人一百四十人，牛七十头，护身兵士一百四十人”。^②在这里，明确讲了赐八千丁的赋谷赋银，却不讲赐多少土地的田赋，这也表明，金国是实行计丁纳赋的制度。

其四，督堂上报丁银的材料。天命八年二月初十日，“督堂计算后而上奏之书曰：一年一丁之征取官赋者，赋谷、赋银、饲军马之料，合共三两。按三两银计，淘金之六百丁，一年取金三百两。炼银之一万丁，取银三万两。”^③

这段材料十分重要，很有说服力。这是金国处理日常政务的督堂“计算后”得出这个数字，向汗奏报的，是全面概括金国情况的总结性材料，不是讲个别地区个别人丁的负担。每丁征收的项目，有赋谷，有赋银，还有饲养军马的草料，即包括了主要的官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2。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5。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45。

赋项目，加起来折为白银，合共三两。从交纳谷、银、草料的农业上的丁，推广到炼金、炼银之丁，皆照此数，每年一丁也收三两。这就非常有力地说明了，此是通行金国的征赋标准，金国就是这样以丁为计算单位，按丁征取官赋。

汉民承担的徭役分两个方面，一是按丁出兵，一是计丁派夫。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的“计丁授田”谕，规定汉民每二十丁，出一丁当兵，一丁服役。十一月十九日又进一步具体规定：“贫富均以丁计，二十丁，出一丁为兵。若有急事，十人出一人，使之服役。若系缓事，百人出一人服役。百以下，十以上，视其事而使之。”^①

二十丁出一丁当兵，这是很重的徭役负担。因为，不仅是要出人丁服兵役，而且还要自备衣服、兵器 and 战马。天命七年正月初四日，努尔哈赤下谕：“二十丁，征一人为兵。此当兵之人，乘十两之马，以及携带之器具，令二十人合同征之。”^②

同月初二日，又下汗谕，详细规定满汉将官各依所辖人丁多少，准备相应数量的大炮、长炮。管四千人的汉官，准备大炮十、长炮八十。管三千人者，准备大炮八、长炮五十四。管二千人的汉官，准备大炮五、长炮四十。^③所谓汉官准备，实即系各将辖属下的汉民共同负担，平均每二百丁要准备长炮四门、大炮半门，需花费大量银两。

每二百丁，需出十名兵士、十匹马。每马官价定银十两，十匹马一百两。二十名兵士的衣服、兵器（刀、枪、弓、箭）、鞍辔，以及四门长炮、半门大炮，要用大量银两，负担十分沉重。

金国金派役夫的比例也很大。当时，征战频繁，城工迭兴，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8。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32。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32。

既筑新都，又大修各地重要城池，拉石运木，载土装沙，征调了大批民丁和牲畜，常常是十丁出一夫，甚至是五丁出一夫。比如，《满文老档·太祖》卷三十二载，天命七年正月初四日，努尔哈赤下令，汉民十丁出一丁，并出牛车三辆，筑造汗的都城。金州、复州，每十丁，出二丁筑城。

这还只讲到正赋，还未谈到额外苛索。虽然努尔哈赤多次宣布只收正赋，指责明朝官员贪污不法，敲诈民财，一定要革除过去汉官私下逼取民物的陋习。但是，金国的额外苛派，也是很厉害的，项目不少，数量很大，仅只是天命八年二月十六日，令女真官员管辖的汉民，每三丁交纳额外粮谷二石，一石送往沈阳，一石送往辽阳（或海州），就敛取了汉民粮谷一、二十万石，超过了每丁正赋的数字。^①

汗、贝勒还利用贫苦农民缺乏耕牛的困境，把掠夺来的牛，以“官牛”名义出赁于民，征收租谷。也就是在对汉民额外征谷的这月，督堂下令说：“官赋之万牛，今年饲养者，可以耕田，依汉人之旧例，赁一牛，给与汉人之石五石谷、草百束。”^②赁一牛，取谷五石、草一百束，一万头牛可收谷五万石、草五百万束，此数相当惊人了。

以上谈到了金国对汉民征赋徭役的基本情况，这些事实表明，上述赋役制度，是封建的赋役制度。因为，从理论上说，它是沿袭明朝“旧例”，基本上采用了明朝收赋派役的办法，明政府是封建政权，所实行的赋役制，是建立于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是封建的赋役制度，金沿明制，其赋役制当然也是封建性的。从实际上看，金国以丁为计算单位的赋役制，与土地密切相关，与“计丁授田”、“各守旧业”紧密相联。各守旧业的田主，有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5。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7。

土地，计丁授田的人丁也有土地，努尔哈赤授与汉民土地，就是要他们“三丁耕官田一垧，每二十丁征一丁当兵，以一丁服官役”，计丁纳粮当差。八旗人丁领地之后，也是“凡百差徭，皆从此出”。这都清楚地表明了，赋役的征金，离不开田地，领种汗、贝勒之田，就得向汗交赋服役。这种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征收官赋派民服役，当然是封建性的，是封建的赋役制度。

二、诸申下降为封建依附民

进入辽沈以后，诸申的赋役负担越益沉重，处境更加恶化。

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的“计丁授田”谕，规定了已来辽东的八旗兵士，也计丁领种“无主之田”，一丁六垧，五垧种粮，一垧植棉，后减少为每丁领田五垧。这样一来，过去建州时期耕种氏族公有田地的诸申，变成了领种汗和八贝勒所有的无主之田的伊尔根，就必须为汗、贝勒纳粮当差，下降为汗、贝勒的封建依附农民了。所谓“每丁给田五日，一家衣食，凡百差徭，皆从此出”，^①就是讲的这种情形。

诸申必须按丁交纳官赋，天命八年二月，督堂总括金国情况计算后说，每丁交赋谷、赋银、马料合共三两，这也可能是诸申每丁上交的正额官粮数目。

对于诸申来说，更为繁重、更为艰苦的是金丁披甲派遣差役。随着后金辖地的扩大，战争的频繁，反金斗争的发展，汗、贝勒更需要加强暴力统治，增加士卒，扩大军队，因此逼迫更多的诸申当兵从征，屯驻要地。

天命三年四月攻抚顺时，一牛录有五十甲，即六丁抽一。后

^① 《天聪臣工奏议》卷上，页7，高士俊：《谨陈末议疏》。

陆续增多，到六年十月，已是每牛录金诸申一百披甲，三丁抽一为兵。第二月，努尔哈赤下谕，每牛录增披甲五十，分驻辽阳、海州，二丁抽一当兵。天命七年正月征明广宁，每牛录一百甲从征，五十甲留守。^①二丁抽一，兵役过重，诸申实在负担不起，难以长期坚持，所以，天命十年正月，已改为每牛录出一百甲，三丁抽一，以后，大体上遵循此制。

二丁抽一，三丁抽一，兵士的军装、兵器、战马，皆须自备。军马一匹，价银一、二十两，最贵时，三百两银一匹。刀、箭、弓、枪，需银很多，用费浩繁。一般兵丁，仅有口粮，并无军饷，只能免除一至二丁的官赋，没有其他优待，全靠耕种计丁领来的土地收获。长期当兵，征战驻防，耕种困难，入不敷出，缺吃少穿，度日艰辛。

而且，除了披甲当兵以外，还要承担名目繁多的差徭。每牛录需出六人以上，在汗、贝勒府宅服役。每牛录养官马十六匹，又需派若干余丁饲养牧放。每牛录还要出守台人、铁匠、银匠、弓匠若干名。^②

筑造城池，是苦累诸申的重大负担。既修汗都，又建州县各城，大工屡兴，期限急迫，严督赶造，满汉兵民皆困。努尔哈赤也不得不承认：“我等旧女真，又有修筑各城官役之苦。”^③

其他临时差派，也很繁重。现以天命八年二月为例，初一日，命一牛录出一人，自广宁往辽阳，迎接汗的诸福金来广宁。初三日，一牛录出一人，护送乌尔古岱额驸之子恩塞德里的尸体，自杏山回辽阳。初四日，巴笃礼总兵官率一牛录的五甲，大贝勒代善领一牛录的十甲，去驱赶义州等地汉民。初六日，命辽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28、33。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1、62。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7。

阳各牛录之人，以三分之一驻戍各地，其田由另三分之二的牛录人耕种。初十，派莽谭领一牛录各出的一甲，赶逐沿海剩余的汉民，又令每牛录各作一个梯子。十四日，喀克笃里副将率每牛录出的五甲，驱赶镇安堡的编户。二十四日，驻广宁的女真兵士，每牛录出二十人，赶运河西的粮谷。二十七日，命一牛录出十五人，饲养朝鲜马。^①可见，临时差派何等之多！

二丁抽一、三丁抽一披甲当兵，长期性的养马、打铁和侍奉汗、贝勒的官役，筑造城池，临时差派，这一切，几乎把所有诸申都网罗在内，在这样条件下，诸申怎能安静务农耕田种地，家境自然窘困不堪。

总起来说，通过计丁授田和按丁征赋金役，诸申已下降为领种汗的“无主之田”交纳官粮的封建依附农民，与汉族贫苦农民的处境基本相同，成为金国统治与奴役的伊尔根了。

第四节 禁杀包衣和阿哈的“首主”

进入辽沈以后，包衣阿哈的数量比过去又增加了很多，主要是战争中掠夺人丁，逼令为奴。努尔哈赤一向实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方针，“抗拒者杀，俘者为奴”，在攻取辽阳、沈阳时，掠夺了大量汉民，作为俘获，逼令充当阿哈。后来，镇压各地反金人员，又掠夺了大批俘获。天命六年五月初五日，努尔哈赤因镇江民不愿发归顺，坚决抵抗，斩杀劝降金使，特遣乌尔古岱额驸率兵前往，携带汗谕，诱令投降，并威胁汉民交出为首之人说：“若不肯降，明以十三省之兵俱皆来战，尚不能胜而被杀，尔等岂能胜哉！因一二人之恶，何为殃及众人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4、35、36。

而死耶！”^①汉民拒降，立即进攻，大杀抗拒之人，将其妻子儿女编为俘获。^②

七月二十日镇江民起义，生擒城主佟养真游击，努尔哈赤闻讯盛怒，立遣二贝勒阿敏、四贝勒皇太极率兵前往，大肆屠杀，其余民及家口尽行编为俘获。九月，又遣兵至镇江，掠夺叛乱民人，得俘获三千。^③

天命七年二月初，派兵围攻广宁北山各寨拒降汉民，尽杀男丁，掠其子女为俘获。^④三月二十二日，谕令镇江匿守山谷的汉民下山归顺，不从，纵兵攻打，掠夺俘获。^⑤

天命八年四月，沙安峪等四村汉民向明境逃去，沿边驻兵闻讯，急追，尽杀其男，以子女为俘获。^⑥六月，因复州城民欲逃往明地，大贝勒代善领兵二万前往征剿，杀一万七千余丁，掠其子女为俘获。^⑦

此外，查寻逃人时，将逃人（包衣阿哈及汉民）及收留者处以重罪，没为阿哈。一些违犯法令的辽民和女真诸申，也常贬罚为奴。这样一来，包衣阿哈急剧增加，远远超过了建州时期的数量。

这个阶段的包衣阿哈，并不是仅只从事家务劳动，而是被迫从事各种苦活，主要是束缚于家主的拖克索内，耕田种地，仍然是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劳动力。

汗、贝勒、八旗官将的拖克索，遍布金国各地，役使大批包衣耕种。我们可举三例为证。天命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努尔哈赤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1、22。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4。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36。

^⑤ 《满文老档·太祖》卷40。

^⑥ 《满文老档·太祖》卷49。

^⑦ 《满文老档·太祖》卷54。

召集“八贝勒家之人”，下谕说：“将原先给与各自拖克索之汉人，皆送于稽丁处，再恰如其分而取之。”^①这里明确讲到，过去曾将汉人分给各贝勒的拖克索，这些汉人，就是被掠为俘获的包衣阿哈，因为，编为民户的汉民，是分隶满汉官将管辖，是不会给与八贝勒庄园的。

天命七年正月初五日，即距上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努尔哈赤又下谕说：“将抚顺得获之汉人，给与我等之诸贝勒，其领催管辖之人，由各自之主人察看任置。”^②联系上一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攻取抚顺时掠取的汉民，相当多的是归诸贝勒占有了，安排在他们的拖克索内，责令他们耕田种地，从事农业劳动。下一道汗谕，对此讲得更加明白。

天命七年二月，努尔哈赤从广宁致谕留守辽阳的诸贝勒说：“将尔等得获之二百匹马、四百头牛，给与自乌噜特来之（蒙古）诸贝勒。所得汉人，亦给与自乌噜特来之诸贝勒，为种圃置拖克索之人。”^③这不是指的个别人个别拖克索，而是富有代表性的概括性材料，很能说明问题。这道汗谕讲得十分清楚，将俘获的汉人，给与来投的蒙古乌噜特部各贝勒，并不是供家内劳动用，而是用于种菜，用于耕田，作为“种圃置拖克索之人”。这就有力地证明了，被俘为奴的汉人，是在贵族、官将的拖克索中干活，是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

当然，包衣阿哈还被迫承担其他苦役。好些阿哈在汗宫、贝勒府宅和额真大院中当牛作马，侍奉家主，披星戴月，攀山越岭，伐木砍柴，肩挑背磨，运回府院，还要深井汲水，洗衣洗菜，淘米煮饭，点烟倒茶，略有怠慢，即遭毒打。一些阿哈为家主牧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0。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32。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37。

马放羊，养猪饲牛，成年累月，跟着马羊四处游牧，日逐水草，夜宿荒滩，日晒雨淋，风雨交加，艰苦之极，

更为劳累而且十分危险的，是“打牲”苦役。汗、贝勒、大臣都派遣包衣阿哈，前往乌拉打牲。阿哈们跋山涉水，千里迢迢，进入崇山峻岭，参天大树，蔽日遮月，草高过头，难寻踪迹，十天半月，不见人烟，悬崖绝壁，烂泥深坑，行走艰难，兼之虎啸狼嚎，熊闹豹吼，声震大地，闻之丧胆，万分危险。阿哈们忍饥挨饿，顶风冒雪，冻僵手足，四处奔走，找寻人参，采摘松子，下网设套，捕鸟捉貂，猎虎斗豹，无比艰险。费尽千辛万苦，流血流汗，甚至葬身于猛虎腹中，好不容易才捕捉到虎、豹、貂、鹰，采挖到人参、松子，捞取到东珠，又全为家主霸占享用。

主子出征，阿哈跟随从行，牧马做饭，背运兵械，敷陈马鞍，甚至陪主上阵，厮杀肉搏，枪刺刀砍，身负重伤，血洒战场。

阿哈的人身，严格隶属于家主。努尔哈赤于天命八年正月二十七日下的汗谕，对阿哈的地位、待遇，作了根本性的规定。努尔哈赤说：

“天之子汗，汗之子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伊尔根，主(ojen额真)之子阿哈。……阿哈以主为父，若敬思弗忘，不萌贼盗奸诈凶暴之念，小心翼翼，而尽力于阿哈之事，则刑罚从何而至！……阿哈若不小心翼翼，尽力从事主所委托之事，违之，而为盗贼奸诈凶暴之行，则将为主所责，受刑罚矣。……若不尽力，违背怠慢，则主将发怒，而打伤矣！”^①

这些谕令的中心意思是，贬降阿哈为子，迫令尊主为父。主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0。

为父，就是阿哈的统治者。阿哈为子，就是沦为被剥削者，是被尊奉为父的主子的鱼肉对象，是主子役使的牛马。阿哈对于家主，必须“敬思弗忘”，俯首帖耳，奴颜婢膝，唯命是听，不得违抗，不能冒犯主子威严，不准反抗家主。阿哈必须安于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尽力于阿哈之事”耕田种地，上交产品，不得怠慢不恭，否则，家主有权惩治阿哈，皮鞭大棒是主子统治阿哈的常有武器，鞭挞杖笞是金国允许额真惩罚阿哈的合法手段。

尽管汗、贝勒对阿哈施行严格的统治，阿哈仍然遭受家主野蛮压迫，但是，由于包衣阿哈的长期斗争和满汉人民的坚决反抗，统治阶级也不能完全按照古老的方式奴役阿哈了，家主已经不能任意杀害包衣了。这在下述四个方面，反映得十分清楚。

其一，将天命八年正月二十七日的“汗谕”，和过去的传统习惯说法，加以比较。在先前阿哈是奴隶的阶段，家主可以任意打杀阿哈，可以公开用“打杀”来威胁奴隶。明代前期，建州卫女真都督李古纳哈，“饮酒发狂，不分金刃，打杀西亏柳”（西亏柳，系古纳哈的汉奴）。①汉人金宝轨被建州女真兀纥乃抢去，“做奴听使”，金难忍其虐，逃走出外，被兀纥乃之子遏儿哥抓回。遏儿哥大骂金宝轨说，等父打围回家后，“便打杀你了”。②努尔哈赤之三伯祖索长阿，为了领取赏金，告诉栋鄂部长克彻，愿将自己的两个阿哈杀死。③现在，努尔哈赤在“汗谕”中，专门讲阿哈的问题时，只强调家主可以斥责阿哈，可以施用刑罚，可以打伤阿哈，但却只字不提可以杀死阿哈，这表明，家主已经不能任意处死阿哈，所以“汗谕”才不提额真有权杀害包衣。

其二，天命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牛录章京郎善控告色勒备御

① 《朝鲜世祖实录》卷39。

② 《朝鲜成宗实录》卷79。

③ 《满洲实录》卷1，满文体。

横行不法，以制作纸钱之故，打瞎了郎善之妻的眼睛，并揭露色勒过去藉口“有狐魅”，打死家中一女阿哈，打死其所辖牛录下一妇女。法司审理属实，虽然色勒是努尔哈赤的堂侄，其祖礼敦在景祖觉昌安创业过程中立下大功，甚受努尔哈赤尊重（景祖迁葬东京时，以大伯父礼敦陪葬，后追封武功郡王），但亦将色勒治罪，革其备御职，打死二妇，取二人以偿，罚银十五两。^①这个判决，是不合理的。人命关天，打死两个妇女，才罚取二人，革职，确是轻惩了，也许因为色勒是英明汗的堂侄的原因。但是，这个案例也反映出一个重要的变化，即现在家主已不能任意打死阿哈，杀害包衣，这是违法行为，要受法司审理，要受惩治，尽管处罚较轻，毕竟也定了罪，杀死阿哈总算是不合法的。这与从前的古老传统（主人可以打杀阿哈），的确有较大区别。

其三，家主固然可以施用刑罚，辱骂阿哈，打伤阿哈，但也有一个限度，太野蛮了，也是不行的，要受到制裁。《满文老档·太祖》卷四十二载，什拉纳之弟阿纳家中，一个女阿哈逃走，抓回以后，阿纳之妻残酷迫害，竟用烧红的铁器烙女阿哈的阴门。审案大臣认为，阿纳之妻的这种行为，是kooli akū，曾拟以死罪，后免死，改为刺耳鼻。对逃走的阿哈，也定罪，削其耳鼻。kooli，意为定例、法例、例，akū，意为无、没有。kooli akū，直译为无法、无例，没有法例，意译为破例，即法官认为，这一暴行违犯了国法，违犯了家主对待阿哈的法例，须加以惩治。虽然这种处罚，不算太重，但与过去把阿哈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人有绝对支配权，可以任意打骂砍杀，不受任何限制，两相比较，总有了一些约束，毕竟前进了一步。

其四，现在阿哈可以告发家主违犯国法的行为，审理后，阿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6；《武皇帝实录》卷4。

哈离主，另投他府。天命八年六月，叶赫备御石宁的包衣阿哈，告发其主在南方戍守时杀死逃走的汉民，私自隐藏此人的衣服，法司审实，革石宁的备御官职，“令告发之阿哈离主”。^①

沙津参将被其包衣女子告发说：主子勒索汉民四十头猪和一百只鸡。督堂审实后，罚银治罪，并惩治拘留、虐待女阿哈的库里、扎克旦、宁古沁三千总。^②

苏尔玛的女阿哈，告发其主有谋杀人命之嫌说：苏尔玛之姨夫纳米达哈里被杀的那一天，纳米达哈里之妻来向苏尔玛耳旁密语后，苏尔玛即乘马带腰刀外出，当天纳米达哈里便被人杀死。众督堂审理后告汗，汗说：纳米达去拖克索时，为什么不带腰刀、弓和撒袋，为什么空身而去？“若尼堪杀就杀了，如苏尔玛杀就杀了，总之皆是死”。遂定纳米达罪，释放苏尔玛。”令告发之女子离开苏尔玛，给与阿拜阿哥。^③这个案子，本来已认定苏尔玛是杀人凶手，有罪，但因汗厌恶纳米达哈里只身出外，故治其罪，释放了苏尔玛。即使这样，也让其阿哈离主，另与他人。

以上所述家主不能任意杀害阿哈，主人对包衣的虐待有一定的限制，不能超越国法规定的范围，阿哈可以首告有罪的家主，与主分离，这些情况集中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家主已不能象过去对待奴隶那样，完全占有阿哈人身了。联系到产品分配形式有了改变，阿哈领种拖克索田地，交纳租谷，可见此时的阿哈，已从入辽沈前衣食于主的奴隶，正在迅速地向家主不能完全占有身身的封建农奴过渡，原有的奴隶制拖克索急剧向封建农奴制庄园转化。这是生产关系的一大变化，是满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6。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6。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51。

第五节 天命十年的编庄

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三日，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下达长谕，指责汉民不听管辖，心向明国，叛逃不绝，命令八旗满官奔赴各地清查，大杀反金人员，将“筑城纳赋”之“小人”，留下不杀，编进汗、贝勒的拖克索，新置了大批庄园，一部分拖克索赐与八旗官将。《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六对此事作了详细记载，摘录如下：

“汗曰：我等常养汉人，而汉人准备棍棒不止。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去各自之村，区分汉人（大杀反金人员）。……为我等筑城纳赋之人，则养之而编拖克索。……一庄以十三丁七牛编成，将庄头之兄弟列入于十三丁之数。将庄头本身带至沈阳，令其与牛录额真之包衣为邻。使二庄头之家，同居一处，若逢有事，则令该二庄头轮班前往督催，女真勿得干预。将庄头之名，庄中十二丁之名，牛、驴之色，尽行书之，交与各村章京，令前去之大臣书之持来。……以小人筑造城邑，不留奸细，欲逃，则彼只身逃走，故养育小人也。养育之人，若置于公中，恐受女真侵害，皆编作汗、诸贝勒之庄。一庄十三丁、七牛，给与百垧田，二十垧作公赋，八十垧尔等自身食用者也。

……八固山诸大臣分路而行，逢村堡，即下马而杀。将杀毕后区别而活命者，十三丁、七牛编为一庄，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一备御各给与一庄。”

这次大规模的编立拖克索，是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很大，它反映出不少重要问题。

第一，汗、贝勒再次宣布全部田地皆属己有，并直接霸占了

后金辖区大部分土地。四年以前，实行“各守旧业”和“计丁授田”的政策，本已表明，汗、贝勒是金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掌握了全国土地的最高主权。现在，更进一步了。汗谕规定，将全国各地所有汉民皆编隶汗、贝勒新编的拖克索，每庄给地一百垧。这一百垧地，就是过去汉民“各守旧业”之田和“计丁授田”之地。这就是说，在此之前汉民占有和耕种的土地，一下子就被全部没收了，变成为汗、贝勒新置拖克索的庄田了。此举再一次表明，对所有土地，汗都有权支配，可以让你保留祖产，可以将无主田土授与汉民，也可以籍没汉民“旧业”，收回授与的土地，都编入汗、贝勒的拖克索。

第二，庄丁沦为农奴，拖克索成为封建农奴制庄园。按照汗谕的规定，一庄有地百垧、丁十三名、牛七头，皆为庄主（汗、贝勒和八旗官将）所有，即生产资料归庄主所有。至于过去身为编户的汉民，变成庄丁以后，身分有无变化，是奴隶，是农奴，是一般封建租佃制下的佃农，还是仍为金国的民户？这一点，汗谕虽未明说，但很显然，这次编丁隶庄，是汗、贝勒为惩罚辽民叛逃而采取的措施，束缚很紧，庄丁的身份一定会比未编时的民户更低一些。后来《清太宗实录》卷一追述编庄情形说：“先是，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这就清楚了，过去的民户，被迫充当庄丁以后，就失去了国家编户、良民的身份，沦落为奴，下降为汗、贝勒、八旗官将等庄主占有的阿哈了。

这种庄丁，虽是包衣，但和建州时期的奴隶相比，仍然有着重大的区别。因为，这次新编的拖克索的庄丁，交纳封建地租，能够得到自己生产的部分粮谷，有自己的私有经济。汗谕规定，一庄有地一百垧，八十垧供庄丁“自身食用”，二十垧作正赋。在这里，把庄丁“自身食用”的八十垧地，和作为正赋的二十垧地明

显区别开了，这个“正赋”，就是封建性质的剥削，就是封建劳役地租。这样的分配方式，与过去不一样，昔日奴隶性质的阿哈，耕田所得的全部产品，皆被家主霸占，家主供吃供穿，与现在的庄丁自筹衣食，显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二者也不相同，这时的阿哈，家主已不能随意杀害，主子打死阿哈，是犯法的，要受惩处。可见，这次新编拖克索的庄丁，不是衣食于主，被家主完全占有人身的“会说话的工具”——奴隶，而是交纳地租，有少量私有经济，家主无权任意处死的封建农奴。这种新拖克索，也就成为汗、贝勒和八旗官将占有的封建农奴制庄园了。

第三，赋、租合而为一，加重了对庄丁的压榨。新编之庄，一庄十三丁，耕地一百垧，以二十晌作正赋，一垧以六亩计，平均每丁须耕“正赋”地九亩二分。天命六年七月的计丁授田谕，规定汉民一丁授地六垧，每三丁耕官地一垧，平均每丁耕官地二亩，庄丁必耕的正赋地比“计丁授田”的汉民的“官赋”地多四倍多。庄丁十三丁有“自身食用”地八十垧，每丁折六垧多，合三十七亩，自耕地与正赋地的比例是四比一，而计丁授田的民户，一丁领地三十六亩，耕官田二亩，自耕地和官赋地的比例，是十八比二，也比庄丁的负担更轻。

再以民户实际所交国赋数量相比，努尔哈赤赐恩格德尔平虏堡民四百三十丁，年征官赋银一百两、谷一百石，平均每丁交银二钱三分、谷二斗三升，如以每丁耕地三十六亩计，每亩折纳赋谷一、二升。而庄丁食用地为三十七亩，官赋地为九亩二分，按亩产一石计，可收谷九石二斗，平均每亩庄丁“自身食用”地纳赋谷二斗四升多，比计丁授田的民人交纳的官赋增加了十几倍。

再与明制相比，明朝政府规定，官田每亩征赋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明代辽东军屯，嘉靖年间，每亩征额粮一斗一升多。

由此可见，新拖克索的剥削率很高，庄丁的负担很重，庄赋比民田的国赋，增加了数倍甚至十余倍，比明代辽东军屯的“屯田子粒”还要多。

新拖克索租赋的大量增加，与当时土地占有、人身依附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密切相联的。编庄之前，征税较少，这是因为土地占有者是民户，是金国的黎民、良民，不是奴仆，交的是封建赋税，是金国沿袭明朝旧制征收的民田赋税。现在，土地转归汗、贝勒直接占有，从原来的民田变为汗、贝勒的庄地，就应该收地租，地租当然比田赋更多。同时，汗、贝勒又是金国之主，汗即国，国即汗，八贝勒共治国政，因此，不仅要收地租，而且这些土地原来应该交的田赋，也应由汗、贝勒征收。这样，所谓每庄二十垧“正赋”，便不仅有地租，还包含了田赋，租、赋合而为一，两种剥削项目同时并存，当然要远远超过原来民田的国赋。兼之耕作者已不是民户，不是一般的臣民，而是庄丁，是身份极为低贱的奴仆，耕牛也由庄主置买，当然要从重盘剥了。这也是汗、贝勒编民立庄的原因之一，既用以镇压反金斗争，又用来增加租赋。保证剥削收入。

第四，这次编丁隶庄，标志着封建农奴制成为金国的主要的生产关系。金国各州县，原来皆有身为“民户”、“良民”的汉民，或“各守旧业”，或“计丁授田”，经营农业，耕耘田地，不论是人丁的数量，还是耕地的面积，都超过了汗、贝勒、八旗官将占有的人丁和庄地。现在，这些汉人已从“民户”下降为奴，编进了汗、贝勒的庄内，原有的民田，转化成汗、贝勒的庄地，这样一来，封建农奴制庄园就星罗棋布，遍及各地，封建农奴制也就成为金国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了。而且，这次编庄，还促使原来的奴隶制拖克索，加速向封建农奴制庄园转化，满族社会的发展又前进了一大步。

第三章 八旗贵族的发展

第一节 汗、贝勒权势的膨胀

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子侄诸贝勒，掌握了后金国——金国军政财刑大权。在这个国家里，努尔哈赤一直是主宰一切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专制君汗。这从其被尊为“英明汗”一事，反映得十分清楚。

努尔哈赤起兵初期，自称“淑勒贝勒”，后改称“聪睿汗”、“恭敬聪睿汗”。天命元年（1616）正月，八旗贝勒、大臣及“众人”，恭上新号，敬称努尔哈赤为英明汗时说道：“我等之国，无汗则忧苦甚多。皇天为使我等之国得享安康，眷爱穷苦部众，而降生贤能善养之汗，应上尊号”，遂尊为“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①

八旗贝勒、大臣的议论及其奉上的尊号，非常清楚地、确切地反映了努尔哈赤统治后金的真实情形。所谓“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包括了密切相关的两个内容。其一，努尔哈赤并非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

凡夫俗子，也不是辅佐帝王领兵辖民的文官武将，而是奉承天命的开国之君。他的所作所为，皆非平凡之举，而是秉承天命来平乱致治。受天所命为皇天保佑的君主，当然应该掌握一切权力，当然应是言出令行的专制君汗。其二，正因为他是承奉天命之君，因此，他必然是“贤能善养”穷苦部众之汗，而且是“养育列国”之汗。既承奉天命，又贤明英武，善养部众，这样的汗，自然是执掌后金大权的最高统治者。这不仅仅是诸贝勒、大臣对努尔哈赤尊称之词，他自己也是这样看这样说的，不单是一般诸申为汗恩养，就是威风凛凛位高势强的八旗大臣，也系汗所育养。每当召集群臣集会时，他就要宣扬汗为天命、臣为汗用的一套，反复讲述“天任之为汗，汗任之为大臣”。^①

进入辽沈以后，虽然国号由后金改为金国，但汗的尊称并未改变，局面仍如以前一样，努尔哈赤仍然是最高统治者。天命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特下汗谕，对八旗贝勒、大臣讲述全国各类人员的情况，明确规定了各自的身份、地位、义务和相互关系，指出存在的问题，给与严厉的警告。这对说明汗之威严，是极为难得的纲领性的文件。努尔哈赤说：

“天之子汗，汗之子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伊尔根，主（额真）之子阿哈。汗以天为父，若敬思弗忘，英明治理天所赋与之政，则汗之政焉得而亡。诸贝勒、大臣，以汗为父，若敬思勿忘，无论何物，皆不思贪为己有，不萌盗贼凶暴奸诈之念，务守正直，则诸贝勒大臣之臣道焉得而亡。……诸贝勒、大臣，承受汗之恩惠，若不顾汗意，恃彼之才之力而行，不勤治其政，持贼盗奸诈凶暴之心，贪婪昏乱，则将为汗所谴，而罢诸贝勒、大臣之任，诸贝勒、大臣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

岂能保持其位乎？……若天命之汗、贝勒，不为天嘉之，不为人喜之，不小心以善行治政，则将为天所谴而汗之政亡矣。汗所委命之诸大臣，若不公平勤勉尽力于所委之事，而持邪恶怠慢之心，则将为汗所斥而身亡矣。”^①

这道汗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英明汗努尔哈赤是金国的最高统治者，握有金国军政大权。这一点，反映在许多方面。第一，努尔哈赤是金国各类人员之父，金人皆系其“子”。汗谕把金国人员分成四类：汗、贝勒与大臣、伊尔根、阿哈，从阶级关系看，汗、贝勒、大臣及一部分占有较多阿哈的伊尔根，是剥削阶级，是统治阶级，大多数穷苦的伊尔根、诸申及包衣阿哈，是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内部，又分成若干阶层和集团。贝勒、大臣是伊尔根、诸申之父。额真(主)的成员比较复杂，凡是占有包衣阿哈之人，不管是贝勒、八旗官将，还是富裕的伊尔根、诸申，都是他们的阿哈之主，也就是阿哈之父。所有这些人——贝勒、大臣、额真，都是英明汗之子（占有包衣的伊尔根，还是贝勒、大臣之子），都必须尊努尔哈赤为父。这里所讲的父与子，不是讲血统关系家族关系，而是指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指尊卑上下隶属关系。父，就是其子之主和统治者。子，就是其父的被统治者，他们必须对其父努尔哈赤“敬思弗忘”，毕恭毕敬，俯首听命，不得冒犯父的尊严，不许犯上谋乱心怀不轨。金国之人，皆系汗之子，皆须听从汗安排。

第二，诸贝勒和八旗官将，皆由汗封授、奖惩和罢革。固山贝勒、旗主贝勒，固然是该旗之主，该旗所有人员，不管是固山额真、总兵官、梅勒额真、副将等高级官将，还是参将、游击和备御，以及一切诸申和伊尔根，都须服从他的管辖，权势极大。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4。

总兵官和副将，以及参将、游击、备御，分管所辖兵民，佐治国政，率兵出征，也是有权有势的高级人员。但是，贝勒权再大，总兵官职再高，也须尊汗为父，听汗支配。贝勒之尊、官职之显，皆系汗父封授，如若对汗忠贞孝顺，勤勉治政，便能蒙受汗恩，久在其位，久任其职。如若对汗不忠，贪婪昏庸，心怀“贼盗奸诈”之念，扰乱国政，则将为汗所谴，革其位，罢其官，诛其身，籍没其家，“遇逢忧患矣”。前面曾经讲过，贵为国母的大福金富察氏的被休，皇长子阿尔哈图图们贝勒褚英的执政及其被革和处死，大贝勒代善之立为太子及其被废，以及后面将要叙述的四贝勒皇太极的被训斥，督堂乌尔古岱的贬职，督堂、总兵官阿敦的失宠和被监禁，巴克什额尔德尼的冤死，都清楚地表明了顺汗者昌，逆汗者亡，努尔哈赤确系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最高君汗。

第三，金国大政方针，为汗亲定。努尔哈赤虽然分封子侄为和硕贝勒，委任亲信臣僚为五大臣、八固山额真和总兵官、督堂、副将，军国大政，一般都由汗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讨论各种方案，最后由他钦定。一般情况下，努尔哈赤是采纳群臣意见的，但他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拒绝众议，独自作出相反的决定。比如，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攻下辽阳以后，对于是否定居辽沈，汗与八旗贝勒、大臣有着不同看法，诸贝勒、大臣想返回故地，努尔哈赤独主迁都辽阳。《武皇帝实录》卷三载：

“帝聚诸王臣议曰：辽阳乃天赐我者，可迁居于此耶？抑仍还本国耶？诸王臣俱以还国对。帝曰：若我兵还，辽阳必复固守，凡城堡之民逃散于山谷者，俱遗之矣，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必复烦征讨。且此处乃大明、朝鲜、蒙古三国之中要地也，可居天与之地。诸王臣对曰：此言诚然。议定，遂遣人迎后妃皇子。”

据《满文老档》所载，诸贝勒、大臣不仅想早返旧地，而且还采取了具体行动，因扬古利额驸之子去世，诸贝勒欲将尸骨送还萨尔浒。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着重阐述了迁都辽阳的意义，遂定议迁都，努尔哈赤说：

“何用送至萨尔浒？彼处之尸骸，尚须运来耶！如此天赐之地，尔等诸贝勒、大臣，尚以辽东城为不可居住，踌躇不决。昔我国之包衣阿哈逃亡者，皆因无盐得食耳。今得盐可食矣。由辽河至此，各路皆已归降，吾等何故弃此他往耶！吾初在困苦之时，如涸泽之鱼，求水不得，被置于石头之上。如此困苦，蒙天眷爱，而得大政。昔金国阿骨打汗，兴兵征伐宋与蒙古，然犹未尽服，至其弟乌克玛依汗，始尽降服。蒙古青吉斯汗征讨未尽之国，其子窝阔台汗方悉降顺。为父之我，为尔众子集兵平定大业，尔等诸子，何为不能居此耶？乃定议居住辽东城。”①

迁都辽阳，自建州老营进驻辽沈，这是一件关系金国发展的大事，如果打下沈阳、辽阳以后，徒事掳掠，纵然带回大批人畜财帛，可在老家享用一时，但能用多久？大军一撤，辽沈汉民重返故里，明兵归回旧城，各省援兵相继赶来，那时金兵再来进攻，困难就大了，良机一失，后悔不及，对金国的发展，将带来严重的障碍。努尔哈赤当机立断，力排众议，坚主迁都，这既反映了他确系胸怀雄才大略的有为之君，又表明了金国由他主宰，大政方针的最后决定权是掌握在努尔哈赤手中的。

修筑东京城，也反映了汗权之大。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因辽阳城大而旧，难以防守，欲筑新城，诸贝勒、大臣谏阻，努尔哈赤拒绝众议，力主新建，群臣不得不服从。《武皇帝实录》卷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1。

四载述此事经过说：

“帝聚诸王臣议曰：皇天见祐，将辽东地方付与我等，然辽阳城大，且多年倾圯，东南有朝鲜，西北有蒙古，二国俱未服，若释此而征大明，难免内顾之忧，必另筑城郭，派兵坚守，庶得坦然前驱，而无后虑矣。诸王臣谏曰：若舍已得之城郭，弃所居之房屋，而更为建立，毋乃劳民乎？帝曰：既征大明，岂容中止，汝等惜一时之劳，我惟远大是图，若以一时之劳为劳，前途大事何由而成！可令降民筑城，至于房屋，各建之可也。诸王臣俱服其言，遂于城东五里代子河边筑城迁居之，名其城曰东京。”

过了三年，旧境重现，努尔哈赤又提出迁都沈阳，八旗贝勒、大臣又行谏阻，努尔哈赤一如既往，又力主其议，群臣只好再次服从汗旨。对于这件关系重大之事，《武皇帝实录》卷四叙述说：

“（天命十年三月）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乃于初三日自东京，宿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

定都沈阳，是正确的，对金国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从这两次迁都和新筑东京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努尔哈赤实系金国之主，握有军国大政的决策权，是说一不二言出令行的专制君汗。

在军事上，努尔哈赤是最高统帅，八旗劲旅归他指挥，将领的升降奖惩和委任，皆由他最后决定。对外用兵，从军事方针到战略战术，以及军队的进退等等，都由汗钦定，重大征伐，往往是努尔哈赤亲自统率。从击败九部联军的古勒山之战，中经攻抚顺，败明军于萨尔浒，取沈阳、辽阳，下广宁，三十多年的重大战役，皆系英明汗发号施令，率领诸贝勒挥军鏖战。军权牢固地掌握在努尔哈赤手中。

在财经上，金国辖区土地，皆属汗、贝勒所有，满汉人民交纳的赋税和贡物，尽归汗、贝勒支配。他们大量掠夺人丁，逼令充当阿哈，增建新的拖克索。天命六年九月，汗、贝勒下令，自牛庄、海州以东，鞍山以西，“一贝勒各置三拖克索”。^①八年六月，镇压复州人民反抗后，将杀后遗下的叛民编为阿哈五百户，每十口给一牛、一驴，遣往设有汗、贝勒拖克索的纳丹费勒，耕田种地。^②九年正月，强迫盖州、析木城一带的汉民三千二百丁，迁往盖州城居住。充当汗的“种棉之人”、“育养水果之人”。^③十年十月，努尔哈赤下谕，编立成千上万的拖克索，除以数百庄赐与八旗官将外，其余拖克索尽归汗、贝勒所有。努尔哈赤及其子侄诸贝勒，一跃而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大庄园主。

汗、贝勒拥有大量牲畜。除建州时期原有牲畜以外，进驻辽东又掠夺和没收了大批马、牛、羊、驴、猪，仅用来出赁与民的耕牛就有一万头。天命六年八月，蒙古喀尔喀部为赎取斋赛贝勒，送来马二千匹、牛三千头、羊五千只，一小部分赐与八旗官将，其余尽为诸贝勒分取。^④

汗、贝勒还有大批专门培养果树的园户、捕鱼捉蟹的渔户、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7。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5。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61。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25。

捉鸟的雀户、煎煮食盐的盐丁，以及种植棉花的阿哈。另外，汗、贝勒每年还派遣上千包衣到长白山采挖人参，猎捕貂狐，捞取珍珠。^①

天命六年三月进驻辽沈以后，汗、贝勒从建州时期主要剥削奴隶性质的阿哈的大奴隶主，迅速向大农奴主转化，征收满汉人丁交的封建田赋，榨取拖克索中阿哈上纳的封建地租。天命十年的编庄，标志着汗、贝勒基本上变成了大封建主、大农奴主。

第二节 优待女真官将

努尔哈赤从一个丁不满百的小部酋长，上升为辖地万里臣民百万的大金国英明汗，固然与其个人艰苦奋斗和家族成员的同心协力共创大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如果没有网罗到一批谋臣勇将，没有他们的挥军冲杀，佐治国政，这一变化也是不能出现的。努尔哈赤深深感到人才的重要性，一贯强调要任用贤人，擢升有功的忠臣。进入辽沈以后，统治广大汉民，更加感到必须依靠各级臣僚，因而对八旗官将，尤其是对女真官将非常重视，十分信赖，厚加礼遇，额外奖赏，以促使他们效忠汗、贝勒，为巩固金国而尽力效劳。他曾专给诸贝勒下达密谕说：

“我国之诸贝勒、大臣，若皆贪图个人之安娱，我为尔等太息，当唾尔等之面矣。尔等之断罪，非理矣！对并立授首之汉人，何故如我等之女真同样处之耶？我等之女真，若犯何罪，当问其功，问其差使，若有些小理由，即以之为藉口而宽宥之矣。汉人系应杀而获生之人，若不忠正效力，复为盗贼，何故不诛灭其族而杖释耶？至于系带往我等之费阿

^① 《清文老档·太祖》卷44。

拉后与我等同来之汉人，当以同理考虑而断也。尔等所断者，似倔强不听之牛骡矣。著八贝勒将此谕，召集各自之固山之贝勒、大臣密观之，勿令他人闻知”^①

金国特重刑法，审断是非功过，是汗。贝勒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他们扶植忠良惩治奸臣的有效手段。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努尔哈赤特别指出，要区别开女真和汉人，对女真人，对女真官将，要尽量优待，即使犯法，应当问罪，也要论功论职而宽宥。至于封授爵位、官职，赏赐人丁财帛牲畜和庄园，女真官将更受到特殊的优惠。

八旗官将，多系女真担任。早期的“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扈尔汉和安费扬古，都是女真。建州时期先后担任过固山额真要职的有，阿敦、额亦都、虾费扬古、多弼、扈尔汉、穆哈连、济尔哈朗、汤古岱、博尔晋、何和礼、阿巴泰、扬古利，济尔哈朗、阿巴泰、汤古岱是宗室，多弼是觉罗，与其他固山额真都是女真。

进驻辽沈以后，曾任处理金国日常政务的督堂要职之人有，阿敦、阿巴泰、汤古岱、何和礼、扈尔汉、乌尔古岱、阿布泰、扬古利、多弼、巴雅喇、苏巴海、阿什达尔汉、贝托辉，也都是女真（包括宗室和觉罗）。

担任过固山额真或总兵官的有，巴笃里、穆哈连、康古里、汤古岱、扬古利、车尔格、扈尔汉、布山、阿布泰、岱音布、乌尔古岱、何和礼、喀克笃礼、武纳格、宗海、图尔格、李永芳、佟养性，还有明安等几个蒙古总兵官。上述人员中，只有李永芳、佟养性是汉人。

副将、参将、游击、备御，十之八九也是女真人。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2。

努尔哈赤一向主张赏罚分明，重奖任劳立功之人，特别是对于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官将，更给予特殊奖赏。例如，布山原曾因被他人陷害革除官职，后来查明，他不仅在辽沈之战中没有过失，反而见难而进，独担重任，立下大功，努尔哈赤恢复其职，并擢升一等总兵官，特赐世代优免的敕书。该敕文说：

“汗曰：在我得胜之时，能够管辖禁约之人甚多，我等苦战困难之时，管辖禁约之人则很少。夺取辽东城时，汗所举用之诸大臣，皆知我兵后退，谁也不出来管辖禁约，皆逃于房中隐蔽，布山独出而管束指挥，更番遣兵前往。如斯我等危难之地，布山独能只身承当而管辖，立下大功，以一等总兵官之职给与布山，充任固山额真。子孙世代获死罪者，皆不杀，得贪赃之罪者，不夺其财，免其二千四百一十两之罪。无论何人，若皆如布山一样，于我等危难之时，以身承当而管辖者，如此之人，汗与诸贝勒将信赖矣。若如斯汗和诸贝勒信赖，也象布山一样，立下大功，即使犯下死罪，也不杀，得取财之罪亦免之。”^①

努尔哈赤对开国元勋扬古利，也因其功多、正直、忠心耿耿而特赐世袭敕书。该敕说：

“汗曰：扬古利于各次用兵时，率先而前，赐以功，给予一等总兵官之职，子孙世代承袭。若犯嗜盖、阿敦之乱政坏道之罪，则诛其身，倘若因过获罪，则死罪不杀，取财之罪不取。免一千五百两之罪。”^②

八旗官将，立下军功，或政绩可观，佐治国政，忠于汗、贝勒，就可获得汗的赏识，授与官职，封赐爵衔，除谋叛大罪外，死罪不杀，罚罪不罚，而且可以子孙世袭其爵，世得其职，确也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8。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1。

算是备受汗的优惠了。

有功，有了官职，就可论功领赏按职取财。三十多年的南征北战，从各部女真及明朝城乡掠夺了上百万人畜和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帛，努尔哈赤以论功行赏按职分赐的方式，将大量人畜钱物赐与八旗官将。天命六年三月十三下沈阳，二十一日取辽阳，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就大赏群臣，赐总兵官各银二百两、布二百二十四、帛三十匹，副将银一百五十两、布一百五十匹、缎十五匹，参将银八十两、布八十匹、帛八匹，游击银五十两、布五十匹、帛五匹，牛录额真、备御、备御级的巴克什，各银二十两、布二十四、帛三匹。^①

五月，乌拉古岱领兵强迫镇江民投降，杀拒降者，以其妻子为俘获，带回一千，分与督堂以下备御以上官员。^②七月底，二贝勒阿敏、四贝勒皇太极，领兵镇压镇江反金人民，杀拒降之人，将起义民人编为俘获，带回辽阳一万二千，一部分赐给有职官将，自督堂起，下达千总。^③九月初四，以海岛掳掠汉民带来的俘获一万，赐与督堂以下守备以上各官。^④天命七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以掠取明总兵官毛文龙所得俘获一万，一半赐与督堂以下备御以上官将。^⑤二月初四，他又下谕，将“驱护”的汉民，赐与督堂、总兵官各三十五丁，副将各三十丁。^⑥

有了功，有了官职，就可凭仗权势，掠民为奴，增置拖克索，新设牧场，驱使包衣阿哈耕田种地，打牲牧放，收取租谷丁银和珍禽异兽。过去，八旗大臣可以自己遣派阿哈，前往乌拉打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1。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3、24。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26。

⑤ 《满文老档·太祖》卷33。

⑥ 《满文老档·太祖》卷36。

猎，仅天命八年二月初五日的一次统计，各大臣捕获兽禽之数为：貂一千四百九十三只，水獭一百零三只，貉二百八十一只，灰鼠九百三十六只，虎四头，猞猁狲十六只，黄鼠狼二十只，狐四只，雕一百零四只。^①

这样一来，在努尔哈赤优待女真官将政策扶植下，一大批女真官将因南北转战，开国有功，“佐命”有劳，而封官授职，当上了总兵官（后来的子爵），副将（后之男爵），以后晋为公、侯、伯，成为世袭爵职、岁领俸禄、广占庄园的满州八旗贵族。

为了深入了解八旗女真官将财富膨胀和满洲八旗贵族发展的情形，我们可以举“开国元勋”额亦都一家，作为典型，具体论述。

额亦都，姓钮祜禄氏，比努尔哈赤小三岁，世居长白山，后迁英崞峪。其家先年颇有资财，祖父阿陵阿被人们称为“巴颜”（即富翁）。可是，好景不长，额亦都来到人间不久，其父即被仇敌杀害，家道立即衰落。额亦都十三岁时，杀死仇人，避难逃往嘉木湖寨，依姑度日。这样一个寄人篱下的贫穷诸申，跟随努尔哈赤以后，四处厮杀，南北转战四十余年，军功累累，任至“五大臣”、众额真、一等总兵官、固山额真，娶英明汗之妹，死后追封宏毅公。

努尔哈赤赐给额亦都大批人丁牲畜和庄园，仅在起兵初期的十年内（1583—1593），先后赐与：舒尔黑布占城的所有物品；巴尔达城的全部敕书、户和诸申；索尔瑚寨主哈什瑚的“人户、阿哈、诸申、敕书及其他各物”；嘉木湖波衣嘎巴颜的人户、阿哈、诸申、敕书；沙济的旺吉努马法的人户、阿哈、诸申、敕书；纳殷的谭太墨尔根、都勒哈二族、尼玛兰城的大量人、马、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4。

牛；马近三十匹。^①仅仅十年，额亦都就从一个寄人为生的贫寒诸申，一跃而为占有众多阿哈、诸申、牲畜、财帛的大富翁了。

随着女真国——后金国的扩展，以及八旗军进驻辽沈以后，额亦都一家通过领赏和掠取人畜，财富更加急剧膨胀了。现将《满文老档》所载努尔哈赤赐与额亦都的两道敕书引录于下，作些分析。

第一道敕书，是关于努尔哈赤给与额亦都官职和免赋的敕书：

“汗曰：额亦都巴图鲁，独取舒尔黑布占城，取巴尔达城，破萨克扎之来兵，率先取尼玛兰城，故使为一等大臣，给与总兵官之职，彼自身至子、孙三代，食百人之钱粮。”^②
第二道，是努尔哈赤赐额亦都“专主牛录”的敕书：

“汗曰：额亦都巴图鲁，独取舒尔黑布占城，取巴尔达城，破萨克扎人之来兵，于尼玛兰城前率先而战，有功，为第一等，给与三牛录，使之专主。”^③

这两道敕书，是了解额亦都，分析清朝开国时期“军功勋贵”的重要史料。它表明了，八旗官将立功之后，就能封授官职爵位，分领人畜、土地和财帛，免交官粮，成为广占田土、官高位显的大庄园主和大贵族。以额亦都而言，努尔哈赤使额亦都“专主”的三个牛录，是由包衣等人员编成立。汗谕说，以额亦都“所俘获者，益以赏给户口，为三佐领”，隶于额亦都，“俾无预上役”，为其“私属”。所谓“俘获者”，自然是包衣，“赏给户口”，也是包衣。这些包衣编为牛录，归额亦都“专主”，成为后来的“专管牛录”或“世管牛录”，亦称“福朱里牛录”，即“勋旧牛

① 《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48。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62。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63。

录”。这些编入“专管牛录”的包衣，身份逐渐提高，入关以后，与未编的阿哈，有着较大的差别。额亦都所掠俘获及领取的人口，能编三个牛录，达九百丁，可见其家占有的包衣数量是不少的，还有很多包衣在他家的拖克索中耕田种地，还有打牲牧放的包衣。

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角度看，额亦都及其子侄，已由建州时期的奴隶主转化为封建农奴主。天命六年三月金军进驻辽沈，五月额亦都病故，总兵官一职由其子车尔格袭承。从额亦都家的收入看，除去征战掠取和仗权勒索以外，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役使包衣阿哈耕种庄田；论职计功领赏；科敛辖属汉民。额亦都是一等总兵官，死后由车尔格继任，按照总兵官职，领取大量金银财帛和人口牲畜。这是由封建国家——金国赐与的财物，主要是通过封建性质的剥削措施搜刮而来的，其中大部分是征收的封建赋税。因此，领取这种赐品，就是主要领取封建赋税和其他项目的封建剥削物品。

额亦都及其子车尔格是总兵官，辖治汉民三千丁，对这些人收取贡物，金派差役，也是封建性质的剥削。从天命七年开始，金国汗、贝勒陆续金拨辽民分隶八旗官将。七年正月初四，将辽河以东的汉民，金隶各将，给女真的总兵官、督堂各三千丁，给副将一千七百丁，给参将、游击一千丁，给备御五百丁。汉人的总兵官、副将，亦各给若干丁。^①初六，努尔哈赤又下达汗谕，规定每二十丁出一丁为兵，这些兵士的一半，各官将“可以任意差遣”。^②按照这个规定，女真的督堂、总兵官可以“任意差遣”七十五名汉兵，副将“可以任意差遣”四十一名汉兵，参将、游击“可以任意差遣”二十五名汉兵。所谓“可以任意差遣”，就是说，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2。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32。

这些官将可以任意金派汉兵为己服役，实际上是将这些汉兵，变成督堂、总兵官、副将占有的封建役夫和封建士卒。督堂、总兵官等官将，不仅可以任意差遣部分汉兵，而且对所有隶辖的汉民，都可以驱使金派。努尔哈赤曾经下谕宣布，各将可遣属下汉民打牲捕猎，供给肉食。^①

辽东汉民之所以被迫充当役夫、士卒，听从八旗官将支派，主要是因为“计丁授田”，领种汗、贝勒田地，或“各守旧业”，须向金政权纳赋服役，因而也要向辖属官将纳贡当差，这也是封建性质的剥削。

至于包衣阿哈和拖克索的情况，目前尚未发现具体的剥削材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此时的包衣阿哈已不能任意杀害，家主不能再象建州时期那样完全占有阿哈人身，受到了一定限制，这表明阿哈正在向封建农奴转化。由此可见，额亦都家在车尔格袭职以后，已不再是奴隶主了，正在向大农奴主、大封建主转化。

额亦都家的情况，是一个很好的典型，金国大多数女真官将，亦即“军功勋贵”的情况基本与此相同。我们从额亦都的立功受奖发财致富，及其家由奴隶主向封建农奴主转化的具体事例，可以了解到女真官将和满洲贵族的兴起、发展及其逐步变化为封建主的大体轮廓。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5。

第三节 厚遇蒙古贵族

一、满蒙联盟的历史背景

善待蒙古，结为姻亲，联为羽翼，资彼之力，建立巩固的满蒙联盟，是后金——金——清的基本国策之一。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定的这一国策，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它对金国的扩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女真虽然剽悍善战，威名远扬，但僻处边区，人丁稀少，难成大事，必须联合其他民族，才能创立伟业，问鼎中原。蒙古与女真一样，也是骑射民族，弓马娴熟，昔日元太祖成吉思汗所遣铁骑，驰骋三大洲，踏平数百国，无坚不摧，所向无敌，令人胆寒。就是在元亡以后，有明一代，蒙古也是明政权的大敌，屡败明兵，胁制“诸夷”，称霸北方。

明吏部右侍郎张鼎，在其所著的《辽夷略》中写道，万历年间（1573—1620），辽东地区，蒙古部落众多，有革兰泰、土蛮汗、暖塔必、大委正、克石炭、鬼麻、五路台吉、把伴、虎喇赤、杪花、伯儿、伯要儿等十余种，计一百余支，酋长数百人，甲骑数十万，确是一股强大的势力。

努尔哈赤正确认识到联合蒙古，吸收蒙古贝勒、大臣，是壮大金国、对抗明帝的必备条件，一直竭力争取。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并不容易。一则，女真弱，蒙古强，直到明末，仍然流行着“三万女真，四十万蒙古”的传统说法。察哈尔部林丹汗就曾用此词写信，蔑视努尔哈赤，威胁后金不得攻取辽阳、沈阳。再则明廷施行“以夷攻夷”的政策，利用互市、抚赏等手段拉拢蒙古

各部，对付后金。张廌在辽阳、沈阳失守以后，再次强调实行“以蛮夷攻蛮夷”，拉蒙古攻建州的“长技”。他说：

“虎墩兔汗为西虏帝，然累岁思邀我贡市三爵如俺答故事而不得，抱恨终身，岂肯坐视奴帝辽阳，断其市贡之利乎。……今日每年数十万两市赏，固(蒙古)诸酋所恋恋而不能舍者矣。诸酋利吾市赏，便我市易，我之布帛锅口等物，皆彼夷日用所需，而彼马牛毡革，非与我市，则无所售，然则辽阳一带，实西虏所资以为生，料西虏亦决不利我失辽阳，而令奴得之也。……挑之使斗，亦彼各自为其私情所必至也。”①

尽管蒙古各部轻视建州，贪明市赏之利，不愿降金叛明，但聪睿机智的努尔哈赤，却具有顽强的毅力，想尽一切办法，排除各种困难，终于达到了争取蒙古的目的。他主要实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恩威并行”的方针，既挥军奋战，重惩与己为敌的一些蒙古部落，打掉其骄气，树立八旗劲旅的无敌军威，逼其降顺或与己盟誓和好，共对明国；又竭力笼络各部酋长，联姻婚娶，封授官职，诱其率部来归，编入八旗。

在女真弱小贫穷的条件下，高傲的蒙古贝勒、台吉，看不上建州，不要说领部归顺是办不到的，就连平等相待，共誓和好，也不可能，只有先兵后礼，显示雄威，压倒对方，才有可能谈到联合、臣服等问题。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进攻建州的九部联军，就有蒙古科尔沁部的明安、莽古思和翁果岱三贝勒的人马。两军鏖战，三贝勒大败而回。此战建州初露头角，声名始著，从此蒙古科尔沁部、喀尔喀部一些贝勒，才开始“遣使往来”。②

震动更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天命四年至七年的四次大

① 张廌：《辽夷略》。

② 《武皇帝实录》卷1。

战。天命四年三月，后金军大败明兵于萨尔浒，显示了八旗劲旅的军威，吓倒了明朝万历帝和文武百官，惊动了整个蒙古。紧接着，七月二十五日后金攻取铁岭，蒙古喀尔喀部斋赛贝勒、科尔沁兀鲁特部明安贝勒之子桑噶尔寨、孔鲁特部巴克贝勒等二十余名贝勒、台吉，领兵万余，前来援明，二十六日击杀后金牧马人。此斋赛贝勒，颇有名气，勇悍异常，兵多国富。《满文老档》对斋赛的情形，作了如下描述：

“在蒙古五部喀尔喀中，兵之多，牲畜之多，国之富，以斋赛为最。故恃其强盛，藐视各国，屡肆欺凌、掳掠和杀害，各国之人皆憎斋赛犹如鬼魔，斋赛亦不以己为人，而自视如薄天飞行之大鸟、兽中之猛虎。”^①

正因为斋赛兵多将广，势力强大，故蔑视建州，屡与后金作对。他夺取努尔哈赤已下聘礼的叶赫金台石贝勒之女，派兵袭击建州兀扎鲁村，拦路劫夺英明汗遣出的使臣，他又与明国合谋，多索赏赐，发誓要讨伐后金。这一切，使努尔哈赤十分气愤，“常思擒之”，甚至在梦中大叫：“吾擒得斋赛矣”。^②

因此，当探子报告蒙古斋赛兵到时，努尔哈赤即下令迎战，八旗劲旅奋勇冲杀，以多胜寡，大败敌兵，生擒斋赛及其二子与巴克、色本、桑噶尔寨等贝勒、大臣十余人。这一战，彻底打掉了蒙古喀尔喀部、科尔沁部诸贝勒的傲气，逼使他们与金盟誓友好，一些贝勒产生了归顺英明汗的念头。

天命六年三月，八旗军取沈阳，克辽阳，击败明兵十余万，七年正月下广宁，再败明军十余万，奠定了久驻辽东的基础，出现了金强明弱、女真兴旺、蒙古势衰的新局面。在这极为有利的条件下，努尔哈赤又积极推行优待蒙古招诱蒙古贝勒大臣的政策，因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1。

② 《武皇帝实录》卷3。

此吸收了大批蒙古贝勒、大臣和一般蒙古前来归顺。天命六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古尔布什及莽果尔台吉率部民六百四十五户来归，七年二月十六日，蒙古科尔沁的兀鲁特部贝勒明安、兀尔宰图、锁诺木、绰乙喇札尔、达赖、密赛、拜音代、噶尔马、昂坤、多尔济、顾禄、绰尔齐、奇笔他尔、布颜代、伊林齐、特灵，以及喀尔喀部贝勒石里胡那克等，率所属三千余户，前来归顺。喀尔喀五部又有一千二百户来投。努尔哈赤皆分别封授官职，赐与皮裘细缎布匹银器及“房田奴婢牛马粮粟”，“凡所用之物，俱赏给之”。对一些人多势强影响较大的贝勒台吉，汗、贝勒还与他们联姻婚娶，共享荣华富贵。^①

努尔哈赤这种封官授爵赐与庄田阿哈的政策，使一些蒙古贝勒、大臣荣任要职，统兵辖民，役使阿哈，成为富贵豪华有权有势的大农奴主、大贵族。我们可以略举下述几人为例。

明安，原系科尔沁蒙古兀鲁特部贝勒，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古勒山大战时，惨败逃遁。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闻听其女“颇有丰姿”，遣使聘娶，明安立即应承，取消了过去已将己女许诺与人的婚约，将女嫁与努尔哈赤为妃。天命二年（1617）努尔哈赤知悉明安将来建州，会晤汗、贝勒，遂亲率诸福金及各贝勒出城，至百里外迎接，留住一月，每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隆重款待。临行，赠赐人四十户、甲四十副以及大量布帛等物，送到三十里以外才归还。^②天命七年二月，明安偕锁诺木等贝勒率部来归，努尔哈赤设宴欢迎，授明安三等总兵官。后明安隶满洲正黄旗，多次出征，晋二等伯，死后，雍正时追封一等侯。其第二子多尔济娶公主，为额駙，后封三等子。明安的长子昂洪，封三等男。

^① 《武皇帝实录》卷4。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

布颜代，兀鲁特部贝勒，天命七年二月同明安率所属来归，娶公主，封额駙，授二等参将世职，后隶满洲镶红旗，以军功晋三等男，任镶红旗固山额真。

布当，随明安来投，授二等参将世职，隶满洲正蓝旗，后晋三等男。

古尔布什，喀尔喀部台吉，天命六年十一月领部民来投，努尔哈赤设宴招待，赐貂裘三领、猞猁裘二领、虎裘二领、貉裘二领、狐裘一领、镶边貂裘五领、镶边獭裘二领、镶边青鼠裘三领、蟒衣九件、蟒缎六匹、绉缎三十五匹、布五百匹，以及金、银、鞍甲、奴仆、牛马等，“凡应用之物皆备”，又以第八女和硕公主下嫁，封古尔布什为额駙，授一等总兵官世职，给与女真一牛录、蒙古一牛录，后隶满洲镶黄旗，封一等子。

莽果尔，喀尔喀部台吉，偕古尔布什率部来归，努尔哈赤宴见，赐与古尔布什同样物品，以族弟济白里之女与彼为妻，授总兵官世职。

努尔哈赤创立的厚待蒙古贝勒、台吉、官员的政策，发生了重大作用，促进了蒙古八旗贵族的形成和发展，初步建立起比较牢固的满蒙联盟，对金国——清的扩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恩格德尔额駙

对于来归的蒙古各部贝勒、台吉和大臣，努尔哈赤赐与大量人丁、牲畜和财帛。象上述的莽果尔，原来辖领的部民并不太多，牲畜也较少，来投以后，仅仅经过半年时间，在汗的恩赐重赏下，就一跃而为辖治万民、拥有上万头牲畜的大富翁、大贵族了。

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些蒙古贵族的阶级属性，看看其是否已转

化为封建主、农奴主，我们可以举恩格德尔作为典型，详细论述。

恩格德尔，《武皇帝实录》记为恩格得里），原是蒙古喀尔喀部的巴约特部达尔汉巴图鲁贝勒之子，是一个仅仅辖有一百来人丁的小小台吉。由于他是最早来朝拜努尔哈赤的蒙古台吉，十分恭顺和友好，故备受汗、贝勒重视和优待。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恩格德尔进马二十匹，来谒。努尔哈赤说：“越敌国而来者，不过有所希图而已。”，“遂厚赏之”。^①第二年十二月，恩格德尔又引蒙古喀尔喀五部使臣，进驼马来谒，尊努尔哈赤为“恭敬聪睿汗”，“从此蒙古相往不绝”。^②天命二年(1617)，恩格德尔再到建州，努尔哈赤以亲弟舒尔哈齐贝勒之女，与彼为妻(后封和硕公主)，尊称额驸，此后多次来朝。

天命九年正月初三，恩格德尔与妻同来，要求率部来归，定居金国，努尔哈赤甚喜，决定“厚养之”，与他盟誓赐敕，封授官职，赏赐庄园奴仆，迁其部属至辽。

努尔哈赤的誓辞如下：

“皇天垂祐，使恩格得里舍其己父，而以我为父，舍其己之弟兄，以其妻之弟兄为弟兄，弃其故土，而以我国为依归，若不厚养之，则穹苍不苟，殃及吾身。于天作合之婿子而恩养无间，则天自保佑，俾吾子孙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古台吉、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苟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得里台吉等，命得延长，永享荣昌。”^③

努尔哈赤又以制诰赐恩格德尔及其妻子。诰文说：

① 《武皇帝实录》卷2。

② 《武皇帝实录》卷2。

③ 《武皇帝实录》卷4；《清文老档·太祖》卷60。

“恩格得里后若有罪，惟篡逆不赦，其余一切过犯，俱不加罪。昔居汝国，吾女国仰望于汝，今移居至此，尔则依赖吾女，但吾女或恃亲族而慢其夫者或有之，谅尔有何事苦吾女也。尔心或受吾女之制，而不得舒，吾惟汝是庇，汝虽死，吾女必不溺爱以姑息之也。”^①

努尔哈赤又给以“子孙世代罔替之职”，封恩格德尔及其弟莽古尔岱为三等总兵官。盟誓赐诰，封授总兵官（其子囊努克后来袭父职，晋至二等公），这就保证了恩格德尔及其子孙世代代占据高官要职，永为金国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有了这样大这样牢固的政治特权，就为恩格德尔一家攫取大量财富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努尔哈赤赐给恩格德尔弟兄大批财物。天命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赐恩格德尔金十两、银五百两、大蟒缎一匹、次蟒缎一匹、狍蟒缎二匹、金丝龙缎一匹、补子纯缎一匹、钱蟒缎一匹、倭缎一匹、蟒缎衣服四套、帛五十匹、毛青布五百匹、钉有金佛首帽顶的帽子一顶、黑貂皮镶边的皮袄一件、黑貂皮皮袄一件、柜子十个、立柜十个、碗碟八百件，以及鞍、辔、弓等物。赐与莽古尔岱的物品，与其兄一样。对二人的妻、子及随行人员，又赏与大量财物。这样的厚赏，在当时金国来说，还是少有的。

更为重要、更能说明实质问题的，是赐与人丁、阿哈、拖克索的具体情形。《武皇帝实录》、《满州实录》、《高皇帝实录》，都只简略地提到赐给恩格德尔等人“田卒、耕牛……，及房田应用之物，仍以平虏堡人民赐之”，究竟赐与多少田卒房田？平虏堡民有多少？田卒、堡民与恩格德尔是何等关系，交不交纳贡品？为什么未提阿哈、拖克索，是未赐还是已赐，赐了多少？这一系列

^① 《武皇帝实录》卷4。

至关重要的问题，三种太祖实录，都略而不叙。查阅《满文老档》，才找到解答这些疑问的珍贵资料，现摘录如下，作些分析。

天命七年正月初八日，努尔哈赤下谕说：

“以平虏堡之四百三十四男，给与蒙古恩格德尔额駙。挑选通晓汉语、心地公正、未曾犯罪之谨慎之人，置主十家居住。尔等不得擅自索取任何物品。一年征收赋银一百两、谷一百石，以我之手给与。额駙若行，吹奏喇叭琐呐送之出境。若来，出境相接。”①

天命八年二月十四日，努尔哈赤致书招劝恩格德尔定居金国时允诺说：

“（将）给汝等男丁八千人之贡赋之钱粮。……将给额駙二千丁，给格格二千丁，给（其子）代青一千丁，总计五千丁。……将给尔弟二千丁，……给尔之二子各五百丁。……额駙、格格，尔等之一弟三子，总计八千丁。”②

天命九年正月恩格德尔一家入居金国时，努尔哈赤赐恩格德尔及其弟莽古尔岱各七丁的女真拖克索两个，汉人十丁的拖克索两个，近身役使的女真五对，其下伐木运水的男女五对。赐恩格德尔、莽古尔岱的儿子六人合共女真四丁的拖克索四个，三丁的拖克索两个，汉人十丁的拖克索六个。又分别赐与辖属的汉民。恩格德尔弟兄带来的蒙古二百余户，仍由他俩辖领。③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归纳出四个结论。第一，恩格德尔弟兄辖有大量人丁。这两位台吉，原来仅仅领有二百来户蒙古，定居金国以后，获得了大批人丁。恩格德尔先领平虏堡民四百三十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2。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5。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50、61。

四丁，后又许给五千丁，加上其弟莽古尔岱的三千丁，共有汉民八千四百三十四丁，比原来辖属的二百多户蒙古，增加了二、三十倍。还有拖克索的人丁。恩格德尔及其子女，有女真拖克索七个、汉人拖克索七个，共十四个拖克索，丁一百零二。莽古尔岱父子有女真拖克索三个、汉人拖克索三个，四十八丁。兄弟二人共领拖克索二十个及一百五十丁。再加上恩格德尔夫妇近身役使和伐木运水的男女四十对，总起来，兄弟二人占有女真、汉民八千六百二十四丁。其中，恩格德尔一人就有六千五百七十六丁，这是相当大的数字。

第二，恩格德尔弟兄成为田连阡陌的大土地所有者。虽然《满文老档》未写明努尔哈赤赐给恩格德尔弟兄的土地数目，但是我们根据“计丁授田”法和天命十年的编庄规定，进行推算，还是可以了解到大概情况的。天命十年十月编丁立庄时，规定一庄十三丁、地一百垧。一垧按六亩计（有些地方，一垧为十亩），为六百亩，平均每丁领种土地四十六亩。照此折算，恩格德尔弟兄二人的二十个拖克索一百五十丁，应有田地六千九百亩。其中，恩格德尔一人就有十四个拖克索一百零二丁，应领地四千六百九十二亩。

恩格德尔还有役使男女四十对，即四十丁，也应领地，每丁六垧，三十六亩，又有一千四百四十亩。

这些土地都属家主所有，这样，恩格德尔仅凭赐与的拖克索人丁和役使阿哈，就应领地六千一百三十二亩，加上莽古尔岱的人丁应领地二千二百零八亩，共有地八千三百四十亩。

恩格德尔弟兄还辖有八千汉民，按每丁领地三十六亩计算，当领地二十八万八千亩。这样多的土地虽不归恩格德尔弟兄直接占有亲自管理，仍由汉民经营耕种，但他们必须向主人纳租服役。这个租与役，本来是英明汗以金国土地最高所有者的身份，

以最高主权者的资格，向汉民征收的，现在努尔哈赤将这个权赐给恩格德尔弟兄，由他们来征租金役。这就是说，恩格德尔兄弟二人对赐给他俩的八千名汉丁领有的土地有一定的主权，有一定的所有权。

还有平虏堡汉民四百三十四丁耕种的上万亩土地，也与主人恩格德尔有一定关系，他对这些田土也有一定的主权。

一个小小的蒙古台吉，一下子就这样上升为占地万亩、辖地数十万亩的大土地占有者了。

第三，恩格德尔兄弟成为征收大量银谷的大庄园主、大地主。按照天命十年编庄的规定，一庄十三丁，耕地百垧，以其中的二十垧作为正赋，即作为地租。二十垧为一百二十亩，平均每丁耕官赋地九亩，照此折算，恩格德尔弟兄的二十个拖克索一百五十丁，应耕正赋地一千三百五十亩。如果亩产一石，可收谷一千三百五十石，亩产八斗，可收谷一千零八十石。仅凭这二十个拖克索，恩格德尔兄弟二人就可收租谷一千零八十石至一千三百五十石，恩格德尔一人就可收租谷七百三十四石至九百一十八石。

努尔哈赤赐平虏堡汉民给恩格德尔时，明确规定每年收赋银一百两、谷一百石。努尔哈赤允诺赐八千丁给恩格德尔时，也具体规定，从这八千丁每年征银五百二十两、谷八百八十石，还要金派役夫一百四十人、“防护自身物品的兵丁一百四十人”，以及耕牛七十头。其中恩格德尔的五千丁，每年征银三百三十两、谷五百五十石，金派役夫九十人、兵丁九十人，耕牛四十五头。^①仅凭这三项，恩格德尔每年就收银四百三十两、谷一千三百八十四石至一千六百六十八石。还要加上役使阿哈四十丁应领之地一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5。

千四百余亩的谷、银收入。这个数字相当可观了。

第四，恩格德尔兄弟已成为剥削阿哈和汉族农民的大封建主、大农奴主。恩格德尔弟兄的主要收入，有五个方面来源：论功论职领取赐物；平虏堡民上交的银谷；汉民八千丁的纳租服役；二十个拖克索中阿哈上交的正赋；属下蒙古的贡物。这几项，可以肯定，基本上都是属于封建性质的剥削。

以平虏堡民来说，这四百三十四丁，原系隶属金国汗，每年都应向国家交纳封建赋谷、赋银，现在他们被拨归恩格德尔管辖，就转向家主纳租服役了，每年交银一百两、谷一百石，家主出境入境，还要恭送欢迎。这显然是封建剥削。

再以努尔哈赤许诺赐的八千丁来说，这些汉民也是由金国黎民转变为恩格德尔属下，他们不再向汗、贝勒交纳赋银充役当兵，而改向家主恩格德尔兄弟纳租当差，每年交银五百二十两、谷八百八十石，还要出“服役之人”一百四十名、“防护身之诸物之兵士”一百四十名，这些谷、银、役夫和兵丁，本是汉民八千丁每年应向金国交纳的封建赋税和承担的封建徭役，现转归恩格德尔弟兄，由他们占有，由他们征收，由他们役使，这自然也是封建性质的剥削。

按职论功领取的赏物，属下蒙古交纳的贡品，也是封建赋税的性质。由此可见，在天命九年正月恩格德尔定居金国时，他已由原来的蒙古小台吉，转变成广占田土奴役汉民、阿哈的大封建主、大农奴主了。

恩格德尔的发家及其成为大封建主的事例，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从这里可以了解八旗中蒙古贵族的发展和阶级属性，可以作为主要依凭恩赐被汗、贝勒扶植起来的贵族、官将这一类的典型代表。

第四节 降金汉官的任用和疏远

一、起用废官罪臣微员末将

天命三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队攻下抚顺，守城游击李永芳降金以后，陆续有一些明朝的官吏、生员和偏裨末将战败被俘归顺，特别是天命六年三月打下沈阳、辽阳，进驻辽东以后，许多汉官纷纷投降，愿为新主效劳。明国重镇广宁的失守，就并非金兵的进攻，而是降官献城所致。天命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攻下西平堡，击败明总兵刘渠、祁秉忠部队后，驻宿沙岭。此时，明游击孙得功串通千总郎绍贞、陆国志及守备黄进等查封府库，把守城门，遣七人来见请降。二十二日，西兴堡备御朱世勋差中军王志高求降。二十三日，金军开往广宁，明千总石天柱、秀才郭肇基来降说，“吾等已禁城门”。二十四日努尔哈赤进入广宁，住巡抚衙门，游击罗万言、平洋桥守堡闵云龙、锦州中军陈尚智、铁场守堡俞鸿渐、大凌河游击何世延、锦安守堡郑登、右屯卫备御黄宗鲁、团山守堡崔尽忠、镇宁守堡李诗、镇远守堡徐镇静、镇安守堡郑维翰、镇静堡参将刘世勋、镇边守堡周元勋、大清堡游击阎印、大康守堡王国泰、镇武堡都司金励等，共四十余城堡官将，各领属民投降。

这批降金汉官，初期大都编入八旗，分隶八贝勒，后来专门编立八旗汉军，委任他们充当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以及其他官职，不少人因功封为公、侯伯、子、男，形成了八旗汉军贵族，在金国——大清国政治生活中

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努尔哈赤创立的大量任用汉官政策，是出于形势需要，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以汗、贝勒为首的满族贵族，人数太少，数万金兵，只能聚居辽阳、沈阳、广宁以及少数军事要地，其他州县城镇和广大乡村，难以一一分兵屯驻。兼之，语言不通，文字相异，服饰有别，习俗不同，无法了解辽民心情，不易查获“叛、逃”密谋，也很难逼迫汉民纳粮贡物当兵服役。在这样条件限制之下，要想由满族贵族独占一切，完全排斥汉族地主阶级，那是绝对不行的，没有汉族地主阶级的合作，汗、贝勒就不能在辽东站稳脚跟，很难控制全辽汉民，更谈不上以此为基地，进一步大举攻明，夺取关内州县，扩展金国辖区，攫掠更多的人畜财帛。因此，要想克服兵少民多人地生疏的障碍，加强对满汉人民尤其是汉民的统治，必须拉拢汉族地主阶级，建立起以满族贵族为主、为核心的满汉剥削阶级的联合专政。这就是说，必须吸收汉族地主阶级中愿意归顺新君的代表人物——降金汉官，必须实行任用汉官的政策。这一政策执行如何，是好是坏？汉官的多数，是真心实意为英明汗甘效犬马之劳，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或三心二意，窥测形势，待机而变？直接关系到辽东地区的局面，关系着金国的扩展。进驻辽沈初期，努尔哈赤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还是相当明智、妥当的，大量擢用汉官，对巩固辽河以东地区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

努尔哈赤多次谈到必须任用汉官的问题。他很明白，知道自己对广大辽民不了解，不知谁可靠，谁难信任，不知道谁是顺民，谁想抗金，也不知道应该任用哪些人，应该杀谁抓谁，这一切，只有汉官才清楚。他曾在一次专门召集各汉官的会议上，对他们说：“尔等之国人，可信者，不可靠者，尔等知之矣！”你们应当担负起防守边境的责任，“善为把守边境不固之处，收其不

可靠之人。”^①

努尔哈赤还在一次下达给汉民的汗谕中，透露了为什么要任用汉官的一个原因。他说：“得辽东后，欲任女真官员管辖，恐尔等新民言语不通”，故令汉官辖治汉民。^②在这里，语言不通，以致言谈的不便，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问题也很明显，其所以要任用汉官，并不只是决定于文字语言的因素，实际上是由于整个制度、风俗、习惯的差异，以及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

努尔哈赤的高明，不仅仅表现在他认识到需用汉官的必要性，而且还在于他进一步注意到应当委任哪些汉官。此时，八旗劲旅虽然接连三次大败明军，打下沈阳、辽阳，夺据辽东，但与明国相比，毕竟是人丁太少，辖区不广，而且刚刚进驻，面对幅员数百万里臣民亿万的大明天朝，力量对比，相差还是十分悬殊的，能否久驻辽东，仍是疑问。在这样条件下，那些原来身为明朝总督、巡抚、将军、总兵、副将的高级官将，那些长期囿于华夷之别，视己“尊如神明”，蔑视女真的文武大员，很难立改常态，认“夷”为父，屈身事汗，甘为臣仆，永远效忠于新君。相反，有些微员小吏偏裨末将，以及罪臣闲官，或者是胸无点墨，少读诗书，唯图鱼肉乡民，贪赃枉法，加官晋职，或者是自恃甚高，官场失利，心怀不满，因而有可能背叛旧君，投靠新汗，把自己的命运，把个人的升官发财和荣华富贵，与金国汗、贝勒联在一起。

因此，努尔哈赤特别注意收罗和起用明朝的罪臣、废官及中下官将。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打下辽阳，二十四日，即“释辽阳狱中官民，查削职闲住者，复其原职。设游击八员、都司二员，委之以事”。^③此后，继续实行这项政策，不断提升为金效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0。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9。

③ 《武皇帝实录》卷3。

劳的明朝废将、罪臣及战败愿降之将。天命八年三月，努尔哈赤训斥众汉官时，讲了这样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尔等众汉官，一半之人曾于明帝时得获死罪，监禁于狱中，一半之人曾坏其身（即被革职），一无所有，又皆战阵所获而养之也。”^①可见明朝的废官罪官降金以后，确被汗、贝勒大批起用。

努尔哈赤曾对督堂下达专谕，指示不用明朝大臣，而应擢用愿为金国效劳的小官小吏。他说：

“河东归顺之汉人，谄谀于我等，出其力，致其才，被河西官员视为敌矣。以彼国为敌而谄媚于我等之人，我等若不举用育养，彼等何能维生，此后复有何人附我而来，谁肯出其理事之才？……彼等甚恨其国而归向我等，若尽其之才，勤其所能，则当不思其为奴为小人，即行擢用，使其为大人，则贤者将来归附我等矣。对彼之皇帝有功，给彼之官员财物，而成为官员之人，自以为原系大臣，一向为官，不为我等勤劳，不献其所知，惟观察脸色沉默无为之人，彼于我等究有何益耶。”^②

努尔哈赤在进入辽东初期，这样的大力网罗愿意投降金国的汉官，目的在于让他们辖治汉民，为汗尽忠出力。这在天命六年四月初三的“汗谕”中，讲得十分清楚。他给“明国众游击官”（即降金的汉官）下谕说：

“我等非汝明国，不取属下人之财，不以财物送与上级大臣，公正断决。与其科索下人，给与上司，何如公正审断，汗嘉赏赐财，此诚终身享用矣。凡汗所一度嘉升之人，不似明国有过即黜。尔等游击官员，须秉正直，不敛取属下之财，不馈送上司，勤守各种法令，为汗之眼，观察众人，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8。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3。

为汗之耳，用以听众，诸凡各事，皆详加督察。”^①

这次“汗谕”，是打下辽阳以后十二天下达的，可以说，它基本上包括了努尔哈赤对汉官的要求和政策，主要是要求汉官为汗耳目，当汗之犬马，尽忠效劳。具体来说，可分为五个方面。第一，责令汉官“勤守各种法令”。为了统治阿哈、诸申和辽东汉民，金国汗、贝勒制订了许多法令，比如，强迫汉民尽力种田，不许怠耕；安分守法，禁止叛逃，纳粮交税，充当役夫，筑城运谷，不许拖欠违抗；敬养汗、贝勒，尊奉家主，不得犯上失敬，等等禁令，汉官都须“勤守”，都要贯彻执行。第二，要求汉官“为汗之眼”，“为汗之耳”。因为汉官知悉汉民情况，了解明朝习俗，故要汉官充当汗、贝勒耳目，侦察属人，哪家富庶，哪家贫穷，谁顺从新君，谁留恋故帝，谁可信任，谁不可靠，哪些人与明国联系，准备叛逃，随时将侦察所得消息，上报汗、贝勒，引导八旗女真官将，带兵捕捉反金人员，为贯彻执行努尔哈赤制定的“平盗贼，止恶逆”国策而效劳。第三，谕示汉官要“公正审断”，不要徇私舞弊。所谓“公正审断”，就是依据维护汗、贝勒、贵族官将利益的法令，以严刑峻法，来逼令满汉人民听任汗、贝勒、大臣鱼肉盘剥，不能心怀不满犯上作乱。进驻辽沈前，这个重担，主要还是女真官将承担的，现在汉官既然分任各职，专管汉民事务，就要负起这个责任，要对汉民“审断公正”，从而强迫辽人充当降金顺民，以巩固金国的统治。第四，谕劝汉官不要“科索下人”，不要敛取属民财帛。努尔哈赤这样讲，主要是为了平息人民的愤怒，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减少反抗，维护金国统治。过去金军多次攻明，焚烧庐舍，掠夺人畜，进驻辽沈以后，又大肆烧杀，逼民为奴，本已使得民族矛盾、阶级矛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第六(四)

盾异常尖锐，反金斗争如火如荼，如果汉官为虎作伥，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必将火上加油，激起辽民更加愤恨，掀起更大规模的抗金斗争。努尔哈赤的担心，确实是有根据的，不少地区的汉民，就是因为降金汉官欺压百姓、勒索民财而起义反抗。例如，从辽阳派往马科瓦勒赛和古河的汉官，竟大声叫喊说“拿财物来”，居民不胜愤怒，杀了这些民族败类和贪官污吏。镇江、长山岛民，亦因“不能忍受尼堪官员(降金汉官)勒索财物的罪行”而武装起义。^①第五，委命汉官对各事“皆详加督察”。这个范围十分宽广，不是一件事两件事，不是这一方面那一方面，而是“诸凡各事”，都要监督，都要察看，委以汉官具体办理汉民事务的权力。

为了使汉官为汗、贝勒出力，努尔哈赤采取以“功”、“福”相诱，以惩罚相威胁的政策。他多次宣称，对尽忠效劳的汉官，要“嘉赏赐财”，“终身享受”，要“赏以功，给与为官”，甚至还实行世袭制，允诺“功臣”的子孙可以世代承袭祖、父的官职，即使犯了法，只要不是谋叛大罪，都予从宽减免。镶蓝旗的游击朱吉文，在金军攻取辽阳后降顺，逼迫绥河、凤凰、镇江、汤山、长甸六城逃散的汉民，归回城内。镇江罗秀才带领五百汉民渡江入朝，朱吉文又率人追赶回来。他先后杀死明总兵毛文龙派来的“奸细”多人，又屠杀登山叛逃的汉民，因此由游击升为参将。^②明朝白土厂刘参将，“全部收容他周围之村”，亲自先来归顺，升为副将，仍管旧地。^③

广宁守备石廷柱，天命七年正月降，晋游击，“辖降众”，后历任昂邦章京、镇海将军，封三等伯世袭，其兄国柱、天柱（千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9。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72。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33。

总)，亦封授三等男。

明开原千总金玉和，降金后，初授甲喇额真，予世职三等副将，后任工部参政、梅勒额真、署怀庆总兵官，定封二等男。

备御陈完卫，去复州收割公粮时，盗走二十二车粮谷，努尔哈赤认为，“盗汗之公粮，是大罪”，本欲斩杀，因陈述说其父任汤山守堡时，被毛文龙带走处死，努尔哈赤听后指示：“由于父之功，给陈完卫备御，敕书上写有世代承袭之功”，免死无罪释放。^①

在努尔哈赤的高官厚赏引诱下，进入辽东初期，不少明朝官、将、生员降顺金国，巴结新汗，阿谀逢迎，献计献策，告密送信，逼催赋税，迁民分地，查点入丁，追捕逃人，对巩固金国的统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好景不长，降金汉官的处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二、严责众汉官

努尔哈赤从天命三年(1618)四月收降明抚顺游击李永芳起，制定了大量任用汉官的政策，网罗到一大批汉官，为汗、贝勒效劳，起到了女真官将不能起的作用。但是，由于辽民抗金活动的频繁，汗、贝勒恼羞成怒，遣军屠杀，残酷镇压，严格控制（详后述第四章），极大地激怒了广大辽民，他们拼死斗争，反金浪潮愈益高涨，后金统治出现了严重危机。也就在此时，明廷多次遣派“奸细”进入辽东，潜与汉民、汉官联络，劝诱降金汉官反正。在这样形势下，一些汉官开始动摇，三心二意，窥测形势，不那么积极了。另外一些汉官，则猛然悔悟，私与明国边臣书信往来，秘密策划，待机里应外合。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0。

部分汉官的消极怠工，一些汉官与明私通书信的破获，少数汉官带领兵民潜逃未果被捕，这一切，震动了汗、贝勒，惹恼了汗、贝勒。努尔哈赤不是冷静分析形势，寻找原因，想出妥当办法，以抚为主，以惩相辅，重治少数谋叛者，笼络大多数汉官，以稳定局面，却感情冲动，仗势凌人，放弃了原来执行的依靠汉官、大量任用汉官的正确政策，转而采取了怀疑、歧视、压制、疏远汉官的错误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他经常训斥汉官、惩治刘兴祚和怀疑李永芳三个方面。

早在天命七年初，努尔哈赤就曾痛骂过降金汉官。李永芳、佟养性等汉官，利用金国女真官将刚入辽沈不谙民情的机会，凭借汗、贝勒给与的职权，敲诈勒索，搜刮民财，攫夺了大量人畜财帛，侵犯了女真官将利益，影响了金国役夫、兵卒的来源。努尔哈赤知道此事以后，大为不满，于七年正月初二日，亲到衙门，严厉地斥责众汉官说：

“曾令尔等将归降之兵，尽行放回各自之父母之处，尔等不从，以为若将此等遣返，则今后我等俘获敌兵有何用处？乃不遣返。尔等往新城、瑗河之时，曾带人数万，欲以充兵，而不能得兵，欲以服官役，而不能得人。带来之百人、千人之中，尔不能得一二人服役者。河东数万万人，若皆由尔等索取财物而使之豁免，则人有何用！……抚顺额驸，石乌礼额驸，吾视尔等如同半子之婿而养之矣。贝勒家中庭院有草料乎？尔等家中庭院所积如斯草料者，若非尽皆免于赋税而取者，何能有也！草乃积于表面易见者耳，金银能见乎？尔等不思报答汗育养之恩，不明白办事，而一味如此索取财物，我等不信赖尔等汉人矣。”①

① 《清文老档·太祖》卷32。

这次训责的口气，固然很严厉，而且点了李永芳、佟养性的名，说出了“我等不信赖尔等汉人”的话，但这时双方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汉官很卖力，汗、贝勒很重用他们，只不过是汉官们本性难移，见财必然起意，就是要勒索民财，扩大私囊，惹恼了金国汗，挨了一顿骂。但是，骂完以后双方继续“合作”，没有引起大的政策性变化。

金国汗、贝勒对降顺汉官态度的改变，关键在于天命八年发生的一些事。这时辽民反金浪潮不断高涨，明国乘机派遣“奸细”，秘密联络汉官汉民，煽动他们逃往明境或里应外合，共抗金兵。一部分汉官动摇了，不认真办事了，也不告发明国的“奸细”。努尔哈赤非常生气。天命八年三月下旬，努尔哈赤重赏了一批地方上忠于金国擒捕明朝奸细的汉官汉民。比如，宽奠的赵游击，斩杀了明总兵毛文龙派来行间的曹都司，捕其同行人员，努尔哈赤赏赵银一百两，“颁发敕书，记载子孙世袭之功”，升赵游击的中军佟文明为备御。^①张德玉告发到郎游击处的奸细，升为备御。王园久逮捕明国派来的奸细，升为备御。刘济宽告发双山备御苗一庄私通毛文龙，革苗之职，任刘为备御。博济寨王钟魁两次向草河备御苏士登首告寨民要叛逃，苏不追查，不久博济寨民逃走，遂杀苏士登弟兄，升王钟魁为备御。沙场备御王之登追查并捕获了毛文龙派来的奸细，升为游击。汤山守堡汤英园，捕获毛文龙的奸细，升备御。岫岩备御乔邦魁私通毛文龙，为其包衣首告，斩乔邦魁一家。^②

努尔哈赤就此事大发议论，严厉斥责汗都的众汉官忘恩负义，心向明国，不捕奸细。他说

“外边地方之小人，经常捕获奸细，送往此地，奸细岂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8。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8。

有不来我等之地之理耶？尔等众官员，一半在明帝时得获死罪，关在狱中，一半失去官职，一无所有，又皆战阵所获而养之也。吾所举用育养之官员，尔等思及育养之恩，毛文龙所遣之奸细，尔等何故不捕获耶？叛逃凶暴为乱，何故不查？若如斯不为汗而勤奋，养育尔等有何益耶？无论何人，发觉叛逃而告，知奸细之来而捕之送来时，仍如先前之人一样，赏以功，给与为官。若闻叛逃而不告，知奸细之来而不捕，为他人告发时，将依苏士登、乔邦魁一例处之矣。”^①

这次训话，既将降金汉官极力丑化，揭其曾为阶下囚、穷汉子、败将战俘的老底，又点出他们心向明国、不捕奸细、不查叛乱的罪状，并以私通明国的汉官被斩为例，予以威胁，用词的严厉，实为罕见。这次“汗谕”，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努尔哈赤对降金汉官已由任用、依赖，而转为怀疑、疏远了。

三、惩治刘兴祚

更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例子，是金国汗对待刘兴祚态度的变化。刘兴祚，辽东开原人，初因违犯明法，开原道将予以杖责，兴祚又惧又怒，于明万历三十三年，离开父母妻子，逃入建州，努尔哈赤甚喜，“授以备御之职”，改名爱塔。天命六年三月进驻辽东后，驻防金州，升为游击。六月进为参将，八月升副将，管辖金州、复州、盖州、海州四州，其侄为海州参将，弟亦为游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刘兴祚竭力为金国汗、贝勒服务。他追捕逃人，逼迫避居海岛的辽民投降，击杀明朝官兵。《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三，载录了刘兴祚于天命六年四至六月所立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8。

的“军功”及其因此升职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乙巳年(1605)，太平之时，爱塔弃其父母妻子故乡，来归于汗，汗惠爱之，授以备御之职。得辽东后，给与游击之职，遣官金州。到金州后，原有二秀才及十余光棍，翌日欲究问之，回报皆已遁入海，乃遣十余人于海岸二处瞭守。夜间有二船来此岸欲取粮，捕十五人，夺其船。得此船后，致书各岛，十五岛之人皆降。

此后，四月十六日，闻登州之人，以三十四条船渡海，来金州，遂连夜前往，遇敌，射死四人，擒二十七人而回。海内七十里外，有一广鹿岛，杀我方遣去招降之一人，捕一人解送山东，乃乘船前往，擒何游击，获二千余人，以及金一百两、银一千三百两，猞猁狲皮袍子、衣服、绸帛共三百件，送来。

又，登州之兵，乘七十五条船来攻，射杀七人。此兵返时，爱塔率一百五十人，乘船往追，因其败走，未能追及而返。又，明国翰林院给事中等官，赉赐朝鲜国王衣服，朝鲜之二总兵官、一侍郎送彼归国，乘船二十只行于海，因未得顺风，来金州方向海岸之岛。六月初七日闻讯，爱塔率三十人往，乘诸官员不暇乘船，得获朝鲜人五十二名、明人九十、银四两。

因有此功，升爱塔为参将，以银五百两、备有鞍辔之马、甲冑、细甲叶袖、弓、撒带、箭二十支、帽、带、靴等，尽赏与之。”

此后，刘兴祚继续斩杀明国来兵，搜寻明将派来的奸细，追捕逃人，为巩固金国辽南辖区，防敌、平叛、止逃，立了大功。

刘兴祚还负责催征所属兵民上交租赋。天命六年十一月，刘

奉汗谕，运送盖州官中谷草于耀州，以饲养军马。^①十二月，又三奉汗谕，赶送盖州、复州官赋草，运往辽阳，并速将盖州、金州、复州官赋，征收押运。^②天命七年二月，努尔哈赤令刘兴祚将金州、复州、盖州、海州四卫会驾驶木船的人，尽行查出，使运右屯卫的粮谷。^③又叫爱塔督促役夫，“要不分昼夜赶快用刀船架桥”，“要勤勉地多煮官赋之盐”。^④

刘兴祚的效劳，受到金国汗的嘉奖。努尔哈赤不仅一再给刘升官晋职，还常下汗谕，劝其谨慎小心，防护身体，免陷奸计。天命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努尔哈赤谕告兴祚之侄海州刘参将说：“尔参将和我处之人一样。河西之人将要下毒，谋害尔，尔食饭之时要注意。尔要注意自己身体，多派遣可以信赖之人看守尔家之门。送信给尔叔爱塔说：食饭时，要注意，多派可以信赖之人守门。”^⑤

十二月十八日下达给刘兴祚的汗谕，对双方之关系，讲得很清楚，摘录如下：

“汗之书下于爱塔副将：汝上之书，皆已看阅。依照旧例汗所规定征收之各项官赋，勿增勿减，照旧征收，辽东周围与女真合住地方之人，草尽粮缺，若不将女真未至地方之谷草征收通融，则兵马何得而食。汉官私下擅自征收之谷、草、小麦、芝麻、线麻、蓝、笔、纸等等诸物，俱皆革除。为此，今后差遣官员，皆以汗之库银与之，令其持带，各自买肉肴而食之。只给以米，用以食饭。刘副将要将此谕下达及南边四卫之人，南四卫之人皆信尔之言。要善为教谕，语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8。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31、32。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35。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36。

⑤ 《满文老档·太祖》卷32。

以更新之际，虽有所苦，然汗之政法明矣，终将得安。尔须善慎其身，勿陷当地之人奸计。”^①

这道汗谕，讲了刘兴祚肩负催征官赋的责任，讲了汗、贝勒要革除汉官勒索的“仁政”，而这个仁政，只有刘才能宣扬，辽民才相信。它还表明了汗对刘的信赖和爱护，叮咛刘要“善慎其身”，防中奸计。进入辽沈以后的一年多，刘与金国汗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这样。

虽然努尔哈赤欣赏刘兴祚的才干，依靠他来维护辽南金、复、海、盖四州的统治，多次嘉奖厚赏，越级提拔，半年内由备御三次升迁，晋为副将，成为降金汉官中仅次于汗之女婿李永芳、佟养性的第三位高级官员。刘兴祚在一段时间里确实尽心效劳，在征赋、防敌、平叛、止乱、捕逃、安民等方面，为保卫汗、贝勒的江山，出了力，立了大功，双方互相依靠，各有所获，关系是密切的、融洽的。但是，历史是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辽东地区反金斗争的惊涛巨浪，冲断了联结双方的桥梁，这个曾经效忠于金国汗、备受重用的刘兴祚副将，经过徬徨犹豫，最后终于走上了叛金归明的道路。

明李介所著《天香阁集》的《刘爱塔小传》，对刘兴祚的反正始末，作了如下叙述：

“刘爱塔，辽人也。幼俘入口，伶俐善解人意，某王绝爱之，呼为爱塔。爱塔者，爱他也。及壮，配以口口，使守复州。爱塔素有归朝意，东江总兵毛文龙使人招之，为人所告。某王发兵围复州，缚爱塔归，将杀之，口口泣请，乃免。（后卒归明）”

马晋允的《通纪辑要》，亦载有刘兴祚的事：“天启三年九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1。

月，麻羊守备张盘收复金州。先是，奴以刘兴祚守复州，兴祚欲反正，事觉，奴缚之去，尽戮金，复等处辽民，逃者甚众。”

上述二书都讲到刘兴祚有反正归明之心，此说不够准确，刘原来是真心为金效劳的，但后来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逐步不满金国，有了回明的念头，并于天聪二年(1628)潜逃入明，对抗金军。为什么刘会尽改初衷，从叛明降金转为归明抗金？显然这是与他的亲身经历和辽东人民的反金浪涛密切相关的。

刘兴祚本来是因为不满明朝官将的欺压，在即将“挾之”的威胁下，被迫抛弃父母妻子和故国家乡，从开原逃入建州的。但是，十七、八年的经历，特别是天命六年(1621)三月进入辽沈以后一年多的耳闻目睹，及其亲身所作所为，使他感到，此处并非天堂，八旗贵族官将并非为民谋利的救世主，他们一样是掠夺民脂民膏，谋己私利，其残酷性、野蛮性、贪婪性，比诸明朝的贪官污吏凶横将官，有过之而无不及。赋重役繁，冤狱频兴，掳掠盛行，杀声不绝，幅员辽阔的辽东地区，找不到一处安静之地，广大辽民被斩被掠被徙，血流成河，哭声遍野，流离失所，惨不忍言。而在这造成辽民陷入水深火热的地狱过程中，刘兴祚不仅并未置身事外，不能自夸清白，相反，他却成为金国汗的得力鹰犬，起了女真官将不能起的恶劣作用，是造成这场灾难的重要帮凶。才干出众，武艺超群，胸怀大志的刘兴祚，竟成为千人骂万人恨的民族败类，真是既可悲，又可恨，实在令人痛心。这是促使刘兴祚痛定思痛下决心叛金反正的重要因素。

天命七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事，也给刘兴祚以极大的刺激。这年的三月，总兵官穆哈连遣马守堡去带领筑造城池的人夫车辆和牛，此人玩忽职守，不去催促牛、车和人夫，却在村里大肆敲诈民财，勒收银两。村民向副将爱塔告状，刘兴祚将马守堡带来讯问，责备他不去催促牛、车，却索取银两，予以逮捕。穆哈连

知道后，派阿布尼送信给刘兴祚说：“此路系汗给与吾之地方，尔为何逮捕我所派遣之人？”刘兴祚说：马守堡犯有勒索财物之罪，因而逮捕，须另差催促人、车、牛的人员。阿布尼不听，耍无赖，不住在给他找的房屋，“却执拗地住在爱塔副将之门下”。刘兴祚忍无可忍，携带穆哈连送来的文书，向法司告发。法司因穆哈连诈称是“别路之大人”，擅遣人去，定罪，革其总兵官职。^①这个官司，刘兴祚虽然打赢了，但得罪了穆哈连，此人久经战阵，历任固山额真、总兵官要职，深受汗的重用，地位很高，权势很大，将来势必会报仇算账。而且，一个汉官，竟然敢于顶撞上级，告女真总兵官的状，还告准了，惩治了穆哈连，兔死狐悲，其他女真官将对刘也不会有好感，刘兴祚为此事得罪了一批握有实权的女真高级官将，种下了祸根。努尔哈赤的女婿乌尔古岱，身任督堂、总兵官，权势赫赫，就曾公开宣称，他和刘兴祚“有仇”。机智的刘兴祚，对此事的后果不会不考虑，很难安枕了。

六月初七，刘兴祚又告了一状。盖州北面三十里的博罗铺，瑚什塔牛录的阿哈硕色，欺压与他合住的汉民，使用汉民的牛耕田，役使汉民干活，强迫汉民之妻做饭，汉民养的猪，只给一、二钱银，就把大猪“蛮横地捉去宰杀”。汉民向刘告状。刘兴祚遣一人送去满汉合写的文书说：“汗昔制定之法例，女真不得使用汉民之牛，各住各自之房，分粮要计口分食。这是人所共知的。尔汉民不要将已育养之猪给人，若（有人）蛮横捉去，尔来向我首告，我将向诸贝勒、上臣上告。”阿哈硕色接过刘的文书以后，竟然撕碎抛弃，捆绑派去的人，并蛮横地说：“爱塔系任何等大臣？与我合住之人，尔凭什么审断？”刘兴祚再派二人前往，差一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9。

点又被捆绑吊打。刘兴祚十分生气，向上报告说：“设若派一人时，逮捕拷打，派二人去，也要逮捕吊打，那末，今后我等怎能办理汗之各事？”尽管此事曲在女真，可是，法司并未立即判案，而是下令将刘派去之三人，“捕送到辽东（辽阳）”，把阿哈硕色也传去。^①此事后来下落如何，《满文老档》没有记载，但是，可以肯定，刘兴祚此状没有告赢，因为，不久他就被降职革职了。

这些事实表明，哪怕刘兴祚尽心竭力为金效劳，也不会博得八旗贵族的真正信任，也仍然是汗、贝勒的“外人”，虽然他已荣任副将，主管金、复、海、盖四州，但并没有多大实权，连一个普通的无职闲散女真，他也管不了，如果坚决履行职责执行法令，稍微保护一下汉民的合法利益，他就会遭到八旗女真贵族官将压制，惹恼掌权者，碰得头破血流。这些事实深刻地教训了刘兴祚，促使他下决心脱离金国，返回明境，改过从善，走上抗金之路。

辽南金、复、海、盖四州，邻近大海，易与明国官将联系，毛文龙派来的奸细活动频繁，汉民早就秘密开展了反金斗争。刘兴祚下了归明的决心后，利用主管四州的职权，积极准备，待机起义。人多嘴杂，难免有所泄漏，金国汗、贝勒听到一点毛文龙派人来的风声，天命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下令清查。督堂下达文书说：听说毛文龙为煽惑我国之人，派了五十名奸细来，因此命令：捕捉奸细者，立功，拒不交出者，子嗣亲戚尽行屠杀。岫岩以南，派爱塔副将清查。^②

刘兴祚置之不理，继续在复州积极进行反金准备。不料，叛徒告密，走漏了消息。这个民族败类，从复州跑到辽阳告发说：复州城里的男丁，比原来的七千丁，增加了一万一千余，还接收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2。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6。

从那边（指明国）来的奸细和札付。复州之人将全部叛逃。开始汗、贝勒还半信半疑，复州可是汗所擢用、嘉赏的爱塔副将主管！但因事关重大，还是派大贝勒代善、斋桑古、阿济格、杜度、硕托等贝勒，带兵二万，前往查看，相机处理。代善到后调查，发现仅仅四、五个月，复州的男丁就比八年正月清查时多了一万一千余人，“还把所有的粮谷全部作为炒面”，“叛变之事是真的”，遂纵兵大肆屠杀，撤消了复州，分成许多地方。^①

刘兴祚身为掌管复、盖等四州的主将，常在复州驻守，复州全城居民合谋叛金，欲图逃往明国，没有他的支持、组织和默许，怎能进行！因此，刘兴祚是难逃罗网了。明人说，刘被缚欲斩，后免死，此事《满文老档》虽无记载，但却在镇压复州起义后的一个月以内，“降爱塔副将职为参将”。^②《清太宗实录》卷四则记为：“太祖既克辽东，以兴祚为副将，令管盖、复、金三州。兴祚多索民间财物牲畜，为李继学所讦，免官，自是兴祚有叛志，屡与明人私通。”此说虽然不尽确切，刘欲叛金在前，免官、降职在后，但也表明，刘兴祚确是因叛金而被惩治了。

刘兴祚的行动，使努尔哈赤受了很大刺激。既然这个早年自愿来归的刘兴祚，这个由一介布衣上升为主管辽南四州的高级官将，这个曾为金国汗出生入死屡斩明兵军功累累蒙汗嘉奖的“忠臣”能够改变初衷，冒着斩首籍没的危险，进行叛金活动，欲图归返故国，那么，那些战败而降的汉官，那些未任要职未蒙重奖的汉官，岂不是更会动摇变卦，更易与明臣私通，叛金投明吗？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3、54、55。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7。

四、痛斥李永芳

李永芳从天命三年四月降金以后，一直竭尽全力为汗效劳。他以领兵从征沈阳、辽阳有功，由副将晋三等总兵官，与石乌礼额、佟养性共同主管辽东汉官事务，备受汗的优遇和信任。

李永芳身受殊宠，竭力报恩，积极贯彻汗旨，执行八贝勒命令，为巩固金国统治做了许多事。其中，最重要的是“平叛”、“止盗”、“捕逃”和“防边”，即镇压满汉人民的反抗，防御明军偷袭，捍卫汗、贝勒的宝座。天命六年四月十四日，即打下辽阳不到一月的时间。努尔哈赤就遣李永芳偕固山额真兼督堂阿敦，带领军队，“于沿边各堡置官，教部属，置台，设哨探”。^①这是为了防御明兵反攻，抵挡蒙古进袭，也是为了加强控制，不许辽民外逃。天命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努尔哈赤专下汗谕，要求众汉官承担起守护边境的重任，责令他们“要与李、佟二额驸商议”，对“能办诸事之好人”，对“恶逆之坏人”，不能擅自上告，必须“和二额驸共议”，才能上报，擢升贤者。^②

努尔哈赤多次遣派李永芳，偕同女真官将，率兵镇压反金辽民。天命六年五月，因镇江民众拒不降服，李永芳奉命和乌拉古岱总兵官带兵前往视察，胁令归顺，相机处置。李到镇江后，民仍拒降，遂纵兵屠杀，掠夺抗金人员的妻室儿女，带回辽阳，由汗分赐诸将。^③天命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以王备御告称托伦山村民与明总兵毛文龙遣来的蒋达、蒋萨二人密议，欲行叛逃，努尔哈赤命李永芳带兵前往处理。李去后，发现该村居民不耕田地，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0。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1、22。

变卖谷物，确将逃走，遂斩杀村民，以其子女牲畜作为俘获。^①

为了制止辽民外逃，惩处反金人员，金国几次大规模迁徙边境城镇和发生过抗金行动的州县居民，这件事主要由李永芳、佟养性负责办理。天命六年十月，李、佟遵奉汗命，将多次抗金的镇江民迁往萨尔浒。第二年三月，二人又与刘兴祚，驱赶广宁、锦州、义州等河西九卫民，迁往河东，分居辽阳、沈阳等地。天命八年正月，二人又奉汗谕，前往迁移辽南沿海居住人民，逼令徙至内地。^②

为了控制满汉人民，防止外逃和起义，搜捕逃亡的阿哈和辽民，金国汗、贝勒一再派遣官兵，清查丁口，严禁窝逃。天命八年，李永芳与佟养性奉命前往清查南部州县人丁，规定所有居民都必须向官府如实报告本身人丁数目，告发外地逃来的辽民，若隐匿不告，“则将逃人定为逃罪，容留之人定为盗贼之罪，将此二户皆作为俘获，使为阿哈”。李永芳严厉训示所辖清查官员，责令他们“当思汗之养育之恩”，认真清查，若因收纳银物而徇情不追，不查出逃人，“将上奏于汗杀之”。^③

李永芳还被金国汗“委以财赋重任”，收取官赋，清查余粮，运送官谷。天命七年正月金军打下广宁后，夺取了明朝存贮于右屯卫的五十万石粮食，在当时年荒缺粮的形势下，这对金国汗、贝勒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非常难得的宝贵物资。为了防止明兵反击争夺存粮，或派人放火烧毁，李永芳遵照汗命，凑足一万辆牛车，日夜兼程，费尽心机，将谷抢运回来，为缓和粮荒、增加国库收入，立了一功。^④

尽管李永芳投降以后，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征赋运谷，迁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9、50。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30、33、43。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43、47。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37。

民查丁，平叛止逃，四处奔走，为金国的强盛和巩固尽心竭力，军功政绩皆著，而且他还屡拒明廷招诱，擒谍上奏，屡受汗奖，赐敕免死三次，可算是文武双全效忠于汗的忠臣功臣了。但是，随着辽东人民反金斗争的高涨，以及一些汉官的动摇和叛逃，特别是刘兴祚叛金归明的密谋逐渐泄漏，金国汗、贝勒对李永芳也产生了怀疑。天命八年五至六月发生的几件事，标志着李永芳与金国汗、贝勒的关系出现了显著的裂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天命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李永芳肩负安民、平叛、止逃重任，亲奉汗谕，查处托伦山村民是否叛逃的问题，坐镇盖州，指挥驻戍岫岩的佟参将、高额勒英的李游击、沙河的金游击、老虎洞的张游击和复州的赵游击，调查丁口，安排粮食和田地。^①五月初二，努尔哈赤为了隆重庆祝阿巴泰、德格类、阿济格等贝勒大败蒙古，得获二万牲畜的胜利，决定在初六日设大宴迎接凯旋的八旗官兵，特致信李永芳，让他赶回辽阳，参加庆祝大会。^②可见，此时汗对李永芳，还是重用和信任的。但是，狂风暴雨就要来临了。

五月初七，听说复州人要叛逃，汗、贝勒欲发兵征讨，李永芳立即谏阻。他说：“所谓复州之人叛者，非实也，恐系人之诬陷者。若信其言而发兵，彼方之人闻知，当讥笑矣！”^③李永芳谏阻发兵，就其言论而说，并无大错。在此前后，陆续发生过几起诬告降金汉官私通明国的案件。比如，沙场的备御王之登，因捕获毛文龙派来的奸细，于天命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升为游击，不久又升为参将，戍守炼铁的石城。石城一人就伪造明国札付，捏称是乘王之登酒醉时从其置放男丁册簿的大立柜中偷出来的，向法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9。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0。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51。

司告发“王之登接受彼方尼堪之札付”。法司审理后断定，此系诬告，特专门送信给王之登，告诉他说：“此首告者是诬告，尔勿担心，好好管辖地方。”^①努尔哈赤自己也说过，辽东巡抚经常遣人送信来，告李永芳、佟养性的状，说他俩要叛金归明，“进行种种诬蔑。”^②

李永芳的谏言，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陈述的。他主张慎重，不要轻易发兵，以免误杀，这将招致明国官将嘲笑。而且，估计他还有一段话未说出来，或者是《满文老档》没有载录。这就是，轻易发兵，不分青红皂白地滥肆杀掠，必将激化已经尖锐的民族矛盾，将遭到辽东汉民的坚决反对，那时，举国叛逃，就不可收拾了。缓发兵，慎杀掠，先调查，后下手，这就是李永芳谏阻的理由和建议。

李永芳之所以站出来阻止立即用兵，可能是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种可能是，他忠于金国，害怕铸成大错，冤杀滥杀，会招致辽民更坚决的反抗，对金国统治不利。第二种可能是，李永芳在辽南州县呆了几个月，专管查丁、平叛、止逃，对这样全城合谋叛逃之事，却一无所知，刚回都城，就有复州人来密告，岂不是玩忽职守，怎能逃避知情不报心向明国的嫌疑，征讨以后，自己就将蒙受通叛之冤，轻则贬官降职，重则梟首示众满门抄斩，倒不如以攻为守，阻止发兵，搁平此事。第三种可能是，李永芳知道复州将叛的内情，而且自己也参与了这一事件的策划，想藉此立功，叛金投明。根据以后李永芳的行动来看，显然李并未参加这一叛逃案件，而是一直尽忠于金，死不回头。连清朝政府官修的《国史列传》，也载称李“归诚最先”，“明巡抚王化贞及边将，累遣谍来诱，永芳执其人并书以闻，上嘉奖，赐敕免死三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8、56。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2。

次”。^①

现在姑且不谈李永芳谏阻的内心动机，而就事论事。不管李是怎么想的，就其谏言本身而论，他的谏阻，理由充分、建议正确。在辽民拼死反金的浪潮冲击下，先调查，后用兵，防止冤杀无辜，以免事态扩大，引起辽民更猛烈的反抗，这个建议是妥当的，这个谏阻是合理的，不应加以非议。

但是，被人民斗争气昏了头脑的努尔哈赤，虽素以聪睿名世，此时却不那么英明了。听到谏言以后，他竟对一向忠心耿耿为金国效劳的“抚顺额驸”李永芳大发雷霆，严厉训责，痛斥李永芳忘恩负义，不识天命。他下达长谕，历数李永芳过恶如下：

“汗怒，下谕于抚顺额驸曰：李永芳，当初于抚顺获尔之时，念尔系一知觉明白醒悟之人，故携尔而行，以我爱新骨肉给与尔矣。天眷祐于我，征讨叶赫、哈达、乌拉、明国之四路，以及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东、广宁、蒙古之境，此等地方，上天眷爱而给与，尔李永芳何不信耶。以尔不信，故常思尔等之明帝为久，以我为暂短。因辽东地方汉人屡叛，彼方之人相谋之书不断而来，吾常令清查而收捕之，尔心向明国，迷惑谏阻于我。行往彼方，尔心中以为善，发觉而杀之，于尔心不合矣。尔若果真正直，不苦累兵士，不劳累国人，尔身承受而管辖，叛逃皆止，平定国人，灭之而携来，则系我之过，尔之谏宜也。

尔若贱视于我，我闻之，尔之汉国刘邦，曾为领催淮下差役之事人也，亦为天所祐，而为汉帝王矣。赵太祖乃街上之无赖，亦为天祐而为帝，又数代为国之主矣。朱元璋之身，父母亡后，独身乞食，曾为郭元帅之下役使，亦为天所

^① 《清史列传》卷78，《李永芳传》。

祐而为皇帝，传至十三、四世矣。

尔若欲助明，北京城之内河，两次流血矣，各衙门大树之根，被风拔之矣。上天所显示如此异兆，岂尔之谏阻能止之乎？

尔对育养之父、岳父，视为空白无用矣。以尔为婿而养之，蒙古、明国、朝鲜皆闻之矣。若治罪，他国之人闻知，亦将嘲笑于我，亦将嘲笑于尔，念及此，故不罪尔，俾尔安处。此亦我之愤怨而出此我所思之言也。”^①

努尔哈赤实在是气昏了，糊涂了，分不清真伪虚实，硬给李永芳扣上“心向明国”的帽子，并且还不顾自己宣布的“不罪尔”的汗谕，而对李进行惩治。李永芳的几个儿子，以及刘兴祚的族人都被拘押捆绑，直到五月二十三日，才下达文书，告诉大贝勒代善说：“不要捆绑抚顺额驸之诸子及爱塔之族人，派人看守送来。彼等之罪尚未调查，未知本末，（那样做）太过份矣。”^②六月初九日，大贝勒代善领兵前往，屠杀复州反金人员，二十八日回辽阳。七月初四，革李永芳总兵官，使为白身。初七日又复其职，李永芳仍为总兵官。^③但是，从此以后，汗、贝勒对李永芳就不太放心了，不如过去那样重用和信赖，总管汉民事务的重任，落在石乌礼额驸、总兵官佟养性身上了。

努尔哈赤这次对李永芳的训斥和惩治，是严重的失策，犯了一个大错误。汗谕所谓李永芳谏阻用兵复州，是“心向明国”，是“欲助”明朝的结论，完全是无中生有，信口开河，没有事实根据。这是一个冤案、错案，在降金汉官中必然会引起很大波动，带来严重的后果。象李永芳这样“归诚最先”，背叛故主，效忠新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2。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54、55、56、57。

君，为巩固、扩大金国统治而出生入死、四处奔走效尽犬马之劳的可靠降臣，都因忠言直谏而遭到英明汗严厉斥责，并且不念前劳，不思旧功，严加惩治，既对其子捆缚拘押，又革其职，那么，其他汉官怎么办呢？他们投降在后，没有那样多军功，没有那样多的苦劳，也不象李永芳那样受到金国汗的重用和信赖，不是汗的孙女婿，未能荣任总兵官这样的要职（天命年间，汉官中，只有李永芳和佟养性是总兵官）。既然李永芳都会因直谏而蒙受冤曲，罢职问罪，这样，他们这批汉官更可能被突然治罪，斩首抄家了。汗、贝勒这样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实在叫降金汉官寒心。汉官之中的多数，更加动摇不定了，对金国汗的“忠诚”亦大大减少。

总之，天命八年三月努尔哈赤指责汉官不忠，五月训斥李永芳，七月初四革李永芳总兵官，降刘兴祚为参将，标志着金国汗、贝勒对待汉官政策的大变化，从过去的大量任用汉官、依靠汉官，转而采取了怀疑汉官、歧视汉官、疏远汉官的态度。努尔哈赤的这种转变，是十分错误的，它使真心降金的汉官心灰意冷，无所适从，使那些原本三心二意的汉官更加犹豫，更为动摇，扩大了汗、贝勒与汉官之间的裂痕，双方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这样一来，也使汉官更为胆小怕事，三缄其口，三思而行，不敢各抒己见、陈述军国大事，更不敢犯颜直谏，阻止汗、贝勒滥施杀掠，革除害民弊政。金国汗、贝勒空前孤立了，听不到汉官的忠言，不知道怎样处理军国要务，尤其是在对待汉民的问题上，更是闭目塞听，一意孤行，迷信武力，大肆杀掠，把整个辖区搞得百业萧条，田园荒芜，天怒人怨，民不聊生，金国的统治出现了严重危机。

第四章 对待汉民政策的变化

第一节 “恩养”尼堪

金国汗努尔哈赤对待汉民的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对汉民实行的政策，也有所不同，特别是天命六年(1621)三月进入辽沈以后，五年之内，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从“恩养”尼堪，以抚为主，过渡到虐待汉民，以剿为主。这一政策的改变，给金国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建州时期，谈不上有什么专门的汉民政策，因为，所有汉人，不是在双方交战过程中为八旗军斩杀，便是被俘为奴，沦落为包衣阿哈，既未被杀又不是包衣的汉人，实在太少，不需要制订专门的汉民政策。

天命三年四月以“七大恨”誓师攻取抚顺以后，情况大变了，陆续有一些汉民汉官归顺金国，特别是六年三月进入辽沈之后，有着数以百万计的辽民，既不能斩尽杀绝，又不可能全部编入八旗，成为伊尔根，就更需要制定专门对待汉民的政策。

在这个关系到金国盛衰的要害问题上，努尔哈赤初期是比较

明智的，制定了“恩养”尼堪的正确政策，可是，好景不长，后来他竟转而采取歧视、镇压汉民的错误方针，严格控制，血腥屠杀，闹得整个辖区鸡犬不宁，威胁了金国的统治。^①

天命三年四月打下抚顺城时，努尔哈赤对待一千户降金汉民，是相当宽厚的，不没收其财产，不分散其家眷，父子夫妇弟兄叔侄皆照样团聚，失散的尽量找回，重新欢聚一堂，逃走的奴仆，也要清查出来，给与原主。又赐与宰杀食用的牛一千头，每户给大母猪二头、犬四只、鹅五只、鸭五只、鸡十只，以及衣服、衾褥、粮食、桌盆缸桶碗碟刀斧针剪等等家用物品，皆“充足给与”。而且还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行政制度，“仍依昔日尼堪国之旧制，委任大小官员，归彼等原有之主李永芳游击管辖”。^②

这对敦促、劝诱其他城堡的汉民归顺，是能够起些促进作用的。比如，天命三年五月进攻松山屯山寨时，派李永芳去劝降。李对明兵说：如果投降，就不进攻，如若拒降，便要攻城了。城中人回答说：我们城内之兵，不是能攻善战之兵，战则死，降则生。可是，虽然我们能够免死获生，但我们的夫妻、妇女、兄弟，以及我们的家，都完了。我们投降又有何益？李永芳把抚顺降民受到优待的情形，一一说了，这个山寨的人听后，便都投降了。^③

天命六年三月进驻辽沈以后的一段时间，努尔哈赤大力推行“恩养”尼堪的政策。他曾一再谕告汉民说：“我方以民少为恨”。滥施杀掠，可以抢到许多财宝，但很快就会用完，哪能象让汉民安心种地筑房经商行贾的利益这样长久。因此，汗要“恩养”尼堪，汉民则要归降，作汗的顺民。^④

① 尼堪，乃满文的音译，意为汉人、汉民、明国。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6。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7。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20、21。

金国汗对尼堪的“恩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实行“各守旧业”的政策。努尔哈赤一直以不动汉民田宅，各守旧业，为“恩养”汉民的重要政策，反复宣扬。天命六年五月初五日，他招劝镇江民投降说，不会因前些时镇江人民杀死遣往劝降的汉官，“而将此处之民俱皆杀戮”，应快降，便可“各守其宅，各耕其田”。^①八年四月十二日，他用《李駉马书》的形式，以李永芳的名义训谕盖州、复州等南部州县汉民不要叛逃时，又强调说：“得辽东之后，各自之住宅耕田，原皆全然未动而居也。”^②直到天命十年十月初三下令大杀反金人员时，他仍着重指出：“我等得辽东之后，不杀尔等，不变动住宅耕田，不侵犯家中各物而养之。”^③

第二，计丁授田。努尔哈赤诋毁明朝弊制，宣扬金国德政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论据，就是计丁授田，给辽东汉民分配土地。早在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颁行的“计丁授田”汗谕中，他就对汉民宣传说：“昔尔等明国富人，多占田地，雇人耕种，食之不尽，将谷出卖。贫困之人，无有田谷，买而食之，钱财尽后，则行求乞。”现在金国要将田地，分给无田的乞丐，每丁三十六亩，三十亩种粮，六亩植棉。^④天命七年正月二十四日进取广宁后，努尔哈赤下谕劝诱河西汉民不要逃入关内，仍然留在原地，降顺金国。这时，他又讲到明朝政府不管辽民死活，不分田地，而金国汗将分授田宅，以此吸引汉民来归。他谕告汉民说：“尔等山海关外之人，如若进入关内，尔等之皇帝，为天所谴，昏暗已极，不会安排给尔等食用之谷、居住之宅、耕种之田。……设若前往河东，英明汗将给与住之房，食之粮及耕种之田，善养国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37。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24。

人。”^①

第三，严军纪，绳国法，禁止欺凌汉民。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下辽阳，二十七日，德格类贝勒和斋桑古贝勒率八旗各一大臣、一牛录各二甲，去查看辽河渡口的桥，“并安抚新尼堪”，到了海州，唯恐兵士“侵害城之尼堪”，下达禁令说：“来往行走时，不许侵犯尼堪之所有之物”。有一、二女真夺取汉民的东西，依令逮捕穿刺耳鼻。“因下禁令，一无侵害，来之兵士中，有的带来之米已吃完，就挨饿”。^②努尔哈赤在天命六年里，一再下达汗谕，反复强调，不许女真官将士卒压迫汉民，勒索钱财，贱价抑买。七月十七日，他命令总兵官扬古利、纲古里说：“用送给尔等之二百两银子，喊叫想卖牲畜之人来，两方当事人同意之后，可以买而食之。若不同意，不得强买。听说先去之人，类似抢夺，扔给银子，尼堪有怨言。”^③九月初五，以颜珠瑚牛录的三人，抢夺汉民的猪，宰杀食用，斩一人，判刑二人。^④十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又下达文书，谕令女真不得欺压尼堪。汗谕说：

“我为政清明，皇天眷祐，将尼堪皇帝之河东之辽东地方给我。现今诸申、尼堪皆是汗之国人。我等之编户迁来之旧诸申，不要将尼堪认为系他国之人，夺取粮食、衣服、草、打过粮食剩下之草秸子，不要夺杀猪鸡。尔等如若犯了抢夺偷盗之罪，……该杀者依法处死，该治罪者罪之。”^⑤

第四，重赏效劳顺民。五月二十七，努尔哈赤到鞍山查看汉民时，遇见盖州汉官遣人送来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三年(1125)铸造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4。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4。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26。

⑤ 《满文老档·太祖》卷27。

的钟，十分高兴，立即下达督堂谕令说：“此乃我等之昔日金国阿骨打祖之弟，本名吴乞曼皇帝，又称天会帝”，于天会三年铸造的，因献我祖先之钟，该官升了职，对送来之人，“应赏什么”？让督堂考虑。过了十二天，对这送钟来的庶人，破格重赏，升为备御。^①

六月初七，海州属下析木城的村民，制造了三千五百一十个绿碗、小瓶送来。努尔哈赤大喜，立即下谕说：

“以东珠、金、银之为宝者，果何足为宝耶？寒时可著乎？饿时可食乎？理国之贤人，知国人所不能知之物，巧匠制造人不能造之物，是乃真正之宝也。今析木城送来制造之绿碗、瓦盆、酒瓶，于国大有益处。对此制造之工匠，抑赏以职耶，或赐以财帛，尔等督堂、总兵官、道尹、副将、游击等议之，作书回奏。”^②

第二日，努尔哈赤又谕示督堂说：你们的建议是对的，应当对造碗送来之人重赏。于是，将制碗的人，由庶人升为备御，赐给银两。^③

以上四个方面，就是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初期，施行的“恩养”尼堪政策的主要内容。应当说，这项政策是比较恰当的，如果长期坚持下去，对缓和满汉民族关系，稳定辽东局面，保护汉民的生命财产，恢复和发展辽东地区的生产，以及对金国国库收入的增加，保证兵丁役夫的来源，都有可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可惜，努尔哈赤不能持之以恒，不久便放弃了这项方针，转而错误地对汉民严格控制，残酷屠杀，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2、23。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3。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3。

第二节 迁丁隶民

努尔哈赤满以为通过上述“恩养”尼堪政策的实行，辽人定会感恩戴德，三呼万岁，争作顺民，奉养君汗。不料，这个愿望完全落空了，广大汉民不仅没有感谢所谓的育养不杀之恩，不按照汗的规定毕恭毕敬甘当马牛，反而怨声载道，怒气冲天，奋起斗争，叛逃不绝。原因很简单，“恩养”尼堪的政策本身，就包含有严重的阶级压迫民族歧视内容（详见第二章“各守旧业”、“计丁授田”的评述），而且，尽管有汗谕，有禁令，但并不能制止八旗女真将官对汉民的欺压和奴役，他们以“征服者”、“战胜者”的身份，在国中横冲直撞，胡作非为，掠夺财畜，逼民为奴，草菅人命，鱼肉辽民。何况，进入辽沈以后，汗、贝勒就执行了优遇女真官将，厚待蒙古贵族，编丁隶庄增置拖克索的政策。这一切，把辽民推入了水深火热的地狱，他们怎会俯首贴耳，任人宰杀，因而掀起了规模浩大的长期的反金斗争。

面对这辽民的反抗，努尔哈赤不是静心思考，从本阶级、本集团的弊政暴行去寻找原因，采取纠错利民的措施，制订确系为民牟利的政策，努力减轻汉民负担，放松一些控制，改善其处境，以平息民怨，缓和矛盾，反而错误地认为，辽民忘恩负义，一点不念及育养不杀之恩，转而采取了加强暴力统治，滥施杀掠的高压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反金斗争的激化，汗、贝勒越来越采取了更残酷、更野蛮的手段。

最早是将辽民分隶八旗官将和迫令汉民迁移。努尔哈赤以汉官勒索汉民财物为藉口，将全体辽民分别编隶八旗官将。天命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努尔哈赤对汉民下谕说：

“若令汉官照旧辖治汉人，将因其惯习而索取财物，苦

累国人。今清查河东尼堪丁数，于女真官员中选取适当之人，令女真官员管辖。无论何人，如不愿在尼堪官员处，而愿依靠女真官员为生之人，皆可来依靠。”^①

天命七年正月出征广宁前夕，金国汗、贝勒于初四日分配河东的汉民，给与八旗官将管辖。给女真的督堂、总兵官三千丁，副将一千七百丁，给参将、游击一千丁，备御五百丁。给尼堪总兵官四千丁，副将三千丁，参将、游击二千丁。^②

二月二十八日，又将广宁等地迁来的汉民，按广宁降官职位的高低，分与辖治，多余的人丁，分给来归的蒙古诸贝勒。^③

金国汗、贝勒将辽东汉民分隶八旗官将，有两个目的。一是加强对汉民的统治。当时，金兵主要聚居辽阳、沈阳及少数要塞，许多州县，或无兵，或只三几十、一二百名金兵，怎能控制住本州、本县数万、数十万汉民。现在，辽民分隶各将，情况就不一样了。总兵官多系管辖一旗的固山额真。一旗照二十五个牛录计算，每牛录辖丁三百，总兵官可辖七千五百丁，三丁抽二，有兵五千名。参将、游击多系甲喇额真，管五个牛录。辖丁一千五百，可征兵一千名。用这样一批辖丁众多带领军队的武将，来统治分给他们隶属的四千、三千、一千七百、一千、五百名汉丁，就是以女真兵力作后盾，以武力来严格统治辽沈居民，镇压反抗，制止逃亡。

另一个目的是，为八旗官将增加收入，扩大势力，提供了有利条件。努尔哈赤明确规定，各将可以对“各自之汉人”（即辖属的汉民）征收鱼、雉、野鸭、水果等物，可以“任意差遣”数十名汉兵，还可委派所辖汉民打牲捕猎，供给肉食。至于八旗官将对属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8。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32。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37。

民的任意科索，更是司空见惯，十分普遍。^①

这种将辽民分隶各将的制度，加重了汉民的负担，人身依附更加厉害，更不自由了。

对辽东汉民危害更大的是，常被强迫迁徙。进据辽沈以后，因为一些州县接近明境，南部沿海地区，乘船渡海，即可到明国的山东，居民易和明臣联系，逃入其境。与朝鲜接壤的镇江，居民过江即入朝境，再转返明国。有的州县虽与明境隔绝，但曾发生叛逃，为示惩罚，加强控制，也须迁徙。金国统治者认为，勒令土著人民离开老家，移往新区，人生路不熟，就难于联络，不易逃跑，便于控制，因此从天命六年八月以后，多次大规模地强迫辽民迁移。

天命六年七月末，镇江军民起义，捕捉城主游击佟养正，金兵前往镇压后，八月，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领兵二千，移金州民于复州，二贝勒阿敏、四贝勒皇太极率兵三千，移镇江沿海居民于内地。^②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遣二贝勒阿敏带兵五千，前往镇江，强迫镇江、瑗河、新城、宽奠、汤山、镇东堡、镇夷堡、凤凰等地汉民，迁往萨尔浒、清河、三岔儿等处，放火焚烧民房，恋居不迁者，杀无赦。努尔哈赤谕告汉民说，就是因为镇江人民反金，“叛乱不止”，才将镇江、宽奠等处汉民，迁往内地。^③

天命七年正月，攻下广宁等城后，又强迫广宁等九卫汉民渡过辽河，锦州二卫人口迁往辽阳，右屯卫移金州、复州，义州二卫徙盖州和威宁营，广宁四卫居民迁辽阳和奉集堡。^④

天命八年六月，镇压了复州反金活动以后，强迫盖州、复州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0。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4、25；《武皇帝实录》卷3。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8、29、30。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35。

属下南部地区汉民，迁往耀州、海州、牛庄、鞍山等地。督堂下达的迁移文书说：因为明国派来的“奸细不断”，汉民若仍居原地，不安全，有了叛乱，要处死，故要迁移。这次，一共拨出三十万垧田，分给移民。^①可见移民之多。

天命九年正月初一，因有人告发大里山村居民，纷纷买马，恐要叛逃，诸贝勒立即下达文书，责令主管官员将该村子女带来辽阳，在虎皮驿拨与田宅，迁至此处。^②

被迁汉民，既在战争中遭受八旗军的烧杀掳掠，又被迫离开数代居住的故乡，前往陌生地域，跋涉数百里上千里，路途遥远，天寒地冻，行走艰难，旧居日用家具衣器，以及衣服粮谷等物，哪能尽数携带，到了新地，又需筑屋避寒，添制各物，钱财耗费甚多，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很多移民在途中把存粮吃光，无米下炊。^③迁徙途中，还被押送官员敲诈勒索，任意欺凌，甚至连妻女都难保清白，横遭侮辱，种种苦痛，实难忍受。但是，不走不行，金国汗、贝勒硬要强行移民，残酷镇压。当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领兵驱迫义州城民迁徙时，城民抗拒不走，竟被金兵野蛮屠杀。努尔哈赤并多次以此为例，威胁应迁地区汉民迅速迁走。^④

连续三年的大迁徙，汉民劳累奔波，钱财耗尽，故乡田土遗弃不耕，大片土地抛荒，新到地区，资金缺乏，农器不全，耕牛不足，既难开垦荒地，又难耕好旧田，因而辽东地区田园荒芜的情况相当严重。多次迁徙，成年累月行走不绝，所过州县村屯骚然，社会秩序动荡不定。这一切，既进一步激怒了辽东汉民，加剧了民族矛盾，又在经济上、政治上削弱了金国的统治，真是祸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5。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60。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30。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34、35。

国殃民，纯属蠢举。

第三节 合食同住

努尔哈赤虽然一向聪睿机智，想出了许多奇计妙策，解决了很多麻烦问题，越过了重重难关。但是，进入辽沈以后，骄傲了，太自负了，误认为自己真是奉天承运之君，所作所为，皆系顺天意，合民情，绝对正确，因而遇有挫折，便不够冷静，大发雷霆，干了不少蠢事。强迫汉民与女真合住同食，就是一件笨得出奇的蠢事。

两个不同民族的人员，要住在一间房，同桌吃饭，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年两年三年若干年，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十分罕见的。想出这个绝招，创立这项政策的，不是别人，而是素以聪睿著名和自负的大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

天命六年三月打下沈阳、辽阳以后，努尔哈赤就下令，将建州旧地以及萨尔浒等处的女真，陆续迁入辽沈地区。十一月初一日，女真的第一木昆到达辽阳，到十二月初十，后面的女真也都到了。

这样多的女真，进驻辽沈，自然需要解决吃穿日用和耕田房宅等问题。当时，辽民纷纷逃往关内，遗下了大量田地房宅和耕牛食谷，只要调度适当，是能够安排好移来的女真的。可是，努尔哈赤却以女真与尼堪合住同食的方法，来解决此事，犯了一个大错误。

天命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下达的汗谕，规定了女真、尼堪要同吃共住。汗谕说：

“原曾令女真、尼堪合居一村，合食粮谷，合以草料饲马，女真勿得欺凌尼堪，忽夺尼堪之任何物品，勿掳掠，若

如斯擄掠侵害，尼堪来诉之后，定罪。尔等尼堪勿伪作谎言，若伪造虚伪之事，令当事者双方面质而审理。审理之时，若有虚伪，此乃罪恶矣。女真、尼堪，皆系汗之民矣。汗之金口教谕女真、尼堪皆会议公正为生，如若不听，违谕犯罪，则将重罪矣。犯罪之人，怨其自身耳。女真勿得浪费尼堪之粮食，勿得买卖，设若发现买卖之时，治罪。若开窖口，女真、尼堪合开。一月，以尼堪之升量，尼堪、女真一口各给四斗。”^①

女真、汉民不只是同住一村，共吃粮谷，同以草料饲马，而且要合住一房，共同耕田，这都是汗谕规定的。另一道汗谕说：“女真、尼堪，房要合住，粮要同食，田要共耕。”^②

为什么要这样作？汗谕解释说：“因从故地迁来，没有住房、粮食、耕田，所以与尼堪一起生活。”^③

这就是努尔哈赤创立的女真、汉民合住同食一起耕田的奇特政策。这项政策的实质，就是要尼堪供养女真。当时，农村中，最主要的财产，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耕田、房宅和粮食。按照汗谕规定，村民的房屋所有权，受到严重的侵犯。他必须将房腾出来，让女真住，而且很可能女真要占据好房，要占有大多数房屋，因为他是胜利者，是真正的主人，而汉民仅仅是其宽免不杀宥而为奴的阿哈。村民对自己辛苦耕耘收获的粮食，也失去了所有权，也无权分配了。收藏粮食的谷窖，开时要尼堪、女真同开，不让汉民单独开，存放的粮食，女真、尼堪同食，每月一口四斗，多余的粮谷，不许出卖，违令治罪。这哪里能说成是村民的粮食，他有什么支配权？田地、草料，也是同样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9。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39。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39。

情况。可以肯定地说，这项女真、尼堪合住同食的规定，就是基本上剥夺了汉民自己的土地、房宅、耕牛、粮食的所有权，就是让汉民供养女真，就是使女真成为汉民之主。

事实上，女真官将和凶横诸申，确实是把同住的汉民，看成是他们的阿哈，欺压汉民，抢夺财物，役使汉民为己干活，使用房东耕牛，甚至侮辱汉民的妻子女儿，等等不法行为，难以枚数。象副将阿布图巴图鲁，强迫与他合住的汉民服劳役，为他盖房，还随意打人。法司本已徇情轻断，拟议收回赐给他的汉民，罚银三十两，努尔哈赤还因其有功，而“眷爱免罪”。^①

努尔哈赤自己也知道这些“弊病”，他曾在一次汗谕中承认：“听闻女真使用合住一屋之尼堪之牛车，使合住之尼堪运送粮食，勒索各种各样物品。”^②

更为麻烦的是，女真、尼堪的合住同吃，严重地破坏了努尔哈赤引以为荣的“各守旧业”的“德政”。前面曾经谈过，“各守旧业”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各自保留原有的田地、房屋，以及食谷、钱财，现在，汉民的房屋，实质上被女真侵占了，汉民的田地，被女真瓜分了，汉民的粮食，被女真食用和官方剥夺了，在这种条件的限制下，哪里还能谈得上“各守旧业”政策呢？这项政策，已被尼堪女真同吃合住规定抵消了，努尔哈赤反复宣扬的主要“德政”，就这样轻率地被自己破坏了。这样的朝令夕改，怎能取信于民！

总起来说，不论是就汗谕的规定本身来分析，还是从女真官将的横暴行为看，或者是评论其对“各守旧业”等政策的影响，努尔哈赤实行的尼堪、女真合住同食的政策，都是十分错误的，异常荒唐的，它严重地侵犯了辽民的利益，加深了汉人的灾难，破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2。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39。

坏了农业生产，加剧了动荡局面，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使金国的统治出现了更严重的危机。

第四节 捕捉“无谷之人”

天命九年(1624)正月，金国发生了一件古今罕见的怪事和骇人听闻的暴行，这就是号称英明汗的努尔哈赤，在半月之内，连下九次汗谕，责令八旗官将在辖区内清查和擒捕“无谷之人”，干了一件极大的蠢事。

自从八旗军占据沈阳、辽阳以后，广大辽民就极力反对金国汗、贝勒、八旗官将的奴役和野蛮的奴隶制、农奴制剥削方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金斗争。尤其是在天命八年，由于努尔哈赤强制推行迁丁隶民和女真尼堪同食共住政策，更使辽民义愤填膺，抗金浪涛汹涌澎湃，威力更猛。降金汉官也纷纷动摇，刘兴祚副将的决心归明，李永芳的叛金之嫌，这一切，表示出金国的统治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危机。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努尔哈赤不是冷静思考，检查入辽以来的各项政策以及八旗贵族官将的所作所为，纠正错误，放松压迫，减轻剥削，以平息民怒，收买人心。而是恼羞成怒，迷信武力，进一步放弃了“恩养尼堪”、依靠汉官的正确政策，采取了更为野蛮的高压手段，在金国辖区内大肆清查和追捕“无谷之人”。《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六十一，对此事的经过，作了如下的记载。

天命九年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遣派八旗大臣，前往赫扯木等地，查量汉民家中谷物，下谕规定：每人有粮食六至七金斗（一金斗为一斗八升）的，为“有谷之人”。一口有五金斗，但又有牲畜，“足以维生者”，亦列入“有谷之人”数内，如果“不足维生”，列入“无谷之人”数内。将“无谷之人”尽皆收捕，等待汗

令，书写丁数、口数上报。二十日再下汗谕，修订划分有谷、无谷的人的标准，规定一口有五金斗的，列入“有谷之人”数内。一口有四金斗，若有牛驴，列入“有谷之人”数内，如无牛驴，即作为“无谷之人”。二十一日，再下谕派遣大臣，查量与女真合住的汉民的谷物，标准同上，但增令将“无谷之人连户押来，令为阿哈”。同日又降汗谕，辱骂无谷、不定居、不耕田的人，令将“无谷闲行乞食之人”捕捉解来，重赏捕者。二十七日，“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根据《满文老档》的有关记载和其他文献，对于这次捕捉“无谷之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五点结论。第一，所谓“无谷之人”，是穷苦汉民，而“有谷之人”，则基本是指汉人地主。乍一看来，每人有谷五金斗，折合九斗，似乎不多，不宜作为富人的标准，但在当时粮少价昂的条件下，一人有谷九斗以上，确很难得，这样的家庭还不算多。辽东地区，连年战争，兵荒马乱，民不宁居，耕种艰难，灾荒频仍，年岁歉收，谷价“踊贵”。早在辽阳、沈阳失守前一年（明泰昌元年，后金天命五年，1620年）八月，辽东地区已是一石米价银四两，石粟二两，这还是小斗，一石不及山东四斗，如按山东斗（即关内正常的斗）计，一石米价银当在十两以上，比诸正常年成，粮价上涨了十几倍。^①粮少价昂，穷苦农民缺粮情况十分严重，很多人饥饿至死。据《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四的记载，当时辽东“南方之人，……饥饿而死者甚多”。

金国汗、贝勒虽然尽力搜刮粮食，以供军用，但仍然不能克服粮荒，连对作为巩固金国统治的重要依靠力量的来归的蒙古人，每二口也只发谷一金斗，可见粮食是何等的紧张。^②

^① 《明光宗实录》卷7。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7。

这些情况表明，辽东地区的汉民，每口有谷五金斗以上足以维生的人，是不多的，大多数是不能维生的“无谷之人”，是穷苦的劳动人民。

第二，这次查量粮谷的范围很广，地区很大。这从三道“汗谕”，可以看得很清楚。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下了两道汗谕，赐给查量谷物的八旗大臣，一是赐与前往音格、赫扯木、穆溪、玛尔墩、扎库木、抚顺、铁岭的大臣。从音格、赫扯木、穆溪、玛尔墩到扎库木，这五处都是原来女真耕种居住的地区，可见，这些大臣进行查量的地方相当广阔，包括了从铁岭、抚顺起，往东北延伸到原来女真处的广大地区。另一道汗谕，是给与前往盖州以西，威宁营以东的大臣。盖州以西，包括熊岳、复州等地，威宁营以东，包括奉集堡、清河、马根丹等大片地区。正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又下谕查量与女真合住的汉民粮谷。女真与汉民合住的地区很宽广，以辽阳、沈阳为中心，包括海州、鞍山、盖州等州县。由此可见，在金国辖区的大部分地方，都进行了查量汉民粮谷的活动。

第三，这次查量谷物，金国汗、贝勒花了很大力气，十分重视。据《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六十一的记载，从正月初五起，到二十一日，半个月内，努尔哈赤接连下了九次关于查量汉民粮谷的命令，其中初五、十二、二十一日三天，每天都下达了两次汗谕。对一件事，下如此之多的谕令，是很少有的。除第一次派遣查量谷物的大臣兵丁以外，又两次增派人员，有一次竟派一固山各十五名大臣前往。人员之多，命令之急，花费力量之大，都是罕见的，可见金国统治者对此事是何等的重视。

第四，汗、贝勒清查“无谷之人”的原因，是为了压抑辽东汉民的抗金浪潮。努尔哈赤下谕，讲述为什么要清查、追捕“无谷之人”的原因时说：

“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因为，“盗牛马而杀者，火焚积谷及村中房宅者，皆系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之光棍也。对此等无谷闲行乞食之光棍，无论女真、尼堪，见者即捕之送来。若有妻、子，将妻、子给与捕者。若无妻、子，一人赏银三两”。①

《满文老档》编写者对此事解释说：“得辽东后，尼堪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而不勤力耕田，故发怒而言也。”②

这两段材料，有力地说明了，辽东广大穷苦人民猛烈反对金国统治者的压迫，他们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或者是怠工不干，不耕田地；或者是四处逃走，竭力摆脱金国的束缚；或者是秘密串连，与明联系，欲图进入明国；或是火焚地主、金将的房宅粮谷，夺其牛马，武装反抗。而且，这种斗争，十分普遍，坚持不断，影响巨大，搞得金国统治者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视如眼中钉，故下令严格清查，坚决镇压。

第五，大杀“无谷之人”，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也是金国汗、贝勒消除反抗、武力镇压的“恩威并举”方针，遭到重大失败的标志。一切剥削者、压迫者，都轻视穷苦人民，历代统治者都采用各种借口，屠杀反抗他们的劳动人民，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但是，象金国这次仅以没有粮谷、不足维生为理由，就四处追查擒捕，大肆杀戮贫苦劳动人民，还是极为罕见的。

这样的野蛮屠杀，也表明了金国汗、贝勒前一阶段妄图消除辽民反抗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彻底失败了。这样地追捕、屠杀“无谷之人”，必将激起人民的更大愤怒，掀起更大的反金波涛。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61。

第五节 天命十年十月的大屠杀

天命六年(1621)三月进驻辽东以后，虽然金国汗、贝勒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安抚”尼堪，加强控制，严酷镇压，但汉民反金怒火并未熄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烈火越燃越旺，斗争连绵不断。仅据《满文老档》的记载，五年内(1621—1626)比较大的起义与逃亡，多达数十次。发生和正在准备进行武装反抗的州县，有辽阳、海州、鞍山、耀州、盖州、复州、岫岩、暖河、新城、金州，镇江、清河、抚顺等地，基本上遍及金国全部辖区。

尽管汗、贝勒更加野蛮地镇压起义，竟然采取了古今中外罕有的捕捉“无谷之人”的行动，但也无济于事，辽民的反抗更加坚决，到天命十年五月，已经出现了震惊统治者的严重局面，努尔哈赤不得不特下急令，在汗宫门前专门设置报警锣板，规定报警信号。《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五载：

“(五月初三日)汗曰：夜间有事来报，若系军务急讯，则击云板；若系逃人逃走或城内之事，则击铜锣；若系喜事，则打鼓。”

所谓“军务急讯”，并不是明军来攻，当时明朝几遭惨败，危机四伏，根本无力派兵收复失地，而辽民反金斗争却蓬勃开展，这就是所谓的军务急讯。《满文老档》编写者解释报警信号规定的原因说：“是时年荒，逃叛甚多，乱。”可见，辽东军民的斗争，已经打乱了金国统治秩序，没法安宁，没法平定，形成了“乱”的严重局面，在金国最高统治者的门前，竟要赶紧设立报警装置，统治者已经睡不安枕了。

面临如此难局，汗、贝勒本应清醒一下头脑，冷静反省，革

除弊政，放松一点压迫，以收买民心，缓和矛盾，这才是解决难题的唯一办法，可是，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被辽民反抗气昏了头，大发雷霆，调遣八旗军队，在金国辖区大规模地屠杀反金人员。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历数汉民不忠，叛逃不止，指令八旗贝勒、大臣，带领士卒，分路前往，屠杀反金官民。他谕告群臣说：

“我等常豢养尼堪，而尼堪却置办棍棒不止。著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各往其屯，去后，甄别屯中之尼堪。常言道：豹色在外，人心难测。唯恐尔等听信奸巧之言，当以中正之心察辨之。凡以彼方所遣奸细之言，煽惑本地乡民者，皆属非我保举之官，或原为明官今已革职之生员、大臣等人，此等之人，皆另行甄别正法（原注：正法即杀之）。为我等建城池、纳官赋之人，则建拖克索以养之。无妻孥独身之人，及应加豢养之人，则养之，赐以妻、衣、牛、驴、粮谷，编拖克索。不该豢养之独身者及拒不从命者，亦予正法，自八贝勒之包衣拖克索起，凡入女真家之人，皆捕之，照例甄别。女真中之怪人、讨厌之人、顽固者，若说家中无有或不知而隐匿不举者，则罪之。明时非千总今经我委任为千总之人，一向居住沈阳，其父母家族皆来投者，则免之。家虽住沈阳，但未携父母、未带妻室、只以外妾假充居住之名者，不准居住。素未居住，因九月以来耀州、海州之消息，使其惊恐而来沈阳之人，不准居住，照例甄别之。为恐在甄别时如以前一样贿银而免之，故对沈阳、抚顺、开原、铁岭所属之人，比他处之人从宽甄别之。自广宁迁来之人，亦按抚顺、沈阳之人从宽甄别之。”①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在屠杀反金汉民时，金国汗还颁行指责辽民叛逃的告示。此告示说：

“我等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宅耕地，……虽如此育养，然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窝藏明国遣来之奸细，领受札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之秀才、官员之亲戚及以前之大臣尔等所为也，至于在沈阳之官员，及筑城充役之人，知道什么？无非为尔等之恶，受牵连而被杀耳。总之，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向明国，故杀尔等外乡之为首之人者，即为是也。小人筑城，奸细难容，即使逃亡，亦仅其隻身而已，故养小人者。”①

八旗贝勒、大臣遵奉汗谕，“分路前往，下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十三丁、七头牛，编为一庄。……此次屠杀，使贤良之秀才亦被杀绝。”②

努尔哈赤下达的长长汗谕，讲了许多问题，是记述辽东军民反金斗争和大编拖克索的极好资料。仅就这次杀戮而论，虽然努尔哈赤竭力文过饰非，巧言辩解，但也非常充分地暴露了这次对抗金军民的大屠杀的真实情况，生员要杀，原系明臣今为闲散者要杀，“筑城纳赋之小人中”，凡是“不从命者”，“不该豢养者”，也要杀，这样就很难分清杀与不杀的界限了，不管是官是民，只要领兵的八旗贝勒、大臣看不顺眼，认为你要叛逃，就杀，不需要什么证据。真是逢人便砍，滥施杀戮，搞得辽东天昏地暗，十室九空，使得其他地区汉民，闻之“肝胆俱丧”，切齿痛恨。

迷信武力的汗、贝勒，满以为经过这次大屠杀和编丁立庄，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就可把辽民吓住，控制住，就不叛逃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民心尽失，辽东军民更加厌恶金国统治，斗争更加坚决，“叛逃不止”，连相当多的降金汉官也动摇了，也反对这样不分贫富地一律屠杀，暗和明国秘密联系，待机反正，金国的统治更加不稳。

第五章 入辽以后的五大案

第一节 “虾阿哥”的贬责

一、威震辽东的达尔汉虾

在紧张的对外用兵对内平叛止逃的同时，汗、贝勒和八旗高级官将，继续围绕着统治权力的争夺而忙个不停，私下策划，暗地联络，堂上论辩，审理断决，出现了一桩又一桩重大案件。依时间先后为序，“虾阿哥”的贬责，算是金军进驻辽沈以后发生的第一大案。

“虾阿哥”，是八旗贝勒、大臣对扈尔汉的尊称。扈尔汉被努尔哈赤收为养子，赐号“达尔汉虾”，故被简化和尊称为“虾阿哥”。

扈尔汉，姓佟佳氏，曾任“五大臣”、固山额真、总兵官和督堂诸要职，深受汗父宠爱。统兵辖民，佐理国政，权势赫赫，一度成为仅次于四大贝勒的第五个大贵族。努尔哈赤曾对他说：“吾之待汝，如吾所生之四子举而用之，以汝为第五子矣。从与汝相并之人中，擢用汝而贵养之，其他大臣虽羡慕而不能得

矣。”^①

扈尔汉之所以历任要职，位高衔显，主要是因为他长年征战，军功累累，为爱新觉罗的兴起，为金国的建立和扩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虽然征服了兆嘉、玛尔墩、翁鄂洛、安图瓜尔佳、贝欢、托漠河、鄂勒珲、巴尔达、洞城等城寨，但皆系小部，人丁并未大增，一次出征，最多只有马步兵五百。人口这样少，努尔哈赤要想统一女真各部，是很难办到的。万历十六年，苏完部长索尔果、栋鄂部长何和礼、雅尔古部长扈拉瑚，各率所部诸申来投，一下子就改变了努尔哈赤力不从心的被动局面。

苏完部长索尔果率本部诸申五百户来投，每户按抽一丁披甲计算，可挑选兵士五百名，这就是说，立即给努尔哈赤增加了一倍的兵力。何和礼是栋鄂部长克彻巴颜之孙，兄名屯珠鲁巴颜，祖孙三代世为部长，皆被人们尊称为“巴颜”(即富翁)，可见其势力之强和家产之富。《清史稿》说，努尔哈赤初起兵时，“闻何和礼所部兵马精壮，乃加礼招致之”。^②扈拉瑚是雅尔古寨主，人丁也不少。

这样一来，三部长带人来归，使努尔哈赤兵力增加了好几倍，军威大振。《武皇帝实录》卷一记述了三部长来投后，接着写道：“太祖遂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这显然意味着与三部长率众“归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为努尔哈赤的创业兴邦，立下了一大功。

因此，努尔哈赤对三部长特别优待，以长女嫁与何和礼为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8。

^② 《清史稿》卷231，《何和礼传》。

妻，以孙女给与索尔果之子费英东，收扈拉瑚之子扈尔汉为养子，授三人为大臣。此时，扈尔汉年仅十四岁，就立了功，当上了“大臣”，身为汗之子，真是少年得志了。

扈尔汉勇猛刚强，自幼即披甲上阵，拼死厮杀，屡建奇勋。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扈尔汉随舒尔哈齐、褚英、代善，率兵三千，往迎瓦尔喀部斐悠城主策木特黑及其带领来归的五百户女真。扈尔汉领兵三百，护送五百户先行，乌拉布占泰贝勒遣兵一万，突然冲出，拦路劫杀。在敌众我寡猝不及防的形势下，扈尔汉毫不畏惧，当机立断，“结寨山岭”，分一百人守卫降户，遣卒飞报后军，亲领二百兵与乌拉对抗。乌拉虽有万人，五十倍于建州，扈尔汉并不退缩，“与敌兵相持经一夜”。次日，乌拉“悉众来战”，扈尔汉与扬古利“击却之”，这就争取了时间，为后继部队的来援，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天下午，舒尔哈齐、褚英等领军赶来，会合扈尔汉部，猛攻敌军，大败乌拉兵。^①

同年五月，扈尔汉又偕绰里克图贝勒和额亦都，率兵一千，往征东海渥集部所属瑚叶路，尽降其部，取赫席赫、鄂漠和苏鲁及佛纳赫拖克索，获人畜二千而回。努尔哈赤嘉其再立军功，“赏甲胄驷马”，赐号“达尔汉虾”。^②

万历三十九年七月，扈尔汉与何和礼、额亦都领兵二千，征渥集部所属虎尔哈路，围扎库塔城三日，猛攻克城，获俘一千。

天命元年(1616)，扈尔汉偕安费扬古，率兵二千，往征东海萨哈连部，来去四月，行程上千里，水陆并进，收乌拉河南北三十六寨及黑龙江北十一寨，又招降使犬部、诺洛部、实喇忻部。

天命四年三月的萨尔浒大战，扈尔汉起了突出的作用。他先是带领本旗兵丁，在努尔哈赤、代善的指挥下，猛烈进攻明军主

① 《武皇帝实录》卷2；《满文老档·太祖》卷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1；《清史列传》卷4，《扈尔汉传》。

力西路杜松部，接着又进攻北路马林部，大败明兵，奠定了此战胜利的基础。紧跟着，他又奉汗命，率兵一千，往敌明东路勇将刘铤，伏兵于山谷隘处，“以扼其冲”。代善领军赶来，前后夹击，斩刘铤，尽杀其兵。扈尔汉又与阿敏领兵攻破明游击乔一琦营，乔奔往孤拉库岩朝鲜兵营自缢死。

天命六年三月辽阳、沈阳战役中，扈尔汉带领本旗兵丁，力战克敌，再著功勋。

扈尔汉从十四岁来归，南北转战三十年，功勋卓著，史称其“感上抚育恩，誓以戎行效死，每出战，辄为前锋”。^①

正因为扈尔汉长年征战，军功累累，历任要职，又系汗之养子，因而地位崇高，权势很大。特别是在天命四年、五年和六年的上半年，扈尔汉成为具体处理军国要务的最高官将，其势之盛，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这从下述二例，可以看得很清楚。

朝鲜李民寅，以“从事”身份，参加了天命四年的萨尔浒战役，战败被俘，在建州住了一年多，探听到不少消息。他了解到，达尔汉虾是“胡将中最用事者也”。^②可见扈尔汉地位之高、权势之大。

更令人吃惊的是，扈尔汉居然成为与四大贝勒并列的后金国中的五大贵族之一。天命五年九月，努尔哈赤斥责代善听妻谗言虐待硕托时，对诸贝勒大臣说：

“吾和莽古尔泰父子二人，发觉大阿哥之妻之过错时，尔等诸贝勒、大臣窥伺大阿哥之脸色，竟一言不发。尔等扪心自问，如若以我言舛谬，则尔等皇太极，阿敏台吉、达尔汉虾须立誓。设若尔等立誓，则我等二位自会认错。但尔等

① 《清史列传》卷4，《扈尔汉传》。

② 李民寅：《棚中日记》。

若不发誓，为何仍坐在阿哥那边，徒事敷衍；快离开（彼处吧）。……言后，皇太极、阿敏台吉、达尔汉虾彼等三位起立，移到汗这边来。”^①

这段记载清楚地表明了，扈尔汉是与四大贝勒处于同等地位的。其一，扈尔汉与皇太极、阿敏、代善并肩而坐，而且当英明汗对他们说话时，皆坐而听之，没有站而恭听，也未跪聆汗谕，可见其地位之特殊。其二，努尔哈赤要处治代善时，仅他和莽古尔泰二人，仍嫌力量不足，还需把皇太极、阿敏、达尔汉虾争取过来，才能最后孤立代善。扈尔汉能与皇太极、阿敏这两个大贝勒联在一起，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势力够大的了。

不仅扈尔汉与代善、皇太极、阿敏同坐一条板凳，被汗父看成是和二、三、四贝勒同等的爱子，而且代善也是这样看的。当他杀了进谗的后妻，向汗父请求宽恕时，发誓说：“吾因不恪守汗父之教诲，不听信三位弟弟一位虾阿哥之忠言，误听妻谗，致丧失汗父委托于吾之大权。……”^②在这里，代善也是把扈尔汉与二、三、四贝勒相提并列的，而且还尊称他为“虾阿哥”。

代善是大贝勒，曾为“太子”。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分别是二大贝勒、三大贝勒、四大贝勒，皆是旗主。四大贝勒主持军国大政，其他小贝勒，如杜度、岳托、硕托、济尔哈朗等，皆须服从本旗旗主贝勒的管辖。扈尔汉能与这四个大贝勒并驾齐驱，又长期为汗宠信，被汗父委以具体军国政务的权力，地位高，势力大，不仅其他官将对他十分畏惧，就是四大贝勒也得让他三分，象济尔哈朗等小贝勒，竟还要向他馈送财物，阿谀奉承（详下），这样特殊的地位，这样突出的事例，在金国历史上，还是

^① 《旧满洲档》·《晟字档》。

^② 《旧满洲档》·《晟字档》。

罕见的。

然而乐极生悲，好景不长，这位曾经叱咤风云，威震辽东，权倾朝野的开国元勋，不久便问罪降职，赶出庙堂，年方四十八岁，就闲居林下，抑郁而死了。

二、扈尔汉的革任降职

扈尔汉的贬斥，经过了几个阶段，先是挨训罚银，后才降职闲废。

天命六年闰二月初五，重审去年八月沈阳城外追击战的过误。当时，刚夺取了蒲河，沈阳明兵前来，努尔哈赤下令，击杀来兵，乘其退入沈阳城门拥挤时刻，挥军猛攻。但是，右翼大贝勒、达尔汉虾，遣布尔济命令军队停止前进，回师以后，据此定罪。六年二月，巴拜、伟齐等将说谎作伪，翻了旧案，重新审理时，诸贝勒、大臣皆信此谎言，上奏于汗。努尔哈赤谴责断事官“以非为是”，各定罚银之罪。达尔汉虾为此气愤恼怒，脸色都变红了，气冲冲地对汗说，是汗派人去令停止不前的。努尔哈赤痛斥扈尔汉文过饰非，以伪作真，而且“红脸抗拒”，在判罪的衙门里，“划地为牢，将达尔汉虾监禁三日”。^①这是扈尔汉第一次遭受的惩治。

不到半月，扈尔汉又犯了错误，被汗父严厉斥责。天命六年闰二月十八日，因有边警，努尔哈赤询问八旗大臣，瓦尔喀路是否被明军断绝。扈尔汉回答说：已断绝了，因牛录的女人患病，未能带来，其家之人又返回原处了。努尔哈赤说：如果这样，则路并未断，我们有不少的老人、病人、盲人和瘸子，明兵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7。

去后，将要抓住他们。令沙津参将去查看，沙津带回一百四十人和马牛八十六头。因未遵汗命尽收瓦尔喀路的人口，努尔哈赤十分生气，狠狠地训斥了扈尔汉，责备他不报答父汗的殊宠特恩，敷衍塞责，不勤勉管辖国人，“因此恼怒”，命令扈尔汉“在十天之内，不准谒见”。①

虽然接连挨训，但此时扈尔汉仍然担任军政要职，领兵进取沈阳、辽阳，镇压各地反金武装。天命六年七月，镇江军民起义，辽南四卫群情振奋，金国在这几个州县的统治，出现了严重危机，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反金波涛很快就会扩大到其他州县。努尔哈赤立即派遣二贝勒阿敏、四贝勒皇太极、达尔汉虾和栋鄂额駙何和礼，领兵星夜前往，镇压了这次起义，俘获人畜一万二千。努尔哈赤取牛二千头，赐与有官职之人，给达尔汉虾牛十五头，给阿敦阿哥、阿巴泰阿哥五头牛，赐总兵官各四头、副将各三头，给一等参将各二头，二等、三等参将每二人各三头，三等游击一头。又赐达尔汉虾之旗一百三十，给阿巴泰阿哥之旗一百二十，给何和礼之旗八十。② 达尔汉虾所得的赐物，为努尔哈赤之子兼任督堂、固山额真的阿巴泰贝勒的两倍，为总兵官的三倍，六倍于参将所得，这也充分表明了他的地位远远列于八旗高级官将之前。

尽管扈尔汉仍居要职，但不幸的事接踵而来，他快倒霉了。天命六年九月初一，扈尔汉为亡妻上坟，向莽古尔泰贝勒讲，要将领兵戍守外地的弟弟章嘉带回，三贝勒同意，章嘉回来了。法司对此判决说：章嘉不该离开戍地，丢下所领之兵，革其副将职，籍没家中各物，夫妇二人空身出门。以莽古尔泰未拒绝扈尔汉的要求，未将章嘉留下，“定罪，取回女真五十丁”。因何和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8。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4、25。

礼、阿敦未劝阻，未能留下章嘉，让其兄带走，“各定罚银二十五两之罪”。对扈尔汉，则削其“敕书之百两之功”（即定罚银——百两之罪）。

努尔哈赤对扈尔汉这次“过误”的处理，显然是小题大作，很不公允。妻死之后，夫念旧日恩爱深情，上坟祭吊，有何不可。长哥当父，长嫂当母，兄弟回家，凭吊亡嫂，谢其往日抚养之恩，既乃人之常情，理所当然，又不触犯国法，何罪之有。法司声称，章嘉领兵在外戍守，不该为私废公，弃军不管，乍一听来，似乎此说颇有道理，但是，仔细一想，却未必尽然。须知，扈尔汉亲自向莽古尔泰要求，得到了同意，莽古尔泰并非小官微员，白身闲官，他是三大贝勒，是主管金国军政要务的四大贝勒之一，而且很可能是上坟这月的值班贝勒。天命六年二月，努尔哈赤规定：“四大贝勒，按月分直，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①莽古尔泰是正蓝旗旗主，扈尔汉是正白旗，如果这一月不是莽古尔泰“直月”，扈尔汉就不必找他。既然是“直月贝勒”批准了，就是合法的，就没有不妥之处，也就不存在私自弃军回家之过。可见，这次给扈尔汉弟兄定上的所谓“过失”，并非真错，是没有根据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努尔哈赤对此事的如此处理，显然包含了两个目的，一是藉此压抑一下扈尔汉，泄其年初因扈尔汉顶撞而产生的气愤，二是透漏一点消息，即扈尔汉已开始失宠了，汗父对他不仅不象以往如同对四子一样的疼爱，而且开始厌恶他了。这一着，十分厉害，扈尔汉马上就要遭殃。

不到一个半月，扈尔汉就被降职。《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八，对此事作了如下的记载：

^① 《清太宗实录》卷5。

“(天命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督堂达尔汉虾在辽东索取诸贝勒财物，又盗取财帛。为其弟达尔泰首告后，将其自沈阳以来按职赏赐之所有物品，和盗取之财帛，尽皆取之。一份给首告者，二份赏给督堂、总兵官以下，副将、参将、游击以上之官，革(达尔汉虾)督堂之职，降为三等总兵官，永禁其言。对曾给与财物之济尔哈朗阿哥、斋桑古阿哥、岳托阿哥、硕托阿哥四贝勒说：尔等或以在上之兄等之妻〔原档残缺〕为塞其口而与之，或以不使尔等之上之叔父、兄等为君，而以我等为君，因而给与财物耳！若无此故，尔等似妇女之心矣。定罪，使着女人之短袍，系裾，划地为牢，监三日三夜。汗亲自前往此三位贝勒坐之地方，叱责诸子，向脸上吐唾沫之后，送回家。”

《满文老档》的以上叙述，有原告，有罪状，有“赃物”，有索财者和送物人，人证物证齐全，据此作结论，似乎是铁证如山无懈可击，可是，略加分析，便使人们不禁产生了几疑问。

第一，此事的告发，很有文章。扈尔汉虽然不久前刚被定了“削敕书百两之功”的罪，但仅就此事而论，毕竟是轻罚，他仍系督堂，他与努尔哈赤有父子之情，他长期征战，功勋卓著，位列四大贝勒之右。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大贵族，能告倒吗？告不准，今后首告人可就要倒大霉。这真是虎嘴拔牙，太岁头上动土，太危险了。并且，为什么别人不告，而是其弟上控？达尔泰又是为了什么原因，要抛弃骨肉同胞之情，控告其兄，谋害其兄？是贪图财产，是报复私仇，还是别人操纵？这都是令人难解之谜。

第二，此案的定性，颇为奇怪。扈尔汉是努尔哈赤的养子，与汗父爱如心肝之四子一样，连大贝勒代善都要叫他“虾阿哥”。他与济尔哈朗贝勒、斋桑古贝勒是弟兄关系，与岳托、硕托是叔

侄关系。既是弟兄叔侄，平时必有往来，逢年过节，娶妻纳妾，嫁女取媳，做寿庆生，彼此之间，免不了要互赠礼品，送交贺银，若有关好帛缎和珍奇古玩，也会分赠同胞，银钱的周转暂借，也在所不免，这能说是行贿纳贿勒索财物吗？就算是扈尔汉仗恃年长位尊势大，送少收多，也很难说成是逼索银帛。如果把这种行为定成是贪婪之罪，那么，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以及所有的贝勒，包括这次审案的“诸贝勒”，没有一个能说成是与此无干的“清官”，因为，他们也有这个毛病，也不清白。

而且，这种事很难查清和定案，受者不说，送礼者不讲，经手人不交代不揭发，就难以弄清事实真相，更难作出肯定的结论，其他任何人的告发，包括扈尔汉之弟达尔泰的首告，都没有份量，都不能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

至于所谓扈尔汉的“盗取财帛”，也与上述索财之过相似。首告人没有讲明扈尔汉是盗取什么地方的财帛，是怎样盗取的。从字面上看，“盗取”应是进入仓库，窃走财物。这个仓库，可以是金国国库，也可能是汗之御库，或者是八贝勒的内库，这才叫“盗取”。既然达尔泰没有具体讲明，《满文老档》也未一一记载，可见，扈尔汉没有进入这些仓库盗取物品。那么，所谓盗取，指的是什么？看来，很可能是指扈尔汉吞没战争中所掠俘获而言。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八旗官将把掠夺所得财畜，留下一部分，上交一部分，此乃通病，渊源长久，开国时期如此，进关以后此风更盛，汗知其情，帝悉其状，不值得大惊小怪，不需要仅仅为此而大作文章，从重惩处。

可是，审案的诸贝勒、大臣却偏偏违反常例，仅仅根据达尔泰的首告，就断定确有其事，就要给扈尔汉定上逼索贝勒财物和盗取财帛之罪，就要实行惩治，而且对扈尔汉的处罚，是相当重

的。其一，将自沈阳以来按职赏赐之物及“盗取之物”，全部没收追还。金军进入辽沈，掠取了巨量金银财帛和人畜，英明汗大赏群臣，八旗官将得到了很多财帛人畜，扈尔汉身系汗子，肩任要职，位列四大贝勒之右，赐物超逾总兵官二三倍。俘获多，私分私留即“盗取”之物也必然多，两项相加，数目不小，扈尔汉的家产，不尽弃无遗，也要损失多半，经济上受到了很大损失。

其二，革扈尔汉的督堂职务，降为三等总兵官，这本身已够重的了。扈尔汉不仅是督堂，而且是掌握实权、位居第一的督堂，其他督堂如阿巴泰、汤古岱、何和礼等，皆在其下，唯其马首是瞻，现在，既罢官了，丢了督堂之职，又降职了，从一等总兵官降为三等总兵官。这就是说，扈尔汉从原来八旗官将中的名列第一，下降到第二、三十名的位置，连降几级。同样重要的是，扈尔汉被“永禁其言”，即永远赶出议政衙门，不能参与八旗贝勒、大臣议处军政要务的会议，与闲散官员，相近不远了。

其三，扈尔汉的被罚及革任降职，表明了他已失宠，汗不再信赖和爱护他，汗对他已经厌恶了，这在政治上对扈尔汉是个沉重的打击。官场的变化，异常显著，朝为席上贵宾，暮被摒弃门外，是常有的事。为汗所宠，阿谀奉承之人成千上万，车水马龙，应接不暇，遭汗谴责，顿时来客稀少，门可罗雀，昔日的势倾朝野，气吞山河，已成泡影，说不定还有人投井下石，趁火打劫，陷害无辜。扈尔汉就经历了这样巨大而痛苦的变化。尽管天命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的处罚，还只是革督堂，降为三等总兵官，还保持了固山额真的职务，此后的几个月里，还带兵出征，运送官粮，处理一些事务，按总兵官职领取赏品，甚至于在天命七年六月初七，还被努尔哈赤委任为“审断国人各种罪行”的十六大臣之一，而且名列第一，排在督堂、总兵官巴笃礼、乌尔古岱、索海之前，但也是夕阳西下好景不长了。就在委此重任的第五天，便

因原来处理布山总兵官之事不妥，而受牵连，降为副将，主要负责人巴笃礼降为参将。^①从此扈尔汉被彻底排斥出政界，成为一个闲散官员了。

扈尔汉为了挽回危局，摆脱被动处境，于天命八年三月十五日，向汗上书，请求宽恕，希望再次起用。他说：

“汗父，自十四岁恩养以来，并未获罪。到辽东以后，于汗父及诸弟委付之事，不公正尽力，以吾之心变之故，吾所娶之妻、养之子，下之诸弟，皆死矣。己身亦得重病，殆死矣。此亦世世代代之罪过而应遭殃矣。今决弃其前恶，敬慎从善，勤勉从事于汗父、诸弟委付之事。征战之时，若不勤于用兵行围之事，己身不正直为生，若再被汗父与诸弟发现，可谴之而贬矣。”^②

扈尔汉的请求，是诚恳的，承认了以往的过误（实际上没有什么大错），希望得到汗父宽恕，表示今后决心改过，认真从事汗、贝勒委付之事，并立下誓言，违则愿受重惩。读过此文，令人有感，身为养父的努尔哈赤，谅会动心了吧。不料，努尔哈赤并未被此感动，反而再谴其非，不信其誓言，没有起用他。

扈尔汉忧闷病重，于天命九年正月初十含恨去世，年仅四十八岁。努尔哈赤拒绝了阿布泰总兵官的要求，不许其子浑塔袭扈尔汉先前的一等总兵官世职，改为降袭一等副将。他还说：“不能说虾阿哥有功，彼已毁弃自己之功”。^③

扈尔汉的如此下场，是相当悲惨的，也是很不公平的，努尔哈赤有些忘掉旧情了。从扈尔汉来归以后三十五年的全部历史看，他对努尔哈赤家族的兴起，为金国的建立和扩展，尽心竭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2。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7。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60。

力，南北转战，立下了丰功伟绩，可是到头来，却一再受责，革任降职，忧虑气愤而死，确实有些冤枉。努尔哈赤对扈尔汉态度的变化，及其的贬责，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可能是对其权势太大很不满意。功高震主，势重危国，独断专行的英明汗，决不会允许属下人员窃取权柄，哪怕是亲子代善、养子虾阿哥，也不能冒犯汗父尊严，不许侵夺汗父之权。当然，由于扈尔汉参与了诸贝勒争夺嗣位的斗争，也可能因此而被株连，成为八贝勒之争的牺牲品了。但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样的处理，是不恰当的。努尔哈赤对扈尔汉的旧功，忘怀了，对自己的尊严和权力，看得太重了，他为此欠下了扈尔汉一家的人情债，犯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第二节 幽禁阿敦督堂

查遍《国史列传》、《清史稿》等等有关清人传记的目录，找不到阿敦的名字。不管是清朝国史馆史臣，还是民国初年的“清史馆”人员，以及近人的《清代七百名人传》、《清代名人传略》、《清代人物传稿》的作者，都没有为阿敦立传评述，似乎此乃无关紧要的小官末弁。但是，一当我们接触到清初历史时，便马上感觉到，不仅确有阿敦其人，而且此人还系驰骋疆场的勇将，曾经是红极一时权势赫赫的军政要人，应予立传专论。

阿敦，朝鲜人说他是“(奴)酋之从弟”，《满文老档》称他为“阿敦阿哥”，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近支族弟。阿敦骁勇善战，足智多谋，久经戎阵，历任要职，军功累累，政绩可观，为金国的建立、巩固和扩展，费尽了心血，立下了功勋，在八旗贝勒、大臣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在举行改元天命，努尔哈赤荣任“英明汗”的后金建国大典

时，阿敦站在汗的右侧，额尔德尼立于左，一文一武，辅佐君汗。他俩又共同接上八旗贝勒、大臣尊奉努尔哈赤为“覆育列国英明汗”的文书，“捧至汗前，置于桌上”，在大典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居于突出的地位。^①

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五日，努尔哈赤率军攻明抚顺时，阿敦已是统辖一旗兵丁挥军征战的固山额真，是他将抚顺游击李永芳带至汗前，促其降金的。^②

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八旗军攻下辽阳以后，阿敦又荣任主持军国要务的“督堂”，为安定辽东局面，管辖汉民，更改国制，防明反击而日夜忙碌。四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给督堂阿敦、副将李永芳、毛右铭及尼堪众游击之文书”，要求他们“将尼堪行事之各种法例”，全都写好呈奏，“弃其不妥之处，报其妥当之处”，至于辽东的兵额，城堡的数目，庶民之多少，以及木匠、画匠等各种工匠，“皆尽行写于文书上，呈送上来”。^③这样，既可以了解辽东军政详情，以便做好安抚、管束辽东地区的工作，又可以参考明制，为实行过渡性质的新政策，提供根据。这副重担，主要落在阿敦肩上，由他领头主持，指挥降金汉官，一一办理。

四月十四日，阿敦又奉命，带领李永芳、阿布图巴图鲁，前往边境诸堡，“教导国人，设立墩台，安置哨探”。^④这是为了安抚汉民，加强边防，阻止明军反攻，制止汉民逃亡。

七月二十六日，以镇江军民起义，擒捕守城游击佟养真，努尔哈赤命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和阿敦，领兵二千，“察看金州，遥远的边境，以及应该注意之地”，以加强控制，制止金州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6；《武皇帝实录》卷2。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21。

等地汉民响应起义。^①

阿敦地位之高，在分取镇江俘获时，表现得十分清楚。天命六年八月十二日，努尔哈赤从镇压镇江人民起义而掠取的物品中，挑出二千头牛，作为上等之物，赏给各官，赐达尔汉虾牛十五头，“赐阿敦阿哥、阿巴泰阿哥各五头”，给总兵官四头、副将三头，备御每二人赐牛一头。^②在这里，阿敦所受赐品之多，在八旗官将中，名列第二，他居于达尔汉虾之后，与阿巴泰并列第二，但名次在前。达尔汉虾是努尔哈赤宠爱的养子（详前述第一节）。阿巴泰是努尔哈赤第七子，也是督堂兼固山额真。阿敦名次能排在第二，位于汗之亲子阿巴泰贝勒前，比其他总兵官高，可见其受汗之宠爱和地位之显赫。

但是，政治风云变化莫测，很可能，朝居百班之首，位极人臣，威风凛凛，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群臣望而生畏，肃然起敬，突然间，一下子便触犯了龙颜，铁链系身，屈为阶下囚，梟首市场，满门抄斩。阿敦的处境，就发生了与此类似的巨大变化。八月十二日，阿敦还蒙受汗恩，领受厚赏，可是，仅仅过了一个月，他就被定上扰乱国政大罪，差一点被处以极刑，后虽免死，亦终身监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阿敦究竟犯了什么罪？它说明什么问题？先看看汗、贝勒对此案的审理。

还在阿敦监禁之前，他就曾两次被惩。

天命六年九月初一，阿敦因达尔汉虾带其弟回都祭坟之事，被“定以罚银二十五两之罪”。^③

这还是小事，更麻烦的问题，更大的“过错”，是四天以后的一件案子。初五日，诸贝勒、大臣断定，阿敦有三大过失。一为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4。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5。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6。

诬告巴笃礼总兵官有违法行为。阿敦说：汉民曾来告状，指控巴笃礼在戍地“将尼堪的女子，带到蒙古包内。又杀尼堪之猪、鸭食用，迫令尼堪之女子做饭”。二为攻辽阳时，蒙阿图牛录之人说谎，阿敦之旗先登上城，巴笃礼以其说谎而鞭打。阿敦想堵住巴笃礼的嘴，向诸贝勒告发鞭打之事。三为阿敦控告在尚间崖战役中，巴笃礼离开阿敦，“留下了”。诸贝勒、大臣断定，一、三是诬告，蒙阿图牛录之人是说谎，应定阿敦罪，革其督堂职，取回二牛录的诸申。^①

阿敦被定上的这三个错误，严格说来，是缺乏根据的。以第一件事来说，阿敦身为督堂和总兵官，当然有权也有责任受理汉民的上控，何况在此前后，金国汗曾多次下谕，禁止女真官将欺凌尼堪，允许和支持尼堪上告。当时，女真官将横行霸道，掠夺钱财，鱼肉汉民，侮辱尼堪妇女，已是司空见惯之事，十分普遍，诸贝勒、大臣凭什么就断定巴笃礼是清白善良的圣人，就断定阿敦是诬告？需知，阿敦有上告的汉人作证据，巴笃礼能拿出什么过硬的材料来反驳？显然此事的断决，说轻一点，是草率的，是主观的，若论其实质，追其秘密，倒很可能是故意的，是有意开脱巴笃礼，诚心狠整阿敦。

第三件事，与此类似，阿敦作为指挥官兵作战的固山额真，对其属下官将的功过，应是最了解最有发言权的了，他往上报告属将巴笃礼临阵怯战，留后不进，表现不好，这个评语，谁能推翻，难道说远在他处的别旗官将，能知道巴笃礼的战时行动吗？能以外人的印象，否决指挥官对下属将领的评语吗？当然不能，这既关系到事实的真相，也涉及到统帅的权力和职责。法司对此事的结论，显然也是有偏向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6。

第二件事，所谓蒙阿图牛录下人谎称阿敦之旗先登上城，人们不禁要问，凭什么断定蒙阿图牛录下人是说谎？有什么证据证明不是阿敦之旗先上城？况且阿敦不是争论谁先上城，而是不满于巴笃礼依仗权势，欺压属人，指控其鞭打士兵，这有什么不对？

如果仔细分析巴笃礼的品质行为，更可以了解到阿敦“过失”的实情及此事的是非真伪。巴笃礼，素以“正直”、认真自夸，也蒙骗了不少人。努尔哈赤曾召集八旗贝勒、大臣，训诫他们要公正善良，要求八旗贝勒，以及督堂、总兵官以下，游击以上，公举“好人”上报。诸贝勒、大臣会议后呈奏说，巴笃礼“正直”、认真，扬古利勇敢。努尔哈赤说：“此二大臣之善事，吾也曾听闻。若尔等众人皆说好，那就是真好。”遂赏给穿貂皮的皮端罩、貂皮的皮袄，以及伞、小旗、坐轿、鼓乐等。^① 就是这样一个八旗贝勒、大臣公推经汗钦准的“正直”官将，却不说正直的话，硬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天命七年六月十一日，诸贝勒重新审理布山在辽东战争中的“罪行”，当时，巴笃礼等人，以布山怯战为“理由”革其总兵官，降为参将，现查明事实，重新定案，“赏还布山总兵官职”，而惩治巴笃礼。诸贝勒裁决说：“巴笃礼，以尔为人正直，任用为大臣，却不说正直之话，执谬地把非说成是”。遂没收其因正直而赏赐的各种物品，降总兵官为参将，取一牛录的诸申。^② 从巴笃礼的为人来看，阿敦的告状，是有根据的，巴笃礼是难逃其责的。

尽管阿敦并无大的过失，可是却被定了罪，革了督堂职，这预兆着更厉害的暴风雨即将到来，阿敦快要大祸临头了。刚刚过了半月，阿敦就被定上乱政大罪而下监狱了。《满文老档·太祖》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3。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2。

卷二十七，对此事作了如下的记载：

“逮捕阿敦阿哥。阿敦阿哥之罪状是：彼挑拨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与四贝勒交恶，讲有损国政之话，又讲其他诸贝勒之坏话。为此，诸贝勒议论，闻于汗。汗验证其罪，令拟以罪。诸贝勒、众执法大臣，对阿敦阿哥拟以八固山之扑杀之罪。汗曰：尔等所断，诚当也，吾非惜彼。原居萨尔浒之时，曾议说：我等之手，勿杀犯罪之人，而囚之于高墙，今若背弃我等曾定不杀之议，将何以取信于国人耶！可令监禁。乃以铁链系之，监于狱中。”

后来，努尔哈赤一再引用阿敦败坏政道将被重惩为例，训诫各大臣。^①

尽管努尔哈赤和“诸贝勒、众执法大臣”给阿敦定了扰乱国政的大罪，但具体“罪行”是哪些？他为什么、又怎样使大、三、四贝勒之间“交恶”？仍是语焉不详，使人难以捉摸。幸好，阿敦不仅在八旗官将中享有崇高地位，而且声名远扬，明和朝鲜皆知其人，有所评述，提供了一些珍贵材料。

早在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正月兵部奏准“刊印榜文，晓谕中外”的《擒奴赏格》中，就有阿敦之名，系列在努尔哈赤的子侄之后。从赏格说：“擒奴酋中军韦都、前锋阿堵、书记大汉、女婿火胡里”等人，“赏银七百两，升指挥僉事世袭”。^②阿堵，就是阿敦，明帝颁行的《擒奴赏格》，称其为“前锋”，名列在韦都(额亦都)之后火胡里(何和礼)之前，可见其地位之高，及作战的骁勇，确系威震辽东，名传内地。

朝鲜对阿敦的情况，更为熟悉。天命六年八月，朝鲜满浦僉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1。

② 《明神宗实录》内閣文库本，卷47，转引自《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满州篇》第四册，第682页。

使郑忠信入使金国时，“深入虏穴，详探虏中事情”。他返回后向国王奏报阿敦之死的原因说：努尔哈赤曾向阿敦询问嗣子人选，阿敦回答说：“智勇双全，人皆称道者可”。意指皇太极。代善知后甚为不满。后阿敦又密告代善说，皇太极与莽古尔泰欲谋害代善，“事机在迫”，代善向汗父报告，努尔哈赤讯问皇太极、莽古尔泰，皆辩解无此事。努尔哈赤生气，以阿敦“交构两间”，遂将阿敦关于狱中，抄没其家。^①

根据《满文老档》和朝鲜的材料，我们对阿敦下狱一案比较清楚了。看来，从九月初五阿敦与巴笃礼之争及其被革职处罚，和这次的监禁，都是出于同一原因，即阿敦参与了或卷入了大贝勒代善与四贝勒皇太极争夺汗位继承人的斗争，他偏向于皇太极，因而受到了制裁。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五节《训斥四贝勒》里，详加评述。

第三节 额尔德尼的冤死

一、“一代杰出之人”

额尔德尼，姓纳喇氏，世居都英额，自幼聪睿敏捷，勤学诗书，通晓汉文、蒙文，而且弓箭娴熟，机智善战，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大巴克什。他很早就投奔努尔哈赤麾下，建立了许多功勋，其中，最为人们称颂的，是创制满文，这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丰富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宝藏，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① 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3145页。

满族是以女真为核心，吸收汉、蒙等族人员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女真族在金代参照汉字，创制了女真文。女真文有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两种。女真大字为完颜希尹所造，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天辅三年(1119)颁行全国。金熙宗完颜亶于天眷元年(1138)制成女真小字，皇统五年(1145)通行于世。女真字是方块字，金亡元兴以后，逐渐衰落，到了元朝末年，懂女真文的人已经很少了。明英宗正统年间，绝大多数女真人已不识女真文为何物。例如，《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载：正统九年(1444)二月甲午，“玄城卫指挥撒升哈、脱脱木荅鲁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真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从之。”

达达字，就是蒙古文字，可见，到了十五世纪中叶，女真文已失传，而必须借用蒙古文了。女真与明朝政府的交往，以及与朝鲜的交往，公文都用蒙文书写。

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明朝的公文，是由从辽东掳来的汉人龚正陆用汉文书写，“凡汗文书，皆出于此人之手”。^①在建州内部，所行公文和法令，则用蒙文，此即《满洲实录》卷三所载：“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女真人说女真语，可是没有自己的文字，不懂女真文，而必须借用蒙文，太不方便了。这样，语言和文字的矛盾，已经成为阻碍满族形成和发展的严重障碍，与建州的飞速前进，极不适应。具有雄才大略的聪睿汗努尔哈赤，富有远见，及时地看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决定立即创制本民族的文字，于万历二十七年，即起兵后的第十六年，命额尔德尼和噶盖肩负此任。《满洲实录》卷三载述此事经过如下：

^① 申忠一：《建州图录》；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2660页。

“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噶盖、额尔德尼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难，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阿玛，父也）。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额默，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

遵照努尔哈赤的指示，额尔德尼与噶盖共同研究编写。不久，噶盖以过诛，额尔德尼独肩重任，创制了满文，通行建州全境，为金国的建立，为满族的加速形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史称其：“创立满文，编行国中，一切制诏章疏文移等体，不复用蒙古字。”^①现存的《满文老档》，记事从万历三十五年（前面残缺），离其创制不到九年，可见其流行之快。

额尔德尼还是早期法令的起草者和《满文老档》的重要撰写人。他的同事称赞说：“额尔德尼巴克什记录恭敬聪睿汗之一切善政。额尔德尼巴克什之勤勉、谨慎、记性、聪明，为人所难得。在这本书上呕尽心血，最初记载这些事情，确非易事。”^②

额尔德尼积极宣传努尔哈赤承奉天命应为国君，指责明帝昏庸谬误必然失败。《满文老档·太祖》卷六，记载了额尔德尼对击败明辽东总兵官张承荫的评论，原文如下：

“编纂法典成书之大臣额尔德尼巴克什曰：因尼堪国之

①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9，《额尔德尼巴克什》。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

万历帝过误甚多，天地皆以为非，在三处设营挖壕层层排列枪炮之一万兵，战中并未取胜，皆被攻破杀死。……女真国英明汗善行甚多，天地祐吾，……尼堪一万兵发射之大炮有一百，小炮一千，我等仅有身份低微之当差之二甲，被那千百枪炮打死。……确系天祐。”

天命四年三月后金于萨尔浒大败明军后，额尔德尼又作了长篇评论。《满文老档·太祖》卷九载述说：

“编纂法典成书之额尔德尼巴克什曰：尼堪万历帝，戊午年从二月起征兵备战，己未年二月，二十七万兵，号称四十七万，四路出师，欲图攻破女真国英明汗所居之城。不顾上天指引方向，自恃国大兵多人众，违天之意而出兵，谋害公正，无理恃强，图杀善人，此乃违背天意也。若非尼堪万历帝恶贯满盈，怎能仅仅三天，就全歼二十七万兵。此是天以为大恶，故有此下场，因女真国英明汗公正善良之处甚多，……故领兵之诸贝勒、大臣无一死亡，此亦天助。”

额尔德尼的聪睿博学，甚为努尔哈赤赞赏，成为他的心腹大臣，经常派其传达重要指示。天命三年四月十五攻下抚顺后，辽东总兵张承荫来援，努尔哈赤遣额尔德尼去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军营，口传汗谕。^①天命六年七月，因镇江军民起义，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和督堂阿敦，率兵赶往金州，不久，额尔德尼即从辽阳派往戍地，传达汗旨。^②

额尔德尼是金国文臣之魁，重大典礼，均由他办，努尔哈赤就任英明汗的大礼，就是由他主持的。当时，汗端坐于上，额尔德尼站在左侧，阿敦在右，八大臣奉上尊号文书时，是额尔德尼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5。

宣读的。^①他还经常作为迎宾大臣，代表金国出席，天命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朝鲜国王遣满浦金使郑忠信入使金国，努尔哈赤派“汗之三女婿”乌尔古岱额驸、抚顺额驸、石乌礼额驸及巴笃礼总兵官、额尔德尼巴克什五大臣往迎，在城外下马相见。^②

额尔德尼还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天命五年三月，小福金代音察控告大福金富察氏送饭与大贝勒、四贝勒及深夜出院等事，努尔哈赤派遣调查的四位大臣中，就有额尔德尼，而且名列第二。^③

额尔德尼不仅是博学多识的文豪，而且还是驰骋疆场英勇冲杀的猛将，他在天命三年四月击败张承荫总兵官之战中，立下了功劳，后在天命七年二月又与达海一道，迫使明戚家堡投降，带回四百人及牛马驴一百一十头。^④

正由于额尔德尼早年来归，尽心竭力，创制满文，“传宣诏令，招纳降附”，“著有劳绩”，因而为汗宠信，赐号“巴克什”，初授参将，后升副将，成为誉满金国的大巴克什。后来天聪七年（1633）皇太极评论额尔德尼时，曾谕告文馆儒臣说：“额尔德尼遵太祖指授，创造国书，乃一代杰出之人。”^⑤

二、大巴克什的惨死

天命六年三月，八旗军进驻辽沈，十月十九日，额尔德尼因功由参将升为副将。在这国家富强个人晋职的双喜临门形势下，额尔德尼为巩固、扩大金国的统治而呕心沥血，日夜操劳，深受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7。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14。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36；《清史列传》卷4，《额尔德尼传》。

⑤ 《清史列传》卷4，《额尔德尼传》。

人们尊敬，他万万没有想到，风云即将变化，灾祸就要临头。

天命七年正月十三日，额尔德尼告于豪格父贝勒说：他所辖牛录的塔布星噶的首告，是雅逊、武纳格二人唆使的，不可不使这二人离开汗。雅逊、武纳格听到以后，向汗报告。法司遂搜查额尔德尼家，“抄出汉官所馈之去毛整猪八头，以及鸡、雉、稻米、面等”。并抄其家，“尽没其绸缎、蟒缎、毛青布、翠蓝布、衣物等家产。”努尔哈赤一面说：“汗之近身之人，何可无此财物？”令将其财产尽还额尔德尼；同时又说：“汉官之馈，少受尚可，所受过多也。”将其治罪，革副将职，贬为闲人，留下阿哈六对、马七匹、牛三头，“其余人、马、牛皆没之，赏给阿巴泰阿哥”，其所管牛录，赐与孟阿图。^①

这件案子的处理，很不寻常。就事实而论，额尔德尼收受汉官的馈物，自然不合适，但问题在于这是人情通例，还是仗势凌人，逼收财帛，揽权纳贿？官场习气，乃至一般人家往来惯俗，互相馈送一点礼品，联络感情，彼此应酬，这算不了什么事，不是大错，不触犯王法，至于以权压人，逼要贿物，那就是贪赃枉法，触犯刑律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很重要的一点是物品的多少。按照雅逊所控，查出之物，标明数量的，只有八头猪，其余鸡、雉、米、面，未载数字，量不会多。八头猪，能值几何？按时价计算，不过十两左右银子，这算是什么赃物？而且，这八头猪还不是一人送的，是众汉官送的，或一人送一头，或数人合送一头，这样看来，显然没有超出互相馈送的一般常情的范围，并不是纳贿受贿，并不是勒要财帛。按清廉的高标准来要求，说说即可，法司轻描淡写地讲几句就行了，根本值不得如此大惊小怪，立即尽行送往汗的衙门，并籍没额尔德尼之家，这种作法，就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3。

是要以小变大，将交际说成是贪污，大造声势，定成贪婪之罪，促使汗承认，将额尔德尼置于死地，用心之险恶，手段之卑鄙，令人胆寒，使人气愤。果然，努尔哈赤中了圈套，以其收物“过多”，而定其罪，革额尔德尼副将职，取回牛录，没收多余的人畜。对于一个长期效劳功勋卓著的大巴克什，如此处理，如此羞辱，是太过份了，太不应该了。这是一件不大不小的冤案和错案。

这个原告雅逊，何许人也？查查其经历，便可知晓，此人品质恶劣，名声不佳，既胆小怕死，临阵怯战，又惯于弄虚作假，捏造军功，讨要官职，而且还贪恋帛缎，违令私买。就在上述之事定案时，额尔德尼实在是难以压下满腔的愤怒，冒险向汗控告雅逊偷买覆盖祭器的蟒缎四匹、倭缎一匹。努尔哈赤听后，十分生气，斥责雅逊说：“原曾颁谕，督堂、总兵以下，备御以上，各买一匹缎，汝若以钱随意购买绸缎、蟒缎，则他人焉能购买。”定为死罪，后念其“原本痴呆”，免死，革参将职，贬为闲人，留下人六对、马六匹、牛三头，其余的人、马、牛尽皆没收。^①

额尔德尼被问罪革副将职以后，仍是巴克什，仍在汗身边，继续工作。天命七年正月十八努尔哈赤亲征广宁时，额尔德尼随汗从征，并与达海一起，迫使戚家堡投降，又奉汗命，与阿巴泰回辽阳，去迎接从蒙古古尔布什台吉处逃来的蒙古。^②

尽管额尔德尼仍然勤勤恳恳为汗效劳，可是挽转不了厄运，一年半以后，终因细故，被冤枉斩杀。《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载述此案经过如下：

天命八年五月初，额尔德尼的婢女，告发其主收了朝鲜人送来的绢，把得获的东珠与金藏在井里，在辽东没收家产时，主人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3。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35。

去其妻弟之家隐藏东珠和金。努尔哈赤传问额尔德尼有无此事，并谕告说：如有隐藏，交出后可免罪，设若隐瞒，定了罪，就不能帮助了。

“额尔德尼回答说：……今献出所藏之东珠，乃雅逊之妻所赠。雅逊之妻曾将此类东珠二十余颗送与哈达格格，而未受也。我妻往雅逊家，正逢其开箱，倾倒容器，因吾子有牙疾，故乞索之以研敷患处。所给之东珠、珍珠，系购于汉人王国臣处。经与王国臣核对，其珍珠多于王国臣所售之数。因此，众督堂审问额尔德尼巴克什曰：若系雅逊夫妻所给之东珠，在辽东抄家时，雅逊家所有米、肉，既已搜尽，如此多之东珠为何未搜出？汝当时为何不声明此系雅逊妻所给之东珠，此类东珠雅逊妻家尚有二十余颗？汝藏匿东珠，为何卸罪于雅逊？为何在抄家时将东珠送藏他处？遂拟处额尔德尼巴克什夫妇以死罪。又以为何窝藏额尔德尼巴克什送来之东珠、珍珠、金等物？婢女前来首告，尔额尔克图、布尔哈图、布彦图等，为何与额尔德尼逐出包衣，闭门私议？当初已颁禁令，父有罪，子勿涉，兄有罪，弟勿涉。若涉之，则死罪同死，罚罪同罚。尔等何故涉之？遂告于汗。汗怒，命杀额尔德尼巴克什夫妇。遂尽杀之。额尔科图鞭一百，刺耳鼻。布尔哈图、布彦图各鞭五十，刺其耳。”^①

此案的审理和判决，完全错误，额尔德尼之死，纯属冤枉。按照《满文老档》的记载，众督堂断定，额尔德尼隐藏了东珠，拒不承认，进行诡辩，因此定为死罪，家族成员也要惩治，努尔哈赤依议而行。这个结论，太不公正，这个裁决，十分荒谬，它的论据贫乏无力，漏洞百出。其一，所谓隐藏之过，本身就不能成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0。

立。天命七年正月，法司藉口额尔德尼收纳汉官馈物，而抄没其家，将财产送请汗看阅时，努尔哈赤曾明确宣布：“汗之近身之人，何可无此财物！”命令退给原主。这就是说，籍没本身，就是错误的，就不该抄家。那么，额尔德尼因畏惧法司而藏存东珠，就没有错，他没有犯抄没之罪，他的财产都应归他所有，都是合法的，而且应当受到国法的保护，旁人不得侵占偷盗，他愿意放置客厅当中，也可以，他愿意藏于井中，也可以，他把它丢掉、砸碎，也可以，他有权自由支配，这能说是触犯国法犯了大罪？当然不能。

其二，退一步讲，就算是“隐藏”，努尔哈赤讲了，只要额尔德尼承认，就不追究，就免其罪。额尔德尼害怕受罚，承认了是有东珠，但解释说这东珠不是得获的，而是从雅逊之妻处要来的。常言君无戏言，额尔德尼既然承认了曾将东珠放于井中，就算是遵谕而行了，就应免罪了，为什么又要在东珠的来源上大做文章？督堂问的是“隐藏”之过，并未问东珠的来源，讲了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揪住不放？

其三，就算是“隐藏”有过，应当惩治，也不算是大罪，不应该重惩。金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官将私拿私藏俘获品的行为，都没有按大罪处理。比如，天命四年六月，八旗军攻下开原，掠取了巨量财帛人畜，许多官将趁机潜窃藏匿，努尔哈赤下令清查，查出族弟古卦勒索贝勒、第四子汤古岱贝勒、一等大臣众额真费英东、固山额真博尔锦、梅勒额真什拉巴虾、五牛录额真图勒伸“隐藏暗地私取之金、银、缎、蟒缎、毛牛角、毛青布、翠蓝布、貂皮、毛皮”。努尔哈赤虽然生气，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但也未定罪，也未贬官革职，没有罚银监禁，更没有处以死刑，而仅仅将“这些大臣盗取之财物”没收，分给那些“没有盗窃之公

正之诸大臣”。①“盗取”之罪，尚且仅只没收其财，那么，援照此例，额尔德尼最多交出“隐藏”之物，即可了结了，为什么要定为大罪，为什么要处以死刑？岂不是小题大作，太过份了！

其四，额尔德尼解释东珠是从雅逊之妻处要来的，雅逊之妻曾将此二十余颗东珠馈送哈达格格，格格未收。这一解释，得到了哈达格格的证明。当额尔德尼被冤枉斩杀后，哈达格格出来证明确有其事，并说曾将此事告诉诸贝勒。四贝勒皇太极、德格类贝勒、济尔哈朗贝勒和岳托贝勒，都知道这一件事。②

正因为额尔德尼未犯大过，此案纯属锻炼而成，额尔德尼死得太冤，兼之其在金国朝野中声望极高，万民敬仰，因而无辜屈死以后，反响异常强烈，尽皆为其惨遭陷害而鸣不平。努尔哈赤知道以后，不仅没有冷静思考，检查此案处理是否恰当，理由是否充足，根据可靠与否，反而发表长篇谕旨，强辞夺理，巧言诡辩，恶语威胁，一意孤行，硬说额尔德尼犯了大罪，死有应得。天命八年五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召集八旗贝勒、大臣，专门就额尔德尼案件，大发议论，警告群臣。《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一作了如下载述：

“初三日晨，汗集诸贝勒、大臣曰：闻额尔德尼曾言，彼以公正而死。哈达格格告诸贝勒曰：雅逊之妻曾馈送东珠二十余颗之事，是真。尔等诸贝勒听到此言，若系真实，则我是谬误矣。获他国之人，亦当视为僚友而养之，如此差遣众多之僚友，焉可轻易杀之！一枝箭，尚且惜之矣。额尔德尼岂能谓忠？昔大阿哥在时，额尔德尼、乌巴泰尔等曾进谗言。攻克辽东城时，非尔一人之力，尔为何独取三十头猪之肉耶？我得一物，尚须平分共食也。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0。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1、54。

哈达、叶赫之诸贝勒，皆不善养己之僚友，而诱其他贝勒之僚友，彼此授受财物，其政乱矣。有鉴于此，故当初训示曰：若贝勒有赏，则赏各该旗之人，诸申有求，则求各自之旗主贝勒，勿越旗赏赉，勿越旗索求，倘越旗赏赐、请求，则罪之。并由尔额尔德尼亲手书之。尔乃多铎阿哥所辖之人，为何越旗索求于八旗诸贝勒？即使遇有诸贝勒倾囊给赏之时，无论如何，亦难为尔所遇。贝勒等赏赐，为何不赏他人，唯独赐尔一人耶？于辽东时，一寻额尔德尼，即已去四贝勒巡察之处。复寻之，仍又去四贝勒巡察之处。往而不问，归而不告其所往，如此之举，不为挑唆，岂有他哉。

雅逊之妻馈尔哈达格格二十余颗东珠，尔岂非似我之心肝之子耶，为何不告于我？若格格告于诸贝勒，尔等诸贝勒为何未曾告我？此即尔等所谓之公正耶？

乌拉之哈斯瑚贝勒，有用斛盛置之东珠，然其卖于我等，仅一、二颗。我等卖于汉人者，亦仅一、二颗。如此二十余颗之东珠，不知雅逊系从何处得之？莫非雅逊有用斛盛置之东珠乎，抑或有用斗盛置之东珠乎？

尔等承审此案之大臣，当持公正之心。上有天，下有地，我等唯有尽力秉公审理，即使无能为力，亦只有秉公审理而已。哈达、叶赫、乌拉、辉发等国之众大臣，不持忠心，奸谗贪婪，故国亡而彼等自身亦亡。上天注定，国各有臣。天祐忠正，君王得福，则臣等亦将得福。天谴邪恶，君王无福，则尔等亦无福也。哈达、乌拉、叶赫、辉发之国已亡，今其国之臣安在，皆已为圉中之人矣。君毁则臣亡，君福则臣亦贵。望尔等诸大臣，当以忠心为之。”

这次汗谕，很不寻常，一系汗专为一事，而召集诸贝勒大臣训话；二是长达千字而又为《满文老档》全文刊载，实为罕见；三

是汗为己过辩解，力言此案之是和额尔德尼之非，堂堂一国之汗，竟下降为此案的一方，与对方互相争辩，大损君威，这又是金国常少见之事；四系诡辩不足，则加以恶言相胁，明明是一介臣僚之事，却大训群臣的不忠，以“君毁则臣亡，君福则臣亦贵”，来劝诱胁迫八旗贝勒、大臣同意他对额尔德尼的处理。这一切，正好表明了，努尔哈赤内心不安，明知有错，但又偏要文过饰非，一错到底，压服臣民。

不过，聪明反被聪明误，努尔哈赤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次训话，不仅没有定死额尔德尼之过，说通和压服八旗官将兵丁，反而事与愿违，既提供了确凿可靠的根据，证明额尔德尼实系无辜被害，反映出军心、民心、臣意的不平，亲为皇女的哈达格格出来作证，四大贝勒之一皇太极，以及岳托、济尔哈朗、德格类三位贝勒，也声明知道东珠之事；而且他还泄漏了天机，使人们知道杀害额尔德尼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他成为诸贝勒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斗争的牺牲品。这在本章第五节《训斥四贝勒》将具体论述。

尽管金国汗努尔哈赤为错杀额尔德尼一事而绞尽脑汁，极力辩解，严格控制，但它毕竟是一个错案，是个冤案，无论是谁，哪怕是威震天下的无敌君汗，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不能长期掩盖此案的真相。就在额尔德尼屈死以后的第十年，天聪汗皇太极便正式为他平了反，高度评价他创制满文的丰功伟绩，明确指出：“额尔德尼遵太祖指授，创造国书，乃一代杰出之人，今也亡。”^① 顺治十一年，又追谥额尔德尼为“文成”，其子萨哈连官至銮仪卫冠军使。^② 一代文豪额尔德尼死后有知，也可聊以自慰了。

① 《清史列传》卷4，《额尔德尼传》。

②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九，《额尔德尼巴克什》。

第四节 审讯乌尔古岱额驸

一、“哈达贝勒”

“哈达贝勒”，是哈达贝勒蒙格布禄之子乌尔古岱，因系英明汗努尔哈赤之婿，又曾任督堂，故人们尊称为乌尔古岱额驸、王督堂，有时也称为哈达贝勒。

乌尔古岱，姓纳喇氏，祖父名万，自称“万汗”，明称为王台，是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一哈达部贝勒。王台机智善战，远交近攻，与明友好，禁杀掠，勤修贡，势力迅速发展，最盛之时，东辖辉发、乌拉，南隶建州，北领叶赫，延袤千里。王台初袭祖父克什纳的塔山前卫左都督职，“长东夷”，万历三年(1575)，以缚送建州酋长王杲，进右柱国、龙虎将军，其二子为都督僉事。后因年老，精力不济，是非不明，各大臣科索民财，欺压属部，勒要贿物，其子扈尔干尤为暴虐，以致属民离心，诸部尽叛，领地日蹙。万历十年七月，王台忧愤病故。

王台有五子，长扈尔干，二、三早死，四为康古陆，幼子蒙格布禄。王台死后，诸子争分父业，干戈不断，国势益弱。不久，扈尔干及其子歹商，以及康古陆相继去世，蒙格布禄继为哈达贝勒。万历二十七年五月，叶赫纳林布禄进攻哈达，“大焚掠”，蒙格布禄不能抵挡，“以三子为质”，向努尔哈赤求援，努尔哈赤遣费英东、噶盖领兵二千前往。九月，乘哈达势弱，努尔哈赤率军攻哈达，灭其国，降蒙格布禄，第二年藉口其与己妾法赖私通而斩杀。明政府降旨斥责，努尔哈赤不得不以第三女莽古济嫁与蒙格布禄的长子乌尔古岱，并于万历二十九年七月在抚顺

关外，“刑白马，誓抚吾苍保寨”，令乌尔古岱率领部属回归哈达。乌尔古岱虽然当上了哈达贝勒，但空有其名，纯由努尔哈赤控制。不久，努尔哈赤彻底地将哈达并为已有，乌尔古岱成为后金国的一员战将。

乌尔古岱为岳父英明汗努尔哈赤竭力效劳，披挂甲冑，驰骋疆场，为巩固金国的统治，立下了功劳。天命六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八旗军打下辽阳以后，鞍山、海州等七十余城“官民俱削髮降”，但镇江民拒不剃头，并杀了派去劝降的官员。五月初五，努尔哈赤遣“女婿乌尔古岱副将，抚顺李永芳副将”，领兵一千，前往查看，谕劝归顺。乌尔古岱二人去后，杀拒降者，迫使镇江汉民剃发投顺，俘获拒降之人妻子，带回一千俘获。汗命以尼堪三百，赏给督堂、总兵官以下至游击职官员，以六百俘获赐与出征兵士。^①

天命七年正月，乌尔古岱带儿子额色德里，参加了进取广宁的战争，额色德尼在杏山附近坠马而死，努尔哈赤听到外孙去世，悲哀痛哭，命费扬古贝勒和岳托贝勒带领数百旗兵，护送遗尸回辽阳。^②

乌尔古岱还肩负了调查军情处理汉民事务的责任。天命六年九月初六日，汤站堡的守堡向上报告说：住此的戍兵，袭击境内已经归顺的“国人”，获一万俘获，杀人之多，连草都沾上杀人的血。努尔哈赤命督堂阿敦和乌尔古岱副将，带领属员，前去调查，规定如果确实是“我们境内之国人”，全部归还。^③

乌尔古岱又参加了迎接朝鲜使臣的工作，也就在九月，朝鲜满浦金使郑忠信入使金国，努尔哈赤派乌尔古岱额驸、抚顺额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1、22。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34。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6。

喇、石乌礼额驸、巴笃礼总兵官、额尔德尼巴克什五大臣迎接，在城外下马相见。^①

由于乌尔古岱是英明汗努尔哈赤的大福金富察氏所生莽古济格格之夫，尊称“额驸”，又曾经是海西女真哈达部之长，“来归”以后，为金国效劳立功，因此备受岳父宠爱，很早就当上了副将，天命七年又升任督堂和总兵官。在六月初七改革官制明确职责时，努尔哈赤下谕说：

“委任总兵官达尔汉虾、总兵官巴笃礼、督堂乌尔古岱额驸、总兵官索海、副将阿泰、游击雅护、参将叶古德、参将康喀赖、游击南济兰、游击武善、备御瑚里、备御托克推、备御博博图、备御星嘉、备御魏和得、备御郎格等十六人，审断国人各种罪行。”

审断案子，一向是金国要事，努尔哈赤对此十分重视，亲自掌握。乌尔古岱能被授与审案之权，确系为汗重用。而且，在这十六人中，有四个总兵官、一名副将、三游击、二参将、六个备御，很显然，参将、游击和备御，是作具体工作的，实权归四个总兵官掌握。乌尔古岱不仅名列第三，仅次于达尔汉虾和巴笃礼之后，这本身已表明他地位之高和权力之大，而且，达尔汉虾已开始失宠，六年十一月革了督堂职，降充三等总兵官，还被禁止“参议政事”，七年六月十一日（即委任审案以后第五日）又因过再降为副将，巴笃礼也因同案降充参将，四个总兵官中只剩下乌尔古岱与索海二人。乌尔古岱还是督堂，索海既只是总兵官，又是晚辈，当然要听乌尔古岱的话。由此可见，乌尔古岱此时是具体掌握审案大权的最高官将。

^① 《清文老档·太祖》，卷27。

乌尔古岱不仅是审断诉讼的首席执法官将，而且是具体处理金国军政事务的第一督堂。进入辽沈以后，努尔哈赤任用心腹官将为“督堂”，办理军政财经诸事，到天命七年六月，先后任督堂的有达尔汉虾、阿敦、阿巴泰、何和里、汤古岱和乌尔古岱。最初是达尔汉虾名列第一、阿敦第二，天命六年九月阿敦被监禁、十一月达尔汉虾革去督堂，不久乌尔古岱就成为代替达尔汉虾和阿敦，成为具体理政治国的首席督堂了。

天命八年二月初七，努尔哈赤对官制又作了重要的改革，八旗设督堂八人，称“八大臣”。《满文老档·太祖》卷四十五载：

“初七，任命八旗督堂八人，每旗断事官各二人，蒙古断事官八人，尼堪断事官八人，监视诸贝勒挂在脖子上之箴言者各四人。任命诸大臣之名字：督堂等级者是乌尔古岱、阿布泰舅、扬古利、多弼叔、卓里克图叔、叶赫之苏巴海、阿什达尔汉、贝托辉。……”

在这八个督堂中，乌尔古岱、扬古利、阿布泰舅三人是总兵官，卓里克图叔是副将，苏巴海、阿什达尔汉是参将，多弼叔、贝托辉是游击。很显然，副将以下充任督堂之人，是做具体工作的，大事由三总兵官管。乌尔古岱不仅是总兵官，又在八个督堂中名列第一。足见其地位之高权势之大。

更令人注意的是，八督堂的权力比过去更大了。努尔哈赤称八督堂为八大臣，授与他们以下权力：

“汗曰：于八和硕贝勒，设八大臣副之，以观察诸贝勒之心。谁以己事与他人之事视为一体，持以公论，谁对己身之过，不自引咎，而突然变色，八大臣共察之，知其非，即责之，如不受责，即告于汗。此其一。凡国事之何以成，何以败，当深为筹划之。有能辅助政业者，则以此人贤良能胜任政事而荐之。不能胜任者，即以此人卑劣无能而劾之。此

其二。自总兵官以下领兵之诸大臣，凡军旅之事，何以胜，何以负，当妥为计谋之。野战，以何种器械为宜，攻城，须用何器，一应物品，皆齐备之。其治军能胜之人，则曰此人善于治军，不能胜任者，则曰此人带兵无能，悉以奏闻。此其三。不肖者不降不革，何以惩恶？贤者不举不用，何以劝善？尔等如能妥善经理各项国事，我之心将以子孙繁衍，大臣林立，而感到欣慰矣。”^①

根据这次汗谕，八督堂拥有很大权力。国政的善恶成败，用兵的胜负、计谋，军备的供应、改善，文臣武将的忠奸贤劣升降奖惩，有关金国政治、军事、人事等等重大问题，皆委八督堂安排调配处理，甚至于连尊如贝勒贵为旗主的八和硕贝勒，都被八督堂监察、劝谏和弹劾，其权力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在金国历史上，八旗大臣能拥有如此大的权力，还是罕见的。八督堂拥有这样大的权力，乌尔古岱又是八督堂之首，可见此时他真是声威赫赫势倾朝野的军政要员了。然而乐极生悲，盛极而衰，四个月以后，这位曾经使人望而生畏的大督堂，竟险被处死，差点人头落地，权势顿失，成为入辽以后轰动金国的第四大案。

二、惩治王督堂

天命八年六月，两名汉官向大贝勒代善告发乌尔古岱收纳贿赂。复州的备御王炳上告说：先前，曾交哈兴望赤马一匹、银五十两，“馈送王督堂”。去年十二月，为筹都堂年礼，交汉人罗山沙银一百两，令其购买蟒缎、珍珠。今年四月，又支银一百三十两。十二月二十一日，交罗山沙纯金十两、上等妆缎一匹，由我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5。

亲率从人霍世勒送去。五月初三日，我王备御于我的上房北屋，交给罗山沙银三百五十两，并告罗说：“沈阳、甜水站无官，尔以此银送王督堂，询之彼处可赏我乎？”吴善送佟额驸马一匹，蟒缎衣服一件。赵山奎送佟镇国银八十两。送李代成金二两、银瓢一个、粗布二十匹、细布二匹、棉花二包、贵马一匹。送毕志赛金十两、银瓢一个。送佟都司骡一头。送朱永成花马一匹。

永宁监备御李殿魁也向代善上告说：天命七年八月十九日，“督堂取我李殿魁之金二十两，王游击知之”。十月初九日，“督堂乌尔古岱以狐肫皮袄一件，给银十两，由王游击取去。十二日，塔尔虎取青马一匹、驴一头、白马一匹，送督堂。十二月十五日，王游击取狼皮肫子一件，送与督堂。王游击带去铁匠一人、皮匠二人，留在督堂处。

此案交众断事官及诸贝勒审理。乌尔古岱回答说：“所谓黄金，前李殿魁曾拿黄金十两，言系爱塔送来。送来后，我想，爱塔与我有仇，恐乃欲加诬告而诱惑之，遂出金以示四贝勒。四贝勒曰：诚是爱塔所送，又有何益？不如暂留以金，以待事发。此事德格类阿哥、济尔哈朗阿哥、岳托阿哥皆知。原金仍在。至于其他十两之金，则不知也。”李殿魁说，先送十两，后送十两，“皆受之。塔尔虎知之”。塔尔虎回答说：“先受之十两黄金，叔父受之。后送十两叔父未受”。乌尔古岱又说：“我未曾受狐肫皮袄，此系由岳托阿哥给价取去。仅此而已，其他一概不知。”问塔尔虎，塔尔虎供称：“马系给价受之，狼皮肫子确曾送来，然嗣后又令拿回。”李殿魁说：“皮肫子即在尔家”。遂往观之，果有皮肫子。“经如此审理，俱落实”。

众断事官断决说：“尔乌尔古岱，当阿敦阿哥获罪之时，故充忠良，跪于汗前，令众大臣皆跪于后。尔曰：不怨杀此奸逆，乌尔古岱今后何以治国？以示尔之忠正。然所报答汗者，实乃内

藏祸心，外以巧言而取信也。尔乌尔古岱之罪，与额尔德尼巴克什之罪无异，以治彼之法治尔可也。……拟乌尔古岱以死罪”。并劾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四贝勒。报汗后，努尔哈赤说，不需为收汉人的财物而处死乌尔古岱，令免死，革督堂职，降为备御，不许独往他人之宅，他人亦不准去其家。①

这一案件的出现及其审理和裁决，都使人感到怀疑。首先，为什么复州备御王炳、永宁监备御李殿魁要告状？须知，乌尔古岱是英明汗亲女之夫，尊称额駙，贵为督堂、总兵官，后台粗，权势大，小小的汉人备御，怎能有此豹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而且，王炳的所谓“告状”，实际上是告自己，告自己如何想方设法孝敬督堂，献纳贡物，博其欢心，以图升迁官职。难道他二人不知这样做的危险下场吗？努尔哈赤一入辽沈，就多次训谕降金汉官，要他们尽革前明陋习，不要馈送上官礼物科索民财，违将重惩。②这次王炳讲了行贿之事和目的，岂不是自找麻烦自投罗网。他二人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其次，此案的审理，也很奇怪。首告人王炳、李殿魁，坚持是送了贿银贿物，被告乌尔古岱却一律拒绝，力言并无其事，并举出四位贝勒作证人。可是，众断事官不相信乌尔古岱的辩解，竟硬性断定纳贿为实。这个结论，缺乏根据，难以成立，但偏偏就成了定论。

再次，这事的结局，也不平常。断事官将不太可靠的结论，当作铁证如山的定论，并据此延伸，扩大为败政乱国的大罪，要将他定成额尔德尼一样的“奸臣”，同样惩治，要判处乌尔古岱死刑。金国汗认为太重，不能因其收汉人财物而斩杀，改为免死革督堂，降充备御，可是，其所收之物，却由四贝勒皇太极付出，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4。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4。

“交金十两、银三百两”，就此了结。为什么众断事官要无限上纲，将乌尔古岱与额尔德尼相提并论，定为危害国政的大奸，严酷斩杀？为什么努尔哈赤只讲乌尔古岱不应收纳汉人财物，只字不提断事官加在督堂身上的乱政大罪，而从轻发落。看来，很可能努尔哈赤知道，此是怪案，内中蹊跷，耐人寻思，众断事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故而轻惩乌尔古岱，严斥四贝勒皇太极（详下第五节）。

尽管乌尔古岱并未处死，但给他定上了贪财之罪，革了督堂，降充备御，失去了权势，成为诸贝勒之间斗争的牺牲品。一个曾经为金国的建立而奔走效劳的大额驸、大督堂、大总兵官，竟落得如此下场，确实令人寒心，使人伤感。满腔愤怒、不平的乌尔古岱，忧伤成疾，不久即离开了人间，其妻莽古济格格另行改嫁，曾为“东夷之长”的哈达名酋王台，其子孙就这样没落下去了。

第五节 训斥四贝勒

四贝勒，是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明和朝鲜人又称他为洪太主、红歹是、弘太时、黑还勃烈、黄大住，因其位居四大贝勒之末，故常被称为四贝勒。

皇太极在金国中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从本章第一节《“虾阿哥”的贬责》，中经阿敦督堂的幽禁、额尔德尼的冤死，直到第四节《审讯乌尔古岱额驸》，每节都涉及到四贝勒，而且前述四案，都使人感到迷惑不解，都是疑案、冤案和错案。究竟事实真相如何，有无内在联系，症结在何处？难以捉摸。幸好，《满文老档》在记述前面四案时，讲到了皇太极的一些事，特别是在乌尔古岱的处理上，努尔哈赤专门对皇太极说了一番话，严厉地训

斥了四贝勒，这些材料为我们提供了解开上述疑案的钥匙，藉此可以弄清进入辽沈以后这几年金国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真实情况。现先将有关重要资料摘录如下。

天命六年六月初，奉命审理乌拉古岱额驸受贿案的诸贝勒、众断事官，在指责乌拉古岱为心不忠以后，接着又裁断说：

“四贝勒，德格类阿哥，济尔哈朗阿哥，岳托阿哥，先者额尔德尼东珠之事，惟尔等知也，其他贝勒何故不知？又，后此金之事，亦同为尔等四贝勒知之，其他贝勒不知。因而遣之。贝勒之罪，由汗断之。乌拉古岱之罪，断以死罪。如此断后，告于汗。”①

努尔哈赤听后，十分生气，对皇太极痛加训斥。他对四贝勒说：

“尔若贤良，凡事须公正处理，持以宽厚。于诸兄弟，皆须均平互敬。独以尔身为诚，凌越他人，岂置诸兄不顾，而令尔坐汗位乎？集会于衙门，分离之时，尔若送诸兄，诸兄之子回报于尔，送于尔家，则合于礼矣。尔原不送诸兄，诸兄之子、诸弟送尔，尔何故默然受之，此岂尔之贤明者乎。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尔等何故置各自父兄不顾而僭越而行，尔等如斯僭越而行者，除进谗恶外，又有何益。四贝勒，吾以尔乃为父我之爱妻所生惟一后嗣而不胜眷爱矣，此岂尔之贤明者乎；尔何故如此愚也。

又，此事之了结：汉人送与乌拉古岱之金银，命于四贝勒处取之以偿。取德格类一牛录诸申，取济尔哈朗二牛录诸申，取岳托一牛录诸申，如此了结此事。言毕遣之。”②

根据汗谕，法司遂取德格类的额克星格牛录，给与多铎阿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4。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4。

哥，取济尔哈朗的呼什屯牛录，给与其弟费扬古，取索索里牛录给与其兄阿敏。取皇太极的栋鄂额駙何和礼的四个牛录，给与大贝勒代善，“以汗之旗之索海、宜荪二牛录，给四贝勒”，“取四贝勒十两金、三百两银，置于库”。^①

从努尔哈赤对皇太极的斥责训诫，以及对鸟尔古岱案子的处理，我们发现了四个十分有趣而又令人费解的奇怪问题，解开此中之谜，也就找到了三年来政局变化的症结所在。第一个问题是，皇太极为何如此骄傲？从训谕看，皇太极的傲气，已经达到无已复加的地步，既“不送诸兄”，又对诸兄之子，对下面的几个弟弟的“恭送”，“默然受之”，毫不谦让，似乎是理所当然，而且“独以己身为诚，凌越他人”，简直是到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蔑视一切的程度。须知，诸兄、诸侄、诸弟并不是无名小卒等闲之辈。大贝勒代善，位居四大贝勒之首，第一位中宫福金之子，正红、镶红二旗的旗主贝勒，而且曾在一段时间内当过太子，虽然因过革除，但仍是大贝勒、旗主贝勒，军国大政，皆系由他领头，助汗处理的。二贝勒阿敏，是镶蓝旗旗主，多次统军出征，军功卓著，秉性高傲，气量狭小，他是容不得人的，受不得委曲和羞辱。三贝勒莽古尔泰，主正蓝旗，粗野鲁莽，胆大敢说。天命五年九月，只有他一人敢站出来附合汗父，指责太子的错误，这也是一个不好惹的怪人。皇太极虽是正白旗旗主，也是四大贝勒之一，但他的母亲叶赫纳喇氏，并非中宫，不是大福金，只是侧福金亦即妃子一类，在这一点上，他既不能和代善、莽古尔泰、德格类这三位“前大福金”的嫡子相比，也不能和现在的大福金（即努尔哈赤的第三位中宫娘娘）乌拉那拉氏所生的阿济格、多尔袞、多铎相提并论。嫡庶有别，皇太极比上述两位兄长四个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54、59。

弟弟，差了一大截。那么，为什么皇太极不按国制家法恭送兄长礼遇弟侄？是没有教养，没有礼貌，本性狂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固然，有才之人，往往也是自视甚高比较骄傲的人，皇太极聪明机警，博览群书，勤习骑射，武艺超群，军功累累，确实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能人，因而也就相当高傲。但是，为什么他的“骄症”过去没有充分暴露，没有记入《满文老档》，为什么天命五年九月汗父训斥代善时，他不敢出来说话，他也和阿敏等诸贝勒一样，“畏惧兄嫂”，不敢公开反对代善得罪兄长。既然“畏惧”，也就自然而然地要尊敬哥哥，不敢在代善面前失礼了。很显然，这是势力大小的问题，性格只是附属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实力。势大，则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万人敬畏。力弱，则低声下气，屈居末位，受人冷落。皇太极此时如此骄傲，是与四年来金国政局的大变化分不开的。

天命五年三月休大福金，九月废太子，使八旗贝勒之间的势力对比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贝勒代善险被籍没，丢掉太子宝座，斩杀爱妻，苦苦哀求汗父宽恕，发誓尽改前非，出尽了丑，声望大减。二贝勒阿敏，不能善待弟弟斋桑古，并听信谗言，欲求汗伯父批准，诛杀其弟。遭到拒绝，斋桑古不会忘掉此仇，八旗贝勒、大臣对阿敏也不会增加敬意，政治上也遭受了损失。三贝勒莽古尔泰，因生母被加上暧昧之罪、窃财之罪，为父休离，而弑亲母，天理不容，众口同诛，臭名远扬。这三个大贝勒，都很难有立为嗣子继承汗位的可能（二贝勒阿敏更因其系侄子而毫无希望），威望、势力都大大下降。四大贝勒之中，只有四贝勒皇太极在此案中，未受牵连，并且因其不食大福金所送食物，增加了汗父对他的好感，可以算是惟一的受益人，势力、声望相应地大为增强和提高了。

皇太极充分利用了这个有利形势，尽力扩大势力，博取汗父

欢心。他本来就是智勇双全之人，再加上谋登汗座的动力，便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个人才智。在克沈阳、下辽阳、取广宁等重要战争中，挥军猛攻，大败敌兵，立下殊勋。进入辽沈以后，他又带兵四处奔走，镇压反金武装，为巩固金国的统治，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努尔哈赤对他越发器重和喜爱。

此时努尔哈赤的大福金乌拉那拉氏，是乌拉满泰贝勒之女，“饶丰姿”，机警聪明，甚为丈夫喜爱。她生了三个儿子，长阿济格，次多尔袞，幼多铎，都为汗父宠爱，但年龄太小，阿济格十八岁，多尔袞十一岁，多铎九岁。努尔哈赤已经是六十五岁的白发老翁，时间不多了，很难将幼小孩子抚养成人，继承汗位。如果病死之后，这样的娃娃贝勒，怎能与多年征战权大势强的四大贝勒及其他贝勒竞争，不要说保住汗位，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

从爱妻娇子考虑，当然应立乌拉那拉氏所生之子。若从金国的巩固与发展着想，就应择贤立长，皇太极比较合适，两种想法，各有利弊，那拉氏又不断施加影响，故一时没有决定。但努尔哈赤毕竟不是年老糊涂听妻摆布的昏庸之人，不愧为英明汗，理智逐渐地占了上风，倾向于让皇太极继位，故对其“不胜眷爱”。这一点，皇太极心领神会，诸贝勒大臣亦有所了解，因而四贝勒才如此骄傲，诸贝勒也对他畏惧三分。这才是皇太极傲视诸兄贱视弟侄的主要因素。

第二个问题是，岳托、济尔哈朗、德格类三个贝勒，与皇太极是什么样的关系。审案的诸贝勒、众断事官，反复讲到这四个贝勒一致行动，额尔德尼隐藏东珠之事，只有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这四位贝勒知道。复州备御王炳送乌尔古岱十两黄金之事，也只有这四个贝勒知道，审案人质问说：为什么只有你们知道，其他贝勒不知道？以此为罪，报汗惩处。努尔哈赤也谴责了这些活动，指出先前额尔德尼违背国制，经常私寻皇太

极，“进谗言”。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撇开“各自之父兄，僭越行事”，“是谗言交恶”。这些事实表明，皇太极与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三位贝勒，以及额尔德尼巴克什五人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德格类是正蓝旗贝勒，济尔哈朗是镶蓝旗贝勒，岳托是镶红旗，额尔德尼隶正黄旗，皇太极此时是正白旗旗主，五人分属五旗，按国制，是不能越旗私下交往的。当时是旗主制，旗主贝勒与旗下人员，包括固山额真、梅勒额真、总兵官、副将等高级官将在内，都隶属于旗主，与旗主有君臣之义。人臣无私交，本旗人员是不能和其他旗旗主贝勒私下往来密谋议事的。这些禁令，济尔哈朗等三位贝勒是知道的，额尔德尼更加清楚，因为这就是他亲手写的。为什么岳托等四人要明知故犯？看了上述金国四年内八旗贝勒之间势力的消长，以及皇太极有可能继位为汗的情况，便一目了然了。这就是，皇太极有意网罗人员，结成一党，争夺汗位继承权，以便在父亲去世以后，继位为君。而岳托等人，则由于个人私利，而情愿为四贝勒效劳。皇太极的聪明才智、赫赫战功，以及天命五年九月以后更加蒙受汗父宠爱，济尔哈朗等人非常了解，额尔德尼系汗心腹大臣，尤为清楚。德格类因生母大福金富察氏被休而地位下降，岳托为父大贝勒代善冷落，处境也不顺利。济尔哈朗系努尔哈赤之侄，一向就是观望风色，紧跟有势之人，他曾博得努尔哈赤欢心，当过固山额真，进入了后金国“十部之执政诸贝勒”行列。但天命五年九月因调换牛录时，遭汗伯父斥责，关系略有疏远，他自然愿为禾米的新汗尽力效劳。双方各有所想，利益一致，因而联在一起，形成了以皇太极为首争夺汗位的小集团。

第三，诸贝勒心怀不满，乘机暗算，打击报复。皇太极的高傲，及其与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等人的合谋，引起其他贝勒严重不满，一直寻找机会，准备行动。天命六年九月的幽禁阿敦

督堂，便包含有阿敦建议立皇太极为太子、挑拨四贝勒与大贝勒的关系的因素。天命八年五月斩杀额尔德尼，努尔哈赤已明确表示了对私与皇太极交结的不满，以此作为额尔德尼不忠应杀的一项罪状。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一个月以后的审讯乌尔古岱，更是诸贝勒对皇太极集团的大规模进攻。

这次，本来是审理所谓的乌尔古岱督堂收纳汉官馈物的案件，在复州备御王炳、永宁监备御李殿魁供述的一、二十次送礼中，牵涉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和岳托的，只有一次。即李殿魁送十两黄金与乌尔古岱，而且乌尔古岱申辩说，他怀疑李可能是施用诡计，有意陷害，先送金，后告发，故将此金请皇太极看，皇太极同意这个看法，叫“暂藏此金，出事后令观之”。就此而论，乌尔古岱不是逼索银财收受贿物，皇太极也没有什么错误。皇太极是处理军国要务的四大贝勒之一，也很可能是当时的“直月贝勒”，他当然有权有责任过问此事。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是议政贝勒，也有权了解此案，他们没有错。可是，审案的诸贝勒和众断事官，却紧紧抓住这惟一的“牵连”而大作文章，断定其有过有罪，而且重翻历史旧账，把额尔德尼隐藏东珠的事，也一股脑儿端出来，用以说明皇太极等人互相勾结，进行谴责，最后裁决说，四个贝勒犯了罪，请汗惩治。实际上这是造成既成事实，对汗施加影响，促使汗处罚皇太极小集团。

审案的诸贝勒，抓住这几年未遇的良机，不仅要惩治皇太极，而且要重重惩办。他们是将皇太极等四个贝勒的过失和处罚，与额尔德尼、乌尔古岱之罪联在一起讲的。既然额尔德尼因对汗不忠而被斩杀抄家，乌尔古岱也要同样处治，拟以死刑，这样皇太极之罪就很大了，处罚就不能轻，也应同乌尔古岱、额尔德尼一样用刑，但因其系贝勒，审案官不便定罪，请汗亲定。这显然是包含了要努尔哈赤从重惩治皇太极等四个贝勒的意思。这

场暴风雨特别猛烈。

第四，痛斥四贝勒，定罪罚银没收牛录。努尔哈赤在审案诸贝勒、众断事官的影响下，十分生气。他虽然没有依照审案人的暗示，将皇太极判以与乌尔古岱、额尔德尼一样的死刑，但处分还是不轻的，既让四贝勒代乌尔古岱纳银退赃，又没收两个牛录。对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也严加训斥，没收牛录。更使皇太极难受的是，汗父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指责他狂妄失礼，谴责他与德格类等人相勾结，特别是汗父辱骂他“何故如此愚也”，明确指出“岂置他兄不顾，而令尔坐汗位乎！”这对皇太极争夺汗位的活动，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

经过三年多的明争暗斗，现在总算有了一个结局了，这就是皇太极势力有所下降，四大贝勒及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硕托、斋桑古五个小贝勒，皆在政治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努尔哈赤找不到合适的太子人选，因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便应运而生了。

第六章 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

第一节 “共治国政”制产生的历史条件

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它是与八旗制度下和硕贝勒的强大权势密切相关的。

和硕贝勒，是满文hošo i beile的音译，hošo意为“方”、“角”，按满文直译，和硕贝勒应译为“一方之贝勒”，即一方之主。《满文老档》有时又将和硕贝勒称为“和硕额真”、“固山贝勒”、“旗主贝勒”，即一旗之主，简称旗主。

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以前，先后当过和硕贝勒（旗主贝勒）的有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还有德格类、阿济格、多尔袞、多铎、岳托、杜度、萨哈廉、豪格等贝勒。努尔哈赤之长子褚英，曾领有部众五千户，每户按二丁计，当有一万丁，也应是旗主。

天命年间(1616—1626)，八旗各有旗主，正黄、镶黄二旗长期由英明汗努尔哈赤自领，晚年他将二旗的六十个牛录一分为四，给大福金乌拉那拉氏所生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袞、多铎各十五牛录，自留十五牛录，死前命第十二子阿济格、第十五子

多铎为二旗的旗主。正白旗旗主是皇太极，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镶蓝旗旗主阿敏，正红旗、镶红旗旗主是代善，杜度为镶白旗旗主。天聪、崇德年间(1627—1643)，各旗的旗主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已灭哈达，人丁增多，遂加以整顿。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立一牛录额真管辖，旗分黄、白、红、蓝四色。万历四十三年，已经亡辉发灭乌拉，丁口大量增加，辖地辽阔，乃确立八旗制，每三百丁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旗)，将原旗的黄、白、蓝、红四色镶为八色，成八固山(八旗)。努尔哈赤将牛录和旗分与诸子侄，使其承受辖领和专主。

努尔哈赤创立的八旗制，使各旗的和硕贝勒(固山贝勒、旗主贝勒)拥有很大的权力，分别成为本旗的所有者和军事统帅，是本旗之主，与旗下人员之间的关系，是君臣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主奴关系。旗下官将兵丁，都得听从旗主贝勒的调遣，都须服从旗主的命令。

早在天命建元的前三、四年(1612—1613)，努尔哈赤就在进军乌拉时说了两句纲领性的要紧的话：“若无阿哈，主(额真)何能生！若无诸申，贝勒何能生！”^①天命六年(1621)闰二月，努尔哈赤又说：“贝勒当爱诸申，诸申须爱贝勒。”^②同月二十八日他又下谕讲：“汗善待国人，国人对汗亦好，贝勒善待诸申，诸申亦对贝勒好。若汗知国人之苦，贝勒知诸申之苦，则诸申、伊尔根虽劳苦从事，亦无怨恨矣。”^③天命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在规定各类人员的地位、义务时，又指出：“汗之子诸贝勒、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17。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18。

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伊尔根。……伊尔根以诸贝勒、大臣为父，”当“敬思弗忘”，“尽力维生”。^①

这一系列的汗谕，中心思想是诸申必须尊诸贝勒特别是本旗旗主贝勒为父，听其辖束，当兵服役，纳赋供税，为其效劳。若有怠慢不恭，不要说一般诸申要遭受旗主贝勒的从严惩处，就是八旗官将，也要罚银降职，甚至监禁处死。象伊尔喀，身为大臣，又是汗之女婿，因汗将他分给四贝勒皇太极“专主”以后，他既不尽力效劳，还埋怨“四贝勒无故不养我，想回到抚养我之汗处”，惹恼了努尔哈赤，将其斩杀，^②由此可见旗主贝勒权势之大。八和硕贝勒拥有这样大的权力，是“共治国政”制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选择汗位继承人的困难，也对共治制的出现，产生了重大影响。努尔哈赤从一个小部酋长之子，在父、祖被杀，亲族变心，部众离散，仇敌威逼，险遭灭门之祸的恶劣形势下，英勇不屈，拼死奋斗，几经鏖战，历经千辛万苦，才网罗了一批战将，打下了千里江山，建立起强大的金国，登上了“养育列国英明汗”的宝座。创业之艰苦，他深有所感，因而很早就想选择理想的嗣子，亲手教导，亲眼督察，让其迅速成长，理好国政，使爱新觉罗江山世代延续。早在五十二岁时，他就着手处理这一重要问题。当时已经成年，能够统军征战，为汗喜爱的儿子，有四个人，即长子褚英、次子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第八子皇太极，前三人是福金所生，后者为汗爱妻之子，四人均已成为有权有势的贝勒。论军功，论嫡长，褚英最有资格，但努尔哈赤嫌他心眼狭窄，处事不公，但若立其他人，又有“僭越”之嫌，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让褚英执政。努尔哈赤在五十二岁时便选择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4。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

执政之嗣子，目的很清楚，就是让嗣子受到锻炼，使其能学会理国治政，承担起主持金政的重任，并在八旗官将兵丁中树立起威望，以便他去世之后，嗣子能顺利继位，不致发生混乱或乱臣篡位夺权的事。这在他发现褚英“虐待”四弟、五大臣而加以训斥时，讲得很明白。他说：

“吾非因年老、不能征战，不能裁决国事秉持政务，而委政于尔也。吾意，若使生长于吾身边之诸子执政，部众闻之，以父虽不干预，而诸子能秉国执政，始肯听尔执政矣。”^①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努尔哈赤在监禁和处死褚英以后不久，又择立代善为嗣子，而且明确地称为太子，告诉诸贝勒大臣，他去世以后，由代善继位，叫代善要“善养”其继母大福金及诸弟。可是，由于代善本人的过失，由于有人（权势相当大之人）暗中盘算和火上加油，努尔哈赤大怒，于天命五年九月废掉太子。此时，四大贝勒中，代善被责，莽古尔泰生母被休，阿敏为侄，自难入选，惟一未受牵连的是四贝勒皇太极，可是他毕竟还不是“中宫”之子，有此缺陷，很难为其他贝勒接受。第三个大福金乌拉那拉氏所生的阿济格、多尔袞、多铎，年岁太小，选择嗣子，实为困难。因此，努尔哈赤有了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想法，让诸贝勒、众大臣在誓言中，第一次提出了，立八和硕额真，共同裁决大事。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此事未有实行，直到天命七年才正式确定。

总起来说，正是由于八旗制度下和硕贝勒（旗主贝勒）拥有强大的权势，诸贝勒之间矛盾重重互不相下，以及无法选定合适的嗣子，努尔哈赤才决定，在他去世以后，不沿袭自己的国主独尊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

的旧制，而采取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

第二节 “共治国政”制的基本内容

天命七年(1622)七月初三日，八固山贝勒请问汗父，今后国政如何安排，努尔哈赤下达汗谕，正式确定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为了更好地论述这一重要问题，先找找其历史渊源，分析一下天命五年的一份誓书。

天命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努尔哈赤在代善手刃其妻承认过错以后，宽恕了代善，并调解其与莽古尔泰的关系，令代善与其他贝勒立誓和好。代善誓称要痛改前非，“今后如再为非，怀抱怨恨，甘愿受天地谴责，不得善终”。“八和硕贝勒、众大臣亦立誓书，对天焚化”。这份誓书，包含了八贝勒共治国政制的一段特别重要的话。誓书说：

“今日汝之过恶，被汗父知晓，非徒听信一人之词。……此后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袞八贝勒为和硕额真。为汗之人受取八旗人众之给与，食其贡献。政务上，汗不得恣意横行。汗承天命执政。任何一位和硕额真，若欲为恶扰乱政务，其余七位和硕额真集会议处，该辱则辱之，该杀则杀之。生活道德谨严为政勤奋公正之人，即使主国之汗出于一己私怨，欲罢黜贬降，其他七旗之人对汗可以不让步。”

这份誓书虽然是“八和硕贝勒、众大臣”所立，但显然是得到努尔哈赤同意的，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它就是按努尔哈赤的指示书写的。这份誓书，十分重要，揭示了以往人们不知道的好些重

① 《旧满洲档·庚字档》。

大问题。比如说，它第一次标明了“八和硕贝勒”、“和硕额真”，这两个词，最早见于此。它还具体地列举了八和硕额真的名字，顺序是：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名为八贝勒，而有九人，因为多铎、多尔衮之间，老档原文没有分开，可能这两人合算一位和硕额真。

又如，这份誓书，对新汗的权力作了较大的限制，责令他“不得恣意横行”，对和硕额真的权力则予扩大，其和硕额真如有过失，由其余七位和硕额真集会议处，可辱，可杀。相反，若为政勤奋公正的和硕额真，虽然为汗厌恶，汗也不能施加惩罚。这就包含了后来天命七年共治国政制的重要内容了。

了解了这一历史渊源，我们再来看天命七年的汗谕。《满文老档·太祖》卷三十八，载录了天命七年努尔哈赤宣布今后实行共治国政制的重要汗谕，现摘译如下：

“三月初三日，八子相会后问于汗曰：天子之政，何以平定，天福何以永承？汗曰：使继承父为国主时，毋令豪强之人为主。以豪强之人为主时，恐其恃力自恣，得罪于天也。一人之识见，能有几何，能及众人之议乎！尔等八子为八王，若八王共议，可无失矣。选择不拒尔等八王之言之人，使继尔父为国之主。若不取尔等之言，不行善道，尔等则更换尔等八王任置(Sindaha)之汗，选任不拒尔等之言之贤者。更换之时，若不心悦诚服而有难色者，岂能任尔不善之人之意乎！若如斯，则以恶者更代矣。

尔等八王之内，治理国政诸事时，若一人有得于心而言，其他七人由此而发之。若己不能理解，又不能以他人之得而发其言，徒只缄然，则当更换其人，使其下之子弟为王。更换之时，若不心悦诚服而有难色者，岂可任尔不善之人之意乎！若如斯，则以恶者更代矣。

若有事外出，当议告于众而行，未议，勿行。若集会于尔等八王任置之国主跟前；一、二人，勿集会，众人皆集后，商议国政，处理事务，祭家神，祭天，诸事当告于众而行。

八王议后，设女真大臣八，尼堪大臣八，蒙古大臣八。其八大臣以下，设女真理事官八，尼堪理事官八，蒙古理事官八。众理事官审理后，告诸大臣。诸大臣拟定后，上奏于八王，八王审断拟定之罪。八王须贬斥奸诡之人，进举忠直之人。八王跟前，设女真巴克什八，尼堪巴克什八，蒙古巴克什八。

国主一月内，于初五日、二十日。两次坐御座。新年初一，向堂子叩首，向神主叩首完毕之后，国主先向众叔兄叩首，然后，坐汗之宝座，使受汗亲身叩首之众叔兄等，皆齐坐于一处，接受国人之叩首。……

八固山贝勒，若尔之固山，与他人之固山发生争吵，不经众审理之后，毋得单独入告，若独告，必争执矣。经众审理以后，入告，则无怨矣。……兄弟之间，互相怨恨之时，可明发其怒，若隐其怒不明言，而诉于众人，则系用计哄骗人之邪心者矣，众人将判尔于罪也。

汗父所定之八分所得之外，若另自贪取隐匿一物，隐匿一次，革其一次应得之物。若隐匿二次，革其二次应得之分。若隐匿三次，则永革其应得之分矣。

若不牢记汗父之教谕，不取诸兄弟之言，仍经常行为悖逆，初则课罚。若再不听从，则取其诸申。若不以取诸申而怒，匡正其身，则事毕矣。若怒，则不杀尔，而羁牢之。若不受此言，行为背理，天地神祇，一应诸神，将皆厌之，殃及矣，岁寿不至，中途而死。若牢记汗父教谕，不违背，持

正直之义，天地神祇，一应诸神，尽皆眷祐，加岁延寿，世代永承矣。”

这次汗谕清楚地、详细地规定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基本内容，十分重要。这样长的训谕，虽然涉及到许多问题，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即八和硕贝勒执掌大权，金国军政要务皆由八和硕贝勒商议裁处。具体来说，汗谕包括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八和硕贝勒握有立汗罢汗的大权。顾名思义，一国之汗当然是言出令行的专制君主，受到群臣包括各贝勒的拥戴。努尔哈赤就是独掌大权的国主，被八和硕贝勒、诸大臣尊奉为“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可是，今后就不一样了。继任的汗，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八和硕贝勒劝进拥戴的，而是被八贝勒 Sindaha。Sindaha 是由动词 Sindambi 变来的形动词，Sindambi 意为“任置，放官之放”，是上对下的用词。这个词用得很好，它准确地、形象地反映了八和硕贝勒享有立汗的权力，是任置，而不是劝进。并且，汗谕规定，不任置豪强者为汗，不任置独断专行拒绝八贝勒意见的人为汗。如果继任的汗不听八贝勒的话，“不行善道”，八和硕贝勒共议后，罢免其汗位，另行任置听从八贝勒旨意的“贤者”。在这种条件下，继任的汗就要考虑言行的后果，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能独揽金国大权，这个权被八和硕贝勒分享了。

第二，八和硕贝勒掌握了议处军国大政的权力。汗谕规定，八贝勒集会后，同见任置的国主，诸事皆集议而行。乍一看来，这个规定似乎没有什么新颖之处，过去努尔哈赤也是与诸贝勒、大臣一起议处军政要务，这样作，并没有削弱他统治后金的专制君汗地位。然而，仔细分析，便可发现两者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努尔哈赤是以“天命之汗”、创业之君的身份，召集诸贝勒、

大臣开会，各贝勒、大臣的建言，符合汗心，他便采纳，有违君意，哪怕贝勒、大臣一致坚持，他都可以置之不顾，完全按照己意裁处，命令诸贝勒、大臣服从和执行。例如，万历四十年（1612）九月，努尔哈赤率兵三万进攻乌拉时，莽古尔泰、皇太极建议直取其都城，以图尽灭其国，努尔哈赤因双方兵力相等，难以完全征服，需先取外部，而指责二子出“轻浮之言”，拒绝其议，掠取俘获后，即撤兵回国。^①可见，努尔哈赤与诸贝勒、大臣的相议，实际上是所谓“贤君”倾听群臣建言，并不是由诸贝勒任意处理各事，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英明汗”努尔哈赤手中。

现在根据汗谕的规定，情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则军国大政必须由新汗同八和硕贝勒共议裁处，不能由汗一人决定。再则继任的汗与八贝勒的共议，是在汗由八贝勒任置而且必须听从八贝勒意见的条件下进行的，新汗若拒绝八贝勒的话，八和硕贝勒可以集议以后将他罢革，另行任置遵从八贝勒旨意之人为汗。因此，这种集议，就是八贝勒和新汗共同裁处各事，而且八和硕贝勒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实际上是八和硕贝勒掌握了处理军国要政的大权。

第三，八和硕贝勒拥有审断案件的权力。努尔哈赤创立的金国，十分重视审理各案。遇有诉讼，审事官先审，报诸大臣，诸大臣鞫问后，报诸贝勒，然后由努尔哈赤复审和断案，他亲自掌握着刑法的最后裁决权。现在汗谕规定，八贝勒共议后，置满、蒙、汉大臣和理事官各八员，一切案件经理事官审问后告八大臣，八大臣拟议处理意见，上报八贝勒，由八贝勒审理断案。这样一来，八和硕贝勒就从继任的汗手中，夺走了生杀予夺的刑法大权。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

第四，八和硕贝勒有权奖惩和任免各级官将。努尔哈赤深知用人的重要性，牢牢地把住了授与官职的大权，牛录额真以上八旗官将的升降任免，皆须由他批准。现在汗谕规定，八贝勒“须贬斥奸谗之人，进举忠直之人”。这就是说，确定奸谗和忠直的权，归八贝勒所有，谁奸，谁忠，不是由八旗官将自封，也不是由继任的汗钦定，而是由八和硕贝勒评定。用谁，罢谁，全由八贝勒集议决定，继任的汗丧失了独自任免官将的权力。这一点，很重要，在用人这个重要关节上，堵住了新汗与八和硕贝勒争权的道路，否则，官将如由新汗一人任用，八贝勒无权过问，则新汗可以通过重用亲信，罢革八贝勒属人的办法，控制重要官职，扩大个人势力，为进一步排斥、压制八和硕贝勒，提供条件。

第五，八和硕贝勒有权裁处八旗之间的争执，更换与惩治凶暴、无能的个别和硕贝勒。八旗制度下的和硕贝勒，是一旗之主，权力很大，只有开国之君努尔哈赤才能管辖各旗的和硕贝勒，才能干预各旗事务，裁处各旗之间的纠纷，才是掌握最高权力的八旗之主。现在汗谕规定，八贝勒集议后，罢革庸懦无能的“劣王”，另立其下的子弟为王。八和硕贝勒还可以惩治“行为悖逆”的个别贝勒，罚银取物，夺其所辖诸申，甚至关押牢中，贬为囚犯。这就使八和硕贝勒从继任的新汗手中，夺走了他统治八旗的权力。这一条，非常重要。假若不作出这样明确的规定，继任的新汗拥有“汗父”努尔哈赤斥革和硕贝勒、处理各旗之间纠纷的权力，那么，他就可以惩办与己对抗或不听指使的和硕贝勒，任用亲信子侄来更换旧的和硕贝勒，审理各旗争执时，偏袒自己及子侄占有的旗分，重惩另一方。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新汗就可以把八个旗的和硕贝勒完全换成自己的人，就可以剥夺和硕贝勒主宰本旗的独立权力，就可以成为执掌金国最高权力的八旗之主，就能彻底破坏八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因此，这个规定成为关系到

确立君权，还是八贝勒共享大权的根本性因素，是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能否实行和延续的十分重要的条件。

第六，八和硕贝勒享有“八分”的特权。进入辽沈以前，后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抢取的人丁、牲畜和财帛。过去，这些掳掠品从原则上讲，都应归汗所得，为努尔哈赤所有，其他人员，从诸申到和硕贝勒，都无权私取，必须由英明汗努尔哈赤赏赐。现在，汗谕明确讲到，“汗父所定之八分之所得以外”，不许隐匿贪取。所谓“八分”，就是归八和硕贝勒共有，按“八分”分配。这就是说，掠来的入畜财帛，今后不再是新汗的私产，而应归八和硕贝勒所有，按“八分”瓜分。如果努尔哈赤不作这个规定，继任的新汗完全可以引用“汗父”旧规，占有全部俘获物后，将大量人丁马牛分给自己及亲信子侄辖有的旗，少分给与己不和的固山贝勒。这样下去，各旗之间经济、军事实力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继任的汗的势力就能日益增强。可见，“八分”制是限制君权、保证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七，继任的汗与八和硕贝勒并肩共坐，同受国人朝拜。努尔哈赤是“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高踞宝座，所有人员，包括亲如子侄的尊贵贝勒，皆须向汗叩拜，无权也没有资格与汗并坐。过去，摆设大宴时，诸贝勒只能坐在地上，不能入席就坐。直到天命四年五月庆贺萨尔浒大胜设宴时，努尔哈赤才赐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以矮几，令他们坐在下面。^①现在汗谕规定，继任的汗须先向“众叔兄”叩首，然后才登上汗的宝座，请诸贝勒并肩齐坐，同受八旗官将兵丁叩拜。这就从朝会礼仪上取消了新汗南面独尊的权力，贬低了他的威信，提高了八贝勒的地位，体现了八和硕贝勒共掌金国大权的实情，从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0。

政治上、礼仪上对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予以保证。

以上情况，清楚地表明了，和硕贝勒拥有很大权力，金国军政要务悉由八和硕贝勒共议裁处。当然，这并不是说继任的新汗完全是虚有其名的傀儡。一则他是金国之汗，虽为八和硕贝勒集议任置，但毕竟是一国之汗，其地位理应比和硕贝勒高一些。再则新汗本身也是统治一旗或二旗的和硕贝勒，有自己所辖的一旗、二旗的人丁兵力作后盾，议处国政时，他既以汗的身份，又以和硕贝勒的资格，与议各事。因此，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并没有把新汗排除在外，新汗也有很大权力，只不过是他就不能象汗父努尔哈赤那样高居八和硕贝勒之上，独掌金国军政大权罢了。

自从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规定了今后要实行共治国政制以后，八和硕贝勒的权力更加扩大了。他们议定八旗各级官将的功过贤劣，提出升降任免的意见，报汗批准。比如，天命八年九月，诸贝勒会商议定后，遣库尔阐告汗，以代子游击呼什姆为备御，给与汉民，使其管辖。以索占代其父舒姆努为备御，以叶什代其侄什伯为备御。^①努尔哈赤还取消了过去只汗处存有一个赏罚官职的档子的旧制，改为备办八个档子，八贝勒各有一个，革某官一职，八档同书，赏某官一职，亦同载于八档。^②这就提高了八和硕贝勒奖惩任免八旗官将的权力。

八和硕贝勒具体裁处各种案件。一般案子，经督堂审理后，报八贝勒，由八和硕贝勒断决。有一次，汉人王景隆诬告石城参将王之登与明将毛文龙私通书信，“督堂审理后，上奏于八王，八王详审，不实”，下令惩办王景隆。^③甚至连处理投居金国的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9。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1。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58。

兀鲁特部蒙古贝勒的重大案件，也由八贝勒裁决。天命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兀鲁特部奇布塔尔台吉射杀努尔哈赤嫁与的格格，兀鲁特诸贝勒说：“杀汗之亲戚，带来于我等处，我等当凌迟之。”巴都瑚副将向八贝勒报告后，八贝勒不同意凌迟，命“以绳绞杀”。^①可见八和硕贝勒在刑法方面权力之大。

八贝勒在财经方面的权限也扩大了。天命八年规定，取消八贝勒各遣人丁捕貂采参打牲的旧例，改为集中全部捕获物品，“按八分均分”。^②这是对天命七年三月汗谕规定的“八分制”的具体贯彻。同年，诸贝勒下令：出东京、海州、耀州、盖州仓谷，卖与各路无粮地方的汉民，一金斗取银一两，因“恐其不能耘田”。存有粮谷的女真官员和汉官，将谷卖与各自地方的汉民。^③诸贝勒又下令，规定蒙古商人出售牛羊的价格，大牛一头银二十两，三岁牛十两，二岁牛五两，大羊四两，小羊三两，不许违背定价高价买卖。^④

天命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亲自规定，若对女真宣告各事，则以“汗谕”名义下达，如果是对汉民，则以“八王之书下之”，废除了过去对汉民以“督堂”名义宣谕的旧制。^⑤

这些事实表明，努尔哈赤虽然还在执掌着最高统治权，但金国军政财刑等日常事务，已由八贝勒集议，报汗批准，一般都依议而行，八和硕贝勒治理国政的权力大大增加了。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诸贝勒遵照“共议国政”的汗谕，集议任立皇太极为新汗，金国正式进入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新阶段。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9。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4。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59。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59。

⑤ 《满文老档·太祖》卷58。

第七章 宁远之战

第一节 城下之败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率八旗贝勒大臣,统领大军,离沈阳,亲征明国。十七日渡辽河,于旷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相继,络绎不绝,首尾莫测,旌旗剑戟如林”。^①八旗劲旅十三万,号称二十万,铺天盖地而来,欲图席卷关外城堡,直捣山海关。

此时明国政治、军事、财经等方面的形势,十分恶劣,正是金国进取的极好时机。

四年前,金败明兵于平阳桥,轻取广宁,明廷大震,京师戒严,“中外惊愕”。^②明帝以日讲官、礼部右侍郎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掌部务。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博学好问,才华出众,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名列第二,授编修,熹宗继位,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讲解得当,为帝喜爱。他留心边事,年轻时,“授经边郡”,

^① 《武皇帝实录》卷4;《高皇帝实录》卷10。

^② 《明熹宗实录》卷19。

往来各地，喜从材官老兵询问险要阨塞，“用是晓畅边事”。承宗性洁志高，精通兵法，救国心切，不畏艰险，力挽狂澜。他就任后，立上抚蒙古、恤辽民、重将权、选边将、简京军、开屯田诸策。在辽东军事的关键问题上，他坚决反对辽东经略王在晋的困守关内的苟安方针，力主收复失地，扼守关外，随即奏调王在晋任南京兵部尚书，自请督师，遂以原官督山海、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便宜行事，不从中制”，亲主辽事。承宗惩逃将、“清冒破”，筑城堡，汰冗兵，练士卒，缮甲仗，买马匹，采木石，军备大整，辽东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明朝的重大变化。连清朝官修的《明史》，也对承宗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它总论其功说：

“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冑、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①

尤其重要的是，他重用能臣袁崇焕，定议守宁远，筑城池，这为后来的击败金兵，起了重大的作用。

袁崇焕，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寄籍广西藤县，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邵武知县。崇焕有胆略，好谈兵，常向老校退卒谈论塞上事，知其阨塞情形。广宁败没，崇焕正因朝覲在京，被破格擢任兵部职方主事，他单骑“出阅关内外”，回京后详述关外形势，并勇气百倍、信心十足地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奇其才，遂超升山东按察司佥事，监关外军。他坚决反对辽东巡抚张凤翼龟缩关内的主张，力请守宁远，孙承宗采纳其议，令参将祖大寿兴工营建，命崇焕与满桂驻守。开始时，

① 《明史》卷250.《孙承宗传》。

祖大寿估计明廷不能远守，故敷衍塞责，仅筑十分之一，而且不合规格。崇焕乃规定：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天启四年完工，十分坚固。满桂是“良将”，崇焕又尽职善抚，誓与城共存亡，“将士乐为效力”，因此，“商旅辐辏，流移骈集”，曾经一度荒凉残破的宁远，变成了“远近望为乐土”的关外重镇。

经过孙承宗、袁崇焕和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辽东形势迅速好转，可是，明朝政府太腐朽了，竟自伐栋梁。昏君明熹宗，听任太监魏忠贤摆布，朝政越加混乱。魏忠贤初因承宗功高望重，欲图拉为己党，刚直的承宗素恶忠贤，拒不应命，“不与交一言”，并以贺万寿节为名，直奔京都，欲面奏熹宗，劾除忠贤。魏忠贤大怒，唆使党羽，连上章疏，终于在天启五年十月，迫使承宗致仕，而以兵部尚书高第代为辽东经略。

高第胆小如鼠，畏敌如虎，原来就曾竭力阻挠孙承宗守关外之议，欲尽撤士卒退守关内，遭承宗驳斥。现在，刚一当上经略，他就不顾将官反对，立即下令，尽撤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诸城防守兵械器具，尽驱屯兵入关，丢弃米粟十余万石，军民“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高第还曾命令撤宁远、右屯二城，虽遭袁崇焕拒绝，但宁远、右屯已成孤城。^①

朝政昏浊，权监专政，文官爱钱，武将怕死，兵无斗志，民心惊慌，危机如此严重，看来关外定将丢掉，宁远孤城亦难保住，金兵可以轻取宁远，占有全辽了。可是，历史的进程却与明金双方当事人的估计，完全两样，不仅宁远没有被攻破，关外四百里土地仍归明有，而且金军吃了一个大败仗。这个奇迹的出

^①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现，既与袁崇焕和宁远军民死守却敌有关，而且也和金国政治、军事上的重大错误密切相联。

金军于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正月十七日渡过辽河以后，明锦州、大凌河等城官兵早已撤退，八旗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连下右屯、大凌河、锦州、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松山等城，二十三日直抵宁远城下。

此时，宁远官兵，不足二万，面对数倍于己的无敌金兵，前后左右俱被隔断，山海关虽有兵数万，却不敢来援，一座孤城，怎能坚守？在这样似乎注定要被金兵攻破惨遭杀戮的紧急关头，智勇双全胆略过人的宁前道袁崇焕，却临危不惧，把生死置之度外，誓死抗金，镇静自如，发挥了非凡的军事才干，指挥军民，打退了强敌，渡过了难关。

宁远原来的士卒并不多，袁崇焕一知道金兵来攻，即将右屯、锦州等处官兵撤回，同守宁远，增加了兵力，但仍不满二万。他想了很多办法，首先是动员将士拼死抗金，召集各将商议战守计谋。总兵官满桂、副将左辅、参将祖大寿，根据过去作战经验，都认为不能和金兵野战，而应防守，提出“奴兵未可争锋，以死守争”。祖大寿遂建议塞门奋死防守，众将赞同，议定，决心死守孤城，坚决抵抗。袁崇焕又“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官兵感动，“将士咸请效死”。^①将士心齐，民心亦就安定了，军民同仇敌忾，誓与金兵决一死战。

紧接着，他充分发挥火炮之长，采纳王喇嘛的建议，将西洋大炮撤入城内，装在城上，并布满各种火器，准备了大量弹药。

他又分配官将各负其责，严肃军纪，重惩奸细。满桂提督全城，兼管东南，左辅守西面，祖大寿守南面，朱梅守北面。命同

^① 《明熹宗实录》卷70；《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知程维模“查察奸细”，通判金启倬按城四隅，编派民夫，供给饮食。卫官裴国珍备办物料，令诸生守巷口，禁止胡乱行走，“有一人乱行动者，即杀”，“城上人下城者，即杀”。他又檄告后面的前屯卫守将赵率教及山海守将总兵杨麒，通知他们，凡有逃兵前来，立即斩杀。崇焕又下令坚壁清野，尽焚城外房舍、积刍，将外城腾空，城厢商民尽迁入城。二十二日部署刚完，第二日金兵即抵城下。^①

努尔哈赤于二十三日遣俘获的汉人入宁远城，招劝袁崇焕投降说：“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袁崇焕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汗何故遽加兵耶？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吾恢复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乃谓来兵二十万，虚也，吾已知十三万，岂其以尔为寡乎。”^②

袁崇焕既严辞拒降，又命素习放炮的家人罗立，向城北金军大营燃放大炮，“一炮歼虏数百”。^③

二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进攻，骑兵、步兵一拥而上，车、牌、勾、梯、炮箭俱至，万矢齐发，“箭上城如雨，悬牌间如蝟”，“奋力攻打”。明兵“铙炮迭发”，“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打死打伤金兵众多。金兵又冒死前冲，在大炮不能轰及的门角两台，拼命挖掘城墙，凿开高二丈多的地方四处，势甚危急，守兵赶忙大发火器，“火毯、火把争乱发下，更以铁索垂火烧之”。崇焕“又选健丁五十名缒下，用棉花火药等物，将达贼战车尽行烧毁”，“穴城之人始毙，贼稍却”，“城下贼尸堆积”。^④第二日，金军再攻，明兵

① 《明熹宗实录》卷70。

② 《武皇帝实录》卷4。

③ 茅元仪：《督师纪略》卷12。

④ 《明熹宗实录》卷67、70；《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于城上放炮，“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①金军畏惧炮火，“无敢近城”，“其酋长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伤亡更加惨重，“贼死伤视前日更多，俱抢尸于西门外各砖窑，拆民房烧之，黄烟蔽野”。晚上“又攻一夜”，而攻具器械俱被明兵夺取。二十六日，仍将城围住，但一靠近城，即被西洋炮击杀。金军打不下去了，“贼计无施”，只好撤走。努尔哈赤乃派吴纳格率八旗蒙古，再加兵八百，往击觉华岛，破守岛明兵，焚船二千余只及粮草千余堆。^②二十七日金兵回师，二月初九日努尔哈赤回到沈阳，著名的宁远之战，以金败明胜而结束。

对于这次战役，朝鲜李星龄记述比较详细，现摘录如下：

“我国译官韩瑗，随使命入朝。适见崇焕，崇焕悦之，请借于使臣，带入其镇，瑗目见其战。军事节制，虽不可知，而军中甚静，崇焕与数幕僚，相与闲谈而已。及贼报至，崇焕轿到敌楼，又与瑗等谈古论文，略无忧色。俄顷放一炮，声动天地，瑗怕不能举头。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俯见，贼兵满野而进，城中了无人声。是夜贼入外城，盖崇焕预空外城，以为诱入之地矣。贼因并力〔攻〕城，又放大炮，城上一时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战方酣，自城中每于堞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柜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层层〔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透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翌朝，见贼拥聚于大野一边，状若一叶，崇焕即送一使，备物谢曰：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奴儿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

① 张岱：《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

② 《明熹宗实录》卷70；《武皇帝实录》卷4。

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患而毙云。”^①

第二节 英明汗去世

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金国汗努尔哈赤亲征明国，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攻宁远，不克，二十六日破觉华岛，二十七日撤兵，二月初九日回到沈阳。

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以来，身经百战，驰骋疆场四十余年，一贯以少胜多，铁骑到处，无坚不摧，无攻不克，所向披靡，从未受挫，为什么这次以数倍于敌的军队，竟不能打败区区不足二万的明兵，竟攻不下远远不如沈阳、辽阳坚固的宁远孤城，竟大败而归？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为此而苦苦思考。其实，问题并不复杂，只要冷静分析，回顾历史，观察战况，便能得出正确答案。

决定这次明胜金败结局的因素，固然很多，有客观的原因（明军死守，奋勇杀敌），有偶然性的事件，但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四年内努尔哈赤在军国大政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才招致了这次的失败。举其大者而言，一是从“恩养尼堪”，错误地转向全面镇压，滥施屠杀。入辽初期，他还讲讲“各守旧业”、“计丁授田”、“恩养尼堪”，但不久就因辽民反抗金国的民族压迫政策而大动肝火，屠复州，捕“无谷之人”，直到天命十年十月的全国大甄别大屠杀，残酷之极，糊涂之极，彻底地孤立了自己，丧尽了民心。二是从任用汉官，信赖汉官，转变为怀疑汉官，排斥汉官，歧视汉官，连“抚顺额驸”李永芳这样效忠金汗的降将，都要怀疑，都要罢官，免死狐悲，其他汉官怎不寒心，怎敢直言，怎

^① 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载于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5。

愿献策？三是内争迭起，疑案纷纷，伤人太多。以最高统治集团的八旗贝勒来说，四大贝勒中，代善的太子之废，皇太极受责罚银没收牛录，莽古尔泰的生母被休，阿敏与其弟斋桑古的隔阂，皆受到汗父（汗伯父）不同程度的训斥和处分。执政贝勒中，斋桑古、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硕托，分别受罚和挨训。纠纷之多，争夺之剧，搞得努尔哈赤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只好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八旗高级官将，如扈尔汉、阿敦、乌尔古岱、额尔德尼、巴笃礼等，或斩或囚，或降职革任，波动也不小。结果是汗威无比，群臣畏惧，三缄其口，不敢直谏，努尔哈赤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了，使得他不知下情，难辨是非，越弄越错，搞得金国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逃移满路，田园荒芜，粮谷奇缺，物价高涨，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这样的背景，这样的条件，怎能进行长期战争打败敌军！

而且，这些弊政，直接影响到明国的军民。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十月大杀汉人时，提出的一条理由就是，杀了这些人，才好放心地对外用兵。他在宣布屠杀的汗谕中对汉民讲到：“尔等在我等不防备之时，尚且如斯杀女真、准备棍棒，那么，当我等行围出兵之后，尔等能安静否？”^①这个英明汗，此时也太不英明了，他竟想用大屠杀来安定后方，这能办到吗？并且，如此血腥杀戮，招致汉民的极端痛恨，为什么一听金兵进攻，关外锦州等地军民纷纷内逃，不愿留下充当顺民？为什么宁远军民齐心抗敌，死守孤城？象通判金启倬，袁崇焕家人罗立，都因猛烈炮轰金兵而“竟以此殒”，象五十健丁不怕危险舍生下城，燃放火药，烧毁金军战车，击毙掘城敌兵，象武举金士麒，以迎父丧出关，闻警赶赴觉华岛，“率义男三百人力战”，全部殉国。^②这一切，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② 《明熹宗实录》卷70。

固然是决定于他们不畏强暴誓死救国的高尚精神，但与金国汗的滥肆杀戮，也不能说毫无关系。直到六年以后，固守大凌河的明国官兵将士，虽然粮尽力竭，外援断绝，仍因努尔哈赤的大杀辽民，“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于死”，而“肝胆俱丧”，“人皆畏缩”，不敢投降。^①杀人越多，民心越恨，反抗越烈。

在军事上，努尔哈赤的错误也不小。屡败明兵，因而骄傲轻敌，训练不力，入辽以来，除旅顺小战和镇压起义以外，“步兵骑兵三年未战，兵主（兵之额真）怠惰，卒无斗志，车、梯、藤牌不良，兵器已不锐利”。^②攻宁远时，沿袭故技，以箭矢对枪炮，以血肉之躯迎炮弹，以穴城敌火毯，努尔哈赤轻敌了，思想僵化了，战术陈旧了。而袁崇焕却总结经验教训，发挥所长，克己所短，用西洋大炮对付八旗劲旅的刀戈弓矢，用坚壁清野来制服掠粮养军的金兵，以凭城死守，来避开金兵的野战冲突。军事统帅的正确与错误，也是造成明胜金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管是什么原因，努尔哈赤被打败了，而且败得很惨，丢尽了面子，因而他十分痛苦。连钦修的《武皇帝实录》也载述说：“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③

战阵劳累，受挫生气，忧愁难眠，积恨成疾，兼之宁远之战所负之伤又未痊愈，痼疽发作，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在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总观努尔哈赤的一生，他在青年时期，奋勇苦斗，智擒刺客，捉获敌人尼堪外兰，报了杀害父、祖之仇；他以少数诸申起

① 《清太宗实录》卷10。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71。

③ 《武皇帝实录》卷4。

兵，在建州、海西、“野人”女真部落中横冲直闯，征抚并用，辖地宽广，人口激增，“归顺”日众，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伟大事业，促进了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形成和发展；他率领八旗劲旅，兴师伐明，以少敌众，大败明军于萨尔浒，抗击了明王朝的民族压迫，保护了满族的生存；他入主辽沈，多次向东用兵，打下了完全统一东北的基础，为满族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网罗人材，厚待功臣，善用计谋，顺应时代的需要，采取了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满族由原始社会末期进入奴隶社会、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他在晚年刚愎自用，滥行杀戮，骄傲轻敌，思想僵化，停顿落后，作了一些错事，破坏了辽东地区生产，危害了满汉之间的正常关系，妨碍了满族更快地前进。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是一个意志坚强、不畏险阻的勇士，是一个叱咤风云、威名远扬的常胜君汗，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之主。他虽然作了某些蠢事，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但毕竟是瑕不掩瑜，功大于过。对于这样一位为多民族国家的壮大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建树了功勋的满族杰出的首领和清朝的始祖努尔哈赤，各族人民一定会将他的英名和贡献，载入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巨册，永志不忘。

附录

大事年表

王朝纪年	公元	大事纪要
明嘉靖三十八年	1559	清太祖努尔哈赤生。 安费扬古生，后为“五大臣”之一，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 ^①
明嘉靖四十年	1561	努尔哈赤之二弟穆尔哈齐生，后追封诚毅勇壮贝勒。 何和礼生，后为“五大臣”之一，赐号栋鄂额驸，授三等总兵官，追封三等勇勤公。
明嘉靖四十一年	1562	额亦都生，后为“五大臣”之一，授一等总兵官，追封弘毅公。 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结土蛮掠东州、抚顺，击杀明副总兵黑春。
明嘉靖四十三年	1564	努尔哈赤之三弟舒尔哈齐生，后追封和硕庄亲王。 费英东生，后为“五大臣”之一，授三等总兵官，追封直义公、一等信勇公。
明嘉靖四十五年	1566	努尔哈赤之四弟雅尔哈齐生，后追封通达郡王。
明隆庆二年	1568	努尔哈赤之生母喜塔拉氏去世。 明险山参将李成梁晋辽阳副总兵。
明隆庆四年	1570	蒙古黄台吉掠锦州，击杀明辽东总兵官王治道，李成梁晋署都督佥事，任辽东总兵官。

① 本表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清太祖努尔哈赤兴兵起，按年月纪事。

王朝纪年	公元	大 事 纪 要
明隆庆五年	1571	土蛮掠辽东，李成梁击败其兵，明帝宣布辽东捷音，升赏官将。 明封俺答为顺义王。
明隆庆六年	1572	建州、王杲入市抚顺，不满明将所为，约诸部入犯。
明万历元年	1573	总兵官李成梁以招还人口，升祖职一级。
明万历二年	1574	建州王杲入掠六次，杀抚顺游击裴承祖。李成梁攻破王杲寨，斩一千一百余人，杲逃往哈达王台处。
明万历三年	1575	海西左都督、哈达部贝勒王台，缚王杲献明斩杀，晋龙虎将军。时王台势强，叶赫、辉发、乌拉及建州，皆归其辖束，领地近千里。叶赫贝勒扬吉努之幼女孟古格格生，后为努尔哈赤之妻，追尊为孝慈高皇后。
明万历四年	1576	扈尔汉生，后为“五大臣”之一，赐号达尔汉虾。
明万历五年	1577	努尔哈赤与父塔克世分居。此时，海西、建州女真各部，纷争混乱，“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
明万历六年	1578	努尔哈赤之长女东果格格生，母佟佳氏，后嫁何和礼。 李成梁连败土蛮，辽东大捷。
明万历七年	1579	李成梁以保边有功，封宁远伯，岁支禄米八百石。
明万历八年	1580	李成梁击败入掠的建州头人王兀堂，斩杀七百五十余人。 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生，母佟佳氏。

王朝纪年	公元	大事纪要
明万历九年	1581	李成梁再败土蛮。
明万历十年	1582	李成梁击败王杲之子阿台，斩一千余人。 海西哈达贝勒王台卒，其部日衰。
明万历十一年	1583	二月，李成梁攻破阿台的古勒寨，斩阿台，又击杀另一女真头人阿海，斩获二千余人。努尔哈赤之祖觉昌安、父塔克世为明军向导，被明兵误杀，明臣以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给努尔哈赤，袭都指挥使。 五月，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攻破仇敌尼堪外兰的图伦城。 七月，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生，母佟佳氏。 八月，努尔哈赤取萨尔浒城。 十二月，李成梁诱斩叶赫贝勒清佳努、扬吉努，斩获其属下一千五百余人。
明万历十二年	1584	正月，努尔哈赤取浑河部兆嘉城。 六月，取马儿墩城。 九月，攻栋鄂部长阿亥的奇吉砮城。未下。 取翁鄂洛城，授鄂尔果尼、洛科为牛录额真。
明万历十三年	1585	二月，努尔哈赤掠界凡，斩城主内申、巴木尼。 四月，攻哲陈部，败托木河、章嘉、巴尔达、萨尔浒、界凡五城联军。 五月，取苏克素护河部安图瓜儿简寨。
明万历十四年	1586	五月，努尔哈赤取浑河部播一混山城。 招服哲陈部托木河城，取鹅儿浑城，杀仇人尼堪外兰。明国自此每年赐努尔哈赤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和好。
明万历十五年	1587	正月，努尔哈赤筑费阿拉城，建衙门楼台。 六月，始定国政，严禁作乱窃盗欺诈，立法制。取哲陈部阿尔泰山城。 八月，取哲陈部巴尔达城、洞城。 十月，明攻哈达部，革其酋长蒙格布禄龙虎将军勋衔。 十一月，明辽东巡抚顾养谦奏称，“努尔哈赤益骄而为患”。 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生，母为大福金富察氏。

王朝纪年	公元	大事纪要
明万历十六年	1588	<p>正月，明辽东巡抚顾养谦奏称，努尔哈赤乃“建州黠酋也，骁骑已盈数千”。</p> <p>四月，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攻叶赫，破二山城，斩五百余人，布寨、纳林贝勒请降听抚，誓不再叛。努尔哈赤娶哈达万汗王台之孙女阿敏格格为妻。苏完部长索尔果、栋鄂部长何和礼、雅尔古寨主扈拉虎，率部来投。</p> <p>九月，努尔哈赤娶叶赫扬吉努贝勒之女孟古格格为妻。</p> <p>努尔哈赤取王甲城。</p> <p>基本统一建州，对明朝贡，互市领赏。</p>
明万历十七年	1589	<p>正月，努尔哈赤取兆嘉城，新城主宁古钦章京。</p> <p>六月，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生，母伊尔根觉罗氏。</p> <p>九月，明授努尔哈赤建州左卫都督佥事。</p>
明万历十八年	1590	<p>四月，努尔哈赤第一次入京朝贡，明廷宴赏如例。</p> <p>是岁，乌拉满泰贝勒之女乌拉纳喇氏生，后为努尔哈赤第三个大福金。</p>
明万历十九年	1591	<p>正月，努尔哈赤取长白山鸭绿江部。</p> <p>叶赫、哈达、辉发三部遣使建州，索地讹诈，逼令降顺，努尔哈赤断然拒绝，严厉驳斥。</p> <p>十一月，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解任，以昌平总兵官杨绍勋代之。</p>
明万历二十年	1592	<p>八月，努尔哈赤上奏文四道，乞升赏冠带敕书及龙虎将军职衔，并奏朝鲜杀死部众五十余人。</p> <p>十月，努尔哈赤第八子皐太极生，母叶赫纳喇氏。</p> <p>是岁，日军侵朝鲜，明应朝鲜国王请求，遣兵往救，努尔哈赤奏请率兵二万援朝，明廷未允。</p>

王朝纪年	公元	大事纪要
明万历二十一年	1593	<p>六月，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发兵，劫掠建州户布恰寨。</p> <p>九月，努尔哈赤大败叶赫等九部联军三万于古勒山，斩叶赫布寨贝勒，擒乌拉布占泰，自此声威大振。</p> <p>十月，取朱舍里部。</p> <p>闰十一月，努尔哈赤进京朝贡，宴赏如例。攻纳阴部佛多和山寨，围三月始下。</p>
明万历二十二年	1594	<p>正月，蒙古科尔沁部明安贝勒、喀尔喀部劳萨贝勒遣使建州通好。</p>
明万历二十三年	1595	<p>六月，努尔哈赤攻辉发，取多璧城。</p> <p>八月，舒尔哈齐进京朝贡，宴赏如例。</p> <p>十月，明游击胡大受遣人入使建州，令勿攻朝，努尔哈赤恭迎使臣，致书明臣，遵谕罢兵。</p> <p>十二月，朝鲜南部主事申忠一入使建州。</p> <p>是岁，努尔哈赤因“保塞有功”，被明帝晋封为龙虎将军。达海生。</p>
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	<p>正月，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在费阿拉城会见申忠一。申忠一著有《建州纪程图记》。</p> <p>二月，明游击胡大受遣人入建州晓谕，努尔哈赤致书胡游击，声称忠顺，保明边界，愿守国法。</p> <p>七月，努尔哈赤释布占泰，并立为乌拉贝勒。</p> <p>十二月，布占泰送其妹与舒尔哈齐为妻。</p> <p>是岁，努尔哈赤第十子德格类生，母富察氏。</p>
明万历二十五年	1597	<p>正月，叶赫、哈达、辉发、乌拉与建州盟誓结亲和好。叶赫布扬古贝勒以妹许与努尔哈赤。</p> <p>五月，努尔哈赤入京朝贡，宴赏如例。</p> <p>七月，舒尔哈齐进京朝贡，宴赏如例。</p> <p>十二月，明帝以内旨授李如松为辽东总兵官。褚英之子杜度生。</p>

王朝纪年	公元	大事纪要
明万历二十六年	1598	<p>正月，巴雅喇、褚英攻取安楚拉库，赐褚英“洪巴图鲁”称号。</p> <p>四月，土蛮掠辽东，总兵官李如松战死。</p> <p>十月，努尔哈赤入京朝贡，明廷命泰宁侯陈良弼宴待。</p> <p>十二月，乌拉布古泰贝勒入建州，努尔哈赤以舒尔哈齐之女厄石泰与彼为妻。</p> <p>是岁，代善之子岳托生。</p>
明万历二十七年	1599	<p>正月，东海兀吉部的虎儿哈部酋长王格、张格入贡建州。</p> <p>二月，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无圈点满文。</p> <p>三月，始冶铁及开金银矿。</p> <p>五月，应哈达蒙格布禄贝勒之请，派费英东领兵往驻，以防叶赫来侵。</p> <p>六月，明税监高淮至辽东，激变开原市民。</p> <p>九月，取哈达，俘孟格布禄，后藉故斩杀。</p> <p>十一月，努尔哈赤致书朝鲜国王，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p>
明万历二十八年	1600	<p>六月，广宁营军以索饷“鼓噪”。</p> <p>八月，辽东金得失起义，寻被镇压。</p> <p>是岁，舒尔哈齐之子济尔哈朗生。</p>
明万历二十九年	1601	<p>正月，努尔哈赤以三女莽古济格格嫁与孟格布禄之子乌尔古岱。</p> <p>七月，努尔哈赤子抚顺关外立誓，“誓抚勿答保寨”。不久，灭哈达。</p> <p>八月，明宁远伯李成梁复任辽东总兵官。</p> <p>十一月，努尔哈赤娶乌拉满泰贝勒之女阿巴亥。</p> <p>十二月，努尔哈赤至京朝贡，明泰宁侯陈良弼宴待。</p> <p>是岁，整编牛录，三百丁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管辖，旗分黄、白、红、蓝四色。</p>

王朝纪年	公元	大事纪要
明万历三十年	1602	建州歉收大饥，努尔哈赤请求朝鲜赈救并授与官职，朝鲜不允。
明万历三十一年	1603	<p>正月，努尔哈赤再以舒尔哈齐之女娥恩格格，嫁与乌拉布占泰贝勒。自费阿拉迁至赫图阿拉。</p> <p>五月，明九卿、科道、辽东抚按诸臣，劾奏税监高淮罪状。</p> <p>九月，努尔哈赤之妻叶赫纳喇氏孟古格格去世。</p>
明万历三十二年	1604	<p>正月，攻叶赫，取张城、阿气郎城而回。</p> <p>是岁，代善之子萨哈廉生。</p>
明万历三十三年	1605	<p>三月，复于赫图阿拉城外再筑大郭，发明煮晒人参法。</p> <p>七月，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生，母乌拉纳喇氏。</p>
明万历三十四年	1606	<p>五月，朝鲜国王奏请明帝谕建州来掠。</p> <p>八月，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巡抚赵揖，徙宽甸等六堡堡外垦地军民六万余户入内地，弃垦地八百余里与建州，并以努尔哈赤助徙有功而奏准赏赐银两。</p> <p>十二月，蒙古喀尔喀部巴岳特部恩格德尔台吉，引喀尔喀五部使臣进驼马，尊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即“恭敬汗”）。</p>
明万历三十五年	1607	<p>三月，舒尔哈齐、褚英、代善往迎东海蜚优城来归女真，乌拉布占泰发兵劫杀，于乌碯岩大败乌拉兵，褚英赐号阿尔哈图图门，代善赐号古英巴图鲁。</p> <p>五月，巴雅喇、额亦都等取赫席赫、俄漠和苏鲁、佛纳赫拖克索三处。</p> <p>九月，灭辉发。</p>

王朝纪年	公元	大事纪要
明万历三十六年	1608	<p>三月，明大学士朱赓等奏称：“建酋桀骜非常，旁近诸夷，多被吞并，恃强不贡”，“精兵业已三万”。褚英、阿敏破乌拉宜罕山城。</p> <p>六月，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解任回京。努尔哈赤与明辽阳副将、抚顺备御立誓刻碑，各守边境。</p> <p>九月，努尔哈赤以第四女木库石格格嫁与乌拉布占泰。</p> <p>十二月，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分率女真人入京朝贡，明廷宴赏如例。</p> <p>是岁，努尔哈赤以第五女嫁与额亦都之子达启。</p>
明万历三十七年	1609	<p>二月，先前努尔哈赤奏请明帝令朝鲜查送散入其境的瓦尔哈部女真，本月送回一千余户。建州贡使投书，阳挠勘地。</p> <p>三月，皇太极之子豪格生。</p> <p>努尔哈赤籍没舒尔哈齐部众财物，寻以其悔过归还。</p> <p>五月，明兵部尚书李化龙引辽东按臣熊廷弼言：“今为患最大，独在建奴。”</p> <p>六月，后金派兵五千驻扎抚顺关外，挟索参价。</p> <p>九月，击败来攻宁古塔城的虎尔哈兵。</p> <p>十二月，扈尔汉统兵往征瑚叶路。</p>
明万历三十八年	1610	<p>二月，扈尔汉取瑚叶路。</p> <p>闰三月，明以杨镐巡抚辽东。</p> <p>十一月，额亦都领兵掠兀吉部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带部众编户而回。</p> <p>十二月，额亦都率兵夺取雅兰路，获人畜一万。</p>
明万历三十九年	1611	<p>二月，努尔哈赤赐布与贫穷无妻的一千余诸申，以买娶妻子。</p> <p>六月，明兵部奏准，建州初以车价迟贡，后又以疆界停贡，今愿遵约束，许令按例入贡。</p> <p>七月，阿巴泰、费英东领兵取兀吉部乌尔古宸、木伦二路。</p> <p>八月，舒尔哈齐死，年四十八岁。</p> <p>十月，明颁给建州等卫“补贡夷人”努尔哈赤等二百五十名“双赏绢匹银钞”。</p> <p>十二月，何和礼等领兵，袭取虎尔哈部扎库塔城。</p>

王朝纪年	公元	大事纪要
明万历四十年	1612	<p>四月，努尔哈赤娶蒙古科尔沁部明安贝勒之女博尔济锦氏为妻，后称侧福金。</p> <p>五月，明以张承胤为辽东总兵官。</p> <p>九月，努尔哈赤征乌拉，取其临河六城。努尔哈赤指出：“若无阿哈，主何能生。若无诸申，贝勒何能生”。</p> <p>十月，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衮生，母乌拉纳喇氏。</p>
明万历四十一年	1613	<p>正月，努尔哈赤灭乌拉，布占泰贝勒逃居叶赫。</p> <p>二月，蒙古科尔沁部寨桑贝勒之女博尔济锦氏生，后为清太宗皇太极的永福宫庄妃，是清世祖福临的生母。</p> <p>三月，努尔哈赤废除褚英的执政，将其幽禁。</p> <p>九月，明边臣移书指责建州攻叶赫扰乱边境，努尔哈赤复书申辩，并将第十一子巴布海入质于明，明廷不纳。</p> <p>努尔哈赤征叶赫，取兀苏等十九城。</p> <p>十月，明派兵一千，助叶赫守城，斥责建州无故兴兵作乱。</p> <p>十二月，明以山西左布政使郭光复为辽东巡抚，努尔哈赤亲至抚顺，向城主游击李永芳呈书申辩。</p> <p>是岁，努尔哈赤令每牛录出十丁四牛，在闲地屯田。</p>
明万历四十二年	1614	<p>二月，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铎生，母乌拉纳喇氏。</p> <p>四月，明遣备御肖伯芝入建州，责令退地罢兵不攻叶赫，努尔哈赤表示遵命。努尔哈赤遣五百余人越边侵垦明地。代善、莽古尔泰分娶蒙古钟嫩贝勒、纳齐贝勒之女。</p> <p>六月，努尔哈赤致书明辽东巡抚郭光复，力表忠于明帝，尊重明臣，辩解没有为非作歹。皇太极娶蒙古科尔沁部莽古思贝勒之女博尔济锦氏为妻，后尊为孝端文皇后。</p> <p>十二月，努尔哈赤派兵袭击锡林、雅兰二路。德格类娶蒙古哈拉巴拜贝勒之女。</p>

王朝纪年	公元	大事纪要
明万历四十三年	1615	<p>正月，努尔哈赤娶蒙古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之女博尔济锦氏为妻。</p> <p>三月，遣贡使十五名至京朝贡，后遂绝贡。定八旗贝勒、官将、诸申婚娶杀牲例。</p> <p>四月，在赫图阿拉始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等七大庙，三年方完工。</p> <p>六月，明辽东总兵官张承胤遣人入建州，责令退出柴河、范河、三岔儿等处耕地，努尔哈赤被迫从命。叶赫布扬古贝勒将许与努尔哈赤之妹（“叶赫老女”），改嫁与蒙古喀尔喀部莽古尔岱台吉。</p> <p>八月，褚英诛。</p> <p>九月，蒙古明安贝勒之子桑噶尔寨台吉叩谒恭敬聪睿汗。</p> <p>十一月，努尔哈赤灭额赫库伦部。</p> <p>是岁，定八旗制度，设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都堂十员。申定兵猎法例。谕令举荐人才。再命牛录屯田。</p>
后金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	1616	<p>正月，八旗贝勒大臣尊努尔哈赤为“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一般简称英明汗），定国号为后金，年号天命。</p> <p>二月，明以陕西右布政使李维翰为辽东巡抚、山东副使袁应泰为辽东兵备参政。</p> <p>六月，遣扈尔汉击杀私入建州伐木的清河兵民五十余人。</p> <p>七月，扈尔汉领兵征黑龙江南北萨哈连部、虎尔哈部。</p> <p>十月，扈尔汉招服使犬部、诺洛部、实喇忻部。明升义州参将颇廷相为辽东副总兵、沈阳游击贺世贤为义州参将。</p> <p>十一月，扈尔汉回至赫图阿拉。</p> <p>十二月，以明辽东巡抚李维翰檄令交送杀戮清河伐木兵民的祸首，努尔哈赤被迫遵命“罚处牛马，悔罪认罪”，缚献“生事部夷”。</p> <p>是岁，努尔哈赤布告整个辖区，令国人植棉织布。开始饲蚕缫丝织缎。</p>

王朝纪年	公元	大事纪要
天命二年(明万历四十五年)	1617	<p>正月, 蒙古科尔沁部明安贝勒来谒, 努尔哈赤盛宴款待, 厚赐财帛。派兵往收东海沿岸散居女真。</p> <p>二月, 以弟舒尔哈齐之女, 嫁与蒙古喀尔喀部恩格德尔台吉。</p> <p>是岁, 归四贝勒皇太极专主的伊尔喀巴图鲁大臣, 以离间汗与其子的关系被诛。</p>
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	1618	<p>正月, 汗谕群臣, 决于本年征明。</p> <p>二月, 厚赐来投的东海使犬部等部的女真。</p> <p>三月, 令整修兵器养肥军马, 准备攻明。</p> <p>四月, 颁“兵法之书”, 宣布“七大恨”, 取抚顺、东州、马根丹三城及台堡五百余, 获人畜三十万, 降游击李永芳, 斩杀明辽东总兵官张承胤、副总兵颇延相。</p> <p>闰四月, 明以杨镐为辽东经略。努尔哈赤以孙女嫁与李永芳, 尊称“抚顺额驸”。</p> <p>五月, 后金军攻明, 取抚安堡、三岔儿等十余堡。</p> <p>六月, 明革辽东巡抚李维翰职为民。明边臣遣人来议和, 索被掳人口, 不允。</p> <p>七月, 后金军下清河。</p> <p>八月, 努尔哈赤遣诸贝勒拖克索中八百名耕田阿哈往嘉木和打谷。</p> <p>九月, 明兵袭杀打谷的耕田阿哈七十。努尔哈赤遣兵掠明会安堡, 斩屯民三百, 致书明臣说: 若你窃杀我耕田阿哈一百。我将杀你耕田阿哈一千。始筑界凡城。明始加派辽餉, 亩增三厘五毫, 共银二百万两。</p> <p>十月, 努尔哈赤厚赏东方虎尔哈部来归部纳喀达等人。</p> <p>十一月, 叶赫金台石贝勒派兵袭辉发城。</p>

王朝纪年	公元	大事纪要
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	1619	<p>正月, 努尔哈赤攻叶赫, 破克伊特城, 明兵来援。致书明国, 以封王、解七大恨、给敕书一千五百道、加赏金银为罢兵条件。穆哈连带兵收取东海虎尔哈散处部众。明兵部奏准, 刊印“擒奴榜文”: 擒斩努尔哈赤, 赏银一万两, 升都指挥使世袭。</p> <p>二月, 努尔哈赤派役夫一万五千人修筑界凡城。明经略杨镐于辽阳誓师, 大军十万, 兵分四路, 约定于三月初一会攻赫图阿哈。</p> <p>三月, 后金军大败明军于萨尔浒。</p> <p>四月, 后金筑界凡城。</p> <p>五月, 努尔哈赤设大宴, 四大贝勒始坐于凳与宴。朝鲜国王遣使人后金, 劝金与明和好。</p> <p>六月, 努尔哈赤盛宴款待东海虎尔哈部降民。攻陷开原, 惩治违反军令官将, 大赏群臣。迁驻界凡。明令熊廷弼为辽东经略。</p> <p>七月, 八旗贝勒、大臣、官将遵照汗谕, 立誓效忠于汗。明千总金玉和等来降, 受重赏擢升。后金军攻取铁岭, 生擒蒙古喀尔喀部斋赛贝勒。</p> <p>八月, 努尔哈赤灭叶赫, 统一了建州海西女真各部, 辖地自东海至辽边, 北自蒙古嫩江, 南至朝鲜鸭绿江。明逮问辽东经略杨镐。</p> <p>九月, 明从辽东经略熊廷弼请, 以李怀信代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官。</p> <p>十月, 蒙古察哈尔林丹汗来书, 蔑视后金, 胁令勿攻广宁。</p> <p>十一月, 努尔哈赤与喀尔喀五部蒙古盟誓和好。派骑兵进入开原收获粮谷。</p> <p>十二月, 努尔哈赤遣还斋赛之子克什克图。明再加派辽饷。</p>

王朝纪年	公元	大事纪要
天命五年(明万历四十八年, 泰昌元年)	1620	<p>正月, 努尔哈赤遣使致林丹汗书, 讽刺其冒充大国, 屡败于明。</p> <p>二月, 释放斋赛之子色特希尔台吉。</p> <p>三月, 改官制, 论功序爵, 列总兵官之品为三等, 副、参、游亦同, 牛录额真俱为备御。众额真、一等大臣费英东死。释放色本贝勒。修筑尚间崖、扎克丹、德立斡赫、温德恩等城。达海巴克什以罪受惩。以窃财帛为口实, 休离大福金富察氏。建萨尔浒汗、贝勒府宅, 代善与父发生争执。明复加派辽餉。</p> <p>四月, 努尔哈赤致喀尔喀五部贝勒书。</p> <p>五月, 后金军略明花岭山城, 掠王大人屯, 挖取窖藏粮食。</p> <p>六月, 努尔哈赤立木于汗宫门外, 许国人上书。派人往东海煮盐。入明边掠抚顺粮谷。明经略熊廷弼奏: “奴贼招降榜文一纸, 内称后金国汗, 自称曰朕。”</p> <p>七月, 萨尔浒之战被俘的朝鲜从事李民寅获释回国, 著有《建州闻见录》、《栅中日记》。致朝鲜国王书。明万历帝死。</p> <p>八月, 后金军取明蒲河、懿路二城。明以袁应泰为辽东巡抚。泰昌帝立。</p> <p>九月, 穆尔哈齐死。由界凡迁至萨尔浒城。太子代善被废, 立八和硕额真。明泰昌帝死, 天启帝立。明罢熊廷弼辽东经略。</p> <p>十月, 努尔哈赤遣人往取东海所煮之盐。明以袁应泰为辽东经略。</p>
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	1621	<p>正月, 汗率诸贝勒对天焚香立誓: 今后家人之中不开杀戒。</p> <p>二月, 后金军掠明奉集堡。以东海所煮之盐, 按丁分与国人。闰二月, 萨尔浒城竣工。努尔哈赤训斥扈尔汉。下达禁止虐待阿哈的汗谕。</p> <p>三月, 后金军下沈阳、辽阳及辽河以东七十余城, 进驻辽东。努尔哈赤致朝鲜国王书, 署名“后金国汗”。</p>

王朝纪年	公元	大事纪要
		<p>努尔哈赤致喀尔喀五部书。大赏八旗官兵。驱逐辽阳城中反抗的汉民出城。迁都辽阳。释狱囚，复下狱汉官原职，设八游击、二都司，管理汉民事务。明起用熊廷弼。</p> <p>四月，对辽东汉民宣布实行“各守旧业”政策。令将明朝法例删节呈报。明以宁前道王化贞为辽东巡抚。</p> <p>五月，定诉讼审理程序。众额真、总兵官额亦都死。派兵镇压镇江拒降军民。辽阳、海州汉民投毒于井，反抗后金。</p> <p>六月，任命管理贸易的额真。谕令八旗官兵严防汉民在食物中投放毒药。重赏贡献金天会帝铸造之钟及陶碗的汉民。升游击爱塔为参将。萨哈尔察部来贡貂皮。明以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p> <p>七月，努尔哈赤致朝鲜国王书。命八旗设八巴克什为师傅，教入学儿童。颁行“计丁授田”谕。镇江民起义，执守城游击，二贝勒阿敏带兵前往镇压。</p> <p>八月，喀尔喀五部送牲畜一万来赎斋赛，盟誓后释放。始命筑辽阳新城，称为“东京”。</p> <p>九月，努尔哈赤罚扈尔汉督堂银。革阿敦督堂职，幽禁于狱。准辽东商人继续开店经商。升参将爱塔为副将。命乌尔古岱额驸迎接朝鲜来使。</p> <p>十月，谕令女真不得侵扰汉民。</p> <p>十一月，以索取济尔哈朗等贝勒财物，革扈尔汉督堂职，降为三等总兵官，监禁济尔哈朗等贝勒三日。重申费阿拉八旗集会朝见旧制。停止明朝按户征役旧制，实行计丁征兵金役制度。蒙古喀尔喀部古尔布什、莽果尔台吉来归，厚赏擢任。下令迁徙镇江、凤凰等处汉民至萨尔浒一带。</p> <p>十二月，下令清查粮谷，女真与汉民同吃同住。赏八旗教书尼堪外郎银各三两。明辽东“经抚不和”。</p>

王朝纪年	公元	大 事 纪 要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	1622	<p>正月, 努尔哈赤谕斥李永芳等汉官在迁民时贪婪不法。致朝鲜国王书。将辽东汉民分隶八旗官将。赐平虏堡民与蒙古恩格德尔额駙。贬副将额尔德尼巴克什为闲人。</p> <p>后金军破西平, 大败明军, 取广宁, 获粮五十万石。大赏八旗官兵。</p> <p>二月, 后金迁辽河以西广宁、锦州等九卫汉民入河东居住。</p> <p>大贝勒代善杀义州拒降汉民。调派一万辆牛车, 赶运明右屯卫存粮。蒙古明安等贝勒率三千余户来归, 厚赏。明逮王化贞, 罢熊廷弼职, 以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预机务。</p> <p>三月, 努尔哈赤谕定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令辽东新旧汉民与女真合住同食共耕。筑东京城。在辽阳修喇嘛庙塔。明以王在晋为经略。</p> <p>四月, 汗、贝勒与来归的蒙古贝勒结为“亲家”。发布汗谕, 提出北京应由女真与汉人轮流居住。</p> <p>五月, 明从镇江袭击后金汤站等地。</p> <p>六月, 努尔哈赤改定官制, 委任审案、管理军、民、财经诸事的各级官员。复布山总兵官职, 降三等总兵官扈尔汉为一等副将。诸贝勒定, 废除穿刺耳鼻之刑。令店主书名立牌于店前, 以防投毒, 加紧稽查。明加毛文龙署都督金事平辽总兵官。</p> <p>七月, 一等大臣硕翁科罗巴图鲁安费扬古死。明以袁崇焕为监军道兵备副使。</p> <p>八月, 明以大学士孙承宗为督师, 经略辽东军务, 定守宁远之议。</p>
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	1623	<p>正月, 蒙古喀尔喀部巴克贝勒来贡。汗谕规定诸申以贝勒大臣为父, 阿哈以主为父。废除八旗大臣各自打牲旧例, 改为集中分配猎获物。明赐辽东总兵官马世龙尚方剑。</p> <p>二月, 努尔哈赤任每旗督堂一人, 女真断事官二人, 蒙古、汉断事官各一人。规定每年每丁交纳官赋银三两。招劝蒙古恩格德尔额駙定居辽东。</p>

王朝纪年	公元	大事纪要
		<p>许以厚赏。规定官牛一头每岁收租谷五石。督堂令每三百丁运二百石谷。明赐平辽总兵官毛文龙尚方剑。</p> <p>三月,扈尔汉上书汗父,乞求宽恕起用,不允。规定各贝勒用东珠的数量。</p> <p>四月,定每牛录一百甲中的摆牙喇、黑营等兵士及炮枪刀车等兵器的种类和数量。禁止辽东汉民制造、买卖兵器。征喀尔喀扎鲁特部,斩昂安贝勒。</p> <p>五月,努尔哈赤杀额尔德尼,赐扬古利一等总兵官世职敕书。</p> <p>六月,后金军镇压复州汉民起义。</p> <p>痛斥抚顺额驸李永芳“心向明国”。革乌尔古岱督堂职,降为备御。严责四贝勒皇太极,训诫济尔哈朗、德格类、岳托三贝勒。谕诫诸格格不得恣意骄纵。规定八贝勒各存一档,升降官将八档同记。</p> <p>七月,努尔哈赤革李永芳总兵官职,三日后再复职,降副将爱塔为参将。镇压岫崖反金汉民。规定对汉民以“八贝勒文书”下达,取消以督堂文书下达之例。</p> <p>八月,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上书自责。</p> <p>九月,努尔哈赤取皇太极二牛录,调拨汗、贝勒牛录,卖仓谷与民,每板升银一两。诸贝勒定蒙古来卖牛羊之价。</p>
天命九年(明天启四年)	1624	<p>正月,蒙古恩格德尔额驸偕妻、弟、子、侄定居东京,汗、贝勒盟誓,世予厚待,赐与庄园、奴仆、财帛。扈尔汉死,其子浑塔降袭一等副将。清查汉民粮谷,追捕杀戮“无谷之人”。</p> <p>二月,巴雅喇贝勒死。诸贝勒与蒙古科尔沁奥巴台吉盟誓和好。</p> <p>四月,努尔哈赤移景祖、显祖、孝慈皇后陵及袞代皇后、褚英灵柩,葬于东京。</p> <p>五月,明毛文龙遣兵入辉发,被守兵击败。蒙古科尔沁部台吉桑噶尔寨,送女嫁与多尔</p>

王朝纪年	公元	大事纪要
		<p>袭。</p> <p>八月，一等大臣、总兵官栋鄂额驸何和礼死。袭毛文龙所据之岛，斩五百余人。</p> <p>九月，明袁崇焕筑宁远城竣工。</p>
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	1625	<p>正月，朝鲜韩润、韩义来降，分授游击、备御。遣博尔晋征东海瓦尔喀部。取旅顺，毁其城。努尔哈赤以第八女松郭图格格，嫁与古尔布什。</p> <p>二月，蒙古科尔沁斋桑贝勒之女博尔济锦氏嫁与皇太极，后尊为孝庄文皇后。</p> <p>三月初三，迁都沈阳。</p> <p>四月，努尔哈赤厚赏征东海瓦尔喀回来的八旗官兵。</p> <p>五月，努尔哈赤以“银子充足，不必使钱”，令停铸铜钱。在汗宫门外安报警装置，规定夜间报警信号。定称汗的称呼，女婿称“岳父贝勒”，近身虾及为首诸大臣称“父贝勒”，国人称汗。</p> <p>六月，努尔哈赤遣兵出征瓦尔喀部。</p> <p>击败毛文龙夜袭耀州之兵，授有功之女真妇女青加奴和那代之妻为备御。</p> <p>八月，努尔哈赤宴迎和厚赏出征瓦尔喀、卦尔察部归来的官兵。</p> <p>九月，后金军击败谋袭耀州的明辽东总兵官马世龙部队于柳河。科尔沁奥巴台吉以林丹汗来攻，求援。</p> <p>十月，后金大杀反金汉人，编立大批拖克索，杀余的汉民尽行没为阿哈，编隶庄园。明孙承宗罢官。</p> <p>十一月，遣兵解科尔沁奥巴台吉之围。</p>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	1626	<p>正月，努尔哈赤率军十三万攻明，围宁远城，被明宁前道袁崇焕击败。取明觉华岛，焚其船只粮草而还。</p> <p>二月，努尔哈赤痛称：“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满怀忿恨，回到沈阳。</p> <p>三月，明升袁崇焕为辽东巡抚。</p>

王朝纪年	公元	大 事 纪 要
		<p>四月，努尔哈赤以蒙古喀尔喀五部背盟，率师往征，四贝勒射杀其贝勒囊努克。</p> <p>五月，奥巴台吉来，努尔哈赤以养孙女朮哲格格嫁与为妻，击败来攻鞍山、萨尔浒的明毛文龙部队。</p> <p>六月，与蒙古科尔沁部奥巴台吉盟誓和好，封奥巴为上谢图汗。汗训谕八旗贝勒。</p> <p>七月，努尔哈赤以病，往清河温泉休养。</p> <p>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享年六十八岁。</p>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暱倬砍癰

L =

计 = 4 3 9

S S 腹 = 0

) ㄋ 戳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